曾彦修访谈录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记录整理





我希望有一天，
读者打开这本书时，
能够透过惊雷般的事件，
读到一颗**痛苦、不屈、希望的心。**

——沈昌文

这是一部口述实录。讲述者曾彦修从童年十一二岁讲到九十岁。八十年的时间跨度，也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半个世纪。

人民文学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曾彦修访谈录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记录整理



我希望有一天，
读者打开这本书时，
能够透过惊雷般的事件，
读到一颗**痛苦、不屈、希望的心**。
——沈昌文

这是一部口述实录。讲述者曾彦修从童年十一二岁讲到九十岁。八十年的时间跨度，也是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大半个世纪。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曾彦修（1919—2015），编辑出版家，杂文家，笔名严秀。1919年生，四川宜宾人。1937年12月到延安，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延安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42年初至1943年夏，在陕北及晋西北做农村调查，后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49年秋南下广东，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广州《南方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1957年被划“右派”。1959年“摘帽”。1960年到1978年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做编务工作。1979年任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1983年退休。著有《严秀杂文选》《审干杂谈》《牵牛花蔓》《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半杯水集》《入党往事略》《论睁眼看世界》等。

李晋西，作家。出版口述历史作品有《我们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大馆奴——樊建川的记忆与梦想》等。

曾彦修访谈录



曾彦修　口述
李晋西　记录整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彦修访谈录/曾彦修口述；李晋西整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ISBN 978-7-02-015649-8

I.①曾…II.①曾…②李…III.①曾彦修（1919—2015）—访问记 IV.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94106号

责任编辑 付如初

装帧设计 刘 远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1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3.25 插页3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20年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649-8

定　　价 4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代开场白
- 第一编
  - 第一章 家族与我（1919年6月—1930年）
    - 1 我们曾家十几户，只有我父亲有职业
    - 2 谈到家乡，我感到非常惭愧。我成了一个永远的“望乡”人
    - 3 少年时代：我成为家庭多种事务的担当者，买鸦片、进当铺更是内行
    - 4 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
    - 5 哥哥给了我政治方向
  - 第二章 世界观的形成
    - 6 十岁左右，我读了些旧小说
    - 7 上高小后，文学对我的影响：郭沫若、鲁迅、茅盾
    - 8 我家有个百家争鸣的小图书馆
    - 9 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
    - 10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还有这些事情
  - 第三章 逐渐走上去延安之路（1931年—1937年11月）
    - 11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响我一生的两个老师
    - 12 初中毕业考试第二名，进了卢作孚在北碚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 13 高中：我搞了两期壁报。地下工作，无师自通
    - 14 决定到延安去
    - 15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块，这是老虎吃天啊
    - 16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绍信
    - 17 一起集议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赵世英、戴碧湘、何郝炬等
    - 18 我们是如何到延安的
    - 19 两点申明
- 第二编
  - 第四章 在延安（一）（1937年12月—1941年12月）

- 20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
- 21 陕北公学三门课，学习过程中又反复写自传
- 22 入党，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
- 23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学员非常参差不齐
- 24　马列学院重量级的老师：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康生、陈云、李富春、艾思奇、杨松、陈昌浩等
- 25 专学习联共党史，错误影响不少
- 26 为什么马列学院办不下去了
- 2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开始大读闲书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

- 28 统一思想、舆论
- 29　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当时他不是中央委员
- 30 开始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 31 张闻天的去与留

第六章　跟随张闻天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调查（1942年1月—1943年4月）

- 32　陕北神府县贺家川口：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 33 晋西北兴县：我不会按地方意图去写调查报告
- 34 从田家会战斗谈到敌后的抗战
- 35 张闻天的调查意见没有被采纳
- 36 陕北米脂县：这次调查带点学术性质
- 37　绥德县：我的一个小调查报告，张闻天觉得有点意思
- 38　　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印了张闻天的农村调查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风“抢救”时的情况（1943年5月—1945年7月）

- 39 回延安后，情况很不对了，跟离开时完全不一样
- 40 “抢救”柯庆施
- 41 我被“抢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务”

    - 42 “抢救”运动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问题
    - 43 “抢救”运动后的概况：种地，纺线，大演戏
  -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1945年8月—1947年2月）
    - 44 “王明路线”一词是进北京后才听说的
    - 45 抗战胜利，中央工作紧张，似未有大规模庆贺
    - 46 延安大撤退：宣传部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
  -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1947年3月—1948年6月）
    - 47 参加土改工作团
    - 48 雁门关外的朔县土改：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土改是不妥当的
    - 49 临县郝家坡土地会上，康生说“你们这个划分阶级的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 50 郝家坡会结束后，我回到朔县补课，大错特错
  - 第十章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到河北山东土改（1947年7月—1948年5月）
    - 51 从山西兴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为老同志服务
    - 52 全国土地改革会议
    - 53 河北饶阳土改：斗争目标已不明确了
    - 54 有头无尾，把麻烦丢给后来的人
    - 55 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继续土改
    - 56 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我们提醒他，你不要随便讲
    - 57 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1948年6月—1949年3月）
    - 58 在东柏坡做书箱，保证了延安撤退时埋藏的部分运到了北京
    - 59 在西柏坡小新华社
- 第三编
  - 第十二章　进北京，下广州。在广州只是一个“官”（1949年3月—1954年3月）

- 6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准备南下
- 61　叶帅、方方谈话，改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领导看来很满意
- 62 代表叶剑英签报纸大样
- 63 陶铸要用我，但不得不让我去治疗关节炎

第十三章 在广州勉强做了四五样事

- 64 半夜给“203”打电话
- 65　侨乡调查：这么多楼房是侨汇建起的，不应该侵犯它们
- 66　云浮县土改：改变死命令；小老婆、丫头等问题我决定妥协处理
- 67　　紧急开支部大会，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流眼泪。我绝不相信有半个“老虎”
- 68 我这个错误不讲，人家不知道：戏改
- 69 对香港有关事务问题的建议，对大学问题的建议

第十四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1954年4月—1956年12月）

- 70　调人民出版社工作，没有任何人跟我谈过话，我也没有问
- 71　把一些浅薄低级的纯苏式教条的东西，想法用各种方式停止出版了
- 72　大请京派学者们吃饭，同时积极翻印一些有影响的旧书
- 73　权力能达到的地方，想办法开开窗户，透点新鲜空气

第十五章 人民出版社的批胡适、批胡风

- 74　批胡适，经历了一段瞎忙。出的书，我一个字未看过
- 75 反胡风，我们单位算是没有胡风分子

第十六章 人民出版社的“内部肃反”

- 76 正式消除了对不少人的怀疑
- 77 把上面抓得最紧的对戴文葆的怀疑彻底取消了
- 78　秘密监管张惠卿，我这个五人小组组长竟然全不

知道
- 79 他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吗
- 80 “虽然我因你而受到更厉害的批斗，但我从内心感激你”
- 81 “肃反”涉及的另外几个人

○ 第十七章　“反右派运动”兴起，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号《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吧
- 82 吹风会上听到陆定一、周扬传达毛主席不断批左的意见
- 83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了些什么
- 84 会上发了《草木篇》，立即又收回
- 85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大大夸奖姚文元，大家都反感极了

○ 第十八章　我这个“反右”五人小组组长，绝没有整别人一点点，首先把自己报成右派（1957年1月—1960年6月）
- 86 人民出版社的“×、×事件”
- 87 内部通知片片来
- 88 我的右派“根据”：黑板报上的“谈话”，《人民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 89 田家英确曾暗示过我，少说点
- 90 中央级的新闻、出版社的负责人，似乎没有一个跑掉的，一锅端
- 91 报右派名单，我把自己报上去。我自高自大想，我一个是不是可以顶两个呢
- 92 今天可以明确地说，对我的批判完全是我不得不设法拖延时间的
- 93 要我性命的控告来了，形势超级严峻，似乎是准备当场逮捕
- 94 党内的右派状元，但对我的处理很轻
- 95 可能因为我的原因，人民社划右派的比例很高

○ 第十九章 “大跃进”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
- 96 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大炼钢铁，专代抄大字报

        - 97 “三年自然灾害”
- 第四编
    - 第二十章 在上海辞海编辑所（1960年6月—1964年9月）
        - 98 调七八十个右派，结果只调去了两三个
        - 99　提意见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
        - 100 石西民总结了《辞海》的根本大法
    - 第二十一章　我在“四清”中为三十个工人彻底平了反，至今负责（1964年10月—1966年5月）
        - 101　车间审查部分工人政治历史，不得不全部由我负责，全部无事
        - 102　被怀疑是特务的小资本家，其实是解放前救过地下党员的同情分子
        - 103　说人家是汉奸反革命，其实是抗战时我们派出的“两面村长”
        - 104 一个真新四军，长年被怀疑是特务分子
        - 105　被认为是“滥权”病退了女工的女支书，差点被开除党籍
        - 106 “劝退”党的会上，临时暗中紧急改变“劝退”决定
    - 第二十二章 半饥半饱，强作风流
        - 107 我的关节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
        - 108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么度过业余时光的
    - 第二十三章 “文革”早期：牛棚虐事（1966年6月—1969年9月）
        - 109 什么人进“牛棚”
        - 110 打扫厕所的学问，我可以写一本很不错的小册子
        - 111 天天早晚请罪中之千奇百怪
        - 112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车，后来全不准坐
        - 113 不准在食堂吃饭
        - 114　天天读：他们干出来的恶事，不应该是人类想得出来的
        - 115　除了搬大餐桌，我还要在广告牌上贴批判我的大字报，既有生命危险，又污辱人

- ○ 第二十四章　“文革”中期：三年干校劳动（1969年10月—1972年3月）
  - 116 在奉贤县海边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相当紧张
  - 117 平常看见我是一把骨头，一劳动，样样会干
  - 118 我跟郑炳中（耿庸）做管水员
  - 119 捞水藻、捞水浮莲、拉大车、倒石子
  - 120 挑水，淘猪圈，冲盐碱
  - 121 表面上对我要大整，重要的问题反而要请教我
  - 122 用各种劳动去代替各种强迫思想“改造”
  - 123 在宽宽的田埂上，吸着“劳动”牌香烟，作作打油诗消遣
- ○ 第二十五章 “文革”后期：心如死灰（1972年4月—1977年6月）
  - 124 闲散人员，一当就是六年
  - 125 那个时候就是绝望，不是等死，是等被捕
  - 126 这几天不对头，杀气腾腾，他们动手了，我准备牺牲了
  - 127 本单位宣布“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会上，负责人却专骂右派
  - 128 一辈子有三件最快乐的事情，我都看见了，幸何如哉
- 第五编
  - ○ 第二十六章　调回北京到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1977年7月—1979年7月）
    - 129 交给于光远关于六十一个人和张闻天的证明材料
    - 130 调回北京的经过
    - 131 重新入党申请书确实难写
    - 132 在大百科全书待了大半年，感觉能力实在太不够了
  - ○ 第二十七章　回人民出版社：“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风波（1979年8月—1984年12月）
    - 133 到人民出版社的任职与辞职
    - 134 为什么要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

- 135 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简单经过
- 136 胡耀邦立即批示，赞成“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计划

○ 第二十八章 “台风”的经过与我的三万言《申诉书》

- 137 事情是这样起来的
- 138 ×××与我的总分歧：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
- 139 比利时的曼德尔，跟中国的大权威开了一个大玩笑
- 140 现在还能坚持布哈林是个反革命分子吗？太怪了
- 141 人民出版社还有个“反苏”问题（指契尔年科时期）
- 142 是否应该了解外国党（外国共产党）
- 143 我在《申诉书》里反复要求×××道歉

• 第六编

○ 第二十九章 张闻天：有才有识，大公无私，朴素谦逊，但是比较软弱

- 144 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
- 145 西安事变，最早主张全面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
- 146 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首先提出应有继承的因素在内
- 147 在延安马列学院院长这段时间，我认为张至少不全是过
- 148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农村调查
- 149 至少张在表面上也已卷入了个人崇拜的巨潮中
- 150 “文革”期间在六十一个人问题上的崇高表现
- 151 逝世早了三个多月，给世人留下永远的悲哀

○ 第三十章 有才无德的康生

- 152 知识广博
- 153 他是个害人狂
- 154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 155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 第三十一章 陈伯达：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 156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 157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 158 陈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 159　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第三十二章 陆定一：才、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 160 几乎一生都任宣传部长，但留下的著作并不多
- 161 教我们的是政治，不大讲技术
- 162 进北京城以前，叫我做过三件小事
- 163 我弄不清“双百”方针最早是谁提出的
- 164 他为我题字，我能做到一点点就好了

第三十三章 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 165 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
- 166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
- 167 调我到中宣部去
- 168 同田家英到胡乔木的窑洞里编语文课本
- 169 审查我编的十本小册子
- 170 “不必回宣传部了，就跟新华社到北京吧”

尾声 我对两个“和谐”问题的一点看法

-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
- 二、两个“和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 三、两个“和谐”从理论上保证了中国在政治上不会有倒退的前途

代开场白

诚实之花

一位禅师为挑选自己的衣钵传人，发给众多的门徒每人一包花籽，宣布谁种出的花儿最美丽，就传位给谁。

比花的时候到了，众人各自捧着盛开的鲜花，来见禅师。只有一位弟子捧着空花盆，神情坦然地站在一旁。最后禅师将衣钵传给了这位弟子，原因是他的花盆装满了诚实之花。原来禅师给大家的花籽全是煮过的，根本就不能发芽。

（2011年1月《参考消息》摘引自台湾《禅心学院》）

第一编

第一章 家族与我（1919年6月—1930年）

1 我们曾家十几户，只有我父亲有职业

我一九一九年出生在四川川南长江边的宜宾县城内，现在九十岁，说老也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路是不大能走了，唯一的是脑筋还没有完全坏。

我们是客家人，是从广东河源县迁移到四川的。清廷初建时，四川几乎是空的。现在历史不讲真话，其实是张献忠及部下杀干净的。现在我们的历史反过来讲，说是清兵杀干净的。这说不通，一个统治者把人都杀光了，它统治什么呢。能够认识到，并坚持是张献忠杀光的，是鲁迅和郭沫若。对此我很佩服。

我们曾家十几家人，原来都是穷苦人，不知怎么去到了四川宜宾县。但这些人后来怎么会统统都变成了官僚、小地主，我就不知道了。这十几家中，有两三家是做官的，还做得不小。我有个伯父，他们家门口悬有大金匾："大夫第"。是什么官？我不知道。但是从他们家房屋的排场看得出来，官很大。我们家的门口，也有个牌子，写有类似"进士第"这样的字。这个字牌是清朝时期模样的，很小，边上有花，有金。这进士是谁？是我祖父的一个兄长。我曾祖父很久没有男孩，依照宗法关系，就必须过继一个男孩来。他就过继到我们这房来，成了我名义上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他。据说他后来成了太原府知府，又据说在义和团时，他支持义和团。八国联军来后，支持西太后的都杀头了，他差点被杀头。在他过继到我们家后，我的祖父出生了，他又回到他的那房去。但是依照宗法关系，他还是属于我们家的正宗。所以，那一套做官时的东西统统放到我们家。他的那顶呢轿，那些回避牌等等，我都在我家楼上看见过。

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我们北门外这十几家人，政治势力全没有了，

全成了破落户。十几家中，跟我父亲一辈的人，大概有二三十个，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有职业。

我十七岁最后离开宜宾前，我们曾家在宜宾北门外有十好几户。十几家人中，没有一个人劳动，没有一个人干事情，完全靠收一点地租过活，全部是破落户，穷得很。我们家父辈三弟兄，大概共收十来石租，一石三百斤，十石三千斤。当时是送租。所谓送租，并不是送米来，都是到时农民送钱来，有时也送米，是送新米。我父亲三个兄弟，每个人留几石。我们家里收的租，合毫洋大概二三十元，与生活来源无甚关系了。其他十几家，是靠收租过日子。全都是破落地主。那时，租佃关系也似乎没有什么争斗，农民自己送来。我们这十几家人，大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田在哪里。如果人家不给你送来，你也没有办法。

我父亲曾海如，最初当布店学徒，后来当银号学徒。银号就是旧时的银行，也兼做生意。四川的银号都兼做生意，而且只做大生意。我父亲开始一个月有四五十块毫洋（毫洋一元二角兑一块大洋），慢慢增加了。后来，我父亲出资一千元，自己开银号，当第一号老板，做最大的股东。当时开这个小银号，一共两千元。大概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前，我父亲就破产了。破产的原因大多是地方军阀筹款，款越派越多。地方军阀筹款的对象，一个是钱庄，一个是山货庄，一个是绸缎铺，还有鸦片行。

破产后，我父亲到重庆的一家小银号当副手，名义上是第二把手（副经理），其实是第一把手（经理）。经理是个秀才，代表资方而已。过去的银号就四五个人，做生意都在外边跑，又叫“跑街”，银号的业务大，人员少，所以伙食好极了，好得无法想象，好到现在你想到市场上去买来做一顿都绝对办不到。像海参、鲍鱼、鱼翅、大虾米、云南火腿，今天都不常吃到，那时内地的大县城都有。银号里有个专门做饭的，家家银号一样。我估计，这是中国的传统。

因为我家里父亲工作，有收入，生活就完全不一样，父亲每个月寄四十毫洋回来。我去取过几年，是在一个卖鸦片兼银号里取的。当时我十一二岁，我哥哥姐姐都去读书住校了，我必须去取。

从广东移民的十几家，能够全挣扎出来的，那时就是我们这一家。

原因就是读书，不读书，不读外面的报纸、杂志，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光上私塾就变不了。尽管读《诗经》《左传》，但不知道外面世界，便什么也改变不了。我父亲到重庆后，订了许多上海的书报，我们都能看到。

在宜宾，我们曾家老一辈，包括我父亲那一辈，抽鸦片很普遍。比我出生早二十年、十几年的，怕有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抽。我父亲三兄弟，包括最靠近的堂弟都抽。这种情况，现在很多人不太知道。在四川抽鸦片，比抽香烟还要普通，根本不算一回事。我们那一带的强体力劳动者，大多抽鸦片，以振奋一时，抬滑竿的、拉船的、码头工人，大多抽。香烟刚传到宜宾县城时，也有几个中青年手中夹根纸烟，却被视为浪荡公子，抽鸦片呢？彼此彼此。如果这家没有人抽鸦片，才成了怪事。不但男的抽，我母亲，还有两个婶母也抽。这些抽鸦片的家是不是都破烂得不成样子呢？不是。那时抽不稀奇，不抽点鸦片似乎身份不够似的。当时鸦片不太贵。但是，要饭的、路毙的也很多。

我们曾家从官僚地主，变成破落地主，变成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最后连肚子都吃不饱，也不劳动，成了城市贫民，也不想办法赚几个钱，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全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现在的青年不知道曾有这样的社会，因为活到九十岁，我就知道我们家乡的这种情况。这个社会是腐烂的，腐烂透了，这种腐烂是不声不响的。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不如现在北京或者上海领救济金的人，买米都是一斤半斤的买，但是要抽鸦片。清末时期，还没有变化，到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还是这种情况。旧中国如果不发生变动的话，这个社会不腐烂下去才怪。不光是我们曾家，北门外还有几个姓，姓龙的，姓李的，情况都类似。所以，中国这时的社会，不改造，确实是要彻底腐烂的。

阻止腐烂的任务国民党未能承当而由共产党承当了。当然，后来中共的有些手段有点过分激烈。但是，中国这样行将腐烂的社会，不是靠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领导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进行多年武装斗争，又怎么挽救得过来呢？

教会势力大——

四川宜宾是岷江与长江汇口的地方。宜宾以上，一般叫金沙江，宜宾以下，叫长江。金沙江，因为沙子里面可以淘金，叫金沙江。金沙江水流很大。宜宾北门这边有岷江，又称锦江，是从成都流来的，所以我们的县城成了金沙、锦水汇合的地方，可谓中国第一佳城。我们坐轮船到重庆，再从重庆坐船到上海，很方便。宜宾在川西南，处于川、滇、黔三省接合部，纬度跟浙江温州差不多，富庶无比。

我一九三六年冬天回过一次家乡，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所以，现在谈到家乡，感到非常惭愧。我像个忘本的人。原因何在？这跟我的关节炎，跟行动不太方便分不开。一个人出去，什么都要人家服务，所以我无法行动。一九五七年后，我成了国事犯了，怎么还能回去？回去要被立刻驱逐出境也说不一定。那是政治使然。

解放前，我们家乡外国人的势力特大，加拿大的，美国的，法国的，在县城里外，占的面积往往超过老百姓区域。北门外，他们房子很多，很大。草地花园，人间仙境。好的地方，都是教会买去了。但老百姓从来不招呼任何外国人。小时候怕洋人。我几岁时，大人说，洋人会把小孩子拿去蒸来吃，教会医院专找小娃娃去吃掉。县里的医院是洋人办的，很大，很好，不大有人去看病。县里的学校，男中有三个，有一两个是教会学校，很漂亮。但是，所有的家庭都看不起教会学校，上教会学校会没面子，这跟北京、天津、上海全不一样。在我们那里，如果有孩子上教会学校，连家长都被人看不起。中国人被外人雇用的，也被中国人看不起。可见我们那个地方是很落后的。思想上，封建主义占绝对地位。那时中国是一个非常顽固、保守、停滞的社会。别人没看到，鲁迅看到了，有点悲观。从这点看，中国要进步，很难。对洋人又怕，又恨，连医院都不敢进。那时，我们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全国有这样思想的地方肯定不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我们县城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半义和团思想，还是相信外国人是要吃人的。

物产丰富——

家乡的气候，热起来热得很，雨又多，未见过雪。这种气候，什么都长得快，长得好。

我们家乡极富裕，全国少有。我在成都平原住过，在杭嘉沪平原住过，在广东住过，这些地方的物产种类都不如宜宾。比如宜宾的甘蔗有十几种，灰的、白的，粗的、细的，各种各样。宜宾的糖，各种各样。橘子，也有十来种。橘子青的时候，小孩子抓起来像丢石子一样扔，大人也不太在意，因为太多了。成熟的时候，路过橘子林，可以随手拿来吃，不给钱，但是不能带走。北方枣子成熟的时候，去枣林也只可以吃，不能带走，带就是偷了。我们那里橘子多到什么程度呢？无法想象。中药需要大量的橘子皮，城里人吃了橘子就丢皮，只好在锦江边上买一船一船的橘子，雇小孩子来剥皮。肉没有人来买，就丢到江里。

宜宾的荔枝，红的，那么好看，没有看见过。品种可能不如广州的小核桂味荔枝，味道差一点，但也很好吃，产量甚大。还有李子，别的地方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是最好的，有半个鸡蛋大，灰黄色，脱核，主要是香，世界上无此好香味。

我们的红烧什锦，普通人家也有能力办到，有鸡、海参、云南火腿、冬笋、虾仁、冬菇……我们家乡的吃，讲究到什么程度？有一家包子店，包子里是火腿丁、黑木耳、鸡肉丁、冬笋丁、猪肉丁、虾米丁、黄花菜丁、新鲜的豌豆……红黄蓝白黑都有，味道绝好，颜色更佳。这家店有多么大？占半个走道，进深一丈多，最多容四个顾客。解放后，我在广州喝过早茶，觉得不如我们宜宾的好吃。一个饺子，就是两个虾。我觉得大大不如我家乡的。

宜宾的酒也了不起。各地方都说自己第一，我现在感觉到评第一第二很难，没有意义。我不但喝酒，而且只喝高度酒，高度酒才香，我一定要喝五十度以上的，现在也喝，天天喝半两。

五粮液，是解放后才叫的，解放前叫“叙州大曲”。我们县做酒的地方叫“糟房”，“糟”字，统统念成“曹”。最大一家叫张万和。大酒厂都有大门市部，有小桌，可以到那里喝酒，有花生、胡豆、豆腐干下酒。也有蚕蛹下酒的，我看见就怕。

五粮液的酒店及酒作坊，老招牌叫“原发升”，老板尹绍周，是宜宾县及下川南地下党的创始人。尹绍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时领导大家游行，淋了大雨，生病死了。他的儿子尹伯明当了酒庄的负责人，同时又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一九三一年后的抗日运动等，就是由他暗中在地下领导的。这个人我见过。他那时可能没有组织关系。一九三六年我回乡一次，一天，在宜宾东街上碰见他。他穿个黑马褂，长衫全是华达呢，高等士绅派头。我哥哥跟他说了几句话。我哥哥在银行当职员。后来我哥哥问我，你知不知道他是谁？我哥哥跟我讲了尹伯明是宜宾县一切救亡运动的领导。我哥哥就在他的领导下。尹伯明在“文革”中死得不明不白。他是川南真正的党的地下创立人。

中央档案馆现存七件宜宾党团在川南活动的文件原件。这些文件是向重庆省委报告情况的，是尹氏父子写给吴玉章，或者杨尚昆的四哥杨闇公的。这些文件从重庆到了上海。一九三七年后通过抗战，又通过解放战争这么多年，竟然保存下来了，真是人间奇迹，是地下党的伟大功劳。

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各地兴起的救亡运动，大多是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领导起来的，方式都差不多，出墙报、组织读书会、歌咏队、演剧队、演讲等等。那时期国民党的特务还未发展到内地省份与基层，不然全被它捉（抓）光了。

我们那个县的商业很繁荣，在西南，几乎是第一个。县城不太大，商业很发达。云南的物资都是用高过头顶的立背，背到宜宾的。昆明、贵州、西康、川西的土特产都运输到宜宾，再上船从长江运出去。

我这个人，解放后没有回过宜宾，想起来，很难过，很难过，是罪人。

3 少年时代：我成为家庭多种事务的担当者，买鸦片、进当铺更是内行

从一九二几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年底我转学到重庆之前的八九年，我成为家庭杂务的主要担当者。

我父亲长期在重庆，家里有母亲、祖母（后）和我。我哥哥从初中起就住学，后到成都去读书也住学。我姐姐也住学。我妹妹和姐姐一起住学。这样一来，家里要维持一个中等门面，就有许多事。我从小就做事。我家里有一个女佣，主要是管做饭。我妈妈抽鸦片，小脚，能干，但不能出门。买菜什么的，都是我。我到今天也觉得奇怪，我母亲每天晚上要我去买酒，二三两的买，做菜的油也是一两天去买一次。为什么不是一次多买一点呢？不是钱的问题，钱来不了，就去当铺。我有一点大概是超过鲁迅的，那就是进当铺的次数。平常得很，一年进出几次，倒未受欺负，见面时，老掌柜还要说：“来啦！”

除了家务，我还管敬拜祖宗，拜天地众神。天天晚上烧香都要跪下来，叩头。还要点一盏灯，我们那里叫神灯。拜祖先在堂屋，我一个人，十一二岁，很怕。妈妈虽然就住在旁边的房子里，但这些活动都只有我一个人。土地神——贴一张红纸就算是土地神了，也天天拜。灶房也要天天点盏灯，还拜灶神。所有这些迷信活动，都归我做。给祖宗烧纸钱，也是我，怎么买，怎么做，怎么烧，也是我的任务。我还管端阳节前后挂菖蒲、写袪五毒的黄纸等。还要“嫁毛虫”，房中遍贴一种用雄黄在黄纸上写的中型字条，上书“张三闲，欠我木瓜钱，一去青州七八年”，贴遍全屋。据说，毛虫见着就会跑走。这是民俗，不知它的源流是怎么的。

每年过年，初二后到家外拜年。近房的长辈我都要去拜年，我还要去拜我哥哥未来妻子的父亲。每年拜年，要拜十来家。过年的时候，初一到十五，活动多，挂祖先神像、点灯……

夏天，快黄昏时蚊子多，要熏蚊子。用扎成长三尺左右的干艾草熏，所有的房子都要熏。虽然有蚊帐，但不把蚊子熏昏，根本无法睡觉。蚊子像成群的轰炸机一样，而且暗中像有个总指挥，大轰一阵，又息一阵。

我哥哥喜欢养鸽子，但他住在学校里，我还代他管理鸽子。我不太会养鸽子，还得管；家里还有一个大石头鱼缸，我还要管买虫子喂金鱼等等。我们的祖坟离宜宾远，要坐船，我十多岁的时候，上祖坟我一个人去。

我母亲抽的鸦片，也由我买。买鸦片烟膏，买二两，送到专门熬鸦片的地方去熬。后来，自己学会熬了。为什么要自己熬呢？因为买了鸦片去熬，只给熬两次，一些东西还没有熬尽，不给你了，他自己留下。我自己熬，就熬三次。怎么熬呢？把草纸放在竹簸箕里，一次一次过滤。我在熬鸦片的地方看会的，麻烦得很。鸦片有两种，有一种是黑的，比较苦，有一种颜色比菠萝深一点，发亮，香得很，用一种草叶包着的。这个好的价钱贵一倍，要自己熬。熬鸦片的全套工序我都会。我的叔父用一种小木制机床手卷香烟卖，我帮他卷过，也帮他卖过。旧社会这样的事，许多人都不知道，我偏偏知道，还几乎件件干过。干了有什么好处呢？对旧社会的生活理解得比较具体。

因为哥哥姐姐妹妹住校，家里的事统统落在我身上，这是应该的。我就成了“家事担当相”。这四五年对我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不是不公平，因为家里只有我一个小男丁。我去买东西，一路看了很多，观察社会，打金钱板的呀，卖打药的呀，这里有万花缭绕、千奇百怪的社会。像我这样从七八岁开始，经过这么多事，承担了这么多事的人，恐怕比较少。这样的经历，一般人不太多，对我很珍贵。所以，现在早晨出去买菜，阿姨没有我精（精明）。

“九一八”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一年，我进高小，读通学。我不能住校。家庭有杂事，我得承担。

4 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

我母亲叫凌文卿，在我们宜宾北门外的曾家，威信高得不得了。为人公道、公正，对人宽大，有礼貌，喜欢助人。那时，大家都穷。抗日战争期间，有本家要到重庆去找生活。从宜宾坐船两天到重庆，我母亲把手上的金戒指抹（取）下来，拿给他，让他卖掉，去重庆。

解放初，我一个堂妹想参军，来找我母亲。这个堂妹叫我母亲二婶。我母亲想办法筹钱，让她有了路费，到成都参了军。她后来到了西藏。她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家里来看我。

一个亲戚表兄，家里很穷，军阀时期去当兵。后来他当逃兵，被打得半死送回家。我母亲做好吃的东西，要我送去。

我一生软弱，不会整人，不会斗人，这跟母亲的慈祥榜样有关。

十来岁，“九一八”前后，我在家里做“管家”，一切家务都做。我们家庭虽然不富裕，但旧社会穷人多得不得了。乞丐，我们叫“叫花子”，不断地来。有时候是一家人，带着孩子来，惨得很。他们都很熟悉找哪些家了，只要给，他们就反复来。我们家不是穷人家，他们就来要。一天来很多次，几批。我母亲叫我去“打发”（安排），东西也好，剩菜剩饭也好，来一个，我“打发”一个，没有剩饭，就给方孔钱，十个钱，八个钱，一天很多次，上午、下午，一次都不拒绝。

我母亲大方、和蔼，心地善良，对子女影响非常好。她虽然吸鸦片，但是那个时候，吸鸦片根本算不了什么，就像现在喝啤酒一样。她读过书，她的家庭肯定比我父亲曾家富裕。那时女子能够识字读书的，家庭不是大地主，根本不可能。我们那个地方，大商人、大买办没有，大地主多。在那个时代，女孩是没有机会读书的。没有女校，只有家学。有钱人，请人到家里来教，女孩子也可以到至亲家里读书。我母亲能看三国、红楼。

我大哥出生于一九一三年。这样算起来，我母亲可能在一九〇九年结婚。那就跟清朝灭亡时差不多。

母亲的仁慈，影响我一辈子。我一辈子都改不了这个习惯。六十年代初还是很困难，我在上海，戴着右派帽子。江南水旱保收，没有自然灾害，却有大量的乞丐，就在上海陕西北路大菜场周围，我看见大量乞丐的时候，总要偷偷摸摸给一点。那个时候，“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你的施舍给别人看见，而这个人又去报告，你就是反动，帮助地主富农一起反攻倒算了。说那些乞丐都是反动地主富农分子，讨饭是假的。世界的荒谬就到了这个程度！但是，只要遇到，我一看周围没有本单位的人，就给一角、两角。现在乞丐也不少。我们家的阿姨推我出去，遇见我也十块五块地给。阿姨说那些乞丐是假的，我说不管真假，我都要给，你看她受这个罪，可怜不？这是个良心问题。这就是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最讨厌残暴，最讨厌缺乏同情心。有几年我天天看见电视上揭发假乞丐，但是我天天照样给乞丐钱，不管真假。

我真正对不起的是母亲。七八岁的时候，我多病，她在堂屋“喊

魂”。喊魂要在半夜。她手里摊着蛋，喊一阵子，那鸡蛋就立起来了。我就在旁边，她问，你的魂回来没有？我回答，回来了。这样喊了好多次，才在黑暗中结束祈祷。慈爱之心啊！我报答了万分之一吗？没有。一九三七年我离开成都到延安，只有哥哥知道。我哥哥，甚至全家人都在骗我母亲。一年、十年，最后也不敢说。那时候，不知道我的音信，不知道是生是死。我母亲一天到晚哭，最后把眼睛哭瞎了。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罪人，现在谈起来就要哭……

在延安时，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可以通信，但是不敢，不敢跟家里联系。一九四五年，陆定一到重庆开政协会，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了，而且还有办法让对方查不出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一天我在延安杨家岭食堂遇见一个很面熟的同志，叫甘道生或林蒙，看样子是大后方才来的，我不便招呼他。他问我，你认不认识曾冕莊？我说是我胞兄。从甘道生处，我才知道我家仍在重庆老地方打铜街18号，是党的地下通信处之一。我在重庆读书时，就住在这里。我写了封信，交给陆定一，说，就照这地址，找《新华日报》一个普通人，找到打铜街18号，往里边一丢就行了。回我的信，也如此，找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人，到《新华日报》门市部前，无人时，把信往里边一丢就行了。就这样，跟家里联系上，母亲才知道我没有死。

解放后，我长期没有回过家乡。一九六四年我在上海，有个规定，在根据地工作的，解放以后可以回家一次，路费可以报销。那时我右派帽子戴了好多年，也不知道批不批准，但很快就批准了。当时，我母亲住在四川万县，我哥哥在万县地区人民银行当副行长。为什么当副行长？他是老地下党，有人写了证明，证明他没有干坏事。（他是一九四一年后被“甩掉的”。据说是绝对大多数。）我回万县去看母亲，竟然没有跪下，我真是不孝，不是个人！为什么不敢跪下呢？我考虑第一，我是个大右派，走到万县，别人是要注意的，而且已经有人指指点点了。第二，我那些侄儿侄女还小，只有七八岁，他们不懂，如果讲出去，说我的二叔回来，给阿婆下跪，就是反动了，就是恢复封建秩序了。天天阶级斗争，会把一个人的人性全毁灭的。

我没有在母亲面前下跪，这个罪，一辈子无法补。我哪里还像个人呢。人而没有人性，就不是人。我们的政治运动，让人把人性都丧失

了。我也丧失了。我认为，人性是最高的，一个人没有人性，就不是人。那次见我母亲，我就不是个人，竟然在母亲日夜提心吊胆十多年，眼睛哭瞎后，不敢在她面前下跪。想想看，去延安，不辞而别，母亲为你把眼哭瞎了，你回去，从政治考虑，没有下跪。政治利害战胜了人性。我的灵魂肮了。这辈子，我九十岁，再活几年，没有什么事情在我的心里引起这么痛苦。想到这样的事，就觉得我太卑鄙，抬不起头。在这样的关口，把政治利害摆在第一位，我失去了做人的资格。

我们过分的内部政治斗争歪曲了人性，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这个事情上，我是个非人。九十岁，就是九百岁，我对我母亲也是个大罪人啊。

谈起这些事，说一点，痛哭一下，好受一点。所以，反人性，我最反感。一个人把人性都反掉了，还有什么性，不是兽性了吗？你把人变成非人了，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性的共产主义吗？一生奋斗是为了建设一个没有人性的社会吗？我反省自己，我已经被改造得差不多了。所以，在恢复人性这个问题上，我是最坚定拥护的人。任何反人性的人，我都坚持反对，不会同他有共同的语言。现在我们也要“呐喊”，就是恢复人性的“呐喊”。我相信，反对“人性”的共产主义，不管在哪里都会失败的。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种性格，要我一天到晚就整人，我宁肯死也不会去做。

我母亲的骨灰放在成都郊区，我母亲、我父亲、我哥哥、我嫂嫂的放在一起。我曾去祭拜过，也跪下来过。但是，我心里还是难过。我对侄儿们说，把你们阿婆的骨灰单独拿出来，我要跪一个小时。他们说拿不出来。我想，他们是担心我的关节炎，怕我跪。

5 哥哥给了我政治方向

我的哥哥叫曾冕荘，比我大六岁。初中在宜宾的叙州联合中学，高中在成都石室中学。那时不叫石室中学，叫成都联中。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所学校是成都第一号高中。

哥哥读书很用功，成绩极好，同时思想极开放，读杂志，读课外书，知识丰富。我们家就是一个像样的图书室。他读初中的时候，我九岁、十岁，他主要给我讲帝国主义怎么侵略中国。当时就是极端爱国，就是义愤填膺。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他都知道。他给我讲什么叫外国领事裁判权、内河航政权、内地驻兵权等，他讲得很仔细，因此我全懂。比如他讲中国海关权，说中国海关不归我们中国管，属外国人管，进口多少税，出口多少税，权力在外国。收了税又作为对他们的赔款。又讲我们中国内地的许多权力都丧失了，重庆就有外国的军舰。我一听，作为一个小孩子就明白了，虽然半殖民地这个名词当时似还未用，但我已知道我们是受外国无穷压迫的国家，是孙中山说的“次殖民地”，比亡国奴还不如。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哥哥对我的教育，是一种启蒙教育，是爱国思想的教育。当时我哥哥也不讲主义，灌输的主要是一种爱国悲情思想。这个很厉害。内心的那种悲情是影响我今后道路选择的，因为知道离家乡只有一两天航程的重庆，就有外国军舰。外国军舰开到万县江边，万县被打得稀烂。外国人的势力已经深入到内地了。听了以后真是义愤填膺，知道帝国主义侵略的厉害，知道不反帝中国就要亡国。

我哥哥在什么地方讲的呢？我家有一棵香樟树，宜宾天热，我们夏天就坐在香樟树下。一般是吃了晚饭后，八九点钟，他就在香樟树下给我讲。一个老师讲，一个学生听。我对他的感情，比对父亲的感情深得多。我父亲教旧道德。因此，我对哥哥，比父亲还尊敬。后来，我要到延安去，是我哥哥偷偷借钱汇给我做路费，三百多元，在当时数量相当大，恐怕要等于现在几万元了。我哥哥八十岁去世。

我姐姐今年九十三岁了，比我大三岁，现在在成都，跟我母亲一样，慈祥、善良，我很尊敬她。顺便说一句，我弟兄姐妹四人，全是共产党员。我哥哥是地下党，是一九三八年元旦宣誓入党的，实际上他在抗战前就是党员了。我姐姐曾殿华，抗战时期同我姐夫赵筱村一起做地下工作，解放初正式入党。（我姐夫赵筱村比我先到延安，一九三九年派回四川。）我妹妹曾淑华是一九六〇年在我被划为右派后入党的。

第二章 世界观的形成

6 十岁左右，我读了些旧小说

我念的私塾，不是好私塾，是四川说的“鸡婆学堂”，老师没有本事，《三字经》、孔子、孟子、《诗经》，都要死背，却都不讲。我读来读去，也不懂。读了这些东西，全是望天书，读了六七年，没有起作用。人家有的地方，像京、沪、杭，他们的私塾水平高，《史记》也懂了。这么几年，我干什么？逃学。老师从不给家长说我们逃学的事，他就只管收钱。一个私塾，有二三十个人，两三个人把书包放到人家大门后，跑到山上去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又去玩。这几年，除了认识几个字，没有增加什么知识。

读私塾大概在五岁，七年时间，字认识不少了。九岁十岁时，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可以看一些小说了。

我们家里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许多旧小说。我就读旧小说。《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儒林外史》，最喜欢《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也喜欢。当时说不出道理，现在看来，是因为半文不白，能看得懂。我小时候看书有个特点，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看不进去，言情小说也看不进去，武侠小说更恨之又恨。

我不明白，现在公然把金庸提到那么高的地步，甚至有人把金庸视为文学的最高成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的武侠电影跟二三十年代的电影根本内容差不多。那时就有斗剑光。手一举起来，手心就发出剑光，在云中斗。现在斗剑光“进步”了，不光是两个手掌能放光，任何地方都能出剑光。眼睛、嘴巴，连肚脐都能射出剑光，荒谬程度超过十倍。我天生不感兴趣，恨透了。把一个青少年的聪明才智和时间都消耗了，对一个民族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我没有资格讨论金庸，他的学问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对这些武侠小说恨得很。为什么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那些武侠小说衰落了，连电影《火烧红莲寺》等也没落了？原因是进步文化上升了。进步文化是什么？就是要抗日，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人民要活。现在中国武侠又起来了，不要轻视这个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些东西上升，这些东西占据了青少年的视线，是危险的。

《西游记》我也不喜欢，就靠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全是公式。它里边的诗不像诗。对小说里的诗，我从小不感兴趣。《红楼梦》看过，现在怎么讲呢，看红楼时太小了，觉得它太长，对爱情不太懂。但对一些人物非常喜欢，像贾宝玉、林黛玉、袭人、晴雯等等。看红楼时，还没有到青春期，只有儿童的观感，觉得他们可爱。但对里边的诗还是讨厌。

7 上高小后，文学对我的影响：郭沫若、鲁迅、茅盾

一九三一年上高小。我读书素来都不用功，数学不行，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半年多，是乙等。我哥哥、我姐姐一直是第一名、第二名。学校里的书，先生根本不会教，我读不进去，就不得不喜欢读杂东西。

十一二岁开始受文学的影响。我不是爱好文学，我不懂文学，纯粹是当时的一种风气。很多反封建的寻求出路的青年人，感觉旧社会是腐朽的，毫无生气，就像一具尸体，感觉到这个社会不行，必须要有所改变，一般便去追求新文学了。

文学艺术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鲁迅、茅盾。

郭沫若的影响排第一。那时，郭老的东西，只要在读书的，都会去读，影响很大。当时看他写的诗，觉得奇奇怪怪，看不懂。但他的诗剧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到我姐姐学校去看《棠棣之花》，也到教会中学去看他的诗剧，看了大流泪。郭老翻译的东西也看，十一二岁看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青年男子，哪个不善多情，少年女郎，哪个不善怀春。”快八十年过去了，到现在还能背出来。郭老的东西，最大的特点是用情感动人。以后，他在重庆写的那些诗剧，《屈原》等，我都记得。到现在我还记得《孔雀胆》中的两句诗：“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这是我一九四二或一九四三年在延安看到的。真是感人。批评郭的人现在很多，可惜的是，你把他的优点也批掉了。

对郭老晚年，解放后的言论、行动，我是不以为然的，有些不像

话。但他在二三十年代对少年的影响可是第一的，谁也比不上。

在文艺上影响我的第二个人是鲁迅。

当时我看鲁迅的书，是毛边书。记得晚上读《狂人日记》，很害怕。他说，中国的历史书里，字缝里只看见两个字，“吃人”。他呼吁救救孩子。一九三〇年前后还没有上高小，看到这个东西，害怕。因为它的整个基调有点阴森。但是后来慢慢觉得它深刻。还有鲁迅的《药》，写吃人血馒头治病的，也害怕。那时毕竟是小孩子。鲁迅的东西，有一些看不懂，《高老夫子》就看不懂。《阿Q正传》反复看，知道社会上评价高，呼声高，但半懂不懂的。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个小说是表达了他的一些思想，并没有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有点像哑剧，要有很高水平，才有兴趣看。

鲁迅对我的影响跟郭老不一样。读鲁迅，对中国的阴暗面多少知道一点，觉得可怕的事情太多了。郭老叫人兴奋，鲁迅叫人认识。

第三个影响我的作家是茅盾。茅盾对西方文学是熟悉的，对中国古代文学也是熟悉的。他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我都看过，都是在家乡看的，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但看不懂。到一九三四、三五年，年龄大一点，看《春蚕》《林家铺子》《子夜》。《子夜》是我哥哥看后寄给我的。茅盾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他自己发明的。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闹得还不厉害。茅盾的小说是揭露旧社会的阴暗面，提高人们的觉悟，是宣传政治的，哪一本不是？《春蚕》《林家铺子》是这样，更不说《子夜》了。茅盾的每一部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子夜》出版的时候，最轰动。《子夜》我看过几遍，但现在想，想不起里边什么人。里边有一个人物形象站起来了吗？能跟《红楼梦》比吗？但其中一个小情节，我现在还记得。老板吴荪甫用一个同乡屠维岳来管工人，他们有两句对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根据这两句话，吴荪甫发现屠维岳这个人很能干，立刻用。屠维岳是反面人物，屠维岳，不知是不是“屠惟虐”。茅盾只对这个人写出了一点性格。其他的人物仍无个性。茅盾的东西，虽然只讲政治，但是，他的作品比我们以后的那些政治小说又要高明得多。以后的，一到念念不忘政治挂帅，就没有看头（不吸引人）了。书中人讲的话，几乎句句是政治了。

那个时候，一般来说，冰心的《寄小读者》对读者的影响大，但对我影响不大。我对冰心一点印象都没有。可见，我偏政治。跟人们真正有痛切关系的，我就重视。扯剑仙侠客，我就不看，看过一些，越看越觉得胡扯。

8 我家有个百家争鸣的小图书馆

更多的是读我家里订的刊物。

我的哥哥比我大六岁，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已经是初中学生。现在初中生是小孩子，那时不得了，十七八岁了，一边读学校的课本，一边还读杂志、报纸等，知道很多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家就变成了一个图书馆。哪来的呢？几乎都是我哥哥的同学买的。我哥哥的同学家庭出身有几个是大地主，一个学期家里给的钱多到一百块、两百块，所以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报刊，几乎全是上海的。我们家的经济够吃饭，没有这么多钱。出钱最多的是我母亲的一个内侄。这些人的家里尽管是地主，但由于两个原因，思想非常激进。一个是要抗日，一个是恨蒋介石杀人。

我哥哥他们订的刊物真多。大约从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起，上海出版的重要书报都有，《大公报》《申报》有。他们不知道我也在看。我什么都看，这样的结果，我的思想起了变化。

上海的出版物——书、刊、报——空前地繁荣。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真正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就是上海这些出版物。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只是各种观念中的一种，而且要看，没有呀。《共产党宣言》有吗？没有呀，上海也根本找不到，有的就是“左联”前后的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救亡歌曲），这些东西，影响大得不得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比共产党的东西还大。那时还找不到共产党的东西，那时是“左翼”的东西（当然这些运动的核心人物，又多是共产党）。我们家乡受“五四”的影响不大，那时还较偏僻，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后，因为在长江边上，上海的出版物不久就能看到。四川整个来说是闭塞，但沿长江边的地方，不

太闭塞。上海的《毛毛雨》两三个星期就下到我们那里了。

9 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文学作品对青年思想的影响，在相对偏远的地区，远远超过“五四”。“五四”运动的影响比较小，在我们县就不大，当时还不能到达像四川我们县这样的地方，而上海“左翼”的像鲁迅的书、郭沫若的书、蒋光慈的书，真是厉害，只要有小学，偏僻的乡村都去了，就能看到。

这些书，我归为两大系统。一是郭沫若系统，革命浪漫主义的；一是鲁迅系统，批判现实主义的，包括鲁迅、茅盾等。

我们中国不能轻视浪漫主义。对我的影响，还是郭老的大。大到什么程度？他的那些诗我读过，不大懂，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到现在有些还不懂，例如他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很多都是这样的，不知所云。但他的诗剧影响很大，完全是靠感情打动人。之后是田汉等人的歌词。不少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学过一首歌：《茫茫的西伯利亚》，冼星海作曲，到现在还能记住，还能唱：

茫茫的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受难者的坟。

多少英雄的战士，被消灭在这万里的途程。

刺刀是那样的无情，鞭子又抽得紧，每个人的身上，是一片血痕与泪痕。

难友们，不要呻吟，我们得把牙根咬紧，又粗又长的铁链，把我们锁成一条心。

我们冒着黑暗前进，我们向着黎明前进。

我主要想说明，这些东西在当时年轻人的脑子里，比口号好，像刀刻的一样。我又不是正式唱，是偶然听来的，一个字都不会错，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不是我的记忆力好，是它们感动人。这几十年的歌，我只记得一句：“妹妹你坐船头”，下一句就没有听清楚过。弄不清楚，也不

想去弄清楚。

启发人们要求变动这个社会，要求推翻旧社会，通过革命的浪漫主义，比较容易些。革命的浪漫主义适合小青年，不管男女青年，都容易接受。

解放后，郭老只讲官话，但在历史上他的作用不低于鲁迅，应该说高于鲁迅，特别对内地的影响。

鲁迅教育我的，有些话，也像刀刻在脑子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当时十三四岁，读到这些，深刻得很。比方说，讲中国的历史：“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代青年的使命！”又如鲁迅讲：“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十二三岁记下来，好几十年了，今天还能脱口而出，是它们太深刻了。不过上面是随口说，错误之处恐怕不少。

郭老给我们的是什么教育，鲁迅给我们的是什么教育，清楚得很。郭老鼓起了我们的热情，鲁迅叫我们沉思，缺一不可。中国人现在必须看他们二人的东西，就像古人必须读司马迁的东西一样。

“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七年前这几年，我受胡适他们的启蒙影响较多。“五四”的启蒙作用很大，但中国变动非常剧烈，主要是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得太厉害了。因此，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社会思想的主流，影响我们青年思想的，从北平、上海这些大都市，到我们四川的小县城，就是鲁迅与郭老，而不是胡适了。而共产主义的东西，当时什么都找不到。《共产党宣言》都知道，但是找不到。抗战前上海没有，内地更找不到。当时马、恩、列的书，正规的书，抗战前不大有，只有一些介绍，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许多名词都不一样。列宁，叫依里奇，或者叫乌里雅诺夫；意识形态，音译叫意德奥罗基；小布尔乔亚，是小资产阶级；恩格斯，叫弗里德里黑；突变，叫奥佛赫变等。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这些书都是这样，我家里多得很。一看，都看不懂。国民党查得严，偷偷出一点，都要用这种化装的方法。但仍得硬着头皮看，求真理，求解放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青年的变化，最大、最剧烈的是一九二七到

一九三七年这段时间。这个思想变化，并不是看中国共产党的什么书，也不是直接看到了马列的著作。对中国共产党不了解，但对苏联的了解则大大超过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苏联的介绍，在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比较多。国民党不禁止，因为还对他的政权没有直接的威胁。苏联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要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再加上中国上海有个租界，国民党根本管不到，那里同在外国差不多。上海的书店全在租界里。

目前有一些说法，说当时的青年，抗战前受了多少真正的马列主义的影响。太夸大了，其实看不到。但很多人，都读过郭老、鲁迅的书。“九一八”前后，冰心已经过时了，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是国难当头，日本的侵略，使青年人非常激愤。冰心的文章我也读了一点，但觉得已不是谈那些东西的时候了，要抗日了。

郭老的作品，在客观上就突出了这些。比如《棠棣之花》，讲的是战国时义士聂政刺韩相侠累的故事。聂政离开姐姐前，在母亲坟前，姐姐吹箫，他唱歌。他唱道：

明月何皎皎，白杨声萧萧。

阿侬姐与弟，离别在今宵。

依欲均贫富，侬欲茹强权，

愿为施瘟使，除彼害群遍！

你说怎么不感动，除非是石头！因为我们心头想到的是抵抗日本，杀掉汉奸，打倒蒋介石，人民大解放，而不是什么侠累不侠累。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不感动吗？虽然讲的是历史，但灌输了对现实社会不平等的仇恨。快八十年前的这些歌，现在还能背得，还能唱，为什么？因为当时已经像刀刻一样在记忆中了，是把它们完全现实化了。文学而不能感动人，叫什么“文学”？

现在，除了对鲁迅，评价都不大高。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这些老前辈对我们的影响。这些老前辈对我们青年的影响，比马列主义的影响大得多。我不是读马克思的东西觉悟的，我是读这些人的书觉悟的。不是

我一个，那个时候的中国青年，大多是这样！

我不仅受文学的影响，还包括受哲学等其他书刊的影响。一九三五年前，北京出过一本《辩证唯物论教程》之类的书，是苏联的宣传书，小三十二开，印得很糟。这本书在极少数人中可能有影响，但在中国的青年中，没有什么普遍影响。原因是看不到，也看不懂。比方，它的第一编就叫“哲学的党性”，可以讲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本定型的斯大林的哲学。当时的任务是抗日救国。因此，它比较脱离中国的实际，起不到什么作用。这类书曾经翻过，一个字都不懂，说它们起了多么伟大的作用，不符合史实。

这个时候，我还非常喜欢林语堂的东西，他办的两个刊物《论语》《宇宙风》，我都看。林语堂的文章很幽默，比看郭沫若、茅盾的有趣得多，一本杂志可以一口气看完，其他刊物绝办不到。我读东西杂，我还看些杂刊物，如一种是《逸经》、一种是《越风》。这两个刊物，是上海出版的，也是随笔性质的刊物，讲些历史故事。这两个刊物影响不小，一般人不懂，要常到图书馆的人才懂。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大概就是《逸经》登的，我当时就看过，全国都知道。

林语堂对正规中学、大学教育方法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到图书馆去看书，比一般地坐在教室里读书好。他不要书呆子，不要仅仅知道知识公式、条条框框，他要思想活泼一点。这一点，对我有影响。另外，他的刊物骂蒋介石，那种骂法，我也喜欢。他不像“左翼”，他用各种各样的滑稽、讽刺达到骂的目的。这些影响使我对生硬教条的东西，一生不感兴趣。据说像林语堂那样，当时官方有个说法，说他们是“软性反动”。林语堂那一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要抓我的辫子，判我的徒刑，办不到。但是我挖苦你，厉害得很。林语堂派的刊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文字水平高，一般懂得外国的事情。左派是进步革命，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大，但文章比较单调枯燥。左派的，写得引人入胜的比较少，原因是知识面窄，革命家太忙了。

为什么我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拥护？这跟我从十一二岁起在家乡看的那些书、那些杂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些书报，对我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以为，专制出不了学问，出不了艺术，也出不了文

采。我们家的书报，各党各派，什么都有。我说一个杂志，可能许多人不知道，《二十世纪》，开本很特别，封面是浅黄色的。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这个杂志是代表哪一党哪一派。这个刊物的文章也怪，很深奥，看不懂，我哥哥他们也看不懂，不过是订得多，把它也订了。我还读过一本书，块把钱一本，很厚，《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这个书讲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者是郭沫若的日本的同学，叫漆树芬，是个左派，据说没有入党。漆树芬后来牺牲了，在重庆被打死了。他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有两个序言，一个是国民党的吴稚晖写的，一个是郭沫若写的。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我就是从这个书里看的，我大致也记下来了。那时大概十二岁，当时别的地方还没有列宁的书，所以，知道列宁的观点，就是这么间接看到的，高兴得不得了。这本书是一九三二年前后看的。有趣的是，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延安要创办一个马列学院，叫我去参加考试，就考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当时，一般人不知道，我答上了一点，并不是我有学问，而是偶然凑巧。

我还喜欢看《时事类编》，这本杂志好像是孙科系统办的，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中山文化教育馆，主要工作人员似乎是地下党员。对国际时事的介绍，这个刊物最多。我们党一九三三年办的《世界知识》，实在的资料、内容不是很多，主要是分析。一九三六年，苏联第一次公布大屠杀，屠杀季诺维也夫、加米列夫等一大批人，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公开向全世界公布大杀包括地位比他高的人。一九三六年的中国，很注意这个事件的人似乎不多，包括上海的文化人、大学生。我记得《时事类编》里有，较详细，有起诉书、判决书等。

这一切说明各种信息对一个青年的影响非常大。我从小有个特点，在十一二岁不懂事的时候，就乱七八糟地广泛接触，我知道的事情，并不比北京、上海的人少。阅读无界限，这也是我一生的一个主张。因此对出版我就一直主张开放，多出一点书。

“九一八”后，思想普遍要求抗日，光靠文学不行了。这个时候，是以邹韬奋为代表的通过生活书店这个系统出版的书刊的影响。我十一二、十二三岁看的书，不是生活书店的，而是昆仑书店的、南强书店的、亚东图书馆的、春明书店的……至少几十家。在中国新闻、出版史

上，生活书店这个系统的影响极大。生活书店有影响的是《生活》周刊。《生活》周刊一九三三年被查封，改名字。一九三五年，邹韬奋从外国回来，出版了《大众生活》。我在内地知道“一二·九”运动，就主要是从这本杂志知道的。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系统的书的影响很普遍。通过抗日救亡，使人们左倾，接近社会主义，拥护苏联，慢慢接近共产党，它的功劳第一。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上海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成立，对我们这些几千里外的青年人，一时暂无组织影响，但他们的报刊厉害，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他们也不敢直接反蒋，不敢直接骂蒋，只给你灌输蒋介石不抗日，蒋介石是独裁。现在查蒋介石日记，他是要抗日的，但当时他一直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也是铁的事实。我们内地的先进青年，恨他那个“宪兵第三团”，同恨日本人一样。

10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还有这些事情

一九三四年年底，我还在家乡。我一九三一年读高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读家乡叙州联合中学。我读书功课不行，一天到晚就是看上海的书报杂志。这个时期，世界观的转变就形成了。不是共产党直接教育的，我们哪里看得到共产党呀。

对我世界观的转变起作用的，除了书报，还有一些事情。

一个是蒋介石。蒋介石，原来我不反对你，但我看见你的镇压，太残忍了，太没有人性了。不是别的人教我，是我看见你的行动后，起来反对你的。有一天晚上，我拿着一本左倾的书经过北门城门洞，城门洞里贴得有标语，城门洞两边的油灯照得清清楚楚：“打倒刽子手蒋介石！”当时有卫兵在城门洞两头守，我走得很快。看到这条标语，糨糊似乎还没有干，就像看到革命青年的鲜血一样，知道共产党还有，不管是有组织还是没有组织，还有。他们真是不要脑袋的人，如果贴标语时被抓到，就要被杀头的呀。当时我心里明白，贴标语的人，才出城门洞不久。那种仰慕之情，那种感动，真是到极点了。

蒋介石一九二七年抢夺政权后大屠杀，太厉害。像在我们那个县里

边，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一九三〇这几年，经常枪毙人。一会儿听说某家二小姐被杀了，一会儿听说某家的三少爷被杀了。我确实从小没有听说过有工农被杀头的，杀来杀去，都是大少爷、二小姐，因为他们才有经济能力读书。一读书，思想就起变化。那个时候，都是杀头，残酷得很。蒋介石这么屠杀几年后，多数人怕了，既不敢有什么行动，也不敢看什么进步的书籍。但少数人觉悟了，虽然一时不敢公开起来游行，贴标语反对你，但暗中起来反对是很多的。一直到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上海的出版物，革命的、进步的很多，左派的力量飞速发展。一个县城里，有十个进步的人就不得了，有三五个就可以闹个天翻地覆。

那时我已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头脑复杂，不像现在的青年这样简单。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的抗日与拥蒋是并存的。不合史实。当时，看到蒋介石杀人杀得太厉害了，又不准别人抗日，所以，长时期是抗日就要反蒋。我长期就是如此，并不是什么托派的影响。

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叫蒋介石什么？不叫他南京政府，都叫他法西斯。蒋介石从来没有说不抗日，但是他镇压抗日。他对内用的是法西斯统治，他想用法西斯的那一套来消灭共产党，消灭进步势力。所以进步青年一谈话，相互就知道了。说蒋介石是法西斯，只有真正进步的青年才这样说。蒋介石是不是法西斯？基本上是法西斯，这是没有错的。

蒋介石对日本不想投降，这个确实是事实。但他用高压政策来屠杀，最后把全国救亡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七君子抓起来。这是蒋介石犯的天大错误，蒋介石不是糊涂人，这是他的背水一战，他的威信跌到谷底了，人民已经到了欲与之不共存亡的程度。抓“七君子”，把张学良也得罪了。张学良的八项要求，释放七君子是第一条。

蒋介石对内，没有宣传抗日。蒋介石一九三五年前后到处搞军训，我们学校也来了军训教官。但军训官不讲抗日，连侧面都不敢讲半个字，这样，谁会相信蒋呢？蒋介石当时的困难确实很多，你要他怎么公开号召抗日，确实有困难。同日本的力量对比太悬殊。蒋介石对内镇压，不准抗日。这是事实。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胡适、《大公报》

他们是公开赞成的。西安事变后，北京大学的一些人开大会反对张学良。胡适在这个大会上说，从前，我是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现在，我要加入国民党了。北京的教授派，他们要求稳定“国家中心”。认为对外没有一个“国家中心”不行。国家中心是谁呢？胡适他们认为，相对来讲，蒋介石比袁世凯、段祺瑞等强，北京的教授，包括《大公报》全是这个观点。要推倒蒋介石，不赞成，说各个实力派头领没有比蒋好的，蒋介石还是要能干一点。但胡适他们对蒋介石对内镇压，有时也是有意见的，批判有时也很明确。《大公报》批评蒋介石，有时也很尖锐。但要推翻，那就不行，那叫“动摇国本”。

推动我世界观的根本改造的，第二个是日本的侵略。当时不少的人还是糊涂，对日本侵略，虽然很恨，但仍不大敢出来说话、行动。主要是国民党政府要镇压，地方势力也要镇压，但少数青年坚决出来贴标语、讲演、演抗日剧等。

一九三六年，上海一个刊物叫《国难教育》，领导人是陶行知，老左派。有一幅漫画是这样，整个封面是中国地图，一只军靴踏在上面，鲜红的血溅满了封面。画面中有个不显眼的太阳旗，让人知道是日本人的军靴。当时看到漫画，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要抗日？当时天津有个海河浮尸事件，闹得很厉害，说天津海河上常常发现死尸，是日本抓去修军工的劳工被弄死后，丢在海河里的。当时上海的《申报》，全国的大报都登这件事，登了几个月。

当时为什么青年要抗日，要到延安去？你国民党不行，不抗日，才想到红军、共产党。当时并不知道共产党做些什么，但是这些不怕死的人还会不抗日吗？

对苏联，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忆语》第三集，一九三五年有零星登出来。一九三六年出版，很厚，这本书写得很详细，他在苏联看到了什么？他看见了人间天堂。其实都是苏联布置的，苏联让他看的，邹韬奋统统相信了。邹韬奋是个天真而伟大的革命家，这不能怪他。当时不仅在内地，即使在北平、上海，一般青年是根本了解不到共产党的主张的，我们只能看邹韬奋，听他的话，跟他走，他的威信第

一，胜过一切人。

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确实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了解，不知道长征，报纸上说朱毛朱毛，但任何报刊都没有报道共产党在哪里活动，打下什么地方。后来，从范长江那里知道了。他不是有两本书吗？一本叫《塞上行》，一本叫《中国的西北角》，是他到陕北保安去访问后写的，《大公报》一期一期登，后来出了书。《大公报》在天津，素来以登官方以外的新闻为号召，因此大家争着看。一九三五年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议后，蒋介石的党政军特被日本人从华北赶走了，所以这两本书能出来。范长江的书，在我们县城就能买到。大约大县城都有小书店，经营人就懂政治，一个人经营，知道上海的什么书好卖。所以，很容易就知道外面的事情。

我是一九三六年看到范长江的通讯的。在之前，只看见共产党员被屠杀。记得范长江访问张闻天后，妙笔生花，说张“不似曾过万重山者”。这句话对我的作用非常大，对共产党的高级领导的看法从根本上改变了：知道共产党根本不是国民党宣传的什么匪徒。那么多领导人是留过洋的，比国民党强得多，高明得多，不要看他们在山沟里，其实全世界的事他们都知道。我第一次知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知道毛主席的简史，而且还知道毛主席的文史修养很深。你蒋介石算什么？一个大军阀罢了，比得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这批人吗？范长江的这些通讯，当时的影响极大。一个县城只要有一二十人看过这类东西，这个县城就热闹起来了，救亡运动就会开展起来了。

《大公报》一直是偏于批评蒋介石的，但是，《大公报》在抗战爆发前，态度明显变了，明显拥护蒋介石了，是要抗日，要全国团结，蒋介石力量大，是中心，但单独依靠蒋介石不行。所以派范长江去陕北，是《大公报》最高当局胡政之决定的。

《大公报》的社论很讲究。总编辑张季鸾写社论，六百字到八百字就说完了，没有长篇大论，不容易。王芸生要长一点，但也很短。《大公报》的社论只占报纸很小的版面，但字是大字，影响很大。绝无废话，也不尖锐。

我看了范长江的书后，只是感动，没有跟别人交流过。那时不能轻

易跟其他人交流。一九三六年冬天，阳历一月我从重庆北碚镇回宜宾看母亲，当时蒋介石已经被张学良送回南京。我哥哥和我完全站在共产党这一边。我哥哥说：解维哲的面目全暴露了，是个法西斯。解维哲是谁呢？一九二七年是我们县党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不知道是不是共产党员。那个时候的县党部，招牌是国民党，其实都是共产党员，加上有名的非党员的左派。解维哲一九三三年从上海回到宜宾教过我们的课，叫“三民主义”。他讲天下大事，讲抗日，还是进步的。我哥哥为什么说他是个法西斯呢？蒋介石十二月二十五号被张学良送回南京，县城得知，据说是晚上九点左右，这时学生已经睡觉了，解维哲却把学生立刻叫起来，到马路上去游行庆祝。抗日战争以前，态度是鲜明的：进步派都反蒋，说他不抗日。从没有人说他真心不抗日，问题是他在镇压抗日运动，对军队并没有抗日教育，而只有灭共教育。历史事实如此，我是过来人，我们这些抗日分子都怕蒋系势力，为什么，因为他们要镇压。蒋当然在实际上也困难，困难得很。在内部讲一句抗日的话，日本第二天就知道了，立刻就要逼得他又要丧权辱国了。

张学良把蒋介石抓起来，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在我们看来，抗战必须反蒋。我们当时哪里可能知道共产党中央要联蒋呢。一个学校的训导主任，半夜三更要大家起来游行庆祝，说明他是站在蒋的立场的，所以我哥哥说他是法西斯，即拥蒋派。

张学良放了蒋介石后，大家心里慌，觉得是放虎归山。不仅是我哥哥，当时进步的青年都是这个观点。现在，切忌这样想，说这个思想是托派思想。当时对党的方针不知道。我们接受的还是早一两年的思想。蒋介石是法西斯。有这种思想的，就是进步的“左翼”分子。我们甚至认为蒋介石是卖国贼。因为一九三五年订的《何梅协定》（何应钦，梅津美治郎），给我们的印象太深。国民党的军队要从察哈尔、河北两省撤退，国民党的省党部、县党部，也不准在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存在。国民党的宪三团也要从北平撤退。国民党的宪三团到哪里就是抓人、杀人，老百姓恨宪三团跟恨日本人差不多，甚至更恨。如果宪三团在北平，“一二·九”运动抓的人肯定更多。宪三团领导人是蒋孝先，是蒋介石的族侄孙。宪三团调到西安去，西安事变当晚东北军有令，遇着蒋孝先先打死再说，都恨他。

当时的青年，判断对方是不是可靠，要通过谈话。一谈话，就知道对方站在什么立场了，因为用的名词不同，一谈就知道。当时我们到延安去的人，往往先不认识，但一谈话，就知道了，用的名词，表达的思想完全一样。我们这些青年这样做，并不是共产党教的，而是蒋介石自己的行动教我们这样的。

第三章 逐渐走上去延安之路（1931年—1937年11月）

11 人格教育最重要：影响我一生的两个老师

比较幼年的时候，跟同时代的孩子比起来，我是属于一个早熟的人。这个时期，有两个老师影响我的一生。高级小学时，是个音乐老师；初一时，是个教体育，也教音乐的老师。他们的人格，我终生难忘。可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哑喉咙（声音沙哑），不会唱歌，但是人格伟大。

小学老师教音乐，按风琴，“长亭外，古道边……”他有肺病，但他教课极为认真。举个例子。他教简谱，把谱提前写好在黑板上，教你怎么使用，一点不教条。当时作为农村出来的子弟，特别是少爷们，谁要学音乐？我同他们不一样，认真学，感觉得到老师费尽心血。他一堂课怎么教？教我们识简谱，叫一个学生起来，他拿着教鞭比画着，教声音怎么高，怎么低，怎么慢，怎么快，完全用手势，用眼睛表达出来。现在回想起来，他完全是拿出心血来教。想一想，对小学五六年级的小学生，如果要简单应付的话，那太容易了。一个学期，油印几首歌就可以了。那时，音乐、体育、图画、手工这四科，考试是要考，但是平均分数不算，教得好不好无所谓。所以这个老师的精神让我感动。后来越想越感动。他只教了我们一学期，第二学期就病死了，但一辈子感激他。

一九三三年刚进初中，遇到了一个老师，叫叶轻溟，是个大胖子，又高又大。这个老师很特别，教音乐，不会唱歌，教体育，又不能在体育场上做什么运动，但是，他教音乐很厉害。他教五线谱，先让学生在黑板上写好，上课再讲。学生觉得五线谱豆芽瓣瓣，跟生计没有关系，不爱学。他不管，你不学，他也正正经经地把每个音符讲清楚，把五线谱的道理讲清楚。他不唱，而是哼，也让大家哼，大多数人不喜欢。他教我们唱李叔同等的歌，多数是中国古诗词的歌，如唐朝高适的《别董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所有的歌词，他都要讲清楚。他说，歌词懂了，才唱得出感情。所以，一个中小学的老师，给学生一生的影响很大。因为他是拿出

生命来教的，启发了我的知识，启发了我的感情。这个老师又是一个学期后因为肺病死的。他死的时候，即使是不喜欢音乐的人，都流眼泪。做事情，这么认真，这么负责，这么不怕牺牲，拼着命干，这样的老师，难找。我也没有学到什么，但他们那种负责认真的精神，感动了我一辈子。现在的教师就要学这样的精神。光教知识不行，没有把人教育成有高尚人格的人，再教得怎么好，都没有用。要教学生，先要从道德上、从人格上来清洁自己。

12 初中毕业考试第二名，进了卢作孚在北碚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一九三五年，我初中三年级从家乡转学到重庆北碚卢作孚办的兼善中学读书，我父亲要我到重庆去开眼界。重庆办得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课程都深，我考不上，乱七八糟的中学，我又不愿意去。这个学校招生，我就去念，念初中三年级。学校风景如画，我读了一年后毕业。

当时，重庆附近的江北县、璧山县、巴县、合江县，山区多，土匪成群。卢作孚向刘湘要下离重庆一百多里的北碚，由他弟弟办一个“峡防队”，实际是剿匪，经费恐怕是官方给的。卢作孚的弟弟卢子英有本事，经过两三年，真的把土匪剿得差不多了。但刘湘也没有管北碚，成立了一个江巴璧合峡防区，卢子英继续在北碚管事，名义好像是“峡防队”的队长，其实就是个特别县的县长。他的权不太大，主要是卢作孚。卢作孚在这个地方搞的事业就多了，办了新式采煤的煤矿，修了短铁路，办了织布厂，办了学校，还办了科学院……

卢作孚的这个中国西部科学院，有化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农林研究所，都是小规模。兼善中学有个规定，凡是毕业考试第一名、第二名，要无条件地到中国西部科学院当练习生。初中毕业到科学院去，这不是开玩笑吗？其实就是做两三年徒弟，然后送你到北京、南京这些地方去读大学。我的成绩本来不高，到了这个地方，一九三五年毕业考试，竟然考了第二名或第三名。校长找我谈，到科学院去当练习生。我征求我父亲意见后就去了，到地质研究所当练习生。我一个初中生的用场是管标本，管仪器——仪器都是进口的。我还学会了照相，包括洗放照片等全套，学会了一般的画地图等。后来要制有等高线

的地图，我的天老爷，一个初中学生怎么画得了有等高线的地图！自己摸索，根本不行。那时，不像解放后，他们是不教的，一去就干。这样搞了大半年，但不懂道理，是一种硬干。我还跟着去调查煤矿。煤矿中有一种木轨，我钻了好多次，了解到是资本家的煤矿。一九三六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回宜宾看哥哥，看姐姐，看妹妹，看母亲，遇西安事变。我感觉到待在西部科学院，我的程度不够。我哥哥说，还是读书吧，到成都读书，我就到成都读书去了。

这件事，就是到现在，对西部科学院我应该道歉，因为那是不辞而别。活到九十岁了，内心十分不安，没有辞职就走了。

13 高中：我搞了两期壁报。地下工作，无师自通

一九三六年从宜宾到成都走了七天，有几个人一同到成都考学。头一天，住白花场，第二天，住贡井，第三天，住资中，第四天，住临江寺。晚上要住店的时候，路两旁的小店，家家都敲锅，抢客人。菜好得不得了，现在根本吃不到。我哥哥指定我考成都联中，即石室中学。石室中学名气大，难考。知道不行，我还是报了名。后来才知道，石室高中开始只收五十人，后来扩大到六十人。考了后，不敢去看榜。因为绝大多数的题，我没有答上。到了发榜时，不得不去看。我的名字竟然在备取榜上。我到收发室问，收发室的人说，备取人全是可以进来的。后来我知道这类学校从初中考高中是怎么回事。学校故意出很深的题来淘汰人。一千多人报名，两天后就发榜，老师不够，没有时间评分，只看少数考卷。所以故意出很难的题，让你都交白卷，立刻淘汰掉。

我举一个例子。当时考地理，中国铁路，那时地图上要分已成铁路、未成铁路。有一道题是问一条已经修好的铁路经过哪些城市，我可能讲对了几个。另外一道题问，同成铁路要经过哪些重要城市？我一个都回答不了。“同成铁路”是啥呢？从山西大同到四川成都，根本没有修。我一个都说不出来，只好交白卷。

上千人报名考试，绝大多数人是0分，我可能答对了一点点，至多得了一二十分，就被录取了。

成都石室中学，清朝就有，很有名，但我们叫它老夫子学校，因为

它只管读书。我一九三二年去成都看我哥哥的时候，看见他们学校的高中学生课余读老子、庄子，觉得如果是自己的话，吃不消。学生吃了晚饭后没有运动，一般是练习书法。石室中学一贯抓中、英、数。我进去后，感觉到很多学科都跟不上。除了中文外，都跟不上。石室中学，死气沉沉。读死书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没有几个关心国家大事，大多数人，既不是国民党，也绝不左倾。

第一个学期，上半年主要是应付，还是把主要的时间放在看进步书报上。成都石室中学是老夫子学校，应该是没有国民党特务的。但一九三七年军训教官来了后，就不一样了。一个中学，三个教官，主教官是上校。看到级别那么高，知道厉害，特别小心。这些教官自己不讲一声抗日，也不准学生讲，谁讲抗日谁就是共产党。

我睡上床，下床也是进步同学，但我们两个互相都不知道。进步学生怕民国党特务，我提防你，你提防我。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是复兴社分子，跟着喊"蒋委员长万岁"，不像我只是应付。结果一九三七年，我经西安到延安，碰上他准备到延安，真是很意外。

一九三七年暑假没有回老家，七七抗战一开始，我就住在初中部的宿舍，少数没有回家的学生，教师都住这里，一个月四块钱，六个菜，两三桌。有一天下午，一个人走到我面前说，你是高一的，你做的事我知道。我说，什么事？他说，墙报，宣传队。

我在我们食堂墙壁上搞了两期壁报，报名叫"石灯"，宣传抗日，一般的学生，知道的情况太少，连"九一八"以来的情况都不知道，所以都是我写的。我找了几个成绩好的同学，晚上九点以后一起抄，贴上去。我的读书成绩不能跟他们比，我慢慢说服他们。地下工作，无师自通。我为什么要选快放假时做呢？你想查，快放假了，查不到。我还搞了两次下乡宣传。全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均是无师自通。初时还没有共产党领导。

这个人是高三的学生，叫余明，是监狱里放出来的，当时不知道他是老地下党。共产党真厉害，连国民党特务都不知道，他竟然知道了，他还是跟党失去了联系的，他出监狱后还没有恢复关系。现在我觉得一个能力强的地下党员，比你一千个公开的国民党员的作用还大得多。他

一下子相信我了。从此后，给我看很多东西。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有延安的《解放》杂志，有西安事变后陕西省委出的刊物《西北》，还有《救亡》等。还有延安出的《列宁主义概论》，印得很简单，但是当时很有用。当时整个四川的党组织还没有恢复，这些人已经有秘密的联系了。我这个暑假接触到余明，变化比较大了。我以为他是党员，后来知道是个人活动。一个共产党员失掉了关系，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国民党怎么能跟共产党比呢？！

14 决定到延安去

一九三七年暑假，心里边已经没有读书的想法了。我读书没有本事，是个乙等生。乙等，在班里被看不起，第三十名。石室中学是讲究成绩的。“七七事变”一爆发，就热闹得不得了。我就想怎么办，自己知道读书不是办法，但共产党怎么样，不知道。

我所在的石室中学，在政治上右倾保守。有好几个国家主义派有影响的人是这个学校出来的。因此，石室中学的教师中，国家主义派，后来叫青年党的影响大。青年党是反共的，名义上是国家主义，基本上是右翼。我在石室中学读书的这大半年，学校中的政治进步活动，丝毫也看不出来。

大概是九月二十三号，国民党的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国民党的报纸发表这样的宣言，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承认你的合法性了。

跟着不久，又发布了命令。这个命令只是说成立一个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这个命令后，大家都知道全部的红军改叫八路军了。好了，要抗战，就去当八路军。

这两个消息一公开，我们这些人就想，这下可以抗日了。知道共产党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要赶快去，参加抗日，立刻决定到延安去。

当时到陕北去，主要是抗日，对蒋介石的抗日不相信，蒋介石挫败太快，抗日无效。我推测，红军没有被打垮，这么多年，游击战还能生存，说明会打仗，打日本要靠他们。觉得国民党不会打仗，几个省都丢

了，军队损失那么大，蒋介石抗不了日。特别是平型关一战的宣传，不只是我们学生，全民兴奋，要抗日就只有找共产党了。

那时，哪里顾得上说实现共产主义呢？面对亡国，要想救国，只有到延安去。到延安去的，没有一个不是想去上前线的。如果再不抵挡，四川也会失掉。谁吹他是为了打倒国民党，实现共产主义到延安，那就不真实了。我们只觉得共产党会抗日，就想上前线。我本来是个近视眼，平时都没有戴眼镜，为了去延安，赶忙到成都春熙路一家大眼镜店配眼镜，第一准备打枪，第二准备晚上行军。

后来延安整风，就是整我们这个东西。只知抗日，不懂共产主义，你们不是为了共产主义奋斗来的，你们是为了抗战。就检查呀，检查呀。有这样思想的人，叫“半条心”，就是不懂马列，不懂共产主义。首先承认半条心，心服口服，到延安去，确实没有想到去实现什么共产主义。

15 哥哥借了三百元送我到延安——我要了三百块，这是老虎吃天啊

开学后，到处串联，准备走。通过私人关系，进步学生就有联系了。但是，怎么才走得了呢？

到延安去有几大难处，延安成立抗大、陕北公学，并不是你想去就收留你的。你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才可能去。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是需要介绍信，二是要很多钱。没有去之前，心里算着要交学费、伙食费，还有路费，哪里知道吃饭不要钱呢。每个人到延安去，无论从什么地方动身去的，都要准备二百元以上。那时二百元是什么概念？那时的猪肉两毛五分钱左右一斤。女工，一个月几毛钱。多数人要准备三四百元，这个费用大得不得了。

对我而言，钱比较容易，向哥哥要。我哥哥当时在宜宾中国银行当行员，他练习生三年后升为行员了，每月有二十四块钱。我决心去延安了，向我哥哥要了三百元，这是老虎吃天啊！哥哥哪里拿得出来！但我哥哥是无条件赞成我去的。他东借西借，借了三百块。当时他已经结婚，有一个儿子。我到哪里去取呢，到成都盐市口中国银行。没想到，

我取钱时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长辈，表叔之类的。我在成都石室中学时用的钱，都是到他家去取的。他看到我在取钱，而且取这么大数目的钱，问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你不是在我这里拿钱吗？我当时很紧张，怕他猜到我要去延安。很快，我想没有关系，他是个不问政治的人，跟我的关系也不是很密切，我就编了个理由，应付过去了。

最麻烦的是介绍信，你要弄到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才行。在走之前这几个月，我曾经去找过当时成都救国会四川大学的几个人，但他们都不理我。我只是一个中学生呀，中学生去找大学生，理都不理你，谈不到一起。当时到延安去的，基本上高中生是一团（拨），大学生是一团（拨）。

当时成都的党组织正式有没有，我现在都不知道。据现在我听说的，成都地下党恢复得很晚，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后，我们都快走了，延安才派出几个老干部回到四川，廖志高、罗世文两个大概是关键人物。我们不可能认识他们，连韩天石我也不认识。“七七事变”后，韩天石是四川建立民宣队的关键人物。韩天石是东北人，北京大学学生，后转学到四川大学读书。他哪里是去读书的，他是去做地下工作的。他在四川待了几个月，找不到地下党的组织，据说自己的关系暂时也没有了，但他照样活动。韩天石在成都救亡运动中是一个关键人物，是我的间接领导者，他的工作成就非常突出。

16 我到延安有四封介绍信

帮我找到介绍信的关键人物是侯台阶，现在改名侯方岳，比我大三四岁。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地下党员。他一九四〇年调到云南。他怎么跟我哥哥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在成都编进步刊物。我哥哥搞地方救亡运动认识他。我哥哥让我去找他，帮我弄到介绍信。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条临河的房子里。当时成都有许多房子，半边临街，半边临河。他认识不少人，知道哪些人要去延安。就是他介绍我认识田家英的。侯的关系多，领导能力强，他团结的进步的青年可能上百。他是我去延安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我得不到介绍信。

我一个人有四封介绍信。那时是各显神通，有可靠救亡运动领袖的

介绍信，西安办处事认为你是可靠的，就行了。

一封介绍信是张志和的。张志和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师长，是老地下党。共产党许多要人都知道他。四川不少人知道他曾是共产党员，也知道车耀先是共产党。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人是林伯渠，字祖涵。张志和的信就是写给林伯渠的。信的内容我还记得。大意是说，祖涵先生，兹介绍成都救国会员前去延安……口气就是老相识。张志和是四川救国会的领导人，其实我当时并未加入救国会，成都联中还是沉寂的，无人来此活动。

我们一同去延安的四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有张志和的介绍信。

第二封介绍信，是王干青的。这个人当时在邓锡侯那里做高级参议之类，其实只是个名义。邓锡侯是四川军阀，资格比蒋介石还老，四川绥靖公署主任，相当于四川军区司令。绥靖就是剿土匪。王干青是不是地下党，当时不知道。但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撤退时，他被害，是十二桥烈士之一，从这点来看，他可能是地下党。

他的信也是写给林伯渠的，口气也是老熟人。

第三封介绍信，是郭祖劼的。郭祖劼在一九三七年是成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办有刊物《国难》三日刊，销路很大。他当时的职业是蜀华中学教务主任。蜀华中学在成都规模比较大，但成绩不怎么样。我到青龙街他的学校去找的他。他的信也是写给西安办事处的，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了。我姐姐的爱人赵筱村先出发去延安，把郭祖劼介绍给我。前两封信为什么记得呢，因为是直接写给林伯渠的。

第四封信是同学余明的，他介绍我到西安找谢华。谢华是谁呢，是地下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青救会在西安的领导。他办的刊物叫《救亡》，陕西省委办的刊物叫《西北》。谢华可能没有资格介绍人到延安，他只能介绍到青训班。安吴青训班距西安不远，是由陕北的党派出来接待没有介绍信的，或者不能立刻到延安去的青年的一个单位。这封介绍信我没有使用。

17 一起集议去延安的朋友：田家英、赵世英、戴碧湘、何郝炬

等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月份，通过侯台阶介绍认识的准备去延安的人，经常在成都的少城公园茶馆聚会。少城公园有很多茶馆。少城公园既是玩的地方，喝茶的地方，也是各方面的人联络的地方。好人在那里联络，坏人也在那里联络。我们这些人，警惕性很高，怕蒋介石的特务。虽然经过了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战，但国民党害共产党那不是假，要杀你还是要杀你。我们对国民党一点都没有幻想，对国民党的看法没有什么改变。有这种思想的，就是真左派。当时有这种思想的人就够参加“民先队”“救国会”了。

我并没有参加这两个组织，我一九三七年才到成都，在成都无朋友，而成都联中又是一个孤立于社会的纯读书的学校。参加“救国会”，特别是“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有两个暗中的条件，一是反蒋，二是拥护苏联。不明说要有这两条才是真正的进步分子。当时革命青年恨日本侵略，抗日，基本上都这样。但只是抗日，根本不能参加这两个组织。现在参加“民先队”，就算参加共青团，参加共青团，就算参加共产党，就算党龄。这很对。现在听说参加生活书店，也就是参加革命。这个做法也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这些人一起谈，但不是一起走的。哪个先筹到钱，又有介绍信，就先走。通过侯台阶，联系了田家英、赵世英（后来改为赵施英）、何郝炬（何其、何驹）、戴碧湘等。何郝炬比我小两三岁，田家英也比我小两三岁，四五个人经常谈。我们这个非正式的小组，不断在更换人。

田家英比我先走。田家英穷得很，他家里能拿出几块钱来也难，估计是赵世英的，赵世英家比较有钱。那个时候，有钱人家的子弟要去延安，往往偷偷从家里弄出金银首饰去卖，一卖后，两三百就到手了。田家英比我早走三四个星期。他们的路线证明他们的钱多。他们从成都坐汽车到重庆，转船到汉口，又坐火车到郑州，再坐火车到西安，绕一大转（圈），很安全，很费钱。从成都到重庆坐汽车是八块，还有那么长的船和火车呢，每一步全要钱。

何郝炬也比我先走，他先弄到钱。去年，他来我家看我，我才知道，天老爷，他没有什么可靠的介绍信，只有一封信，介绍他到西安谢华那里的。我说，哎呀，你还不如等一阵子，我们一起走。你这个信，我也有，我去见过谢华，他在西安许士庙街十五号三楼，他也是介绍我到青训班，我没有用。何郝炬经过安吴青训班最后还是到了延安。

18 我们是如何到延安的

我们这一批新结合的是四个人。

还是通过侯方岳，他介绍我去找林蒙（名字可能有误）。我在成都一个上层的公馆里见到林蒙。林蒙真是能干，他可能已经有组织联系了。他找的是四川军阀出差到西安的空军车，架起的铁栏杆上有帆布篷，烧汽油。军车上有副官，还有押车的人。收我们每个人五十元钱，全部由他们分。

万一遇到国民党检查怎么办？发出前已经办妥一切了。当时阎锡山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阎锡山出钱，出地方，其实许多人是共产党。这个学校在成都公开有招生广告。离开成都前，在成都办了报名手续。我想万一有检查，就说到民族革命大学去。当时，总的说来，你朝华北方向走，国民党觉得你是上前线的，是自愿去做炮灰的，检查都不严。

到西安的准备是比较周到的。有介绍信，有钱，找到了车，到山西民族大学的报到证也有了。揣三百块，一大堆。好在是军车，土匪不敢抢，押车的有枪。通行无阻，没有受到检查。我们那一车二三十个人，各人坐独木凳。司机、押车军人，一路大吃，我们付钱。坐这个军车，比一般的民用车好，钱也花得少，也顺利。

从成都到宝鸡，路很烂，土路，汽车时开时不开，而且过秦岭时很害怕，随时都可能翻车。经历了三四天，到了宝鸡，然后再坐火车到西安。

到西安的时候，到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四个人，各人的介绍信全不一样，我们的信拿进去后，被认为有用，可以到延安去。可见那些介绍信都很过硬，全部非常有效。接待的人穿羊皮袄，第一次看见皮在外，

印象深。这个人说，同意你们去延安，你们是到抗大，还是到陕公，到时再说。我们有两部军车，现在没有回来，回来后，可以送你们去。我不能胡吹呀，说到延安怎么艰苦，我们是办事处用汽车送去的。我们说，已经在旅馆住下了，在偏僻的地方，怕国民党检查。他说，你们白天到郊区躲轰炸，晚上回城里住，每天派一个人早上九点来听消息。我们就在郊外待着，黄昏才回旅店。我们大概是双十二那天到的西安，印象较深，等了五六天，有车子了，集中到办事处坐上车。到延安的路都是黄土路，连石子都没有铺，车一走过，几里路滚滚黄沙。从西安到延安，走了三天。

我们从成都到西安的这一批四个人，另外三个，到了延安后不怎么听说了。为什么现在连名字都忘记了呢？因为是临时碰在一起的。我们这一批是中学生。

19 两点申明

田家英到延安，跟我并不是同路。现在有一些人做书写文，弄错了。还有更莫名其妙的事，张冠李戴，说我是教毛岸英的老师。更不对，那是田家英。毛岸英是一九四六年从苏联回到延安的。回来后，就到延安南边的吴满有那里学农去了。按当时的说法吴满有是富农，是第一号劳动英雄，《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当然是毛主席要这样干的。毛岸英在苏联住了十年，回来后，对中国情况不知道，毛主席就让他到吴满有那里去了解中国农村。毛主席让他住在宣传部，由陈伯达管教他。但陈伯达不愿做琐事，一口福建普通话，就交由田家英管他。他跟田家英的年龄差不多，但他确实把田家英当老师看待。当时陈伯达任中宣部副部长，毛岸英回延安后一直住在中宣部。

现在利用这个讲述的机会，再一次声明。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一些文章说延安有什么“才子”之说。这个名词，是打倒“四人帮”后才慢慢被人纯粹捏造出来的。“才子“是封建词，延安是无万分之一容忍“才子”之说的可能。就是真正有学问的人，像陈伯达，也从来没有哪个人说他是才子。这么说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共产党领导的环境下，根本不可能也不准讲这种话。如果说了，运动来了，你就是“反革命”。任何人要这样说，就是搞破坏。这是纯粹胡编。还有几大“美人”之说，也是根本没有

的，完全是假的。进北京后也还不准有这种说法嘛，全是胡编。

第二编

第四章 在延安（一）（1937年12月—1941年12月）

20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

延安城里就有几个招待所，我们被分到天主堂招待所，就是张学良和周恩来会面的那个天主堂。当时不知道，知道肯定就更激动了。

当时我们睡在谷草上，谷草不是稻草，是小米的梗子，很硬很粗的，直接铺在地上。头天晚上住的时候，觉得奇怪，一大堆人睡在地上，不习惯。到鄜县（现富县）住下时，晚上吃饭，店老板问你要多少斤，我说一碗面，还是问要多少斤。后来别人告别我，所谓斤，就是未和好的面粉，对方要根据你要的分量，给你和面来煮。一般的面条有筷子头那么粗，桌上有盐，有辣椒粉，有水样的醋，自己放。当时心里感觉这个陕西怎么这么苦。从成都锦绣平原到那里，生活水平，天地之差。这样的面，在成都哪有人吃。这就是那时陕北的物质水平。吃白面条，就是享受了。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后，东北军后撤，收缩战线，把共产党“欢迎”进延安。我们去的时候，党中央搬到延安将近一年。我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到延安后，延安已经比较热闹了，还不算十分热闹，一条以南北为主的小十字路而已。比我家乡的小镇还小。

我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号左右到的，因为到了延安后，听说前几天毛主席到延安飞机场去欢迎王明、康生、陈云三个人。现在我了解，王明他们是十二月十五号左右到的。

到了延安，就填表，写思想自传，包括到延安的动机、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等。现在来看，就是在详细审查。在天主堂住了十多天，写了很多字，填了多种表格，谈了多次话。

这以后，就分我到陕北公学十七队。一个队七十个人，住七八个窑洞。有队主任、协理员管我们。又是填表，写各种自传，主要从事政治考查。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到延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人分到抗大，有些人分到陕北公学。两个都是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当时有个说法，抗大毕业，基本分配到军事部门，陕北公学毕业，分配到前方基层工作。这只是一句话，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陕北公学也大得很，但后来不知何故不提了。

21 陕北公学三门课，学习过程中又反复写自传

我们学三门课。第一门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教程”。这门课讲的是“九一八”后的历史。国民党的，我们知道一点，但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就不知道，所以有新鲜之感。第二门是“游击战术”，第三门是“群众工作”。这些课都是抗战的需要，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课程的设置就是抗战上前线需要。

陕北公学除了这三门课，还有晚上的急行军。晚上哨子一吹，赶紧起来。都是半夜，冷死人，有时在高山上走一两个钟头，女生也一样。对一个中学生，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的人来说，有点吃不消（支持不下去）。但我当时并不觉得苦，你是来打仗的，这个训练必须接受。

三门课学完后，我们并不是真的全到前线，到前方根据地，不少人留在了延安。到了前方的人，也不直接上前线，而是当基层干部。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连队战士上前线的。完全上前线牺牲的人，不算很多。大量死的人，是生病，过封锁线，或者被日军包围这几种情况。

陕北公学三个月反复写思想自传，反复写对什么什么问题的认识。因为反复写，写得很多，就能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你到延安来，是凑热闹的，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真正的抗日，过去是否反蒋，或者是否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当然，还少不了一个问题是：你对苏联的态度。你必须是彻底拥护苏联的。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看出。你虽然不懂什么马列，但你的思想倾向是多年形成的。如果你没有十来年看左倾书报，你就写不出来。这样一

来，就相信了我这样的人，不是一时投机。

22 入党，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入党宣誓。入党之前，经过长期的考查、填表、写总结，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当时的背景是大量的学生到延安。中央有个目标，通过考查，能入党的，都要入党。长征到了陕北后，党员就很少了，抗日战争的局面已展开了，知识分子党员不多。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初中到大学都算。当时入党也不是号召，但对非党员公开表态：你们想入党可以写入党申请书。这就是在大规模发展党员，比例是多少，我不知道。每个队有个队长、两个辅导员，这三个人，找你谈话，了解情况。他们都是相对有经验的党员。各个队的情况都是这样。陕北公学很大，工作人员连学生，大概有两三千人。没有什么党委，是在陕北公学总支委办公室里宣誓的。记得墙上有三个人的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时好像还没有挂斯大林。毛主席像也没有。

23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学员非常参差不齐

一九三八年一月进的陕北公学，四月初马列学院秘密招考，通知我去考。要去考试，大概只是一个形式，基本上都定了。陕北公学十七队还有余宗彦也接到了通知。

这个考试，是在延安清凉山下面一个千佛洞里秘密考的。其实绝大部分题我都没有答出来，十个、二十个问题，你答对了一两个，像列宁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多少答出来了，就认为你是读过马列的。我自我估计，我至多能得二十分。

通过考试后，四月下旬，集中在延安蓝家坪，党中央书记处就在那里。一个班是三三制，三分之一是长征老干部，三分之一是老地下党员（多数是抗战后出狱不久的老革命家），三分之一是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三个学校考进去的，合起来不到九十个人。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第二学期我曾经同李先念一个小组，一个炕上睡觉几个月。我那个小组，老干部有宋时轮上将、姬鹏飞外长。后来曾

做国防部副部长的王树声大将隔我一个窑洞。

我们组有哪些地下党员呢？有杨超、章夷白等，好像还有宋时轮、聂洪钧、姬鹏飞，都是长征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活动的地下党员，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抗战后才被党保释出来的老英雄。我们那个组，有两个三八式，一个是我，一个是张同舟。张同舟是西安人，西安事变时，中学生，红得不得了，算是学生领袖了。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势力未进入西安前，党赶快把这些人撤走了。我们组还有个人，叫曾三，后来长期当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新党员有尹达、张黎群等。

后来，学员中的三三制办不到了。因为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封锁严格了，根据地工作开始后，老干部抽不来了。

马列学院，江青是第二班，叶群也是第二班，丁玲大概也是第二班或第三班。实际上一个班就是一个期。

我们小组住在半山上，这个山只能开小窑洞，小窑洞只能住两个人，我跟曾三住一个窑洞。到了根据地后，对我教育最大的就是曾三。曾三也是个知识分子，长征干部，后任中办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非常敬爱他。

当时十七八岁，对长征干部和监狱里出来的干部都尊敬，但是，对后者更尊敬一些。道理很简单，长征不管怎么样，枪在你的手里边；而监狱里出来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雄、革命家。所以对他们真是五体投地。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特别敬佩这批人。他们确实是为了理想，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随时可以付出生命。现在许多青年对打倒蒋介石不了解，不知道那个时候要打倒蒋介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蒋介石当时就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至于说他并不准备投降日本，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镇压一切抗日积极分子，首先是共产党，手段残酷，抓起来就杀头，连陈独秀都要抓起来坐牢。我们当时一批青年，痛恨蒋没有错。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要抗日，但他要先安内。他这个“内”不是一般的“内”，而是关起来杀中国进步抗日人士。现在的青年不懂“九一八”后六七年的环境。那个时候，日本人侵略那么厉害，蒋介石镇压抗日活动也那么厉害，怎么能不恨他呢？当然，现在我们去研究，发觉蒋也在准

备抗战，绝不投降日本，也是完全正确的。

24 马列学院重量级的老师：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康生、陈云、李富春、艾思奇、杨松、陈昌浩等

六门功课，分两学期学，八个月就毕业了。第一个学期，三门课，是根本。马列主义，从马克思讲起，讲到斯大林。这门课，一九三九年后，就变成苏共党史了。老师是吴亮平，我对他有一种很伤感的感情。他是留苏的第一批人，是跟张闻天、蒋经国同一批坐船到苏联去的。英文、俄文都好，还经过长征，到延安后却只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个科长。而博古、王明、张闻天这些人，先后是第一号人物了。吴亮平教的内容丰富，但也有教条。哪个没有教条？都是把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当“圣经”。

后来教我们的是柯柏年，解放后是外交部美大司的司长。美，美国；大，代表大洋洲，是研究性质的，当时谈不上什么外交关系。柯老懂英文、德文，课讲得最好，是学者型的，原原本本，头头是道，讲得引人入胜。他是延安数一数二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人。

还有一门叫政治经济学，是王学文教。现在知道这个老前辈的人很少了。王是留日的，学《资本论》很认真，他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表面上，他是研究经济的，实际上还做特科的要务。特科是周恩来创建的，一直受周的领导，是共产党的情报和反间谍部门，相当于公安部兼安全部，既搞情报，也搞活动。共产党的特科很厉害，恐怕是世界第一，根本原因是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理想的人。王学文资格老，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但是他不善说话。我们很尊敬他。但说实话，上他的课，很难听懂。

有一门课叫党的建设，简称党建。讲共产党的性质、群众工作、支部工作、反特工作等。第一班，第二班，不是一个人讲的，张闻天人缘好，他这个人不得罪人，不整人，请什么人，什么人都来。党的理论这部分是康生讲的。康生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后来的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地下时外号叫“机关枪”，康对他称赞得不得了，

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陈云讲群众工作，大大称赞“小开”。“小开”是潘汉年在党内的外号。“小开”是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陈云称赞他怎么样灵活机动，样样都能干。陈云也大赞过“机关枪”。

记得这些内容的人，现在还有人健在，现在北京听过此课的，我知道至今现有六人，我不会说谎。中国的历史很复杂，作为典型的了不起的好干部，“文革”中被整成“反革命”，连命都送掉了。这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二学期又是三门课：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哲学。哲学是艾思奇讲。艾思奇写文章十分通俗，使人感兴趣，但不会讲话。给我们讲课，不看我们。反而是抗战前看他的《大众哲学》，对活泼人们的思想起了作用。

讲中国革命史的人，叫杨松，湖南人，是个老前辈，在苏联很多年，抗战后从苏联回来，是管东北抗日联军的人物之一。他讲得不错。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刊后，他被调去当总编辑。一九四二年春天得肺病去世了，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教世界革命史的老师叫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徐向前是总指挥。陈昌浩是留苏回来的，“文革”中自杀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讲话的天才，从我到延安，到现在，没有遇见有超过他的，他比王明还会讲。他很年轻，一九三六年，红军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全部被打散，他们这些主要领导人手里有几个钱，他就躲到甘肃偏僻地方一农民家里。巧得很，他躲的那家也是湖北人，那家人猜到他是红军。他到延安恐怕在一九三七年的秋末或冬天了。第二年八九月，就能够给我们上课。他从罗伯斯庇尔，讲到拿破仑。他讲课不狭隘，极传神。讲到拿破仑，他就是拿破仑，讲到罗伯斯庇尔，他就是罗伯斯庇尔，非常有吸引力，英雄主义极为外露。以后我想，他哪里有这些历史知识呢，可能他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看了很多书。当时延安已有各种各样的书，英文的，德文的，俄文的。当时苏联出的书不少，讲世界革命史的书苏联刚出了一些。看情形，他可能热炒热卖。他给我们上课，印象最深。

延安讲课，跟现在不一样，七点吃早饭，从八点到十一点半，至少讲三个钟头。如果有休息，了不起就是喝水。我们坐在马扎上听，有个马扎就不错了，扛来听课，又扛回窑洞。教室是搭的平房，土墙，坐六七十个人。屋顶是很厚的黄土，没有石灰。后来建了更大的，可以坐一百多人，外边也可以坐一百多人。

25 专学习联共党史，错误影响不少

一九三八年年底已经学了八个月，六门课也完了，进入一九三九年年初，马列学院就成立一个部，叫马列学院研究室，分四个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室，哲学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中国问题研究室。人员以一班、二班的学生为基础，有四五十个，又从中央党校、抗大抽调了三分之一的人，加起来有八九十个。我分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刚进去的都是青年人，基本上都不能看外文。开始读一些翻译的书，很快地，苏联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党史”，后来叫“苏共党史”，我们就以这个书为研究课本，根据这个课本，再找一些有中文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其他书来参照读。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后来被毛主席批为教条主义。当然是，完全是。但是，以联共党史为根本教材的根本方针，不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定的，是一九三八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基调报告明文定的，毛主席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号召我们学马列，就是学斯大林。这些，现有文件都能查到，是执行毛的决定。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所谓学马列就正式变为只是学联共党史。我们在马列主义研究室搞了一年，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用的那本书，漂亮得很，是苏联出版的中文书，纸张、印刷都很漂亮，都是苏联的进口材料。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学习马列，就是学斯大林，就是学联共党史，而这个是六中全会通过，是中央定的。从前，我们这些人只知道点马克思，哪里知道斯大林？从此，很多人陷入对斯大林的崇拜。当然，客观上也有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太多、太厚，也没有翻译，就是翻译过来也看不懂。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看懂，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几个人能看懂？号召的人，真的懂吗？

那时候，我也成了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联共党史，事实证明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老同志自以为至今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坚持联共党史，坚持斯大林主义。

一九四〇年，我调到马列学院教育科去做教育干事，有时又叫助教，有四五个人。这个职务不重要，并不是非要不可，主要是做联系班上的工作，开会呀，学习呀。我的时间多一点了，可以看杂书。马列学院有三四个窑洞的书，也有很大的阅览室，有五六十平米。全延安，初时也只有马列学院有。大后方所有的杂志、报纸，包括国民党的反动报纸，统统有。我身在延安，对大后方的情况不生疏。我感到当时去看的人很少，经常去的恐怕就我一人。国民党到了重庆后，专家多无事做，只好办刊物。我记得当时有《外交评论》《财政评论》《贸易月刊》等，很正规，资料丰富，对国际形势、国际经济形势，多有报道，我经常看。

一九四〇年比较平淡。现在回想起来，在五六十平米的阅览室看那么多报刊，上百种，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我对国民党的情况，以及世界的大事，始终关心了解，不全盲目。

26 为什么马列学院办不下去了

马列学院一期期办下去，一九四一年年初，办第五班，实际上就是第五期。第五期分两个班。这时的学生质量大大提高了。国民党实行封锁，学生来延安不容易；此外地下党开展工作也困难，许多人都撤回延安了。

其实，一九四〇年年底，马列学院就很难办下去了。一九四一年起，请不到教员，连宣传部的吴亮平，在张闻天手下做科长，《解放》的杂志总编，他都不来了。这就不正常了。张闻天谁也请不动了，谁也指挥不动了。现在看来张闻天太单纯了，那几个月，非常困难，四面楚歌了，他还要硬撑。

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白区工作的负责干部，还有些抗战后到延安去的知识分子干部，都到马列学院来，马列学院似乎变成一个共产党中央训练高级干部的学校了。

张闻天当院长，拿笔杆的人，变成了拿枪杆的人的老师，还有那么多大人物，解放后，大将、上将、部长一大堆（批）。张闻天是个书生，一九四一年还要继续办，即第五期，突然所有的教师一个也不来讲课了。以张闻天的身份，请不动一个人，有些人如吴亮平、艾思奇是他的直接下属。张闻天成了孤家寡人。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这个学校的学员很多，但实际上教学进行不下去了，有学生，没有教师，维持了几个月，下半年，办不下去。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出来了，说延安过去的教育，特别是马列学院的教育——当然没有明讲——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说整个党的宣传、理论学习全部要改造。因此，学院要停办，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过几个月，就是反对党八股了。

马列学院停办后，一改组，学院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最后，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跟马列学院不同的是，没有人来讲课，全自学。设有多个研究室，有哲学研究室、文学研究室等。张闻天还是院长，只是纯挂名的。这时，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范文澜来当副院长。这个副院长也是个名义，范文澜始终是个学者。真的副院长是李维汉。

2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开始大读闲书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公开发表后，从党中央到各县，都加强调查。很快中央成立了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机构，叫“中央调查研究局”，毛主席兼任局长，副局长是任弼时（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真成立过）。下面分三个部门。一个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主要研究国民党区的情况，包括国际方面的；一个叫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根据地内部问题；第三个部门，叫敌伪研究室。敌伪研究室设在军委里边，一般人不知道。里边有谁呢，有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他一九三九年就到了延安，但没有公开。一九四三年才宣布他到延安。日本战败后，他回国，是日共的总书记。党务研究室的情况，我不知道。政治研究室，毛主席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有七八十人。陈伯达这个人，什么事都不管，一直如此，就是写文章，他自己要写什么，或者上边要他写什么。自从这年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

从此就成为一个党的制度了，任何地方都有。中央书记处有，国务院也有。有些叫政治研究室，有些叫政策研究室。

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我就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邓力群也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其实就是马列学院的学生，马列学院停办了，大部分早期留校的学生就转到这里了，还有其他部门来的少数人。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政治组、经济组、国际组等组。我就在经济组的农业小组里，研究国民党地区的农村问题。我一直喜欢农村。这个机构有个好处，报刊多得不得了。我们当时不是以看书为主，以看报刊、材料为主。在这里只有半年，工作没有做什么，很自由，也可以读闲书，比在马列学院舒服得多。

我在马列学院待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在班上；一九三九年到马列主义研究室，在研究室待了近一年；以后又在马列学院教育科工作，即所谓干事，全部时间都在那里，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马列学院停办。但我以读杂书、读报刊为主。

第五章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

28 统一思想、舆论

一九四一年，我以为基本上是延安的一个分水岭。

延安，最热闹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各种各样的学校很多，光是外边来的学生就上万。抗大、陕公，还有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还有其他。吃什么？粮食全是老百姓支持；烧什么？延安全是荒山，一棵树都没有，全是二三百里外拉的煤炭。延安的经济支撑不了这么多万人的简单消费。

一九三九年春天，延安的粮食供应有困难了，能上前线的上前线，抗大、陕北公学也搬了，分别到各个地方去。马列学院稍微延长了一年。因为总人数不太多。各校要在延安住下去，像一九三八年一样，经济不允许了。因此延安时代，一年年的情况都不同。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六月，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中央同时发布了两个决定，一个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个关于加强减租减息工作的决定。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系列并无专门决定的措施。

要讲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经历，我要先讲一九四一年整个一年的情况。现在回头去看，一九四一年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整风为什么要来？一九四二年的整风不是突然来的，光要做好准备。准备工作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有什么现象呢？统一舆论。

延安前后出了许多杂志，像《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萌芽》等等，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艺刊物。

特别要提一下《轻骑队》。经过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之后，延安一些想表现自己特点的青年，在党的中央青委里边办了一个墙报，起名《轻骑队》。墙报是用很多木板钉起来的，字很大。人

物包括李锐、于光远、许立群、童大林等。《轻骑队》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提出批评。《轻骑队》这批人胆子也够大的，他们应该算延安青年当中思想最活跃的极少数人。他们写短的批评文章，有些人叫杂文，远在丁玲、王实味之前。他们的文章确实好。解放以后的杂文家，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轻骑队》的，我印象深得很。每出一期，很多人都要跑去看。我自己很少去，我还忙着我的教条主义工作，要看书做准备工作。

《轻骑队》是轰动延安的，从毛主席到下面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有一种说法，毛主席是去看过，另外的说法，有人抄好了给毛主席看，还有的说法，说原稿给毛主席看。后来《轻骑队》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跑到毛主席那里去讲，说《轻骑队》这些人不得了，在延安要造反了。其实《轻骑队》这些人只是批评了几句，应该说他们是延安一部分思想活跃的青年代表，是延安的先进分子，是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毛主席本人对《轻骑队》有什么说法，前后听到很多，因无确据，我不能乱说。

党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是一九三七年开始办的不定期期刊，名义上是张闻天主编，实际上是下面的宣传科长吴亮平负责。这个杂志在一九四一年春，出到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期的样子，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不声不响地没有了。

所有报刊全部停刊的同时，党中央在六月创立了《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年，所有的报刊全部停办，谁有这个权力呢？具体内幕就不知道了。但现在回头来看一九四一年，所有的报刊一律停，这件事非同寻常。

29 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当时他不是中央委员

中央领导干部有个很大的调整。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据说当时彭真中央委员都不是。陈云一下子被换了。陈云的声誉本来是高得多的，作风比较实在。为什么要换陈云呢？大家都不清楚原因。

30 开始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中央宣传部慢慢瓦解了。当时不当一回事，现在看来，很重要。现在据载，张闻天在一九四一年夏秋即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了。胡乔木调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以后出了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六大以来》党史资料汇编。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九一八”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博古主持工作时期的地下刊物有一些运到了延安。这本书就收了从六大到抗战前能够收到的文件，包括“九一八”前后，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极左的打倒一切中间派的决议、文章等。这些东西确实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厉害。毛主席反对他们，这个对不对？我觉得是很对的。过去含含糊糊，看不清楚。毛主席本人虽然不重视他们，但在组织上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博古他们当时是青年呀，知识分子出身，站在那么高的位置，不了解情况，以为贴贴标语，游行一下，闹闹就会取胜了。他们很幼稚，而且这些东西又主要是来自莫斯科。张闻天虽然文化修养高，但是那两年写的文章照样是打倒一切。

整风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具体做工作的是胡乔木。不要看胡乔木当时也是个青年，一个毛主席身边的秘书，但他的工作能力特别强，把这些东西都弄出来，编出了这本书。

另一套书叫《两条路线》，两本。这些书的任务，是能充分说明王明、博古、张闻天是错误的。（其实均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31 张闻天的去与留

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虽然没有点名，但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张闻天，说张闻天这些人对中国一点都不懂。《改造我们的学习》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是不行。这个报告影响很大。“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报告中用此讽刺挖苦以前的中央领导，包括瞿秋白，挖苦得很厉害：你们从苏联学习回来，只知道苏联那一套，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是根底浅。但是，毛的这个批评对党内的年轻党员，确是金玉良言，我一生拜服。当时看到这个对联，只觉得很深刻，但对其所指的具体对象，延安百分之九十五的青年干部，都不知道，我

当然不知道。认为是指我们这些青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是指过去的领导。

当时王明、博古已经没有权了，声望也不高了，但张闻天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是总书记，或叫“总负责”。这个名义还在不在，延安含糊了几年。一九三八年，张闻天让毛主席当总书记，毛主席不当。张闻天这个总书记又像是，又像不是。我们这些青年没有到延安前，以为党内最高负责的是张闻天，毛主席跟朱老总主管军事。到了延安后，不大听说张闻天。实际上也看得出来，延安的一切，都是以毛主席的领导为核心。但是名义上，还有模糊状态，张闻天的总书记还有没有，没有下过文件。但是，究竟有没有决定一切的领袖？有没有说一句算一句的最高的领导？当时实际上的理解还是毛主席。

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后，张闻天很快就提出了下乡调查。一九四四年，张闻天任何职务都没有了，搬到枣园去了，带几个人办一个刊物《参考资料》。

一九四一年一年，材料、人事、舆论都准备好了，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正式整风开始。张闻天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离开延安了。

第六章 跟随张闻天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调查（1942年1月—1943年4月）

32 陕北神府县贺家川口：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三年四五月，我不在延安，我跟着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下去了。我们叫延安农村调查团。张闻天自己要求下去，跟他的夫人刘英一起。我们下去时，根本不知道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不知道张闻天已没有权力，自行下放了。这一下去就是一年半。张闻天的事，就是毛主席周围的几个人，另外延安还可能有几十个人知道吧。

张闻天这么高的职位，中央组织农村调查团，各地方弄不清，把你当中央，由张闻天当团长，带几个青年小助手到晋西北调查。张闻天用的是假名，叫张晋西。

我们政治研究室农业小组有四个人，派了我去。中央各部委抽调一些人，中央党务研究室去两个人，财经工作部去两个人。中央研究院的马洪当秘书。马洪很能干。我们的目的地是晋西北。全体团员是：刘英、马洪、雍文涛、薛光军、许大远（须旅）、薛一平、尚明、徐羽、曾彦修。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天还远没有亮，我们十来个人就从延安杨家岭动身，另外加上警卫一个班。中央派了一个加强班十二个人，还有一个排长领导，很是气派，因为张闻天住到哪儿，通天亮是要站岗的。就是白天在路上，张闻天骑着马，前边都是搜索着前进，左右都有人保护的。我们跟在后边走。这些警卫战士真可爱，是红军，是中央警卫团的。排长、班长均是经过长征的四川人，个个像小老虎。张闻天还有一个单独做饭的，还有一个管理员。“管理员”这个称呼现在不大有人知道了，但在延安流行了十几年，管理员管理日常生活，即是个小总务科长。加起来，一共三十几个人，浩浩荡荡。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悄悄离开延安的。李富春、杨尚昆送出杨家岭。我们走出杨家岭十多里，天

才亮。

各地都不知道张闻天没有领导地位了，接待得很隆重。我们先到陕北神府县。国民党统治区叫神木县、府谷县，这两个县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我们叫神府县。神府县的领导在贺家川口，是个小镇。凡是叫什么川、什么口、什么湾的，在北方就相对富裕，因为有水，附近有小河。张闻天住在贺家川口，作农村兼城镇的调查。我们其他人分三个组出去，我所在的组去路家南坬，这个地方是个穷地方。我喜欢调查穷地方。路家南坬距贺家川口要走大半天。我们组还调查另外一个村，叫柳叶村。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我们这个组的其他三个人是：尚明、许大远、徐羽。尚明现在还在，解放后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路家南坬有三十几家，柳叶村也有三十几家。柳叶村名字很漂亮，实际很穷，没有水，旱灾很厉害，收成很低。一般人只调查生产关系，什么多少地主、多少富农、土地占有等，但这个地方没有这些，没有地主，两个村都没有，生产关系相对而言就简单。我调查有个特点，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多少好调查的，我就调查生产力。

怎么调查生产力的呢？举一个例子，以后我在其他地方的调查也跟这里差不多。路家南坬是个穷村庄，羊有几群，一群十几二十个；有几个放羊娃，几家人的羊由一个放羊娃放，每家两三只或三五只，大家出一点钱。山上没有树，也没有一棵草，羊要跑很远，十来里路，把草根都刨来吃了。近的吃完，就跑到更远的地方，羊把草根吃了，土地流失严重。我提到过这个问题的严重，但农民不会看得那么远，听不懂。跟农民讲，农民接受不了，农民只看眼前，所以越来越穷。当时的地方党政也不管这些。我还发现一个情况，小麦比谷子（小米）价钱高，农民反而不种。我问一个农民，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小麦？他讲了种子与收成的比例。小麦的种子花一斤，可以收十斤，不好的时候，种子花一斤，收五六斤。风一来，种子就被吹走了，种子就收不回来。而谷子呢，一斤种子，收一百多斤。一般的人愿意种，因为种子少一点，肥料少一点，收成还有。另外，谷子一颗，很粗，喂牲口很好，而麦草轻飘飘，用处不那么大，等等。这些东西，不在农村待十几年，不懂。还有种大蒜，那里的大蒜贵得不得了，我问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农民说，你知道大蒜是怎么种的吗？一是需要种子多，一瓣蒜长一头，买不起种蒜。二

是需要鸡肥多，此外，一颗大蒜种子种下地时，需要三四粒黄豆做底肥，所以种不起。类似这些情况，通过调查，我知道了很多东西。我后来在河北调查粉条厂、豆腐坊，也是这么做的。粉丝本身赚不了多少钱，开个豆腐坊，也赚不了多少钱。粉坊有粉渣，豆腐坊有豆渣，这些渣可以用来喂猪，赚就赚在这些地方。知道一点点农村经济的常识后，再去了解，就很有好处。一天到晚去调查这个剥削，那个放债，不给你讲真话，很难调查到真相。“稼穑艰难”的时候，农民永远不会相信你。所以，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我们调查完这两个村时，张闻天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我又一个人跑到贾家沟去调查。贾家沟有七十一户人家，是个富地方，有水，虽然不多，但是有条河的上游的看不见的细水在这里。我一个人搞了十来天，专调查生产力，也有报告。此报告张感兴趣。

33 晋西北兴县：我不会按地方意图去写调查报告

大概到了四五月间，结束了贺家川口的调查，东渡黄河，到了晋西北的兴县。兴县不是很穷，县城离黄河五六十里。兴县的碧村是晋绥边区区党委所在地。当时还叫区党委，不叫中央分局。党内早就有电报通知下去了，说洛甫下去做调查了。洛甫是张闻天写文章用的笔名。这个笔名确实有点苏联味道，但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那群人中，个人道德、个人修养都高的人。区党委还不知道张闻天本人的情况，对张闻天非常客气，因为长期以来张闻天名义上是党的总书记，别人以为是党的总书记下来了。当地的干部偷偷问我，党中央领导，到底是张闻天，还是毛主席，谁是最高领导？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从我到延安起，都认为最主要的领导人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说张闻天是第一领导人，但大家都说张是总书记。

我们下去后，当地就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团，我们成了加进去的一小部分。调查团有三个大组，组长都是当地的领导干部。我们调查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兴县的黑峪口，黄河边上，西渡河就是陕北。黑峪口是一个小镇，有条小河，名字真漂亮，叫蔚汾河，从此处流入黄河。天旱时不大有水，雨天有一点水。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还有一个叫高家村，是黑峪口到兴县县城一个大路边上的大村，是往来的要道，比较富裕，有

点小作坊，有七八十户。

晋西北的生产水平很低。在黄河边黑峪口看见剃头担子，插有布幌子，灰黑灰黑的，写有八个字：“朝阳取耳，清水剃头”。令人吃惊。这是六七十年前的广告。现在几乎人人有手机，变化之大，是近一二十年的事。

我们在黄河边上却没有鱼吃。黄河涨大水，鱼自动漂向河边，群众用棒打，竟然没有网鱼的东西，没有捉鱼的方法。这种用棒打鱼的方法，像原始部落。我们几个青年买了些棒打鱼吃。

这两件事，说明当时生产力低下得可怕。我们如果不去发展生产力，只抓阶级斗争，能起什么好作用呢？

我又钻山沟，山沟的名字真好听，一个叫花园沟，一个叫碾子村。花园沟三十户，碾子村一百多户，都比较穷。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地的负责人阎秀峰，解放后曾任西南局的书记处书记，“文革”时被打倒。

我选的花园沟。花园沟原来有一个“富农”，我们看了后，认为只是一个富裕中农。他很能干，养了一条牛，是大犍牛，很漂亮，毛色发亮。那个时候，有条牛不得了。他还代人耕地，收几斤黑豆。后来我们讨论，过去将他当作斗争对象，现在应该改正。为什么呢？一、他是先进生产力，二、他勤劳，牵着牛给别人耕地，一亩地收三升黑豆，也是应该的。虽然我们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没有用，我们一走，一个运动来，肯定还是个富农，又非弄光不可。

我在这个地方看见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惊奇。比如“耧”。“耧”是下种的农具，由很好的枣木做成，牛拉着，有三个落籽口，可以自由调整，根据播种距离来设定三个口的宽度。牛拉一次，就播三行。在这么个小山沟里看见这么先进的生产工具，漂漂亮亮，真是惊人。“耧”是古人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就有。西北的土地，大多贫瘠，种高粱的间距，牛都可以睡。叫作“高粱地，卧老牛”。为什么这样呢？靠天吃饭，不这样不行。行距、株距都很宽。种小麦，也要一尺多宽。

通过调查我发现，在中国农村，只要有点条件，农民勤劳，办法多得很，只要有井灌，就富得流油。当时的问题在哪里呢？在没饭吃。我们调查时发现，他们的粮食非常困难。调查团还是老规矩，在穷苦人家吃饭，按规定，用粮票，一天两斤半。正规的粮食很少，吃点小米窝窝头，连皮一起吃，玉米也带皮，做成窝头。有时候，皮比粮食多。我们向上反映意见，认为农民的负担重，农民交公粮往往占去一半，自己剩下的很少，根本不够吃。而只要成了干部，成了八路军，一天的小米一斤半，这对农民来说，根本办不到。根据地建立的第二年、第三年，还有多种负担，布鞋也是派的。做布鞋需要布、需要麻等，也是负担。牲口出差，更是个大灾难。一年四季都有任务，农民跟着毛驴走，毛驴吃的，自己吃的，都是自己出，负担不起，所以许多农民情愿牲口死掉。所有的根据地情况都差不多，负担不起。马、骡全没了，毛驴还有一些。这些情况我们都反映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上面的各种“调查”多得不得了，下面的基层干部填表都是乱填。比如花园沟行政村——这是阎锡山时期的行政村，我们暂时还没有改，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乡——我问行政村书记，百分比是什么意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连“百分比”都不念，把“%”叫“括栏栏”，即圆蛋蛋的意思。叫都不会叫，怎么还能填？我们出了多少报告，往往是这样来的。上面的调查太多，各种各样的调查全都是公文。报告中说的什么“青年队”“妇救会”“儿童团”，其实不怎么有。肚子饿，吃都吃不饱，哪里又是农救会，又是青救会，又是民兵，又是基干民兵，样样有，一去看，似乎什么也没有。我不大会按照上级的意图去写报告，只按实际调查的写。

34 从田家会战斗谈到敌后的抗战

这次在晋西北，我们遇到一次晋西北反扫荡的大胜利，名“田家会战斗”。大概是五六月，我正在花园沟调查，半夜得到紧急通知，立即连夜西渡黄河，日军来扫荡了。我们这些非武装人员，连夜出发，天亮赶到黄河边。西渡黄河，就是陕甘宁边区的神府县境。过了十来天，我们又回到晋西北。大概是在岚县境内，我们打了一场著名的田家会战斗，是一场漂亮的埋伏战，消灭敌军人数我不大清楚，好像是一百多，或两百多，或更多。现在的人不大了解，认为消灭敌人一百多，有什么稀奇。

可那是十分稀奇的了。敌人出发前，我们必须有可靠情报，在最有利于我们的地方预设强大埋伏，以后外面对我们这样的打法有“口袋战术”之称。硬打，我们的武器弹药与日军相比过于悬殊，硬打就是无谓牺牲。所以放你进来，进入我们在地形上占绝对优势的设伏地方，猛然发起攻击，才有可能制胜。这次田家会战斗就大胜了，敌人停止前进了，根本没有深入到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兴县来。现在的人已全不懂了，战争的规模并不大呀，这样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吗？确实，打败日本，绝不可能是某一方面能办到的。中国的抗日胜利，是集合本国的国、共两方面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加上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三年多的硬打，加上苏军对日本在我们东北领土上长期保持数十万（号称百万）精锐军队的牵制与最后的全面歼灭，等等，才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八路军在敌后八年并没有打多少大规模的歼灭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这种作用，这种战争形态，在一切战争史上至今还是唯一的。想想如果华北、华中全被敌人占领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就会被敌人据为己有，大大增加敌人的战争力量，而正面战场的云、贵、川恐怕也保不住了，中国的抗战局面将何等困难？那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武装，就是在敌人的胸腹内一直存放着几把刺刀和几个炸弹，你说它们的作用有多么大？敌人在山西，在河北，在山东，在河南，在苏北，在安徽，在鄂北，始终只处于大半占领、半占领，以至于小半占领的状态。不然的话，敌人安然占领华北、华中全境，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那么，日军的气势还得了？我们在华北、华中虽然并未打过多少大仗，但根据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日军的内脏部位插了几把刀子，是我们根据地广大军民的鲜血把敌人拖住了。像上述的田家会战斗，如果我们没有挡住，敌人进根据地来扫荡几天、十来天，我们的军民就可能被屠杀多少万。所以我们抗日根据地军民真是生死与共的。我觉得我们多年来的影视，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好像农村富裕户都是汉奸，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民族的侮辱，把“全民抗战”变成“穷人抗战”了，这叫什么历史？处处突出“阶级斗争”，到了自己污辱自己民族的程度，真是可叹之至。

35 张闻天的调查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兴县的调查目的是广泛的，调查后我写了花园沟调查报告。说明

上边报表太多，下面不得不填，但许多东西是虚假的。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张不写进去，基本上是妥协的。

张是懂经济学的，他最后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发展经济是根本，允许农村富农经济发展，不能消灭富农经济。富农生产的粮食多，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一家富农交几百斤，对我们军队的存在，对抗战很有好处。张闻天还提出了地主的减租问题。过去减得别人饭都吃不饱了。一些地主没有什么收入，日常生活已发生困难。形式上来看，是革命，实际上，农民心里不这样想。地主与贫农的关系，没有对立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农村的贫农、中农并不支持你过“左”的政策。过去叫二五减租，张闻天说，现在多减一点，四六也行，需要的时候，对半也行，看情况。但佃客不能一点都不交。不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饿饭，影响社会秩序。其实，这就是“当家不闹事”之意，自己当政，天天闹事，自己制造饥饿人口，这算什么政策呢？张闻天认为中农是农村的主要生产力，这个话，毛主席也讲过。张闻天认为，对中农要绝对保护。那时，一般中农都怕再上升一点，再富裕一点，就整到他的头上，成敌人了。

张闻天还提出农贷问题。名字是农贷，实际上一分钱都收不回来，成了救济款。农民困难，要不要救济？政府是要救济，但农贷一定要有利息，一定要还。如果农贷成了政府的救济，没有什么好处，成了无底洞，对改变生产状况没有什么帮助，只能产生依赖性。张闻天明白提出农贷要贷给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包括中农在内，要使之有利于发展生产。

所有这些意见，完全正确。张闻天是有政治水平、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懂得实际的经济，不把阶级斗争当饭吃。

这些意见，被当地最高领导完全拒绝。原因很简单，区党委书记××大概是九月初从延安回来，他可能去延安作工作报告之类的。回来之后，××的脸色突然变了，一切变得太快。本来要张闻天对干部作的调查报告也停止了，实际上是下逐客令了。张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刻就走了，回到陕甘宁边区继续调查。张闻天终始没有给我们说过，连马洪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个别跟我讲，小曾，准备走了哦，人家不欢迎了。张闻天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要走。但是几天

后，我们糊里糊涂就过黄河，往南走。走的时候，我的印象是区党委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来送行，连话别也没有。我们就灰溜溜“夹着尾巴逃跑了”。

当时，什么都不敢问，总感觉有问题，感到对方要送客，不走不行了。但是没有人问过。除了他的夫人刘英，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绝对服从，不敢问，不敢想，组织性很强，就是相互议论也没有谈过。这是思想改造造成的，因为一天到晚讲纪律，讲服从，自然而然变成了这样。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在黄河西岸躲避日军大扫荡时，张闻天召集我们农村调查团，还有本地的一些干部谈话。张从头到尾全部歌颂毛泽东这件事，我后面要讲。张闻天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我们也一点都没有思考。当时都是这个样子，绝对地组织服从，不能有疑问。像这样普通的问题，也没有问过自己。

在晋绥边区这段时间，好处是我们都作了一些认真的调查，张闻天讲了些好意见。但是，张闻天的意见全部被拒绝。

36 陕北米脂县：这次调查带点学术性质

一九四二年中秋节前不久，我们就到了陕北米脂县。米脂县在绥德北边六七十里，县城很小，很干净，而且县城有文化，非常特别。至于说到出美女，我没有此感觉。米脂县是一九四〇年才扩大的，具体我不清楚。城里很小，没看见什么妇女，美不美，我不知道。

大概绥德地委也不知道张闻天出了事，对张闻天招待得很隆重。我们住在三五九旅的一个团部里，团长张仲翰，对张闻天非常客气。张仲翰解放后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副司令，是王震最得力的助手。他家是冀中的大地主，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北京一个大学生，他把家里的长工、短工组织起来，就成了抗日队伍。

中秋节后，我们就下乡了。我们的调查分四个地方，张在总部，他调查的米脂县杨家沟，离米脂县不远。张和刘英，还有秘书马洪都住在那里。杨家沟基本都姓马，有一百多户，大、中、小地主大概有百之分

七十以上。很特别，以一个姓集中在一个村的地主大集团，在全国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张闻天作学术调查，调查马家集团是怎么发家的。杨家沟有大学生，主要是北京的，也有留学生，留日的，欧美留学的没有听说。这个地方的文化不低。

我这个组在刘家峁，也是个山沟，距杨家沟三十里。刘家峁跟杨家沟有相同之处，是一个地主集中的地方。刘家峁只有七八十户，不大，地主集团姓姜，可见原来这个地方，并不是因姜姓而出名的。这个集团有几家很大，其中有一家住在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里，好几层，全部石头建筑，包括有水井。水井很深，两个人摇一半天才能把水拉上来。还有用石头建的粮仓。米脂县的县仓库就设在这里。整个建筑修建成那个样子，主要是用来抵抗土匪，是怕大股土匪，你有几十个人，没有大量重炮弹，三五个月都打不下来。在中国，恐怕这样的建筑并不多。我去的时候，这家已经没有势力了，他们收的地租，除了自己留四五个人够吃外，其他的都交公粮了。我就住在这个建筑的公家粮仓办公室里。房主四十来岁，没有能力，表现上还是客客气气。对这些大地主，你没有杀他，他阿弥陀佛。

这次调查也是学术性质。调查这样的集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什么时候衰落的。说起来非常可笑。最早，姜家在附近黄河边上的吉镇——老百姓叫“格针店”——开了一个中药店。那一带有这样的风俗，任何人家死人，要摔一个砂锅。（我们家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句俗话，不知是否由此而来。）光绪年间大旱，死人多，需要的砂锅多，姜家囤积后涨价，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放债，发展起来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的大财主的发展史。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地租剥削结合，姜家就是这样。中国商人赚了钱，最后还是买土地，修房子，不像西方发展大工厂。中国地主不扩大再生产，当土老财，修这样的城堡。米脂全是山沟，像这种堡垒，很高的，沿着山修，三四层才能修到山顶。尽管他们是有钱人，但实际生活水平低。在这种家庭里，还是只有地位最高的家长才能吃白面粉，平时也不杀猪宰羊。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有饭吃、有衣穿而已。我们一般人不太理解。他们的钱，是想尽各种方法赚来的，却堆在那里，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坐享其成，一辈子做土老财了。

经过这样的调查，增加很多知识，不调查农村经济，就不知道它是由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地租剥削三者结合发展起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一味求保财，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现象看见了一些。

张闻天写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初稿是秘书马洪起草的。马洪也是中学生，字写得极好，水平也比较高，难得。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37 绥德县：我的一个小调查报告，张闻天觉得有点意思

在米脂县调查完了后，我们又转到绥德县。绥德县过去叫绥德专区，现在跟榆林区合并了。绥德比延安漂亮多了。大概过春节后，张闻天留在绥德调查商业。绥德一个小城有多少商业可调查的？大的全是公营，属三五九旅王震管的。实际上张闻天就是不想回延安，在外边能拖就拖。

我没有参加商业调查，觉得在城里没有好调查的，我单人独马跑到城东六十里义合区去了。绥德城只有那么一点大，没有必要都挤在城里，我一个人提出来，他就准了。张闻天这个人不一样，和平一点，见识广一点，民主一点。

义合区首镇义合镇，是交通要道。义合区委、区政府在那里。因为我一个人，只能调查一个小村庄。他们给我推荐的地方叫虎墕，在山顶上。山顶上有宽的地方，周围很雄壮，很险要。我调查了十天。此村原来是土地革命老区，后来被彻底清剿，破坏一光。一九四〇年前若干年，由一些小军阀统治，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春天转到我们手里。我不作全面调查，只一家一家地问清剿时的损失，比如被抢走了几个鸡、烧了什么，每家心里全有账。调查发现，经过我们恢复政权两年，基本又全部恢复，只有一样没有恢复，那个大磨没有恢复。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我们苦了，粮食要挑到山下找别人的磨子碾。我写了调查报告，副题是："破坏和恢复的力量"。报告主要说明，小农经济没有多少设备，即固定资产。被烧、被抢后，和平一年两年，只要不打扰他，与民休息，让他好好生产，保证治安，生产就恢复了，一年、两年、三年，

就变得比较富裕了。我的调查报告，张闻天看过，觉得还有点意思。我从此肯定：农村第一需要的就是安定。只要有安定，中国农民吃苦得很，只要准他们好好劳动，不样样都充公，他们就会迅速发展起来。

我调查完后，张闻天接到通知，单独回延安。秘书马洪也走了，绥德还派人护送。

一九四三年三月，留我们五六个人继续调查。我们留下的六七个人住了个把月，不太安心。我们在那里是做客的，又没有分配工作，又没有回延安。大概四月份，绥德地委通知我，要我一个人立刻回延安。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了，延安整风紧，开始反特务了。我没有参加整风，没有参加审干，所以一九四三年四五月紧急调回延安。回延安不久就是“抢救”。

38 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印了张闻天的农村调查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

这次调查，各种调查报告很多。一九五四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曾经问过中办副主任曾三。我说，据我所知，中国的农村调查，没有这么详细的，可以出版。他调查后，回答我说，除了张闻天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其他的在延安撤退时都烧了。我说，好，那就把张闻天的调查报告要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就印出了张闻天的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我实事求是写明调查报告初稿具体动笔的是马洪，张闻天是修改定稿。

一九五四年，张闻天还没有被打倒，出版这本书估计到不会受到批评。张闻天这个调查报告认真、仔细。出版的目的，一是纪念这次调查，主要是对这次调查留一个痕迹；二是别人也不知道这些情况。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人也不知道。

第七章 在延安（三）我在整风“抢救”时的情况（1943年5月—1945年7月）

39 回延安后，情况很不对了，跟离开时完全不一样

延安整风开始那一年多，我们都不在。延安整风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号毛主席的一个报告算起。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离开延安的。

为什么张闻天在整风前要带着我们离开延安？后来有一个说法，张闻天是躲风。张闻天去调查是完全自愿——既然我在旁边无事做，我就下去调查。当时形势完全清楚：一九四一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是批判中央的教条主义，但着重是针对张闻天。在延安的干部一般能看得出来，有些话就是针对张闻天讲的。毛的文章说，不能像你们那样办学校。

毛主席的整风的报告，我没有听过，但看过，从内心赞成，因为感受到党八股太严重。但是，我所理解的党八股，跟毛说的，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毛偏向党的几位领导的文章，我所感到的是普通的那一套文章。任何情况都讲空洞的政治，包括文学，政治压倒一切，没有感动人的力量，只有政治斗争。反对主观主义，我更赞成。我调查生产力，不讲空洞。

我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五六月单独调回延安。回去时，感到一切变了，所见的情况跟我离开时完全不一样，各个机关全有了土墙，绝对不能来往了。杨家岭也全被土墙包围起来。我们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杨家岭旁边的一条小沟，小沟与主沟，统统筑个长土墙包围起来。各个机关互不往来。那个时候电话少，大单位才有一个，像政治研究室都没有。我一回延安，就参加筑土墙。

第二个发现，是人不能自由行动了，必须几个人在一起行动。另外也听说了一些情况。一九四二年全年，延安在干什么呢？业务全停下来了，学习毛的报告。学完报告后写自传，因为过去写的那些还不够，还要检讨入党动机，来延安的动机；还有填不完的表。另外，还要写互相

揭露的材料。揭露什么呢？当时叫“小广播”，即相互之间谈的“不合组织原则”的东西，特别是对领导人的不满。一句话，相互谈的“阴暗面”，都要写出来，叫“填小广播表”。这一年我全不在，跟着张闻天躲风，真是幸运。我们离开延安不过四个月，延安就有“五人反党集团”。“五人反党集团”里，我就认识三个。王实味跟我在马列学院一直在一个单位，他不是学生，他在马列学院编译室搞翻译。他的英语好得很，文笔也很好；另外两个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一个农业组的，一个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还有一个是他的夫人王汝琪。王是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律师团的组织领导人之一。

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的报告出来后，延安的知识分子非常高兴，以为过去的那些教条、那些口号、那种文章和宣传不大好了。因此三月八号才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章是在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才出现的呀，在丁玲自己看来，她是拥护毛的反对党八股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登出来了。文章很漂亮，比丁玲的漂亮多了。我们当时在乡村，不太注意这些，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文章，包括艾青的，是对毛的报告的理解，但他们的理解全错了。发表丁玲与王实味的这两篇文章，跟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不一样，这个不是故意放火。延安《解放日报》的各级负责人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有一大批人，陆定一也在那里，如果弄得清楚，为什么这些文章能够发表呢？恐怕对毛的报告，只是从字面去理解，以为准许你讲点个人感想。他们以为，他们是拥护毛的报告的。几篇文章之后，就是“反对五人反党集团”。

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乡下调查，全躲掉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延安越来越热火朝天。很快，每个干部、每个青年知识分子重新写自传，填表，相互揭发，很紧很紧。我们还没有回延安时，已经流行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入党是“半条心”。什么是“半条心”呢？就是说，虽然你到了延安，但你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作风，你的世界观并没有放弃，你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当时，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参加共产党是够资格的，包括老党员。半条心整了一年多，人人都承认了。

然后就转入整“两条心”。“两条心”，就变成敌我问题了。你那条真

心是拥护国民党的，你到延安来是假的，是敌人派来的，是敌我矛盾。那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40 “抢救”柯庆施

我是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已经开始整“两条心”的时候回到延安的。

我回延安后一看，我们中央政治研究室七八十个人，已经有六七个人或更多的作为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被审查，失掉自由了，来往要有人看着。有一个人叫许立群，笔名羊耳，“文革”初期是中宣部副部长，已经被隔离了，给他找了个小窑洞单独关起来，水饭都是单独送去，大小便也要人看守着。

回到延安后，康生七月几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杨家岭中央机关，包括我们单位都去听了。我一听，吃一惊，按照康生的说法，到延安的青年，岂不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康生带着一个人到处作报告，这个人好像是甘肃省的一个地下党员，因为一天到晚要他坦白，他就坦白了。他是第一个坦白的人，说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是国民党搞的“红旗党”成员。这个纯粹是被逼出来的，说抗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红旗政策”，即国民党把大批青年送到共产党里边去做特务。这个滑稽吧，怎么一下子把来延安抗日参加八路军的青年说成是国民党派来当特务的呢，太滑稽了。所谓“红旗党”，就是指在国民党特务“红旗政策”下搞的假共产党。抗战后，大后方各个省开始恢复建立起一些不大的党组织，因为抗战前一些省一个党员都没有了，“红旗党”就是指的这个。这样一来，大后方的地下党组织，一下子又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了。我们这些人更都是国民党派去参加共产党的小特务。康生七月几号的报告，就是这个内容。什么叫“失足者”？你是国民党的特务，“失足”了，现在把你“抢救”过来，不杀你，就是叫你“坦白”，承认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跟着就搞“坦白”运动了。对共产党要心怀坦白，对党讲了是敌人派遣分子后，就宽大处理。坦白运动，交代你是怎么当特务的，怎么混进

延安的，做了些什么样的破坏活动。

康生做报告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土改工作团的人全回来了，其中两个进会场时我们还坐在一排。其中一个老同志雍文涛，后来是陶铸非常相信的一个人，任中南局的秘书长，还有一个姓薛。他们是党务研究室，我们是政治研究室。康生讲话时，我们三个还讲，要吸取中央苏区的教训啊。所谓吸取中央苏区的教训，就是指中央苏区杀AB团的事。所谓AB团，根本没有这回事，错得没有边（谱）。什么AB团，杀的人不知道，被杀的人也不知道。AB团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到现在为止说不通。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那么残酷的战争都过来了，突然说是敌人派来的。总之，中国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康生报告后，各个单位开展“抢救”运动。我先看见公开“抢救”统战部副部长、后来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柯资格老，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以前，他在上海跟刘少奇一起参加过外语训练班，其实就是苏联派人来办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训练班，这样到了苏联，据说见过列宁。一九三六年春，一说柯庆施在华北局当组织部长。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春，柯回陕北，从共产党成立，柯庆施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后，中央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是王明，这个部的作用也不大。王明抗战初在长江局当书记，回到延安，给他一个部长。王明一九三九年回来后，再也没有出去过。柯庆施就是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副部长。

“抢救”柯庆施很突然。有一天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名义上不是“抢救”柯庆施，主席是×××，会要散了，阳光从窗子外斜照进来，×××问柯庆施，柯庆施同志，墙壁上有人写了字，说你是国民党特务，请你说明一下。柯庆施在台上，很镇静，说了一阵。大意是，我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事，我不知道。对柯庆施这样一个人搞如此的突然袭击，没有一个长期准备怎么可能？接着有三四个人发言。发言人当中，一个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姓张，长期在东北军里做地下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第一个发言，这不等于是定了案了吗？杨尚昆的回忆录中说他散会后回窑洞，遇到毛主席，毛主席听到喊口号，问是怎么一回事，杨尚昆说“抢救”柯庆施。但是，别人整理的杨的回忆录说毛主席听见叫口号，就不合事实了。我就住在大礼堂正对面的窑洞，住了几年。就是在大礼堂唱京戏打锣，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才能

隐隐约约似乎丝丝听见，喊口号是绝对听不到的。毛主席住在更靠后边，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相当距离。

具体的发言记不起来了，但核心要点是说，柯庆施当时在长江、华北几个地区巡视后，组织往往就被破坏了。有些地方呢，他去巡视后不久，组织就垮了。按照这个逻辑，地下党的人都必须有被捕的历史，为什么柯从来没有被捕过。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怀疑已经过分，拿到大会上“抢救”，更不应该。没有事实根据，下面的群众莫名其妙。斗了个把小时，没有结果。这个会我是全程参加的。

连柯老也被公开“抢救”，那真是太随便了。这说明形势之紧张，行动之粗暴。“抢救”我们不算粗暴，我们是小青年。延安的“抢救”运动，柯庆施是唯一发了书面简单更正通知的。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吧，上面通知说，经过调查，柯庆施同志的历史没有问题。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通知”。

41 我被“抢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务”

我回延安后，补写各种小传，好在我一个小广播也没有。这方面也没有被追问。我们政治研究室，领导是陈伯达。陈伯达这个人懒得不得了，是甩手掌柜。真正帮他行政杂事的人叫柴木，“文革”初也冤死了。

政治研究室在“抢救”运动中，是出了一些问题，但不像有些单位规模那么大，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被“抢救”。其中有两三个，比如于炳然，在东北军下面工作的一个老党员，是被捕了，许立群也被捕了，陈传纲、王汝琪夫妇早不见了。我们单位被“抢救”的人就放在那里，看得紧一点，也不逮捕，也不拘留，也不天天斗。总的说来，这次“抢救”，我所在的单位，属于运动中比较文雅的，比例还是少的，没有大斗，不是最厉害。

九月间“抢救”到我的头上了。开始是劝说，在延安叫“劝说运动”，就是来几个人，日夜劝说你。意思是你有问题，你应该对党坦白。劝说我有没有理由？有一定的理由。第一个是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我一九四一年到政治研究室后，七八月间，曾写过一首自嘲打油诗：“马恩列史条条妙，不背条条恨不消。条条背得翻锅烂，马恩列史好条条。”

“马恩列斯”的“斯”写成“史”，是为了平仄关系。

写的时候，我以为这打油诗是自我嘲讽，自我讽刺。我闹着玩，没当成一回事。但是整风一来，别人说你是讽刺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党。这样批我，在当时可谓是有证有据，我也不去争辩，承认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是因为一些信。

我随张闻天到晋西北调查后，写了一些信回延安，说群众负担重，说调查的统计表不实在。这些都没有错，这是我去调查的结果。但是，上面觉得你的任务是歌颂，你不但未这样做，还讲了些批评性的话。

第三个是后来告诉我的。当时留在延安还有一个小型的陕北公学，我在那里去上过课。一个学生写坦白材料时，说我在河南开封介绍他参加国民党复兴社。我是从成都去的，没有到过河南。其实问问田家英，我是怎么到延安的，就清楚了。“抢救”我的时候，田家英已经不在政治研究室了，但还在杨家岭，一问便知。

延安的“抢救”运动，不知何故一下子发了高烧。在单位里边，先叫“劝说运动”。一个小组，日夜来劝说，车轮战。劝说的人发自真心，怕你不承认，怕你被抓起来，说得他都要流泪。劝说时也有下跪的，下跪也是出自真心，难过呀，怕你犯错误呀。

我十八岁到延安，没有政治经验，哪里经得住这种事呀！劝说了几天，能承受，三五个晚上不睡，还能顶住，但一两个星期，就顶不住了。不能睡觉，谁受得了？人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两个字：随便，要怎么就怎么了，至多是枪毙。当时觉得，枪毙都比这样要好过一点。来劝说的人是二十四小时换班的。劝说最好的效果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在这么一种逼迫下，什么结果都能问出来。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就承认。承认后，就交代，交代只有乱编了，越编越空，像写小说。我编了一个初中时的体育教师，因为当时都看不起这个体育教师。我说他介绍我加入复兴社。对这位体育老师，我无颜见他，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在延安污蔑他是特务，介绍我加入复兴社，这是我这辈子最卑鄙的行动。我今天还应该对他下跪。人做了亏心事，只有坦白承认，认

罪。

当时我没有咬住不承认。许立群大概就没有承认，当着大家的面，被手铐铐走了。这个事情，打击面之大，想不到。我哥哥的同班同学张宣，鼎鼎大名的四川七君子之一，被抓了；一九三三年我在宜宾联中三十五班的初中同学王家广，被抓了；一九三七年我在成都石室中学的高中同学余明，他三年级，我一年级，被抓了；他们统统被抓到保安局监狱里。延安的监狱之一就是县城西靠山的几排窑洞。日本投降后，那里大部分人到前线去了，这些被关的人无处可去，原来的单位或者已撤销了，或者已改编了。后来，管得不太严，自由一点，允许他们晚饭后出来散步。而他们过去住的监狱，变成招待所了。一次散步，碰见王家广。我说，几年不见，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问，什么保安大学？他才给我讲清楚。当时把保安处的监狱叫保安大学，一起坐监的，叫同学。他说，他是一九四三年在绥德被捕的。余明是在米脂被捕的。这样看来，他们大概比我早一两个月，他们是被捕，我是被叫回延安。对他们两个，怀疑更重。因为他们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张宣可能被捕得早一些。

对我的审查到一九四四年，这年五月左右，宣布一些人的结果，包括我在内，曾某某，没有政治问题。

宣布决定那天，两个人的讲话我还记得。一个是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科长王鹤寿。当时科长了不得。部下面就科，科以下的，都叫工作人员，干事、科员，没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下面老资格太多了，叫干事、科员不好听。另外一个是邓发，中央职工委的书记，他三十年代初在江西负责“肃反”，是掌刀把子的。两个人的发言，真是惊人。王鹤寿说，“抢救”了大半年，全是主观主义。有人举报某人是特务，这个人是不是特务，怎么不来问问我，我跟他一起坐监，我就可以证明。邓发讲得最有趣。三十年代邓发曾做过苏区的保卫局长。保卫局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部长加公安部长。他来讲话的时候，是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已经没有什么权了。当时有三委：青委，工委，妇委。他来讲话的时候，形势好一些了，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情况基本弄清了，原则上统统不是。他讲，搞了那么多，笑话百出。某单位把一个女同志搞成五种特务。有国民党军统、中统，兼日本特务，阎锡山的

特务，这个女同志在北平沦陷后在北平一段时间，因此又是华北汉奸政府的特务。中统、军统这些名词，全是听报告听来的，不然哪里知道什么中统、军统？

“抢救”运动，纯属无中生有，没听说一个是真的。

42 “抢救”运动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为这个运动极力辩护，说这个运动只是扩大化了，还是正确的。根本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包括那些现在硬着头皮伪造历史的人，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硬要这么写。把大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人说成是特务，现在来讲是个大笑话，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被抓的我哥哥同学，我的两个同学，我问过他们：你们听说过有没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们说，保安处抓起来的一个也不是。现在有铁的证据。李锐解放初回到湖南，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他曾看到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唐纵的日记。唐纵在离开长沙时，惊恐中把日记全部丢下了。唐纵是戴笠的副手，又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的主任。第五组就是专门汇集各种情报的。唐纵的日记说，现在延安共党内部不稳，可惜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唐纵日记》已出版，不知这部分还在否。

现在讲，是扩大化，但后来扩大到全国解放区，并不仅仅是延安，有些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才搞“抢救”。这个教训是血的教训。延安已经发现不是了，为什么其他根据地还要搞？延安“抢救”运动这个教训，没有好好吸取，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所以，这些问题今天为什么还要说，因为要接受教训，要总结。“文革”前一两年起，不是又是叛徒、特务满天飞吗？现在又有文章说延安有国民党情报人员，不知确否。即有一两个，也不能来个全民“抢救”。现在中国大陆上有没有外国情报人员？大概是有吧，能因此发动一个全民反特几年吗？

根源来自哪里？来自苏联，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就是用很大的精力来搞内部肃清。现在不是说斯大林是三七开吗？中国的历史命运要想绝对避免这些东西的话，那是要承认事实的，不能再用尽苦心去为这类东西辩护了。

43 “抢救”运动后的概况：种地，纺线，大演戏

一九四三年“抢救”运动后，延安整个趋于沉寂，单位之间不往来，朋友也不往来，许多人等待结论。

除了军事部门，其他部门的业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延安的热闹没有了。当时上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三十年代后几年，在上海新成立的党中央核心，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确立毛泽东的权威以及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这些事，我们下面全不知道。为了做这个事，当时延安设立了一个大党校，多至六部，有没有七部八部，我不清楚。一部，就是高级干部，把各解放区党、政、军能抽回来的干部，统统抽回来；国民党统治区、敌伪占领区，能够抽回来的，尽量抽回来，一是审查，二是重新训练。因为这时我们的力量在收缩，敌伪在扩大势力，国民党反共越来越厉害。如十大元帅，罗荣桓当时在不在延安，我不知道，其他九大元帅统统在延安，包括彭德怀。在杨家岭，有砖修的四个好窑洞，就住着三位元帅：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我们中宣部部内来往，都要经过他们的小围墙外边。这个事情说明，延安这时，刚好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情况相反，延安青年分散了，各方面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大集中了——恐怕是空前的集中。集中一是为了弄清楚历史问题，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地位，二是带有保护性质，减少损失。这些我当时当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才知道。

第二件事，是搞了特别大的生产。一九四三年后，内部供应困难增加。另一方面“抢救”运动后，各个单位基本没有业务工作了，所以集中力量搞生产，种小米、种土豆，还有纺线。延安纺线就是这样来的。纺线既纺毛线，又纺棉线。有一段时间，从早到晚纺线，到处都是这样。这时王震的三五九旅，相当一部分要开进延安，要保卫延安，他们到南泥湾去住，吃的东西不够，要自己解决部分，包括穿的。陕北好多地方出土羊毛，纺毛线，织毛衣，供军用。男女都一样动手。我呢，种地、纺线、织毛衣，这些都干过。纺棉线开始比较难，很快就会了。

一九四三年，我同时又种西红柿。我是种西红柿的专家。在杨家岭沟口外有很大一片平地，划出一亩地左右种西红柿。我跟张云天种。以他为主，他身体强壮。我跟张云天两个人住一小窑洞。那个窑洞也只能

住两个人。他是在我被“抢救”成“反革命”和“特务”后奉命来监看我的，怕我出问题，主要是怕自杀。他是福建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后来我们从北京一起南下，到了南城县——赣州往南——他翻车死了，一车人死了二十几个。这个同志什么都比我强十倍，太可痛了。

说来也奇怪，种西红柿，说干就干，种子还那么好，结出的西红柿一个有半斤重。那时延安与重庆还偶有飞机往来，延安还把最好的西红柿送到重庆，送到最高级别的民主人士像宋庆龄、冯玉祥这些人那里。因为重庆少有。哪里来的种子？真的不知道。普通的红色西红柿，最不好吃，最好吃的是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味道也特好。种西红柿要讲技术，我们请教总务处，他们可能请教了老百姓。奇怪的是我们那几年没有看到老百姓种过西红柿。种西红柿需要大量的肥料，还要去掉多余的岔枝。一株西红柿刚挂果时，要用手把多余的小岔枝摘掉，一株就保持七八个，但顶不能摘，摘了容易枯。西红柿五月初分苗，七月挂果。看见果实一天比一天大，也不想什么事了。

我跟张云天也聊天，但不谈政治。谈什么呢？我跟他谈“二战”问题，他也喜欢谈这些。那时延安出了《参考消息》，可能只有现在《参考消息》的四分之一多一点，不大，一面印，没有标题，什么美联社电等，容纳很多新闻。一九四三年，认为美国这样打，逐岛反攻，损失很大，不理解。当时重庆有“先亚后欧”“先欧后亚”论之争。重庆一部分人希望先把日本打败，即“先亚后欧”；听说党中央主张要先打败希特勒，即“先欧后亚”。党中央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主张不能宣传，一宣传，不了解国际形势的人会认为，你中国人，为什么要先打败希特勒呢？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四三年算起，真是莫名其妙，应该从一九三九年算起。一九三九年二月间，李富春就代表中央作了开始大生产的动员报告，我听了，《解放》杂志登了。冼星海还有“二月里来好风光……”生产大合唱之歌。“二月里来好风光”就产生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因为冼星海一九三九年秋天就到苏联去了。李富春作的报告，冼星海作的歌，现在都不算了，怪事，什么道理？一九四三年，毛主席编了一本书，提出总结生产运动之类，因此大生产也从一九四三开始算，莫名其妙。

我们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根本上就以劳动为主了。一九三九年我还在马列学院研究室，到南门外二三十里去背柴，后半夜就出发，每个人带几个比拳头还大的馒头，天黑才回来。背柴来回要走好几十里，一些人支持不住，笑话百出。我是晚上九十点回来，有的人半夜回来。有一个叫黄乃的，第二天才回来。他是哲学研究室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儿子。他高度近视，晚上看不见，就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待了一个晚上，没遇上狼，万幸，天亮才慢慢摸回来。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人救，只有干等。

延安生产劳动，对大家的锻炼意义比较大，至于对延安的供应起到什么作用，很难说。像我参加的那些农业生产，我就感到恐怕吃的比收的多一点。一天有几个比拳头大的白馒头吃，那是很不简单的。在延安种谷子（小米）收成很少。荒地种谷子，相距一尺多宽种一棵。也种土豆，土豆需要的种子很多。

第三就是搞特大的戏剧运动，演大戏。解放后没有人讲过什么原因。为什么演大戏呢？一九四三年年底，延安的“抢救”运动基本结束，大家没有事干，都闲散在那儿，很多人在等结论，这时就出现了许多戏剧。延安有平剧即京剧院，《三打祝家庄》就是这时搞出来的。《三打祝家庄》的总司令是宋江。这个戏，毛主席写信表扬了。后来，一九七三年突然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头子。那么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宋江又是什么派呢？一九七三年起的批宋江，我就设法一言不发。办法多得很，找个重劳动、脏劳动去做就行了。谁知道过了两年，宋江又是什么派呢？《白毛女》也是这个时候搞出来的。延安演过《日出》《雷雨》，还有陈白尘的《升官图》，这是个闹剧，讽刺国民党的。还演过某老前辈的《天国春秋》。还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还演过西蒙罗夫的《俄罗斯人》，还演过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前线》这个戏是斯大林批准的，翻译过来后，毛主席又叫大家看，也演出了。还有一个戏，这个戏出来后没有怎么演，叫《同志，你走错了路》，参加编戏的有陈波儿，著名的电影演员。这个戏是写新四军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军部遭国民党消灭的事。写项英如何错误。这个戏完全是把政治翻译成戏剧，没有要看的，不久就停演了。当然，最用力气的是《白毛女》。

戏编出来后，各单位轮流去看。延安看戏都是机关发票，晚上去看。当时延安没有电，但煤气灯很亮，很神气，了不起。延安有两处礼堂可以演戏。一个是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个是杨家岭对面的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延安有些人晚上看戏要跑十几里，我们在杨家岭，比较近。

延安的戏，就是“抢救”运动之后的大缓和，上面有意这样做。这个事，是特殊时候产生的。延安有王大化那样的天才演员——恕我说句大话，他的演技，我看远至现在，是前无古人的。重庆抗战后期的戏剧也特别发达，但未见得比延安的好。我一生看戏最多是这两年。现在回想起来，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当时共产党真是集中了国家的很多人才，而且一变成共产党后，人就特别能干起来，都很出色了。共产党员没有几个学过演戏的，怎么一演起戏来就那么厉害？

一句话，一九四三年秋季“抢救”后，紧张的是上层，下面不紧张了，像我，像一般的干部，都不那么紧张了。种种地，纺纺线，看看戏，上面是有意放松，感觉到紧张两三年之后，整个是放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上比前几年压力小一点，但是各个单位之间绝对没有来往，相互也不看望，比较沉静了。

第八章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1945年8月—1947年2月）

44 “王明路线”一词是进北京后才听说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后，中央要重组宣传部，因为整风后，它就停业了，虽然名义上还有这个机构。中央派陆定一做部长、陈伯达做副部长。这两个人是孤家寡人来的，原来宣传部的人已零零落落，还是原来那几个人，绝大多数等待“抢救”结论。他们两个人来，在一个窑洞开了欢迎会。陆定一准备编中共党史。新的党史，当然完全是新的历史。为了编这个党史，陆定一在部内成立了党史小组，找了几个人，有张仲实、丁华，还有我。开了几次会，把《两条路线》等整风的书给我们看了，我们才知道一些事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因为国共斗争很紧张，陆定一去做中共政协的代表了，离开了宣传部。

现在很多书，很多文章，讲延安怎么反对“王明路线”，看上去这个党内斗争好像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似的，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我身在中宣部，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王明路线”，包括在胡乔木的窑洞里，也没有听他讲过一个字的中央上层问题。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胡乔木那么相信我们，分他办公的一个窑洞给田家英和我两人住，他一天到晚忙于历史决定呀，毛主席的报告呀，对这些，我和田家英两个人，半个字都不知道，胡乔木从未泄露过一个字。别人怎么可能都知道呢？我根本不相信。

陆定一他们来了后不久，日本投降，宣传部的很多人等着到前方去。这个时候，才有个别的老同志跟我们这些青年接近，跟我们讲了一点。这些老同志历来守口如瓶。从苏联回来，曾做过延安鲁艺副院长的赵毅敏就跟我们谈过。大概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日本投降后，一次晚饭后他跟我们讲，你们注意，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这本书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吹了。他悄悄告诉我们，是好意。所以，现在讲的什么“王明路线”，似乎延安人人都在批它。根本无此事，我当时全不知道，整个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都不知道。这个名词，进北京前我未听说过。

陈伯达是个书呆子，专门写他的书。陈伯达在写什么呢，奉命在写《中国四大家族》。他这本书的材料，全由两个助手提供，即何均与陈真。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厉害，他自己很懒，这本书是毛主席叫他写的，书名也是毛取的。

45 抗战胜利，中央工作紧张，似未有大规模庆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后，现在有很多文章说延安大庆贺，什么敲盆啰，放鞭炮啰，晚上有提灯游行啰，我只能说，我绝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有没有，我不敢说。有，可能就是在延安南门外一点。我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延安的中心。杨家岭是党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往南一点的山沟叫王家坪，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对面隔一延河，是中央党校一部。当时党校一部不得了，都是高级干部，大得很，一两千人。我们斜对面，是中央研究院，当时改为党校三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走出门来，一里、二里、五六里，尽收眼底。日本投降，我们那些机关，没有旗帜，没有锣鼓，也没有什么瓦盆铜盆给你敲，延安又哪来鞭炮呢？我所见的，延安很冷静，但是内心里确实是高兴得不得了。这个高兴是完全意外，因为我们不知道抗战还要经过多少年，我们准备到山沟里还要待那么一二十年，日本突然就投降了，有点把人震惊呆了：胜利了吗？这就胜利了吗？日本人不能再杀中国人了吗？这不是喜极而狂，也不是喜极而悲，而是喜极而呆：日本也有打败的一天吗？情绪太复杂了，主要是想哭……中国没有亡呀！中国没有亡呀！我们宣传部的人，相对无言，只有禁不住的流泪。这时，只有禁不住的眼泪才能表现我们最真实的感情。看见中央领导人，也是严肃得不得了，中国人的鲜血已经流成河了，只有喜极而悲才是正常的。现在电视里说的、访问里讲的那样大规模的情况，我只能说，我没有听见过，我也丝毫没有看见过。因为没有那个条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锣鼓的，不是每个单位都有那些庆祝的东西的。每人只有一个陶瓦盆。瓦盆一敲，不就碎了么，谁敢敲？

46 延安大撤退：宣传部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月，延安准备大撤退，因为估计胡宗南要用几十万军队打下延安。延安那时没有什么兵力，延安机关老早就离开

了。实际上九月、十月就准备撤退，十一月就撤退到延安北边的瓦窑堡了。宣传部也搬去了，搬到王家湾村。王家湾村，小村子，二三十户，因为沾个“湾”字，就有小水沟，也算比较富的。

当时宣传部零零落落，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王学文、张仲实、曹葆华、许文宣母女，我们戏称“四大家族”。王学文，加上他的夫人，一儿一女，四个，他的夫人是小脚，他的儿女还没有分配工作，王老身体也非常不好。张仲实夫妻，有一个小孩。曹葆华夫妇，曹葆华非常胖，走起路来很困难。一个新来的女客人许文宣及其女儿。许文宣是毛主席一九二几年在长沙活动时的老朋友，共同干革命的。她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儿到延安，作为客人住在宣传部。延安那时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来的客人都分散到各个部住着，像毛岸英，没有工作做，住在宣传部。此时中宣部的最高负责人是许之桢，资格很老的，一九二〇年与刘少奇、任弼时等同时在上海外语补习班学俄语的。我们撤退时，就由他决策了。可是他没有什么名义。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单位的撤退，实际上由秘书长丁华指挥，丁华有四十来岁。

我们单位的壮丁呢，基本走了，图书资料室的几个人也都走了。延安撤退前，丁华秘书长等几个人又调到中央新成立的指挥整个后方的机构去了。田家英那时在西北局书记高岗的调查团，到哪个县去，我不知道，壮丁就剩资料室的刻字员和我两人，还有刚从新疆出狱回来的一个同志。我们搬到王家湾村后，我曾回杨家岭两趟。上述两个壮丁，他们不了解情况，只有我跑。毛岸英跟我们在一起，身体好，但不可能派他回去，一是安全，二是他也不熟悉。回杨家岭住一晚上就走，两百多里，来回好像要四天。为什么要回杨家岭呢？撤退得匆忙，主要奉命去仔细检查与销毁文件。

阴历年是在王家湾村过的。王家湾村很安静，老百姓的生活看起来不穷。我住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天天还有《参考消息》看，消息灵通。比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参考消息》天天登。所以，我肯定是在三月初才离开陕北的。

第九章 在山西土改（1947年3月—1948年6月）

47 参加土改工作团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突然有一天，临时负责人许之桢对我说，中央组织一个土改试点工作团，每个部门抽一个人，你跟洛甫（张闻天）下过乡，你去。另外，田家英也要去。现在不集中了，你直接到山西兴县去。毛岸英已经先走两个星期了。我说，难怪好久没有看见毛岸英了。许之桢也不知详情，我就一个人背着被盖行李，带着牙刷什么的走了。当时，只要有证明，就有住的，有吃的。老干部们是怎么去的，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埋头走，走好几天。青年人都是一个人走，现在比较难想象。一九四二年我就几次走过这条路，不稀奇。

我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到了山西兴县。谁也不知道还有谁，因为撤退后都是分散去的，到了才知道，团员是延安各个部抽调的一个或者两个人，团长是康生，副团长是陈伯达。

这一批二十几个人，以老干部为主，所谓青年只有四人，后来只剩三个了，田家英很快就调走了。老干部有张琴秋，是个女革命家，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茅盾的弟媳妇，工作能力很强，后来我主要在她手下做土改工作，我很尊敬她，“文革”中被整死。高文华，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到天津、北平去之前，据说他是华北局书记，资格老，身体很不好，不能参加工作，实际是随这个团撤退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干部。这个队伍拖拖沓沓。康生他们不跟我们走，他们是怎么走的，我们不知道，毛岸英是由康生带着的。

这时土改还没有开始。我们跟晋绥分局干部组成了几个大的土改工作组，总部在山西临县，康生自己在临县郝家坡坐镇。郝家坡是个小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可能是为了安全，离开大道，四周都是山，康生在哪里住，当然首先要考虑安全。临县中心组，由临县地委书记当组长。另外有三个大组，一个是雁门关外的朔县大组，一个是山西极西北三个县组成的保德大组，还有一个是静乐组。我在朔县组。我们朔县大组，延安工作团的成员共有四个，老资格有张琴秋、李国华、张越华

（博古夫人），加上我。我们与当地的干部组成三十多个人的大组，组长张邦英，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也是延安调去的陕北老干部。保德组，延安工作团有两个人参加，一个廖鲁言，一个于光远。廖鲁言是老同志，是这个组的副大组长，解放后当农业部长。于光远现在还健在。静乐大组是陈伯达自己去的。延安工作团有田家英、史敬棠在那里。田家英就不说了，史敬棠我们也很熟悉，过去是同学。这个组后来由于延安撤退后，刘少奇把陈伯达、田家英带走了，也就撤销了。

48 雁门关外的朔县土改：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土改是不妥当的

我们从兴县出发，到朔县县城要走五天。朔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就有点怕。朔风凛冽嘛，过去把蛮荒之地叫朔方。这条路我前前后后走过五次，是全天下我最熟悉的路。朔县是新区，是日本投降后我们解放的地区。朔县的西面是大山，一片荒凉，但是滹沱河的上游要经过这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荒凉，但是土壤多是半沙荒的，土地辽阔，撂荒的多。朔县自然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地有水灌溉，很富；荒沙地占绝大部分，相当贫困。我们到朔县城后，还往西走五十里，到厦阁。厦阁当时叫行政村，也就是乡。行政村是阎锡山时的名称，我们还没有改过来。我们到这里的任务很明确，第一，反奸反霸；第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第三，建立组织，包括党的，青年会、妇救会、民兵等这一套；第四，扩军，动员参军。土地改革最后看你有没有成绩，往往是用有没有与有多少人参军来考核的，这是跟扩大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的情况看来不是到了非要土改不可的地步，但你不土改，兵源扩大就成问题。

张邦英、张琴秋在厦阁，我被分配在前柳树，组长是李国华，中央组织部的科长（当时部长下就是科长），参加过长征。我们这个小组有十二三个人，晋绥和当地干部占多数。前柳村是个平地的村子，大，有八九十户，算中等偏大的村庄。后柳村要小一点，有六七十户。

我们去前柳村调查后发现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众对我们很怕。要发动群众斗争，分田地非常困难。原因是塞外荒沙地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当地并不缺地，缺的是水。不仅缺水，也缺肥料、缺牲口等。牲口

过去是很多的，经过十多年战乱，快没有了。没有水，没有肥料，收成不够种子。可以说，农村处于破产、半破产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交通活动，全停止了。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朔县北面就是山阴县的岱岳镇。岱岳是个重镇，汽车完全通。那些地方汽车路很好修，路很硬的，不修路汽车也能走。我们新解放区都是唱空城计，内部根本没有兵力。如果傅作义的部队来，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的情报灵通，情报一来，往山沟里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老百姓不敢起来，怕共产党走了后，傅作义回来。我认为，在这种地方立即土改，恐怕不一定对。

前柳村八十来户，实际上没有一个地主，殷实农家，就四五户。用科学的话来讲，算得上“富农”的，一户都没有。只有两户，也仍是富裕中农。也没有发现恶霸。所以，在这个地方搞土改，比较困难。但是，你的任务就是土改，不得不干。最后，在李国华的领导下，还是斗了两个好吃懒做到处偷东西的流氓，当地叫二流子。你不开会，不斗，给你一个“右倾”帽子，你可吃不消。我们这个组的几个老同志，是老的土地革命出身，知道过去“左”倾的乱斗，损失太大了。他们见多识广，是有一点警惕的。按照他们的本性，是要稳重的。所以，有这几个老干部掌握，比较稳重。但是群众对我们还是怕。山西老百姓在全国来说是很老实的，多少年阎锡山的愚民统治，敌伪的统治，每个人都是心惊胆战的，只要是官家来的什么人，他们都极怕。

我们没有划出地主来，但还是基本上平分了土地。我要说，这个做法现在看其实是不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你的任务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分配土地呀，每个人平均大概分了六七亩。这些土地有些原来就在他们的手里，不过拿来一律归公，又重新分配一下而已。当地的土地单位叫“垧”，在北方，有大垧、小垧。我们还是照亩算。分配土地后，我参加丈量土地。量土地的工具叫“弓”。我发现，农民选出来的积极分子量得很随便。如果是好地，就慎重得很，如是差地，马马虎虎。看得出来，他们对分配土地没有大兴趣，因为拿到后，无法耕种。他们一切都没有，没有工具，没有肥料，没有种子。很多人，肚子里也没有粮食。战乱十多年，日军及伪政权把中国榨光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发现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地方搞土改，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在我

看至少要用三年去恢复农业生产。

土地分配后，我到最穷的三四家访问过。进去后，他们也不招呼你，你问他，他也没有兴趣，说，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分的地，我要走两顿饭的工夫才到，我肚子还没有吃饱哩。现在可以讲一句半句了：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土改，不一定是妥当的。

49 临县郝家坡土地会上，康生说“你们这个划分阶级的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我们在乡下工作两三个月，土改工作进行了三分之二，我就到康生的临县郝家坡去开会了，时间大概在六月间。本来应该是张琴秋、张邦英去的，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但是，他们是这么老资格的干部，又有这么高的地位，要去，就麻烦了。要牲口，要管牲口的人，还要带个秘书，实际上他们去，还得带着我去，加上来回路上十几天。他们就派我一个人去。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听会。我不能代表这个组做工作汇报，当然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我们组的整个情况，如果上面有人问，可以讲讲，这个意思他们是明确了的。

我走了五天，回到了兴县。晋西北这个路，基本上是公路、平路，我走得多了，无所谓了。当时延安已经失守三四个月，所有的陕甘宁边区的党中央机关，统统到山西这边来了。兴县到临县郝家坡，还要走两天。从兴县出发，第一天，走到黄昏，我想，应该找个地方住了。这时就不用找兵站、找老百姓了，各村庄都有中央机关。太阳完全下山了，我果然发现原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在散步。我一招呼，彼此都认识。我说，我到郝家坡去，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吧。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又给我吃了饭。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有些人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我住下后，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啊，中央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难说话。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

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更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还没有到郝家坡，已经听说康生那里胡搞乱搞，搞得民间害怕，搞得所有的干部，包括吴玉章这样的人，有意见不敢谈了。这就反映出一个问题：没有民主，一个压倒一切的“革命”口号下去后，明知道是错的，谁也不敢反对。一反对，不但是右倾，说不定就是反革命，弄得像吴玉章这些老革命前辈，都不敢讲一句话。很多错事就是这样一干到底的。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保德那个组，廖鲁言、于光远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但我纯属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坟，说元宝、银元都藏

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微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不清楚。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克思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这个会，康生把比较正确的划分阶级的原则作废了。这是康生最大的错误与罪恶。

一九四八年，中央搬家，毛主席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平山县西柏坡，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毛主席有个在晋绥分局对干部的讲话，“毛选”中有。毛批评了李井泉，说你们把马克思主义烧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中央晋绥分局原来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烧了”，是康生要烧的，毛主席批评的是李井泉，未提康生。

毛主席批评李井泉，我们都知道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事。一晃几十年，一九七八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后，因事出差到昆明，碰巧遇见了

李井泉。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但大家都知道“反右”时开除的党籍，都要恢复的。我住在云南省一招待所的普通房间，而招待所的后面是很讲究的，有花园、假山等。我看到李井泉在那里散步。我走向前招呼他，自我介绍说参加了郝家坡会议，我知道毛主席路过时批评你，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如果现在还需要的话，我可以向上面写信，证明不是你烧的，是康生叫烧的。他说，谢谢你，不必了，不必了。他说，我也不谈了。你说那时叫我怎么办，我说是康生说的？康生的地位在那里，我能怎么样？我跟李井泉的谈话不长，几分钟。

老人家明知道是谁讲的。这些事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50 郝家坡会结束后，我回到朔县补课，大错特错

在郝家坡会议期间，因为我的身份，我不能代表我们那个组讲话。我也问过康生的秘书凌云同志，康生同志要不要听我的汇报？结果有天晚上，康生把我叫去了。我汇报了我们村半小时，说明没有地主，实际也没有富农，虽分了土地，农民没有什么兴趣，等等。他批评我，应该说不严重。他说，书呆子，照你们这样办，怎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回去，回去，重新来过。我汇报时提心吊胆的，怕闯大祸，一听“书呆子”，就放心了。康生叫我回去，我还得回去，还有七八个人等着我回去。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郝家坡会议结束后，我又走八天回到朔县补课。这回补课，就要命，说原来的斗争不彻底、分配不彻底等，按照康生的要求重新来做。但我回去时，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人都走了，他们以为土改已经结束了，只有区的干部还在。所以回到前柳村补课，工作组就变成没有头了，老同志都走了，没有领导了。我给县里交涉，县里把区委书记调来当组长。名义上我是协助，实际上区委书记要跟我协商，很尊重我的意见。这个区委书记很好。

回去后，干了一些很不妥当很“左”的事。第一件，把两家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这两家是弟兄俩，住在一个院子，后来分成两家。两家都有两三个强劳力，是种地的好把式，妇女也很能干，房子干干净净的。这两家确实比较富裕，养的是晋西北的大犍牛，全身油光水滑。但是这两

家没有长工，每年在收割小麦的时候雇几天短工。抢收时，天还没亮要割到太阳斜照吃饭，下午太阳斜照后再去割到天黑。中午太热了，受不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是勤劳致富的。但是要“补课”，原来已经分掉了一半财产，怎么办呢？我在郝家坡开会时，向康生具体汇报过这家。康生说，回去，回去，扫地出门。不然，怎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呀！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把不该分的，分了；把不应该打击的，要他受到惨重的打击。

在回前柳树前，我向区委书记传达了康生的话，商量怎么办。他说，把这两家划为富农吧，没有划为地主。

经过多方了解，群众对这两弟兄并没有仇恨，人家是老老实实的人，没有听说有什么高利贷之类，开斗争会，斗不起来。但那个时候不管了，还是要发动群众斗一下，这种斗只是走过场。斗了后，把他们的土地没收了。他们的家，按照人口，应该分多少分多少，多余的全部拿出来分了。他们有水浇地，是比较好的土地，离家近。而远地，走几里路的，谁也不想要。他们两家的两条大犍牛也分了。怎么分呢？那么多人家分，几家合分一条，一家分“一条腿”，如四家人，就是一家一条腿。当时看到牛被牵出来，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一般的农民并不懂养牛，没有料，三个月，牛就死定了。

对这两家人的整个做法是全部错误的，是真正的破坏生产力。早在这之前，我就读过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里边不是写强迫搞农业集体化吗，老百姓就是杀猪、杀羊、杀鸡，一场大破坏。康生当然知道这些。

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明知道这个没收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我所处的地位，没有办法，必须要服从命令，我顶不住。但是，我还是大打了折扣服从的。

第二件，开斗争会。土改，最反对的是和平土改。什么叫“和平土改”？就是没有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开无数的斗争会。一九四六年后，有些解放区的高级干部老家是大地主，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工作，他们自己献地，全部献出来，开始报纸上还登出来表扬，后来，献地运动被当成和平土改，说是麻痹群众。这些献地的老革命，后来被斗得很厉害。他

们的资格都很老，有的可能是二八式、三八式，献了地还没有资格登报。

我回去补课怎么办？当时的农民，老实得很，上面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斗谁呢？最后找来找去，找了两个二流子，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区委书记跟我一起研究，要斗，只有斗一下他们。调查一阵后，调查到他们喜欢胡吹，说傅作义离开我们不远，将来打回来不得了。傅作义在岱岳，真的离我们只有百把里，人人都知道。

凡是开批斗会就要打，不打就不行。我在旁边看着，一般地打几下，不管，真打了，就找人来制（止）住。

另外有一些贫苦的人还要求分东西，把两三家富裕中农吊起来打，我听说吊打的是妇女，大吃一惊。急忙找区委书记说，你赶快去命令停止。后来我问，这几家有没有东西可分？区委书记说，你不知道，他们要分好醋，埋了很多年的。本地人知道这些情况，哪家十多年前埋下了醋缸。山西好醋引诱力大得很。我听了哭笑不得。

前柳村的补课，总的来说是错的，是我自己被迫犯的错。很多人对自己过去的错不愿讲。我必须讲。

还有一件事，是死了一个人。磨石滩是个煤矿区，农业不发达。区委书记跟我讲，这里搞了土改试点，但不彻底。有个县公安局的外围侦察员，老百姓怕他，经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区委书记说，磨石滩事情比前柳村复杂。于是，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去，我也愿意去。一九三六年我在四川北碚卢作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实习生时，钻过许多煤矿。到了磨石滩，我先钻矿井。我下了两三次，是斜井。工作队下煤矿，是一种表态，发动群众就容易一些。

最后弄清楚了老百姓害怕这个人的原因。敌伪时期，朔县敌人有个暗探队，叫“蓝部队”，就是利用无职业的中国人打探情报，这个人是蓝部队的成员，也就是说是汉奸性质的。日本投降后，傅作义留用此人，解放后，我们又留用。这个人的家在当地是小恶霸。群众看到解放后他仍然被公安机关留用，还是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所以怕他，不敢揭发他，怕共产党哪天走，他会报复。我跟区委书记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想

办法把他弄回村里关起来，开批斗会。这个会是又斗又打的。有一天晚上，群众偷偷把他打死了。天呀，一个区委书记，一个延安来的土改团的人在这里掌握土改，死了人。以前，土改死了人不算啥，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我说，到县委去报告，承认错误，请求处分。我们报告后，县委书记比较客气，说，确实是群众有仇恨，这件事已经出了，就算了。口头上批评了几句。

第二年，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我已经回到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了，一天，我看到《晋绥日报》，也就是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第一版整版报道解散朔县县委的事。报纸上没有提到我们的事，说朔县县委是右倾。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晋绥分局办公厅之类的，请他们转几个负责人。我说，我在朔县工作几个月，到县委去了多少次，看见过县委的生活情况。他们吃的什么？正规粮食是小米加谷糠。我没有在县委吃过一次小米饭，县委是很艰苦的。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作为客人去，也没有招待过我，也是吃小米加谷糠，解大便都困难。我说，这个县委是很朴素的。我的信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解散这个县委，当时来看是土改右倾。现在来看，我们上面的领导，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一味“左”。

康生在临县胡搞，留下极坏的影响，到了无法干涉的地步。我们在朔县，开始没有胡搞，我到郝家坡开了会回去后，执行康生的批示，也胡搞了一些，也死了一个人，犯了大错。

到了七月底八月，叫我回兴县，工作团准备离开山西到河北。

第十章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到河北山东土改（1947年7月—1948年5月）

51 从山西兴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为老同志服务

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转到西柏坡，康生早就到西柏坡了。我们土改工作团这些人也奉命去西柏坡。

我们这个队伍里，有像高文华、张琴秋这样的十多个老干部，加上三青年合在一起，要从山西兴县走到河北平山县。平山县靠近石家庄，从兴县到平山县，要走十多天。怎么走？并没有什么人护送，因为当时根据地每隔半天的路就有兵站，农村的老百姓派人、派牲口从这个兵站护送到下一个兵站。我们从兴县晋绥分局出发，带粮票，带路条——路条还不是一般的，因为我们队伍里有资格很老的干部，所以是晋绥行署开的。这个行军就很特别，团长、副团长没有了，也没有说哪个带队，但自然是张琴秋带队，什么事都问她。

这十几个人，就靠我们三个青年照顾。土改工作团的青年人有凌云、于光远、史敬棠、我。凌云是康生的秘书，“文革”被康生关了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当过公安部部长，凌云跟着康生一路。于光远，《解放日报》的，我，中宣部的，还加上史敬棠。这个工作团，以中老年为主，上面没有派秘书，没有管理员，统统由我们管。我们既是秘书，又是服务员。我们走路，同时为他们服务，我们很愿意为他们服务。

三青年的任务怎么分呢，我打前站做饭，一般是提前两个小时走。比如这些老同志中午要休息，我就提前到下一站准备晚饭。他们每天有六毛钱的补助，我们三青年没有。那时六毛钱能买半斤多肉。我们吃饭在兵站，但没有菜，至多有土豆丝，我们住也在兵站。史敬棠管房子。到一个地方，老干部哪些住哪些房子，要他分配。于光远管交通，老同志有沿途派的牲口、大车，于光远要安排，一直走到西柏坡。老同志骑的毛驴都是老百姓派的，所以抗战时期，老百姓的负担是比较重的。

（于、史的任务，我可能颠倒了。）

我们从兴县的碧村出发，第一天，到界河口。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有水，很富裕。第二天，到岢岚县；第三天，到五寨县；第四天，到神池县。这一段路，我曾经走过四次，加上这次，就是第五次了。这条路是公路。路上铺有小石子，可以通汽车，只是没有汽车。那些地方基本上是高原，很少下雨。某一次我一个人走，碰到国民党飞机扫射，我赶紧躲藏，扫射完了后，我还拾了两个小机关炮弹壳，有近四寸长，两根手指那么粗，青铜的，恐怕有大半斤。这两个弹壳跟着我多少年，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五寨到神池，中间有一个大镇，叫义井，是神池县的，有两三百家人。“神池”“义井”，从这几个字看，就知道这里水的困难。为什么叫“神池”？有一池，是神赐的。为什么叫“义井”？又有叫“三井”的，因为周围没有水，镇里有两三个水井。打水的是柳条筐，编扎得很紧，能装水。义井这些井旁，一天到晚都有人轮流摇水。

我打前站买东西，那些地方可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富裕，没有鸡呀蔬菜卖，但是一般有猪肉卖。一天做晚饭，我买了两三斤肉，但烧什么呢？什么菜都没有，我发现有大蒜头卖。四川不是有大蒜烧肉吗？很香。我就做大蒜烧肉，烧好后，给他们送去。张琴秋大姐是浙江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张越霞是江苏无锡人。她们听见大蒜就摇头，更不说看见大蒜烧肉了。我怎么办呢，我先把大蒜拿出来，只端肉去。她们吃了，觉得好吃得很。我说，几位老大姐知道这是什么烧的吗？我说是大蒜，她们哎哟哟，大吃一惊。我这才把大蒜拿给她们看。她们说，没有什么蒜的味道嘛。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吃，有东西吃就不错了。钱是有的，就是没有东西买。

到了神池后，不是往北，而是往东，到了长城外雁门关北面的广武镇。这一段路我感想很多。这一路就是古代多少年的战场，从秦汉开始就是。我们在荒原中见到当时一个人都没有了，但有很大的天主教堂，感叹天主教的势力深入到这么荒凉的地方。这段地形也特别，两边是山，中间基本上是小石子与粗沙平地。走在沙路上，看两边的山，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这当中的沙荒平川，怕有好几十里宽。路上也见不

到什么生物，所以，感觉好像看见了古代战争你杀我、我杀你的场面。那种荒凉、凄惨的感觉，非常难受。当时也不可能跟别人讲，那些老同志不在乎这些，只有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到了这种地方，思想呀，感情呀，才会这样。因为亲临古代战场，想着多少人战死，有说不出来的难过。广武镇在雁门关之北，倚山而建，是向着关外的一个军事重镇。快到广武的时候，居民已经开始做饭，炊烟在昏沙中已经升起，就想，古战场的司令部可能就在这里吧。为了争夺广武镇，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们在广武住了一个晚上，塞外的凄凉初步看到一点，难免不想起唐李贺诗的两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不过这里不是黑云，而是使人更难受的黄云。

到了广武镇，从北面弯来弯去慢慢上雁门关。这个路很宽，可以过车。雁门关很有名，特别得很，从北面来易攻。匈奴来打的时候，进攻比较容易。我们绕来绕去，绕到关顶，往南一看，就知道雁门关一失守，匈奴一下子可以冲到太原去。想想，那些古代镇守雁门关的将领多险啊。因为一冲上来，就完了。一九三七年，日军也是从北面先占雁门关，然后南下犯太原的。

下雁门关后往南走二三十里，到了代县城。过去防守少数民族大军南下大司令部就设在代县。路上，心情可谓复杂已极。一是想不到能活到今天，能亲自来到这个古代中原民族与边疆部落必争之地，白骨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以后能不能永远葆和平呢？当时心里可谓有说不出来的悲哀，因为根本没有想到两年后就会全国解放。

到代县已近黄昏，远远看见很多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在陕北、在山西，十多年没有看过几棵树了。进县城后，看见县城的十字路上有很雄伟的建筑，街边晚上有上百个卖东西的摊子，油灯火亮，烟尘滚滚，这种景象，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了。在山沟里住了十多年，一进代县，心里有点奇怪了。没有想到，除了我们山沟，还有这个世界，而且这样的地方是共产党的地区了。后来真进了北京、上海，反倒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了。须知这才是浓浓的中国味，现在把地摊、夜市等都要改掉，就不大像中国了。

往东走一天，到了峨口镇，这大概是什么河边上的大镇，沿着河边

有几百户，这也是十几年没有见过的。晚上人很多，还有点灯卖东西的。在峨口镇住了一晚上，继续前进。峨口之后许多地方的路，两边是山，中间是路，路上全是鹅卵石头，也就是说，我们是走在季节河滩上的。有几天遇到下雨，沟里不能走了，我们住下来。我们三青年想为老同志买点东西，买一两个鸡，结果跑了几个村庄都没有买到。这说明根据地农村里比较穷困，但自然条件并不那么差，是十年以上的战争造成的。

又走了五六天，大概八月中旬，我们到了西柏坡。西柏坡是党中央的中心，周围十几二十个村庄，都是驻的中央单位，以西柏坡为代表。到了西柏坡，我们就分散到各人原来的单位了。

当时知道中央在九月要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毛主席还在陕北，陕北的危险还没有过去。所以，全国土地会议，就委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他们在西柏坡召开。我们就等这个会。

52 全国土地改革会议

这个会议，大概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间开的，在西柏坡村后边树林里，那时太阳还大，但不太热了，搞了一些布幔。这个会由中央工委几个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其中包括康生负责主持。实际上是刘少奇主持。有二三百人参加。全国各解放区的区党委以上的代表都来参加。那时的区党委没有现在意义上的这种完整，下面还有几个地委。一个地委管几个县委。座位没有正规的，开会时自己搬坐的去。我们这一群（批）土改工作团的人，也没有说出席什么的，反正自然就进进出出，自然而然参加。当时西柏坡一带中央机构多得很，其他人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刘少奇的整个报告，内容很多，很长，现在我基本上记不得了。刘少奇一九四七年大概四月中旬到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根据地的工作由工委主持。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当时以战争为主。毛主席走到哪里，中央就在哪里，他可以一个人，至多找几个助手如周恩来，但必须带电讯器材，另外就是耍“笔杆子”做宣传的。陕北留下几个大笔杆子：陆定一、胡乔木、范长江。但“文革”中把

范长江搞死了，逼得范长江自杀，一代天才，太难再得了！

刘少奇主持这次整个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会议，我认为总的还是比较稳的。他刚到西柏坡时，发现当地的土改都已经在大干特干。他发现太“左”，到处吊打、逼供，包括中央工委住的西柏坡，把农村的游民当成基本群众。游民一起来，什么事都弄烂。真正的贫农老实得很，并没有想分别人的财产。

刘少奇已经感觉到问题严重，一下制止不了，因此由中央工委派两个县委书记，直接由中央工委领导。建屏县的县委书记，换成经过长征、长期担任中央青委书记的冯文彬，平山县委书记换成钱俊瑞。钱俊瑞解放后当过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能力很强，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上海救国会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现在的平山县，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分为两个县，西半边叫建屏县，东半边叫平山县，西柏坡在建屏县。

其他人的发言，很左的也有，东北来的发言最左，但不占主流地位，强调什么“煮夹生饭”，即反复搞，大家不愿听。我的印象大多数议论，事实上都是提出问题，即老根据地基本上不存在重新分配土地的问题了。意思是说，土地问题实际已经基本解决了。怎么解决的？经过合理负担，这个合理负担很厉害。不没收土地，让地主，或者其他收入多一点的，大部分交公粮。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一来，事实上大地主、大商业老板，基本没有了。地主的土地卖得很多了，土地已经相当分散了，形式上是卖地，但一亩地的价格非常低，假如，平常是十元白大洋一亩，这时不到一两元白大洋。老百姓都信白银保值。谁有权力谁先买。农村谁有权？村干部、乡干部。有的是从村里提起来的区干部，一直到县干部。

干部多得斗争果实的问题，用通俗的说法，是多吃多占。其实不是多吃，主要是多占。从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手里通过合法的买卖形式，拿土地来重新分配。当时形势很清楚，整个根据地全部是共产党的军队，农民的顾虑不太多了，他们不怕什么地主，只怕顶头的村干部、乡干部。总的来说，基层干部，过于滑边（出格）的比较少，但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占斗争果实，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代表的发言到最后，倾向慢慢转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上去了。在北方，土地面积比南方大，但是，肥地跟瘦地、水浇地与旱地的收成可能相差十倍以上。他宁肯要两分近地、水浇地，也不愿意要十亩远沙地。

这个问题，我印象中讲得最好的还有朱总司令、董老董必武。他们说什么呢，要点是说，土改斗争，对农村的小工厂要保护，对雇长工的人的斗争，要有限度。朱总司令说，小工厂的学徒，除了老板养活他外，他还有工资，还能养活其他人，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的事。朱总司令说他跑了那么多国家，一个工人原则上养活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人，很难办到。我们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工商业不要被搞垮。这些老前辈敢说，一个学徒、店员的收入能养活几个人，根本是不对的，不可能的，非把一切工商业立刻搞垮不可。

最后这个会草拟了一个土地改革法，报陕北中央，报毛主席。草稿我没有看到，但是草稿的精神似乎不是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因为整个会议开得很长，不大赞成重新平分，这跟后来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号公开发表的土地改革法不一样。不过，我没有原上报草案在手，可能记错。

这个会结束后，我们土改工作团就在等，康生传话，土改工作团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也没有分配工作。土地改革法这个方案报上去，很长一段时间，两三个星期，等得很焦急，不知什么道理，就是不回答。可能是十月七八号，回答的电报到了西柏坡中央工委。

有一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分别通知我们，第二天下午到他们家去，康生五十岁，请大家坐一坐。那个时候曹轶欧还很慈祥。我们去了，有花生、枣子、茶水。康生拿出一本手抄本的《土地改革法》说，这就是要公布的毛主席的回电。康生喜欢写字，字也写得很好，规规矩矩的楷书。他说，中央对报上去的土地改革法有原则的修订。他究竟说了多少话，记不得了，但是“原则的修订”这几个字，印象比较深。什么叫原则的修订呢？不管新区老区，土地全部归公，然后打乱平分。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感觉到这样做不妥当，这是没事找事，把农村的农民得罪完了。农民的保守性是很强的。我这片土地，多少年种惯了，你全部充公，再平分，分到谁的手里呀！弄得全部农民的心里都

不安，谁都怕受损失，贫农也怕，尽管他缺少土地，但是，他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还是怕拿来分给别人。当时我是不大接受的，觉得是自己找麻烦。我印象中会议上没有人有这种主张。

公布后大约三个月左右，整个根据地，山西、陕西、山东、河北，一直到东北，可以说是全部行动起来。一切最“左”的事，都是在这几个月发生的。打人呀，逼供呀，挖地财呀，斗干部呀。

一九四八年一月，不得不有个原则性的大转弯，回到调整土地。

53 河北饶阳土改：斗争目标已不明确了

康生到山东去了，与他夫人曹轶欧，还带着秘书凌云及毛岸英。毛主席把毛岸英始终委托给康生。他们四个到山东去的事，我们全不知道。

后来通知我们，到河北饶阳县冀中区党委去报到。当时的区党委，相当于现在一个小省委。我们这一批人，谁负责？康生走了，含含糊糊，没有指定哪个负责，那么多老同志，但大家原则上听张琴秋的。张琴秋女中豪杰，精力好，能力也强。

这回我们是坐卡车去的，缴的国民党的卡车，一个卡车全装完。当时我们正在围攻石家庄，白天有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们只能晚上走。经过曲阳，转弯，向东，穿过定县，再经过几个县到饶阳。非常巧的是，我们早上七八点前到饶阳，就听说石家庄昨天解放了。那天正好是双十二。为什么记得呢，谁都记不住解放石家庄是哪天，但我记住了一九四七年的双十二。“双十二”即十二月十二日，是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的日子。我记许多事，就用这个方法。

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怎么整法呢？每一个人，从区委书记、委员、部长起，到所有的党支部的，一层层整。整什么呢？整你怎么划不清阶级界限呀，怎么跟地主有来往呀，等等。整党后，布置土改下乡。这是土改的第一阶段，大政方针就是这时定的。区党委召开三级会议，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区委一级，主要负责人都来，几百人，有时候上千人。

到冀中饶阳时，冀中区党委正在开三级整党会议，他们要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冀中一个核心地方开会，叫辛集，是冀中最大的一个城镇，产皮毛，现在是辛集市。我参加某个县的会，县委、县政府，各个区区长、区党委书记参加。我听到一些极其不合理的事情：集中斗一个区委书记。说这个区委书记跟地主阶级的界限划不清，包庇地主。我从这个区委书记的发言，从别人的批评中弄清楚了事情。冀中是我们巩固的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城市、镇、大的村庄都被敌伪控制。敌人到处修碉堡，在村里也修，而且很高大。我们留下极少数的人很难成立正式的区委区政府了，下面的工作人员只能叫武工队，敌人一来一两百人、两三百人，有汽车，还有马，我们几个人，连枪都没有，只有两个手榴弹，当然退。夏天，我们躲到青纱帐里，出不来。我们一出来，除了敌伪，还有汉奸。这位区委书记说，每次都是某某人家给我们送饭、送水，晚上估计敌人不来了，把我们接出来，安排住处，第二天天不亮，再送回青纱帐里。按照党的政策，这样的人叫开明爱国人士，因为他是抗日的，是援助我们的。（按：其实应该是坚定的不怕牺牲的抗日英雄。）这位区委书记发言时带有检讨，说自己阶级立场不稳，在土改中对这个财主比较客气等。在土改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事人往往要受处分，留党察看，你不承认错误，就开除党籍。把拼着脑袋救我们的人，当成敌人，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当时听了，以我的年龄、资历，只有反映。没有领导人，只有反映给张琴秋。她也没有什么办法。她也怕，怕挨整，不敢反映。所以，这种整，是错误的，它只能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越来越不讲道理，越来越不讲中国的人情事理。在这样困难时援助我们抗战，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呀！他的危险也是很大的呀！因此，在土改中，对这样的人应该和平土改，把他多余的地拿出来分了，还应照顾，而不应该斗呀，打呀，查三代呀。当时的风气是一律不管，如果考虑这些人在抗战中对我们的援助，你就是错了，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想想看，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叫“全民抗战”呢？现在的电影、电视，几乎凡是地主就是汉奸，其实是对我们全民抗战的糟蹋。八路军固然以生命来保卫人民，但人家也是用生命来保卫你共产党，保卫你八路军打敌人的。现在过了几十年，我已经到了九十岁了，我可以说，不管你从哪方面讲，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是过分的。但我们多少年来，实行的往往是这样的政策。解放

后，对知识分子，对科学家，对大学教授，都是这样。“文革”就封顶了，全部都是敌人，就剩下你江青了。到了这个程度，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十亿人口，全部都是敌人了。刘少奇、邓小平都是敌人了。总之，中国把“阶级斗争”弄到了极致，发展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在最危险的时候，别人拿出生命来救你，你转过来什么也不认了，把中国的道德彻底丢进粪缸里去了。现在大家也认识到过去的有些做法太滑边了，但是，现在还有这么一些人，还不承认这些，只是承认有些地方做得不大对，“左”了一点而已。一切事情，翻脸不认人，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54 有头无尾，把麻烦丢给后来的人

康生一生从未做过农村工作，怎么当起名义上是中央的土改工作团的团长？真是怪事。康生虽然不同我们在一起，但因为有个所谓中央土改工作团的招牌，当地接待得很客气，很周到。我们分成几个组，到几个村庄去。我跟张琴秋一个组。当时她四十多，实际上我是秘书了，只是没有这个名义。我们到冀中饶阳县的大崔庄、小崔庄。到之前，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就想了很多。这个“崔”字，让我想起了唐朝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深县与饶阳连在一起的，均以产桃出名。而作者就姓崔。因此我想，这个地方的风景一定很好。其实崔护的诗大概是讲今西安市南郊的事情，跟我去的地方不沾边。

大崔庄有三百多户，小崔庄有八十多户，小崔庄是附点，因为人手不够，就没有专门派小组去。小崔庄派我一个人去，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也住在大崔庄，我两边管。

一到冀中，跟山西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房屋比较整齐，农民文化比较高，穿的衣服也比较整齐干净。我们一到大崔庄，看到墙上有很多口号，是当地原来的工作队写的。比如“平分一切土地，贫雇农万岁万万岁”等。张琴秋也看见了。我们组里还有两三个老同志，都摇头，头痛呀，这样搞法，那要大翻锅，要大闹。我给张琴秋提了一个建议，涂掉另写，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搞法。这个地方已经不好搞了，极“左”的东西已经搞过了。土改一次又一次，这次我们搞什么？她同意了。我找了

几个年轻农民，用石灰浆把这些口号涂了，写上新的。不过，新的大概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还是“左”得很，不过文字上通顺一些罢了。

我们先调查，但是，非常难。没有人赞成把土地打乱重新再分配的，我们心里都知道办不到。首先是村干部不赞成。一句话，抗战后的村干部都不赞成，因为他们得到的“斗争果实”都是比较多的。

因为康生不久又把我们叫到山东去了，我们只调查了个把月。但是，印象已经出来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不是抗战前的旧农村了，不是地主、恶霸、汉奸的问题了，而且土地基本上已经分散了，分散到历届村乡干部的手里。房屋的占有也变了，过去有钱人的房子已经卖了，到了干部手里。所以，原来的什么什么人，都破落了，生活很贫困，再斗他，拿得出来什么？无非就是挖地财那一套。但是，乡村干部内部斗争十分突出，很激烈。干部与干部之间有分配不均的问题；乡干部、村干部跟贫雇农民之间有分配斗争果实不公平的问题。这个所谓“斗争果实”，是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的土地。所以，这时调整内部矛盾，重于阶级斗争。但当时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说，只模模糊糊有这个意识，不明确，没有形成理论。如果非要斗不可，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敲锣打鼓，戴高帽子游街，我们只能发动农村的二流子、农村的游民来干。这样一来，农村就搞得稀烂。历来的所谓农民战争，基本上是靠游民发动起来的，不是靠老实的农民，老实农民全不想要人家的东西，而且是本村天天要见面的人的东西。

还发现农村的生产力已经大大降低了。到什么程度呢？壮丁基本上没有了，牲畜也没有了，出公差太多了。现在我说到这些，还是非常痛苦。当时开会，要成立青年小组。我到小崔庄去，也要成立青年小组，结果一看，两个青年小组十几个人，全部是十几二十岁的妇女。我们看赶集，女孩子也爱美，也比较漂亮，个子高高的，干干净净，但几乎全是年轻妇女。久经战争的人，不大动情，我这样的人不一样，当时忍不住就流眼泪。日本侵略，把我们的农村变成女儿国了。当时他们就自称是女儿国。我们看不到壮丁，日本的侵略，壮丁有些被捕了，有些当兵了、逃难了，惨得很。当时人民恨日本侵略者，很深。如果别的国家到你的国家来，把你国家的年轻壮丁都杀光，就剩下妇女了，你哭不哭？

这样一来，感觉到这个地方赶快恢复农业生产，比强调阶级斗争重要得多。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调整土地的问题，还有分一些富裕中农的田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上面的政策去调整，并不困难。不采取斗争的方法，而采取内部调整的办法，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些基层干部都参加了革命，是党员了。只要好好商量，农民没有不听共产党的话的。

对这些事，当时我们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感觉到重新再来平分土地，大动干戈，是很难很难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我们在冀中饶阳只调查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有头无尾。

我在小崔庄遇到一件事，说明我们新的内部矛盾往往代替了老的矛盾。张闻天时，我已经有在农村钻一年半的经验。开调查会，已是没有用的。毛主席开调查会是什么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开调查会，全看上面要什么，他们讲什么。在冀中时，一般晚上我回小崔庄睡，发现小崔庄很压抑，人人不敢说话，也不敢接近我。冀中农民，比山西、陕西农民开放一点，绝大部分的农村人都识字。我找人谈，不敢说。我住了一个月，和和气气的，慢慢地，问出问题了。我又深入了解，一些老年人敢讲了。根源是民兵队崔队长。这个人只有二十几岁，实际上是小崔庄恶势力的头子，是新的恶霸。这个问题不要回避，他是党员，不然当不了民兵队长。大家都怕这个民兵队长，因为他有武装。我问有什么武装，他们说，拿出几个棒棒也是武装嘛，有一些梭镖，手下几个人。这个人狠，凶，主要是强奸妇女。我说，你们不是都姓崔吗？他们说，他不管这些，好几辈人了，同在一个村庄，名义上的同宗。

我跟张琴秋报告。这个人能够把整个村庄压得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工作队到了，也没有人敢讲。张琴秋同意把这个人揭露出来，看群众有什么事实。但群众怕他，不敢斗。又请示张琴秋。张琴秋是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千军万马她都指挥过。她说，那就扣起来吧。

于是叫青年把这个人扣了起来，关在一间房子里，派人看着。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现他跑了。小崔庄的人吓坏了，说，你们走了以后，他回来报仇，我们怎么办？小崔庄的群众上了屋顶，敲锣通报，大叫：崔

某某跑了，像发通缉令。快天亮时，在二十里外的滹沱河边把他捉（抓）住了。押回来，把他关起来。

但是，关起来不到三四天，我们就奉康生的命令走了。以后的工作队怎么处理，结果怎么样，都不知道，我们就把烂苹果丢给后来的人了。以张琴秋的权威，她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后来的工作队怎么样，是不是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密切，就不晓得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我们根据地，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内部矛盾的突出，远远超过贫苦人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早不当权了。不但权力不是地主的，土地也分散了。这个时候的矛盾是一批新当权的人占有的土地太多。所以，在老区，一般性的号召，发动群众，重新分配土地，斗地主，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一九四七年年底至一九四八年一月春节之前在河北饶阳县的大崔庄、小崔庄的土改经历，我看见了很重要的现象，我们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像这样的比较老的根据地，做法应该是调整解决内部矛盾。假如有大地主、大汉奸，自然要斗，要分他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内部分配不均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一定要叫我说根据地内还有多少恶霸，多少汉奸，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一切重新来过，那是否定了过去我们自己的多年工作，我们好几年不是白干了吗？我不能讲假话。我讲这些是我自己看见的事实。在我们自己的地方，长的十来年，短的也有几年，敌人来，我们退，敌人退，我们进，反反复复多少次。实际上，当地的恶势力，基本上已经被我们铲除掉了。

55 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继续土改

我们在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十多天离开河北冀中的饶阳，往东南，到山东黄河北面的阳信县。这个县不大，山东渤海区党委、华东局后方机关、华东司令部的后方机关都在这里。当时还没有全国大反攻。

我们一路发现冀中这一带群众的发动、军事组织工作比山西好。可能是群众文化高一点，又是平原，客观上工作好做一点。他们派给我们两辆大车，用的是毛驴拉，当时已经没有骡子了。只要有证明，当地群

众就负责派车、派人。当然，不是全部都招待。没有上级路条的，就不管，管中级以上的官员。

我们三青年的分工，还是跟上一次离开兴县时一样，我负责伙食，于光远负责交通，史敬棠管房子。这一带走一下，立刻觉得人民的觉悟高得多，不怕我们，山西还有点怕我们，我们感觉到军民确实是一家人，让人感动。每个村都有一个接待的地方，有几个人，帮助过往的人吃、住，派大车，一切都是义务。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每到一个地方，小米饭均有，但我也要提前到村里去买点东西。村里没有肉卖，只有买点鸡蛋。晚上住下，炕拿什么烧？那时烧玉米根。玉米根都很大，一个就好几斤重，一个炕发四个。烧炕很讲究，要把玉米根弄断之后烧。等到烧了两个钟头，我们饭吃完了，房子也暖了，炕也热了，就睡觉了。炕上有两层毛毡子，毡子上面有苇席，烧炕后，门窗关严了，盖的被子比较厚的话，天亮前，还不怎么冷，还能忍受。但是当地贫苦老百姓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离不开老百姓。我们吃的、穿的、住的，全是老百姓无偿供应的。人民是父母，我有亲身经历呀！

我们经过津浦铁路上的泊头镇，好像乡下人到了北京一样。哎呀，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呀！晚上，满街的灯火，各种小摊、小吃店，热闹得很。当时才从山沟里出来，看到很惊异。当天买了好东西，大办“宴席”，吃了烧鸡！

泊头镇才解放不久，是津浦路的一个重镇，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不但游击队去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国民党几百个人、千把人也难打进去。

到山东阳信县，先要经过乐陵县。乐陵出无核小枣。其实有核，只是核退化了，吃的时候，核很软，很小，可以一起吞下。这些事业不知现在发展了没有？阳信还出香椿，出大量的香椿。当地居民等香椿长到五六寸长，摘下来，用半人多高的大瓮腌上，吃一年。

56 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我们提醒他，你不要随便讲

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

到某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村里。这时，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奉中央命，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

我们去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邓老大概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扫荡了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我们到时，他们已被斗下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景晓村去世后的纪念文集，讲他一生的贡献的书，我都收到了。我估计于光远他们也会收到，我们工作团员并无通信地址。为什么会给我寄呢？他们的家属可能不太清楚，想是不是你们也参加了整景晓村，要不然怎么给我寄来呢？

整景晓村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景晓村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相反，毛岸英对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有很好的评价，说饶漱石有政治家风度。我们三青年，还是延安整风时的那套思想，上级是不能谈的，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赞美饶漱石，我提醒他，不要随便讲，不要跟别人讲。大概我们三人均这么讲了。经过延安整风，大家的组织观念都极强，政治局委员是高级领导，你这个小党员，怎么能讲政治局委员？所以，听见别人说康生怎么怎么样，自己就怕，内心恐怕，生怕别人说你议论上级，批评上级了，那不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突然改变。一九四八年一月中下旬，任弼时有个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新华社全文发表，各地都

印出来了，人手一册。当时，任弼时还在陕北毛的身边，这个报告当然是毛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报告把三个月前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基本推翻了。现在当然不用这样的话，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原件俱在，可以复按。报告讲，原则上根据各根据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已经有一点调整的味道了。我的理解，这是个很大的纠正，因为三四个月来，发生了乱打乱杀，损失极大。各个地方不断叫复查。老百姓说，“不怕土改，就怕复查”，一次复查，说前次右倾了，第二次，又说你前一次右倾了。复查的人绝不敢说你“左”倾，我给你改正，而是加码的“左”倾。要不然，下一个人也去复查他呀。东北的说法，叫“夹生饭”，就是说饭没有煮熟，再去重新煮。煮一次，煮两次，煮三次，一次比一次火大，饭成锅巴了。但是，我听张闻天的部下讲，当时张在东北的合江省任省委书记，他没有煮夹生饭，根本未理此事。张是政治局委员，在东北九省的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他以这个身份，管一个小省，他顶得住。抗战时期，他也了解农村，一年半全在农村里，别人是顶不住的。

任弼时的报告，从根本上转变了土改中过激的、不适当的做法，也是紧急地把三四个月以来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做法制止了。过去的做法实际是在让农村中自己制造恐怖。那几个月根据地的损失太大了。我在农村，我在实际干，只能按实际情况说话。至于现在的史家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管不着。

57 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中央正式做出新的决定，即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调整的决定。原则上改变了土改法的做法。

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马后炮了，而且是马后炮得很多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要干的，已经反复干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不是一个地方的口号。现在的有些史家，可以把这事怪这怪那，总之是下面错，上面对。其实按照土改法那么去做，不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什么呢？至于一九四八年为什么要补这个决定，意义在哪里？现在很难说。我觉得这个决定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我们在山东一九四八年过了正月初五就到各个村庄去。这一次，因为有任弼时的报告，我们胆就壮了，就根据情况来处理，主要还是调查。我们发现，农村的土地问题基本也已解决了，不是重新分配的问题，基本上是调整斗争果实分配不均的问题。正是处于这个关头，五月间，一封电报，调工作队回西柏坡，康生本人留下，要他负责山东工作。

这时，康生也不敢违背任弼时的报告，他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后来怎么搞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搞土改，工作没有做多少，但看见的事不少，这也是很大的收获。不是一般地跑下乡，而是较长时期在村庄里，了解了我们工作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

工作队基本回去是什么原因呢？毛主席已经到了西柏坡。他先不住西柏坡，住聂荣臻那里，离西柏坡还有二百里吧，中央要正式开展工作，要把战争时各单位分出去的人调一些回来。大多数人已分到东北去了，从东北调回很困难。

这次我们回去，坐的是四轮大卡车，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给我们缴获了，轮子有我的肩高。这次我们白天走，也没有什么人打前站了。初夏，不太热，一九四八年的六月上旬回到了西柏坡。回去后，各人回各人的部门。

第十一章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1948年6月—1949年3月）

58 在东柏坡做书箱，保证了延安撤退时埋藏的部分运到了北京

一九四八年六月回到西柏坡，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二十几号进北京，在西柏坡只有大半年的时间。在西柏坡的时候，我有前后两段。前边一段，即六月至十一月，属中宣部，住在东柏坡。后一段住西柏坡，在小新华社临时帮工。东柏坡与西柏坡中间隔一座小山嘴，像鳄鱼嘴。相距不到二三里路就是西柏坡，等于一个村庄分两边。

在东柏坡，各人归本部门，我回到中宣部。但是，中宣部当时实际上没有了。部长陆定一住在西柏坡，他单独应付毛主席那边的事情。陈伯达住在西柏坡，写文章、写书。到此时，这两个正副部长实际上从来没有正式管过事。整个宣传部的人，很多都到东北去了。剩下的人，有秘书长丁华。丁华本名叫帅昌书，四川眉山人，是一九二六或者一九二七年入党的，是上海做教师工作的地下党同志，曾经是江青的上级，后来江青整他。其他的，有几个家庭，我们开玩笑叫“四大家族”，业务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这时调了一个到处跑的很能干的人，叫林间。尽管如此，宣传部仍然处于停业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党中央集中力量打仗，有没有宣传部没有关系，暂时用不到它。宣传工作，毛主席主要是抓新华社，号令一声，全球惊动。他走到哪里，新华社一定是要在脚边。

于光远转到了宣传部，他原来的单位《解放日报》停了。王惠德也调来了。于光远、王惠德，加上我，三个人做点业务。在西柏坡时，我们属于一般的干事。整个延安，当时没有干事、科员这个名称，“干事”还是自封的。

这段时期，六七月到十一月，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回到西柏坡是初夏，六月，天还不太热。我们知道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藏在延安附近的地窖里。虽然是中央图书馆的书，实际上是由宣传部代管的。怎么埋藏的，我们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处

理的。我们收复延安已经三四个月了，想到派人把书运出来。当时估计中央不可能回延安了。

林间是马来亚回来的华侨，到延安时间很长了，他非常单纯，非常热心，个性开朗，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管总务，很能干。我建议丁华转建议杨尚昆，设法把延安埋的书弄出来。杨批准了，由中宣部林间去办此事。林一个人跑去延安，驮了几十匹毛驴的书回来，辛苦得很。当然，中央办公厅花了大力协助他，他也得到了各地的全力协助。林间把书全部驮回来了，功劳真是大得不得了。好在没有下大雨，如果下大雨，就全完了，没有箱子，连油纸都没有。这些书放在东柏坡很大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

慢慢地，我看没有人管，因为图书馆的几个人全部到东北去了，上面也没有人管，我就想，如果哪一天傅作义一来，一本都没有了，都要被烧掉，没有准备是不行的。当时的准备就是进深山去。

我设计了一种书箱，两尺多宽，两尺多高，两格，一个盖子，十几个木襻，很牢固。我到附近的夹峪找木匠铺做。夹峪是个大村庄，有四五百户，距西柏坡有四五里路，中央很多机关在那儿。夹峪的木匠铺有两三家，我要求用结实的木头来做，用好胶来粘。木匠用的木头是榆木，胶是鱼胶，均是特上材料。鱼胶的黏度很强，木匠用这种胶粘木头，当场摔给我看，木头打破了，胶粘的地方没有破。鱼胶说是“进口”的，即是从产鱼的地方，如天津这些地方买来的，它是用鱼鳔熬成的。做一个我设计的这种书箱子，要用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这笔钱不少，从哪里来呢？我就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说了做箱子的作用。我说现在把书装好，现在不用，疏散时关起箱来立刻就可以抬走，好运输。延安撤退时埋在地下没有问题，因为干燥，但以后疏散的地方潮湿，就不行，书会腐烂。杨尚昆很好说话，人和蔼，他批准了。

我动员两三个青年来装书，统统装好。一个立方体的箱子，在它的每一面都写上相同的序号，盖子上也写上序号。记得是七八十箱。

这批箱子果然起了作用。十月到十一月，有一次说傅作义要来偷袭西柏坡，上边通知，各个单位准备行军，如果傅作义来，我们还是走。东柏坡破窑洞多得很，当天晚上，因为宣传部的人不多，中央办公厅行

政处号召西柏坡的所有干部，包括老百姓都来帮助搬书箱。真是壮观，排成两排，两个人面对面，好几十对，两个人抬着传送。传了两个钟头，半夜十二点左右，全部传到了几个破窑洞里，外边做了一些伪装。

我这个人，没有学问，但是干这些事还用脑筋。后来这些装在箱子里的书运到了北京。现在不知下落。

59 在西柏坡小新华社

一九四八年十一或者十二月，我背着行李，绕过山头，由东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华社。

新华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么大一块地方，所以只允许一个小编辑部存在。小新华社占一个院子，胡乔木直接抓（领导），后来听说是社长，但我没有见到宣布过。小新华社有军事组、文教组、政法组、经济组等。另外有个名义上的评论组，实际不评论，胡乔木宣布他自兼组长。评论组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王宗一和我。我们坐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来看，是胡乔木要把我们这一大批人集中起来培训一下，他是在办训练班。新华社的工作，稿件固然重要，但是他也把训练摆在很重要的地位。

一直到三月下旬进北京前，这几个月，我受胡乔木的培训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从逻辑、语法、修辞方面全面要求。他本人的文章并不一定那么生动，不如陈伯达，但他要求文章讲究逻辑、语法、修辞、语境等等。这些名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就有点僵化了，他讲得还要生动。后来“文革”快结束时，邓小平不是也找他出来编毛选吗？毛答应了。毛说胡乔木就喜欢改人家的文章，他的文章胡也要改。毛主席的东西是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写的，那时许多文字语法都不讲究，毛病多得很。

西柏坡有电灯。我们大概在晚上七点上班，十二点下班。办公都在晚上，跟报纸一样。相当多的时候，有几辆摩托车等着送稿件。一般分几批送，送去在外村的电台发报。只要一发稿，全世界就收到了。快十一点稿件发完后，胡乔木经常要召开一个没有名字的会议，即胡乔木的“炉边闲话”。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间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房间可以坐

二三十人，由他来讲。他主要讲在稿件中发现的逻辑、语法、修辞问题。这些问题经他一谈，觉得文章“一无是处”。这里的“一无是处”，不是贬义。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像范长江这样的名记者说，我的文章全不通呀！范当然是客气，但也感到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些问题。那时没有录音，失传了，真是太可惜了。

胡乔木讲的表面上都是小问题，比如，说蒋介石回南京后的政府是伪国民政府。他说，它是真国民政府呀，因为国民政府只有它一个。伪国民政府是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伪国民政府就是汪伪国民政府，是两个概念。北洋军阀就是北洋军阀，你不能说它是伪北洋军阀，难道另外有个真北洋军阀吗？这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国民政府，那汪精卫的政府不是应该叫“伪伪国民政府”了吗？说得大家笑，觉得道理很对。

我还记得他举的一个词。我们报纸常常用“哭声震天”来形容蒋介石统治区人民怎么苦。他说，这个词要看具体的情况，上万人哭，用这个词还可以，但几个人、几十个人在哭，觉得离开事实太远，你自己都不会相信。

胡乔木的讲评，没有一个人不佩服，没有哪一个有怨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文章有问题，不通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我们平时的文字太随便了，经不起推敲。

这种训练，对一个人非常有益，而且终身受益。在这类技术问题上，胡乔木比别人高明多倍。用他的一套来分析，凡是没有经过他改的文章，技术错误确实都很多。但是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有时也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语法、修辞、逻辑等全没问题了，也可能把个人的风格改掉了。胡本人的文章就并不漂亮，“第一支笔”不等于文章大家。“第一支笔”当然是大褒义，但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同时是贬义，即不管怎么说，都能勉强把事情说得“圆满”，以错为正，画白为黑。他就对李慎之说过，他写的“三个世界”的大文，全是“胡说八道”。

总的说来，胡乔木的这个“训练班”办得很好，在动笔写东西时，不要随便乱写。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报纸，从标题到文章，许多东西，都是胡说八道。

我一生是愚鲁的，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尽管陈伯达判了十八年徒刑，但是在我年轻时，他还是老师，实际上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胡乔木的教育更加直接，因此，他就是我的师长，不能因为今天我对他晚期有一些意见，就说他不好。中国人尊师重道，我这个习气改不了。

第三编

第十二章 进北京，下广州。在广州只是一个“官”（1949年3月—1954年3月）

60 在香山得正式通知，准备南下

我本人是宣传部的编制，但胡乔木叫我跟新华社进北京。进北京是三月二十五或二十六号晚上九点过，坐着卡车上的香山。毛主席他们是头天到的，也住香山。当时党中央在香山，组织部、统战部等在城里。毛主席住香山，新华社一定在他旁边。中宣部本部也在香山。毛的枪杆子均在千里之外，笔杆子只能在身边。

在北京香山住的两三个月，相当苦，比延安苦得多。因为刚进北京，粮食不够，要从东北调高粱米来。在北京什么也没有吃过，北京小吃、水果都没有吃过，一分钱没有。像我们这样下层的工作人员，也不参加其他社会活动。至于工作，我不忙，大家都不忙。有一天我去了一次颐和园，二十几个人坐卡车去的。当时颐和园没有开，里边是空的，没有游人，遇到谢觉哉夫妇。

在香山时，已经知道要南下了。这时，我请苏联医生米大夫给我看关节炎。他是给中央看病的，香山的人比西柏坡少得多，所以我能找他看病，当时有翻译。在小新华社时，我的关节炎严重了，要拄棍子。米大夫说，关节炎是世界性的毛病，很难治。有一种治疗方法，在海边用热沙敷。沿海有些地方解放了，有这个条件的话，你可以去治疗。

我找到当时中央办公室主任杨尚昆。那个时候见杨尚昆不难。我说青岛解放了，交通也通了，我到青岛去治疗一段时间，不然南下也不方便。杨尚昆知道我要南下，因为上面对各个干部的调配，是要开会讨论的。他同意了。

当时康生在山东济南，他跟我们几个青年人的关系不错，跟于光远

更谈得来。我六月底去青岛，经过济南市去看望康生，很顺利到了青岛。在海边用热沙埋腿，没有什么大效果。有一天，接到电报，叫我回北京。

我回北京，不回香山了，中宣部在西四大院胡同有个城里的办事处，正筹备成立宣传部。我到中宣部去，他们说，考虑到你的关节炎严重，已经决定你南下，到广东。你去找中央组织部报到，他们会告诉你一切。

我到中组部报到，一个副部长接见，说，上面决定你南下，行不行？我说，南下是我的要求。他说，现在就是派你到广东，职务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你去找第二书记张云逸，他还在北京。

我说，这职务我不行。我要求的是去做一个县属区委书记。这位副部长说，行不行，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过去了。你去找张云逸报到。以后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只能向他提出。

张云逸是十个大将之一，是华南分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是叶剑英。方方是第三书记。

我找到张云逸。他说，上面决定你做这个工作。整个华南的干部，全部是从东北调去的。从北京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你，另一个是张云天，做华南财经委副主任，兼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区银行的行长。主任是个长征干部。这次干部的配备，中央要东北负责全套。北京去个别人。

他说，你一个人怎么走？你最好跟张云天一路。张云天可能还带几个专家去。张云天当时任北京市人民银行行长。

我很高兴，我在延安时曾跟张云天住一个窑洞。我说，我跟张云天太熟悉了。

过了几天，我到西交民巷去见张云天。他说，我去，我要带几个银行专家，我也不懂呀，你我都是搞政治的。

61 叶帅、方方谈话，改任《南方日报》总编辑。领导看来很满

大概是一九四九年七月初，最热的时候，我跟着张云天的小队伍走。除了他，还有四五个人。我们的目的地是江西赣州。当时只有这样走，坐火车先到上海，由上海坐火车到杭州，再走浙赣铁路，到江西南昌，最后坐汽车到赣州。这一带都解放了。经过上海、杭州，热死人。

上海是五月底解放的。到上海，住在外滩中国银行十四楼临时招待所，睡在地板草席上。往来的人，都住在那里，每天发一点钱，可以在路边买面、买包子吃。我们等了两三天，坐火车到了杭州。我们住的旅馆是三层楼的木建筑，面对西湖。住了几天，我问，西湖在哪里？他们说这就是西湖呀！我说，这算什么西湖！西湖边上有洗衣服的，洗碗的，乱七八糟的，把西湖破坏了。当时的情况很不好，很乱很脏。住在西湖边，还问西湖在哪里，可见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的十几年，西湖已经破烂不堪了。

在杭州坐火车，直通南昌。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是没有客车，我们坐的是闷罐车。七月份，从杭州到南昌，苦呀，这个闷罐车又热，蚊子又多，真是难过。

浙江西部，还有江西一些地方的庄稼、树林，是比北方好一点，但是，群众穿的衣服非常破烂。这么富的省，衣服还是那么破烂呵。浙江、江西田里，妇女很多，穿的是黑衣服，破破烂烂的。当时感觉到南方好、生活高的还是城市，到了农村，农民还是非常苦，苦得不行。在浙江看见农村男人的服装还是三十年前阿Q时代的服装，一点未变。

到南昌坐汽车。当时是私营汽车，没有汽油，是木炭汽车。汽车背后背一个大铁罐。我们从南昌坐这种汽车到了赣州。

到赣州后，大概有两三个星期住在赣州周围的乡村。当时正值暑期，小学、中学、师范，都住满了南下的人。叶帅、方方他们也住在村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也是在赣州农村知道的。

一天晚饭后，叶帅、方方派人来叫我去。他们很和气，问我，中央派你来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吧？

在这样的环境，他们这样问，我知道有可能情况有改变。我说，我是一个普通的南下干部，一切是到这里来听分配的。我说，我多年来要求做个区委书记，我参加过几年的农村调查、土改，我愿意做区委书记。我知道，县委书记的目标太大，区委书记的目标小，但什么事情，实际上是区委书记做决定。一般开会，是县委书记主持会议，区委书记夹在当中，看起来不重要，我所了解到的，县委并不能真正指挥到各个乡，区委书记实际在指挥工作，好锻炼人。

他们说，上面叫你来，不是叫你做这个工作的，是叫你做宣传部副部长的。但是现在跟你商量，准备把你的工作改动一下。

我说，我就是一个南下干部，一切听分配。

叶帅毕竟是第一书记，不大出面讲。方方说，华南老干部多得很，你知道一进城，报纸的宣传工作很难抓。现在找抓报纸的人，比宣传部长重要。你是知道的，毛主席近两年有规定，一个省委的报纸，大样要给第一书记看，要第一书记签字后才能付印。

毛主席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原因是土地改革时，有些报纸搞极“左”号召出了比较大的问题，毛便做了这样的规定。这个规定非常严格，但第一书记半夜三更起来签字，实际上办不到。任何第一书记都不可能执行。

他们非常客气，说，你去，我们比较放心，你是老延安，延安这一套你清楚。他们都是香港回来的，虽然都是老同志，他们不习惯照根据地办法办。你去，你签字就行了，不用送来再签字。你知道的，要第一书记签字，我们半夜看了，白天怎么工作？因此，我们的意见是你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原定总编辑刘思慕，中央决定要调他到上海去，我们找不出更合适的人。现在要你去。

刘思慕是一九二几年入党的老干部，跟廖承志是同学。早在我南下前，《南方日报》的干部配备电报，胡乔木已经给我看过了。哪个是社长，哪个是总编辑，我都知道。

我说，我当然服从分配。内心也是如此的。

名义上，《南方日报》的总编辑，比原来确定的宣传部副部长，“官位”大概要差一些。我答应得如此顺利，两个老前辈当然高兴。

在赣州住下后，文教干部、财经干部、组织干部等分开走，坐着租来的木炭车向广东进发。张云天是跟财经系统的在一起，我跟新华社及做报纸的人在一起。张云天坐的卡车比我们的先开一个多小时，大概在赣州之南不远的一个县，经过一个群山时，路不好，他们的车翻了，车子里的人基本上都死了。带着我走的张云天，自己牺牲了。和平进军时，牺牲的人还是比较多。当时我很难受，非常难受，但是，没有办法，我们的车子还是在继续开，因为要接管广州。

62 代表叶剑英签报纸大样

广州解放三四天后，我们才进去。我们坐的是卡车，比大部队快。大部队是走路，我们进去时大部队还没有进广州。国民党撤退时，把珠江大桥炸毁了，其他的破坏不太大。我们两三个连从北面插进，没有打什么仗。南下干部住在几家旅馆。我们住在其中一家。事先地下党把一些大酒店都租下来，全部住南下来的干部。但吃饭要到街边小摊吃，广东小摊的东西比什么地方的都好吃。

这个时候，广州流氓地痞特别多，还有“大天二”（土匪）。解放军进广东前两三天，城里空的，大天二到处接管，竟然敢去接管中山大学。后来成立军管会，开招待会，把这些人请来，全部抓了。

进广州几天后，香港《华商报》的大批干部才回来。香港《华商报》是我们办的报，《南方日报》就是依靠香港《华商报》的班子来办。当时社长叫饶彰风，是个老同志，挂名社长；副社长叫杨奇，比我年轻几岁，带了百把个人，不光编辑，连印刷工人都带回来了。停办《华商报》的决定不知是谁做的，是个很错误的决定。当时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对共产党的舆论机关卡得很紧，减少一个后，绝对不让你再办。所以，我们自己把这个影响最大的宣传阵地无条件放弃了。《华商报》分一些人到《南方日报》是可以的，还可以调一些人去香港，这样就可以把影响巨大的《华商报》在香港留下来。

我任总编辑，但我不懂行，报馆这一行，全不懂。我能起什么作

用？看看版面，看看一些文章，一些消息，任何作用也不能起。杨奇是个非常好的久经锻炼的老同志，打游击出身的，能干得不得了，一个人管很多事情。首先接管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当时这个报纸只有排字工人，编辑部的人都走光了。开始一两个晚上，我只看看报上的东西，签字付印。

香港回来的同志弄不清楚解放区这一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的好处是少麻烦上级，承担一些事情。举个例子吧。

《南方日报》创刊不多天，香港来了一个参观团，是左派人士组织的，叫“香港侨胞回国参观团”。我一看，吓了一跳。把香港人叫侨胞，把香港人回到大陆，叫回国。香港不是中国的地方吗，怎么成了“侨胞”呢？怎么能叫“回国”呢？我说，只能写“香港同胞回穗参观团”。因为这些活动都是我们统战部组织的，我说要跟统战部打电话，明天我们的报纸不能用这个名称，征求他们的意见，请求他们改名称。当时广州还有其他一些报纸没有停，就是态度还比较好的，一些民主人士掌握的。我说，要紧急通知这些报纸，还有新华社、广播电台。所有这些，要在半小时内办妥。我说绝对不会错，我负全责，中央不会责备的。像这种问题，我体会得出中央素来的态度。

我去，一个好处就是能处理这类小问题。我再举个例子。

十一二月，财经困难，上面决定腊月不发双薪。当时，按照历史上多年惯例，要过年了，腊月是要发双薪的，全国大体如此。我说，明天这消息登出去，那不闹起来吗？

这样的事，我们这些“老油子”就知道，事先要有舆论准备，他们财经机关不管闹不闹事，就一个通知了事。我立刻写社论：《同甘共苦，渡过艰难》。我们做宣传的人，就是干这种事的。有时锦上添花，有时雪中送炭。可现在的媒体只做前者，不做后者了。我的好处，临时可以决定，临时可以写。同是南下的原延安《解放日报》的同志有些犹豫。我说不要请示了，这样只登消息，是要闹翻（出事）的。我说了一大堆道理，就是上述的社论。过了若干天后，我去参加分局的扩大会议，列席会议的有些同志说，我们就是根据你们的社论去做解释工作的。不然的话，突然来一个通知，真是不好办呀。

我们做文字工作的人，任务就是补这些漏洞。另外，我对此也有把握，不会错，我自己就可以负责。

但是，不到两个月，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上面似乎又在强调，报纸大样要第一书记签字。这个怎么能办得到呢？叶帅就把签字权委托给华南分局常委、十五兵团政治部主任、挂名宣传部长肖向荣。肖向荣只是挂名，宣传部在哪里他也不知道哩。肖向荣很有名，是长征时的年轻干部。肖向荣会半夜三更起来签字吗？于是，又耍个花样，把我调到他的政治部，因为《南方日报》离兵团政治部很远。我住在那里，上宾招待，半夜后代表他签字，《南方日报》换个总编辑上班。这样转了几个弯，我代表肖向荣签字，肖向荣又代表叶帅、方方签字，完全是形式。这样搞了一个多月，上面突然宣布，我是华南分局宣传部的副部长，兼《南方日报》的社长。这样，我又回到《南方日报》，签字的任务就正式交给我了。其实按毛主席的规定，我根本不够格。我估计，全国没有一个地方能实行上面的这个规定，自然各有对策。

一九五二年后，大概五六月，到一九五三年的六月，有十来个月的时间，我离开报馆，到宣传部去当“坐堂医生”，原来的坐堂副部长，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李凡夫，调工作了，挂名部长肖向荣一九五〇年就到北京了，所以就没有部长。我的前一任“坐堂医生”调到哪里去了，当时不清楚。“文革”时听说在安徽，做省委文教书记，被斗得很厉害。

这时，陶铸调的李心清来了，李是我马列学院的老同学，他正式任宣传部长，但是李心清跟陶铸他们住在广东的东山，距我们比较远，相距十来里路，李心清不来上班，他在那边参与机要。当时，叶帅、方方已经调走，新的三个核心人物是陶铸、赵紫阳、李心清。李心清抓大学教授的思想改造。我的天老爷，这件事，够要命的了，广东那么多大学，一个个教授要过关，忙死人。别的事，他就不大管了。

我在广东待了四整年，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干，成了华南的一个典型的文化官僚。什么文化官僚的名字，都放在我的身上。我兼了一些什么工作呢？华南人民出版社的社长，但我没有去过。一九五三年以后，我还兼广东教育厅厅长，正式的，报纸上都登了，是陶铸定的。教育厅我去过。还兼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等等，会长都是领导人，叶帅、方方挂名，他们哪里管这些。我这个副会长也不管什么，这些会址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那里有个总干事就完全够了，只是开招待会之类要我出席。

所以我在那里成了宣传界一个典型的官僚。关键是叶帅他们相信老解放区的延安干部，认为是最可靠的，认为延安干部是最忠实于党中央、最忠实于毛主席的。

63 陶铸要用我，但不得不让我去治疗关节炎

我的关节炎在这两年发展很快，一个是忙，杂七杂八的事，第二个是营养不良。广州几年，吃饭也不正规。

一九五三年六月后，陶铸命我正式兼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秦牧的事，就是发生在这时。当时，秦牧在教育厅资料室做主任，我不知道。所以，过了若干年，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知道后就当面道歉。我说我不知道你在那儿，如果我知道，我当然会立刻去拜访你，向上面提出调动你的工作。当时都是当官嘛，无非调到文联当个副主席吧，主席还是南下的老干部来当。可见当时当地华南的老干部的发言权比较小，像秦牧在全国这么著名的散文家，他们都没有考虑到，太不应该了。

在教育厅坐了三四个月的班，了解了情况，正准备下到各地去看看中等教学的情况，人走不动了，关节炎严重了。陶铸看见说，这样不行，要治疗治疗。陶铸人能干，什么事他都能决定，找人来代替我。

陶铸要我去治疗，还讲了他的关节炎治疗的事。他说辽宁省鞍山附近有个汤岗子温泉，很有名，他的关节炎也在那里治疗过。他说在东北时，他的关节也不行了，到汤岗子治疗后，两三个月就好了。汤岗子，不仅有温泉治疗，还有理疗。我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到汤岗子疗养院，到一九五四年三月。类风湿关节炎很难治，最后是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治得大见效的。

在汤岗子治疗中，北京几次来人，叫我到人民出版社，说胡乔木已经跟陶铸讲好了，不要回广州了，而且不准我回广东拿行李，怕我想留

在广东。其实我并不想留广东，因为回去几乎纯粹是做官，我不大习惯。

在华南几年的经历，我文教工作基本不谈，报馆工作也基本不谈，那些日常工作，多谈没有意思。我真正做的工作，是在文字之外。

我这一生，应该是搞人事工作，搞组织工作的。宣传工作需要学问，我没有。特别是我自己挨了整，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以后，知道随便给别人一个帽子，是很大的事。审查人的工作我愿意做，我生来就愿意对人负责。我记得很清楚，进城初期，在北京西单丰盛胡同开过一个中央机关的干部大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作了一个报告。安子文是一九二几年的老党员。他的报告讲得很好。他说，将来你们分到各地去，都要做一定职位的领导，一定要接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事先要反复讲清楚。所有的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只要自己讲清楚，只要是自己报告了的，将来都可以从轻处理，甚至可以不处分了。但是，如果是查出来的，责任就重大了。你们将来不能随便怀疑人。我很接受这个报告的精神。接管后，千万不要乱整人。

第十三章 在广州勉强做了四五样事

64 半夜给“203”打电话

一九五一年，全国闹了一年把的大镇反运动，即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镇压的人不是三个五个，是一批，各省每天要报告。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要搞，叫作“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广州解放晚，比上海晚半年多，这个运动一直没有大搞。一九五一年四月下旬，我那时在《南方日报》，一天晚上九点过，报纸开版面编前会，突然，政法组一下拿出个东西，吓死人，说明天要公开枪毙一百四十多个人，罪状刚拿来。这些人的罪状大多空空洞洞，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怎么办？我说，毛主席说要大张旗鼓，就是要宣传呀，宣传为什么一定要杀这些人，其他省市都这样做，报纸几版几版地登罪状，铺天盖地，登几十天；还要开群众大会，还要控诉，一大堆事。我说，我没有听说过明天要杀人，我们才拿到消息，现在连个社论都来不及起草了，群众看到就是空空洞洞的罪名。这些空洞的罪状，民主人士早就批评过我们，而且当面批评说，你们杀人，说一贯反动。什么叫一贯反动？是什么罪状？要说清楚。我说这样登出来，我们报纸就失职了。广州靠近香港，刚解放，突然一天杀一百多人，历史上没有过，海外接受得了吗？香港群众接受得了吗？

大家也觉得这样登出来，整个广州，广东，就连香港，都要震动。因为没有任何解释，罪名抽象，突然杀一百多人，谁能不惊？

大家都吃惊得很，苦得很。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明天早上要出报。

当时有我、杨奇（副社长）、总编辑、采访部主任、政法组的组长成幼殊等。采访部主任是延安《解放日报》来的。曾艾荻，他也很坚持。这怎么行啊，我们报纸见着人如何说啊？我们认为这样登出去，对党不利，对报纸而言，上边也会说，你们就只是这个罪状呀，没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其他的采访资料，其他的配合开会控诉等等，全国都不是这样做的。总之，说来说去，我们觉得这样登出去，实在不行，对政府、对共产党的威信影响大，损失太大。我们报纸对读者交不了账。

副社长杨奇十几岁就在东江游击队，打了几年的仗。他对着我说，现在只有一条路，靠你打电话了。

当时有个规定，报馆的最高负责人有实在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可以在晚上，甚至后半夜打电话给第一书记。但是，话虽这样讲，谁敢执行这一条？我当然也不敢。第一书记是叶帅，跟一般的省委书记不一样，声望、地位高得多，半夜三更，打电话给叶帅，你自己称称自己的分量，碰钉子怎么办？

但报纸明天见报，弄错了，是收不回来的呀。明天不出报，他照样枪毙人，这样更不行，我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件事情，推不掉。七八个人，十一点左右夜餐来了大家都吃不下，拖到十一点半，杨奇第二次提出来让我打电话。杨奇办报纸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打电话给“203”才行。203是叶帅的代号。当时刚解放，都叫203。

我说，如果×××部门要我们登的这个罪状是叶帅看过的，怎么办？这个钉子就碰大了，碰得起吗？

大家分析，我也分析，看样子，叶帅没有看过。叶帅何等周密认真谨慎，大概没有看过。

大概十一点半，我硬着头皮，只有打电话一条路了。电话当然是秘书接的。我简单说，我是谁，明天要枪毙一百多人，这个事情很大，我要把这个事简单向203报告一下。这个事很重要，因为列出来的罪名太一般化了。

十多分钟，叶帅就来了。叶帅的声音很响，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有意见吗？我吓得不得了。我说，明天枪毙一百多人，我们刚拿着一张罪状，其中一些人的罪状不清楚，很抽象。罪犯包括解放前的教育厅长，是从香港回来的。

他又问我，是明天吗？还有哪些人？我又给他说了几个，比方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革命时，杀苏联总领事的，好像还有杀萧楚女的，他很吃惊，说，还有这样一些人呀！我说，毛主席说要大张旗鼓，我们明天连社论都来不及发，更没有什么资料。

叶帅想了一下，说，你等着，等着我的电话。

大家放下了一点心。叶帅也不知道此事呀！

大约半个小时后，秘书电话来了，通知我到东山小岛去开会。东山小岛是叶帅住的地方。后半夜，临时紧急通知开会，有叶帅、古大存（解放后，古大存任中共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是副省长，主持日常事务。还有宣传部副部长李凡夫；当然，此事的主角是专管此事的党内和政府内合二为一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这人后来调到北京来当某某院的副总长。

这个会很重要，在叶帅楼下一个办公室开的。×××气得大怒，他带的一个处长××，嗵嗵，把几麻袋资料扔在地上。这在叶帅面前，太不礼貌。叶帅讲，听说你们明天要枪毙一百多人？“听说”这两个字，刺激了×××。×××说，这不是分局决定的吗？叶帅说，分局决定是说，中央大镇反的这个决定我们要执行，这个指示是讨论过，可是明天你们这个行动……

叶帅还没有说完，×××知道出了问题，立刻打断了叶帅的话。说，我们现在有关部门全部漏夜办公。他强调明天这样大的行动，要用多少卡车，沿途的警戒，刑场的警戒，处理后事要多少人，等等，多少人漏夜办公，都在等着。

这些话讲完后，叶帅说，报馆讲讲吧。

老前辈讲话，一些名词都是老的，把我们叫“报馆”。

我说，毛主席的大镇反运动，我们都是拥护的。但是，大镇反跟宣传分不开，叫“大张旗鼓”，新解放区的行动，不宣传这些人的罪行，他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事，中国历史上没有搞过。我举出了其中有前教育厅长。我说，据我所知，他是公开从香港回来的，不是偷偷回来做情报工作的。这样捉起来就杀，是不是好？

×××反驳我说，他这样反动，参加反动党政军汇报，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当时我是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作为教育厅长，必须要参加。在解放前一年把，国民党有个党政军汇报，是专门镇压进步的

学生运动的。大城市都有，国民党党部特务方面、政府方面、军队方面出席。政府就包括教育厅长参加。

我说，毛主席的方针，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宣传他们的罪恶，要发动全民来声讨，大学发动大学生，工会发动工人，青年团发动年轻人，妇联发动妇女，街道也要发动居民，都要全民来讨论、声讨，全国都是这样做，报纸不是一天，而是一两个月几版报道。我说，这里边有杀害苏联驻广州总领事的人，还有那些杀害我们重要负责人的人，这些材料都没有掌握，明天一件材料也没有，而罪状里边写得含含糊糊。作为罪状，闹不清楚，老百姓更闹不清楚。

×××很生气，指着几袋材料对我说，你看吧，材料都在这里！这样，好像变成了我跟他争论似的。我怎敢争论呢？你这么老资格，中央苏区出来的，你还拿着刀，我敢争论吗？但是，叶帅既然后半夜召集会议，我就知道叶帅已有自己的想法了，不然不会开会。

叶帅叫×××不要那么激动。但有×××仍怒气冲天地说，我们这个事，是毛主席抓的，是中央抓的，要大镇反，广东已经慢了，受了上级的批评。

叶帅发言，把我讲的例子也讲了一些，说这些人，是应该在报上宣传，不然，杀他的理由，老百姓不知道。还有，像“一贯反动”“民愤很大”这样的罪状不能成立。叶帅在国统区工作那么多年，知道民主人士对我们“一贯反动”“民愤很大”这些“罪名”素来就有意见。

×××没有退让，说，我们今天晚上全部在漏夜办公，什么都准备好了，明天不动，这个事不好办。而且这个事，分局讨论过，分局知道。

这下把叶帅惹火了。叶帅说，要不是报馆给我报告，我也要明天看了报才知道。我们开会，是一般地谈过的，但是明天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是报馆给我报告后，觉得你们这样做法有点问题，才开会的。

叶帅不得不点题了，最后不得不说：×××同志，我们要记住中央苏区的教训呀，刀把子究竟掌握在党委的手里，还是掌握在你们保卫部

门的手里，中央苏区血的教训还不够吗？这等于叶帅跟他摊牌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叶帅用的全是老名词：保卫部门、刀把子。看来叶帅有点不耐烦了。

×××是老资格，他不怕。但叶帅说了这些话后，×××才没有办法，知道叶帅已下决心了，站起来说，打电话，明天停止执行。

古老（古大存）说，好啊。好啊。

×××去打电话，通知明天停止执行。他通知有关方面说，大家不要走，等他回去再说。电话就在会议室旁边，都听得见。

×××打了电话后，我不得已地说，我也要打个电话，报馆那么多人全等着呢。我给杨奇打电话，说，杨奇同志，明天不执行了，你另发稿吧。

这次是叶帅做主，没有叶帅做主，我怎么得了？！

这样，就商量怎么办。古老、李凡夫，都插言了。这种会议绝对没有记录的，是秘密会议。最后决定，这些人的罪状，还得重新研究，罪名还得重新落实。一些人，这次不应该杀的，就不杀了。

×××怎么解释呢，用现在的说法是他们没有秀才，没有笔杆子。一句话，没有整理材料的人！天老爷，你们那里没有会整理材料的人，你们就可以罪状不明地杀一百多人吗？

李凡夫说，你们没有笔杆子，怎么不找我们呢？我以宣传部的名义，找一百人、两百人都找得出来。南下那么多，那么多大学地下党的，找一点人还办不到吗？

这样谈了后，叶帅最后说，既然这件事是报馆反映的，就由报馆出人吧。

这个会就搞到晚上两三点。回到报馆，我把经过讲了。我讲要我们报馆组织一个组到有关部门帮助他们整理材料，其实是复核材料。我说，会上建议，由杨奇同志带人去。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杨奇带了政

法组的组长成幼殊等人去了。

第二天，李凡夫召集全市有关方面的干部开会，发动、准备控诉会。尤其是青委在几个大学要开大会。这一套是必须有的，要不然，糊里糊涂杀一百多，像什么话！

第三天，我就动身到北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去了。解放后叫第一次宣传会议，跟组织工作会议同时开。我带队，规模很大，广东几个地委，几个市委，还有海南岛的二三十个人。我早跟方方讲，应该是李凡夫去，方说，留下主持工作更重要。

这次宣传会议开得一塌糊涂，由胡乔木主持，开了两个星期。许多广东地下党的同志第一次出广东，想转一转。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发出邀请，在上海住几天，经过杭州，拐个弯回广州。这样一来，三四个星期个把月就去掉了。

回广州当天晚上，想找杨奇和成幼殊问情况，但是，他们还在监狱里工作。这时，我才知道，他们整理材料是在监狱里。他们回来后，我问了问情况。我说，你们也坐了监呀！他们在监狱里整理，我很吃惊。他们说，不是在监狱里，是在监狱的办公室里。当时没有什么法律，这是法院的事情，但根本没有法院参与。

又过了个把月。有些上海调查，有些北京调查，准备了几个版的材料，开了一些会，大学、青年团、妇联、工会等统统动员起来，各阶层都准备好了后，执行。毛主席要求的就是大张旗鼓，全民动员呀！我们有此点理由，才敢说话。

成幼殊现在在北京。这几年为这个事，我跟她谈过几次。我问她，提出疑问的多不多呀？她说，不太多，变化并不大。我又问她，教育厅长究竟枪毙了没有？她的印象是枪毙了。她说教育厅长站在卡车里，尿裤子。现在看来，既然是从香港回来的，就是特务头子，我们也不能枪毙。就是戴笠公开回来，也不能枪毙。他是公开回来的。成幼殊告诉我，变化并不大，减少了两三个人。他们就是把罪状写得具体、清楚一些。从头调查根本办不到了。现在杨奇还在广州，成幼殊在北京，我敢造谣吗？

这件事对我来讲，看起来当时是有点胆大包天。当时我是拼了，看怎么处理吧，总之我不能也无权照这样签字付印。一切都决定于叶帅的当机立断，能够在听了我的简单报告后立即召集会议。这件事，我这一生非常感激叶帅。关键是叶帅最后讲的话重要：刀把子究竟是掌握在党委手里，还是掌握在你们保卫部门手里。当时叫“保卫”，现在有些地方还叫“保卫”。但现在的保卫跟过去的不太一样，什么偷呀，都归它管，它过去是管捉（抓）人、杀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的时候，×××公开出面，差一点把我捉起来，比这个紧张多了，简直就是小说。

65 侨乡调查：这么多楼房是侨汇建起的，不应该侵犯它们

一九五一年初夏，还不太热的时候，我随同赵紫阳去做了一次侨乡调查。叶帅、方方两个人知道我在华北乡下待过几年。叶帅知道，我跟着张闻天、跟着康生下乡几年。这时，赵紫阳已经从河南调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当秘书长。为什么要调他呢？上面要加强土地改革，他是老根据地出来的，搞过土地改革。

华南分局组织到梁启超的家乡新会等县去调查，主要是看看侨属多的地方土改怎么办。这个县华侨多，很富裕。我们一共十来个人，赵紫阳领队。我当时的身份是宣传部副部长，就叫副领队。在新会调查什么？唯一的任务是调查侨属财产，主要是房产。这个问题比较麻烦，一般都知道，侨属是靠海外劳动汇钱回来生活的。中国的人传统，汇钱回来买土地，修房子，建祠堂，绝大多数是先修房子。侨乡的房子是假西式，基本上是两三层楼，加上一些钢筋水泥，不土不洋，不中不西。

赵紫阳住在新会县委，我完全到村里。根据我的经验，汇报我是不相信的。我在华北十一年，有三年根本就在农村，而且这个农村还不是一般的，就是在农户里，调查过陕、晋、冀、鲁四省。所以，农村的事，要骗我，不那么容易，我是知道点稼穑之艰难的。

在新会农村，我发现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新会的农村基本空了，相当好的房子都空在那里，财产早就转移了。但是，留下的老百姓很穷，生活很苦。我们还是吃派饭，吃的是很粗糙的红米饭。吃什么菜呢？基本上没有菜，有时在碗里蒸几块木瓜当菜。绿苍蝇就在上面爬，

怎么敢吃，吃了是要生病的呀。调查的结果，这些村庄——广东人把一个村庄叫一条村——水泥石头路很宽，有点半西化，楼房很多，这些楼房基本上是华侨的血汗钱拿回来修建的，不是剥削当地贫雇农民的。

结论很清楚，回来报告，肯定这些楼房是侨汇建起的，不是剥削地租，不是高利贷建起来的，因此，就不应该没收它们。这个调查是叶剑英、方方主持的，这时陶铸还未调去。

但是，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的情况完全变了。这个方面，我就对陶铸有点看法了。这时，叶帅走了，方方受处分，调到北京任侨委副主任，陶铸以第四书记的身份主持一切，赵紫阳协助他。赵紫阳指挥日常工作更多。上面催得太紧，为了满足贫雇农，统统动了，统统没收了，分配了。后来，广东侨乡的房产问题，我问了好几个人，说一直拖着，不知道怎么办，要赔吧，又不知道怎么个赔法。现在，新房子比那些旧房子还漂亮，这个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这个事情做得很不对。赵紫阳是能干，但不能因为赵紫阳改革开放有功，就歌颂他的一切。事情对归对，错归错。陶铸我也佩服，他也看重我，但是，他们在土改问题上，在反地方主义上，是有错误的。

反地方主义，就是反本地干部。广东这个地方的干部，没有什么地方主义。广东人根本上是开放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到处找饭吃的。南洋也要去，欧洲也要去，上海也要去，沈阳也要去，连我们四川小县也要去。我们县就有两种店：北京人开的，广东人开的。比较大的县，都有这两种。北京人的店，叫“京货店”，卖的东西都是老式的，特点是一般人进去，出不来。什么道理呢，太客气了，茶呀，烟呀，弄得你非买点东西不可。广东人开的叫“广货店”，海产品多，草帽、手杖等，洋气一点。

反地方主义，连古大存都反进去了。古大存哪里是本地干部，他在延安待了那么多年，任党校一部主任，是从东北带领干部南下的。几次反地方主义，越来越厉害，到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把当地的干部大多打倒了。一九五八年还在反地方主义，还在反古大存，莫名其妙。什么地方主义，广东连个影子都没有。从来就是无中生有，完全是胡搞，不知上面为什么要这样做。

侨乡土改那样做，反地方主义那么厉害，大错特错。这两件事是百分之百的错误。陶铸负主要责任，赵紫阳负次要责任。当然，他们主要也是执行。

66 云浮县土改：改变死命令；小老婆、丫头等问题我决定妥协处理

一九五二年春天，二月到三月，正式搞土改，云浮县成为一个试点县。我带一个文教宣传干部队，成员有中山大学的，有文联的，有各级宣传部的，还有岭南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共似乎有四百多人。其中有画家关山月、阳太阳，作家杜埃、陈残云、韩伯屏等。

云浮是山区，当时穷得不得了。县城有几百家人吧，房子破得很，有一两家小饭馆，很不像样。现在是富得不得了了，高楼林立，因为产一种大理石，即云石，外资多得很。当时看见过这些大理石，不当回事，思想不开放，觉得这些石头在深山里没有什么大用处。

到了县里后，分几个区把干部分下去。县委书记是个南下干部，姓赵，抗战期间久经锻炼的，山东人，已在东北做过县长，老实得很，非常好。我还留下了华南革大的一个部主任。他好像是冀中人，搞过土改，姓王，名已记不得了。我们三个人，对农村都不生疏，在县城里做指挥，一般白天是要到乡下二三十里地方去。大队伍几百人统统分到几个区，有的还要翻大山。县长是一个本地干部，未参与土改。

我们决定把著名国画大师关山月留在县里，要他当县人民法庭庭长。因为他名声太大，下去万一碰到土匪出事，交不了账，留下来，保护他。

县里有一个县大队，九十来人也是拼拼凑凑的。县大队本身就不可靠，有些是旧警察，有些是临时编成的，弄不清楚是怎么组成的。不是我们的老游击队，根本不敢相信。我们把县大队分成三部分，三分之一在县城东部一个重要的地方，三分之一在另外一个中心，县里留三分之一，三十几个人。县里还有个监狱，关有一百多个人。监狱里边的人，不知道我们演的是空城计，根本没有武装，而且留在县里的那三十几个人，我们还不大掌握得住。但我们也不是很担心，因为大军南下后的形

势太壮，坏人一时不敢动。

广东有种脚踏车，人坐在上面，郊区一二十里、二三十里，他可以送你去。但坐这种脚踏车，吓死人。一边是山，一边是水，骑得又快。有一次过很窄的桥，我说我下来，蹬脚踏车的人说，你不要动。这些蹬脚踏车的人有本事，我没有听说有人掉到水里。我经常下去，乘出租脚踏车来去。

晚上就回到县里集中开会。当时穷到什么程度呢，饭嘛，给我们三个人留起来，跑了一天，想喝一点酒，每个人凑，这个人凑两百块，那个人凑三百块，就是两毛三毛钱，买半斤酒。广东菜好，酒根本不行，酒叫“双蒸”，一点酒味都没有。当时生活很苦。我们这个作风，如能保持下来，不说保持全部，能适当地保持，以后的情况都不可能发生。

当时土改的工作方法，上面有规定。这个规定主要是刘少奇和中南局的邓子恢他们坚持的。邓老尤其坚持，叫“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即下去后，专门找一家“苦大仇深”的孤老人家慢慢了解情况，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刘少奇坚持到最后，王光美也讲“扎根串联”。我是根本反对这种方法的。我下去看过多次，冷冷清清。牛角尖钻了两个月，什么也没有了解到，这叫莫名其妙。说实话，最高层的领导没有怎么接触过下层，设想的这一套是太主观了，是过时的。照这一套做，三四个月毫无结果。

我们开了各个区的领导的会。我听来听去，都是这个情况，工作没有什么进展。工作队到了村庄里，最怕接近群众，都是找孤苦老太婆，给她做饭、挑水，搞了个把两个月，没有结果，而且变成我们工作队自己变得偷偷摸摸，出门怕“狗腿子”看见，怕见老百姓了。去访贫问苦，还得左右看看，有没有流氓地痞跟踪。我跟县里两个人商量，我说要从根本上推翻这种工作方式，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肯定这个工作方式是错误的。我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山西、河北、山东均这么试过，全不对。如果照这样做，我们的土地改革要搞好几年。我说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进村庄，要大张旗鼓，召集群众大会，号召“五类分子”登记——三青团支队长以上的、国民党的区党部书记以上的人等登记，而且公开宣传，我们土改要进行到底，宣布纪律，不准破

坏，破坏我们就要镇压等等。我们胆子要壮起来，自己要站起来，不是我们要偷偷摸摸，而是要吓倒对立面。政权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公安在我们手里，我们自己怎么去钻牛角尖？怕见群众？

他们几个干部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开一个干部大会，至少抽三分之一的队员回来开会，改换思想。全部抽回来，不可能。会上，我就讲这一套。工作方法彻底改变，从守势改为攻势。我们是居高临下，现在不是我们怕什么流氓地痞土匪，怕什么地主狗腿子，而是要让他们怕我们。必须做到这点。一个工作队，或者一个大村庄，要配一个“小公安局长”，让一个胆大的、高高大大的、身强力壮的人来做。一天到晚专门到曾经当过土匪的，可能是狗腿子的，可能是坏人的家里钻来钻去，主动找他们，叫他们心里紧张，叫他们出门活动时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跟着。我们不是做地下工作，怎么非用地下工作的方式不可呢？这样的“扎根串联”，是自捆手脚，要串到何年？必须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要他们怕我们。

我当机立断，公开提出一个小工作队要有个小公安局长。群众怕什么？怕变天，怕国民党打回来。我们就公开把这个讲清楚，国民党变不了天，回不来了，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有一个台湾了，他回不来了。你自己偷偷摸摸，本身就是怕“变天”的样子，怎么行呢？我做了一个百多人的报告，斩钉截铁，不搞冷冷清清，得到了百分之百的热烈赞成。

搞了一个多月后，发现有几个社会问题很难解决。

一个是农村里的“小老婆”问题。有些中农、贫农都有小老婆。怪不怪？广东经济相对于穷山区来讲发达一些。湖南、江西南部地区天旱的时候，有大量的少女、少妇逃荒到广东，她们也不想回去了，回去就要饿死。只要饿不死，就留在这里，做中农或者贫农的小老婆。多少年来就这样。

还有“丫头”问题。同样的，有些中农、贫农家有丫头。丫头也是解放前逃荒出来的。这个地方饿不死，总比回去好。

还有群众性的土匪问题。有些地方，一个村庄多数人当过土匪。这

不奇怪。华北、冀中也有这种现象。云浮这个地方穷，南面全是山，北面靠近西江，就在西江边上。西江边上的一些村庄的人集体去抢西江上的大货船。他们的小船钻来钻去，跑到大货船上，也不弄死人，只要抢到钱、抢到货就走了。这些村庄里谁是土匪呀，大多参加过，妇女、小孩也参加过，靠在江边一带的穷人都是这样的。

这一大堆问题，按照规定，小老婆要取消，丫头要解放，当过土匪的，要自首、忏悔，不然就要问罪。当时的同志都觉得这些问题太多，没有办法解决。但共产党搞土地改革，看见小老婆、丫头，看见抢过人的，放过呀，说不通。不放过，怎么解决？

这种情况下，逼得我拿主意。我说小老婆取消的话，早上把她解放了，中午她到哪里吃饭？难道我们工作队有能力给她开饭？丫头也一样，早上把她解放了，中午就没有地方吃饭了。至于土匪的问题，既是群众性的问题，调查完了，可以公开把这个问题摊出来。对那些做得过分的人，要他们检讨一下。只要没有血债，没有杀人，就不多追究了。法不责众，老太婆、小孩子都参加过搬东西，怎么斗？谁斗谁呀！你斗我，我斗你吗？

但是，我一个人不能决定。云浮县属于肇庆地委——包拯在肇庆当过知府，当时叫“端州府”。地委书记叫梁嘉，大概是广州“一二·九”运动出来的大学生，很优秀，能力很强。从行政方面来看，我这个华南分局宣传部的副部长，职位大概跟他差不多，但是，假如把我放下去的话，绝对不让我当地委书记，最多让我在地委当个宣传部长，挂个地委常委的名。我去地委，当时很困难，路况很坏，还有土匪，县城里好像都没有电话。肇庆派吉普车来，还派两个警卫员。一般的枪还不行，要卡宾枪，能乒乒连发的。一路上，我们没有遇到土匪。

我去肇庆地委汇报。我说，我们集体研究的结果，对小老婆、丫头，原则上不告不理，本人没有坚决要求离开的，不处理，也处理不了。一个村子，有一些人，当天就没有饭吃。梁嘉说，老曾同志，你说的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我们本地干部明知道只能妥协，但是不敢提出来，搞得不好，党籍都会给你搞掉，说你是右倾投降主义，阶级异己分子，跟封建势力妥协！你就方便了，你可以提这个意见。我当然同意

你这个做法。现在就好办了，这样一来，就是我们商量过的。他高兴得很，又派车送我回去。

照我们商量的一传达，问题解决了。所以，不了解情况，没有胆量的话，像云浮县，如果强制要“扎根串联”，半年都没有动静。你要解放丫头吗？你要解放小老婆吗？全部社会将会搞得稀烂。

正好这时，我接到电报，让我回去广州，我们的《南方日报》已被打出了十来只“老虎”，叫我赶快回去“打老虎”。

67 紧急开支部大会，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流眼泪。我绝不相信有半个“老虎”

一九五二年春天，广州开始大规模的“三反”运动。“五反”在前一年就搞过了，现在是搞“三反”。“三反”就是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进城后党政机关的人，统统要参加这个运动。这个运动是怎么起来的，为什么一下子就这么突出，而且以反贪污为重点，我弄不清楚。我在云浮县搞土改，县委书记同我们连喝一口酒的钱也没有，“贪”什么呢？《南方日报》已被定为重点反贪污的机构。《南方日报》算经济机构，报纸十多万份，还有广告，进进出出的钱不算少。当时有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之分。一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千万元以上的，叫中老虎，百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一千、一百元吧。

派到我们单位打老虎的队长是××，老同志，监狱出来的，当时华南党领导机构的副秘书长。××一来，大大小小，几天就打出了十几个老虎，包括副社长杨奇在内。《南方日报》横着通栏登出来的，字有鸽子蛋那么大，说杨奇是大老虎。十几个老虎被关在《南方日报》的老虎洞里。所谓老虎洞，就是找一间大房子，把他们集中起来。当时还没有“牛棚”这个名字。

当时一个电报，叫我立刻放下手中的土改回广州。我回广州后，原来的打虎队队长××当天就走了。他说，你来了，是你的事了。我看见报纸还在出，但很多部门的头头，都成老虎了。

当天晚上我请求开了一个党支部大会，我建议杨奇同志出席。但支部大会的目的，是要我出来表个态，狠狠骂他们一通，警告他们一通。结果我站起来几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流眼泪。因为我根本不相信——我绝不相信这里边有一个会是老虎。昨日捐躯者，今日尽贪污。可能吗？最后我说，我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讲，建议今天晚上这个会不要开了，散会。这是绝对真实的，现在活着的人还有一些。就是说，我在接受打老虎的时候，根本没有打。为什么我敢这么做呢？第一，上级对我绝对相信，第二，我是兼分局“三反”五人委员会的委员，当然是挂名的。我们这个单位，我有全权。

我每天都要经过“老虎洞”门口。我想，这些同志，他们经历的斗争有些比我复杂，经过的考验比我多，即使有些资格没有我老，晚一点，但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都是提着脑袋干的，进城才一年多，会去贪污十万八万，即今天的几千几百，去出卖自己吗？绝没有这个可能。将心比心，像杨奇，十年前在东江游击队那么打来打去，跑来跑去，是不要命的。进城一年把，就会去贪污你那几个钱？提着脑袋干了那么多年，就不算数了？不能说一个人提着脑袋干了一二十年，进城一两天就变成贪污犯，世界上哪有这个可能呢？

我回报馆就放下了此事，根本不提了。上面绝对不来检查的。我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拖。老运动员，各种运动都遇到过，知道闹闹闹，办得到你就拖拖拖，几个月后，这个事就没有了。因为我能够肯定，这里边半个老虎都没有。上面不过问，下面不会催。大家都知道，统统是假的。

我这个打虎司令，人家打出来的一大堆老虎，我只好摆在那个地方，没有再丝毫过问。我今天讲，并不是以此为满足，以此为骄傲，根据当时的情况，我是完全可以到他们的房子里去看望他们的，因为我心里明知道他们不是什么老虎。以我当时的情况，我即使看过他们，也没有人去报告的。杨奇这个人，工作能力强得不得了，很有威信，大家都拥护他。大家都知道，我在政治上硬撑着，干事情是靠他。我当时虽然没有火上加油，但是，我应该到那个房子里边去看看他们。我经常走那里过，看见他们憔悴不堪的样子，我没有进去。就是说，我还没有胆量，我这个正义心有限得很。今天想起来，我内心很惭愧。其实全放他

们回本职，静待审查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但我当时不敢，从良心上说起来，我是大有亏欠的。

我这个人不是一个耍笔杆子的人，我最适合的工作是做法官，做个小法官也可以，在县法院做都可以，我决不会冤枉人。自己在延安被“抢救”，那个滋味尝够了。

到了秋天，开了个大规模的一万多人的平反大会，宣布对杨奇和罗明“宽大处理”。其实是平反，不便说。这两个人，在市里边应该算是名流了。杨奇是《南方日报》的副社长。罗明是什么人？就是中央苏区反对“罗明路线”的代表人，而他是正确的。把他们打成老虎时，都用大黑体的字头版头条登报了，宣布平反，照样用大黑体横着通栏大标题登报。所谓宽大处理，事实上是不便公开讲根本没有这回事，暗示他们两个是被弄错了。这真是吃饱了没有事干，把自己可靠的老干部一会儿打成“反革命”，一会儿说是“大老虎”，一会儿又说不是。我们自己整自己，太下得起手了，一下子一个单位顷刻之间就有十几条老虎。

68 我这个错误不讲，人家不知道：戏改

六七十年了，没有人来算账。但怕就怕这样，只知道怎么当官，怎么得意，错误不讲，那是会死了也闭不了眼睛的。

一九五二年秋天，也就是调我到华南分局宣传部当副部长“坐堂医生”时，发动了一次粤剧改革。我的天老爷，那真是不知轻重。当时有几个老同志，有三八式地下党搞文化戏剧工作的，在乡下土改时天天在一起。他们说粤剧非常庸俗，如果不改，不行。主要谈了这几点。一是人物变化随便，同一个角色，演得不一样，这样，艺术性就很难提高。二是粤剧服装变化大，而且乱七八糟。他们举例子说，粤剧有一种服装，放了很多电灯泡，不伦不类。三是语言。总之简单地说，粤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港澳的影响太深，商业化色彩太重。

要改革，怎么改呢？首先剧本要定型化，不要同样一个剧本，同样一个人物，每次演都不一样。此外，粤剧讲究排场，热闹得不得了，很多人物出来，服装穿得很讲究，但内容不太多。因为靠近香港，粤剧自然港化，讲究灯光、布景，有些地方话剧化，不中不西，不洋不土，这

些也要改。语言也半殖民地化，不是纯粹中国的，也要改，还是要讲纯中国的语言，像京戏一样。所谓改革的意思，说穿了，就是把被认为是半殖民地化的东西去掉，完全变成中国式的，最好向中国其他戏，主要是京戏靠拢。

当时南下的干部也看不习惯，主要是地下党有些搞戏剧的同志要求改。这些粤剧改革的话，我是听进去了。于是我找了一些同志，在宣传部座谈了三四次，通过了我的发言提纲，然后我到戏院作报告，许多著名的演员、编剧等都参加了。当然，报告主要强调爱国思想，不要受殖民地的坏影响。这个旗帜举起来没有错。我这个报告在《南方日报》摘登了大半版。

这件事，错误有这样几方面。一个旧戏怎么改革，我又没有研究过，旧戏容易改吗？一个戏剧形成了，改革很难。像京剧的那一套，川剧的那一套，大改不了。“戏剧改革”这个名词，这种说法对不对？很难说。你觉得不好，你是从政府宣传需要角度出发的。戏剧改革，不是你上面下个命令就能改的。要改，要得到编剧、演员等的同意，要他们自己有要求，而不是你作什么报告。你作报告，他可以奉命来听，但他可以不买你的账呀。对我来说，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这个行动很孟浪。第二，在党内搞文艺、搞宣传的干部还没有统一思想，改革的内容没有认真反复地讨论研究过，就听了几个人的意见采取了行动，显然偏听偏信。首先内部的步调就不一致。党内那么多文艺干部，在广州一百多个人总有吧，我无非是找十来个座谈，而且这个事，不仅仅是文艺的事，还包括宣传。宣传干部的思想还没有统一，我就去做这件事，在行动上，就是一种胡来。现在悔之晚矣。第三，这个戏剧改革运动，需要报党委，需要得到党委的同意。没有得到华南党委领导的同意，把一两百人叫来开了会。

改了半天，也没有改出个名堂。这个事，倒没有坚持搞下去，以后我就慢慢不谈了，偃旗息鼓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表达下面的几层意思：对当时粤剧界的演员，表示一种深深的歉意。他们的名字我还记得几个：罗品超，吕玉郎，郎君玉……虽然他们大部分都不在人世了，我还是表示一种告罪。虽然领导没有要我检查，我现在要自己检查。没有领导的具体批准，在组织纪律上也是错误的。当时不知道轻重，不知道

戏剧这个东西是老百姓几十年天天接触的，别的东西容易动，戏很难动。其他的事，我还没有自作主张干过、乱来过。这件事，我不讲，人家不会讲，人家不会把一九五二年的报纸翻出来讲。所以现在自己讲，不要人死了后别人说，他在那里胡搞呀！这个事，是有点胡搞，做错了。我不求原谅，只承认错误。

69 对香港有关事务问题的建议，对大学问题的建议

我做《南方日报》的负责人时，华南分局每个星期开一次会，有二三十个人，现在看来叫高干会、扩大会，我提了一些意见。我很知趣，我一看，人家都是一九二几年的老干部，不太好发言。我呢，往往在下面写一个纸条，递给方方，几十个字。方方很和蔼。

当时香港报纸天天看，知道情况。解放时期，香港左派不断发动捐助内地运动。我提过这样的意见，我说，从现在起，不要在香港发动任何募捐运动了。我说，过去我们在打仗，有困难，现在全国解放了，那点点钱对我们有什么用？这个运动应该停止。反过来，香港天天大火灾，我们要派慰问团去，以群众团体的名义去，像工会之类的。虽然拿不出多少东西，至少去慰问一下，总是可以的。当时香港的棚户区经常发生火灾，后来知道，是地产商故意烧的，是想把棚户区的人赶走后，他们好建高楼。像这类意见，我提得多。我大体上从全国的局面去提出问题。这些问题，在叶帅、方方那里，一提就通过。他们忙，想不到。这些问题，本来一说就清楚，不说的话，还糊里糊涂干下去，干个七年八年的。

关于教育问题，我提了一些的建议，而且得到了实现。

一个是大学。大学我们不敢去摸。中山大学，那时谁懂？没有人懂，连叶帅自己都没有去跟中山大学见过面，讲过话，其他人谁敢去呀！中山大学是有名的大学，其他人去讲，讲什么呀。

一九五一年夏天，陆定一陪着苏联的尤金来广州参观，我们去迎接。尤金是被派来翻译毛选的，当时给他的礼遇高得不得了，住在过去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公馆里，一天三顿饭，除了陆定一陪，华南党委省政府负责干部轮流陪同。我分到陪一次早餐。我看到陆定一，便利用这

个机会向他讲了大学问题。他不是老早就注意大学问题了吗？还没有进城，就叫我调查教会大学，准备接管。我说，中山大学这么大，这么出名，解放这么久，没有人理过，谁都不敢去碰，不懂，也没有人去问。我说，大学都不拿过来怎么行，我们赶快抓起来。中山大学的校长许崇清，老留德学生，老教育家，是孙中山的朋友，不能动，任何人都不敢动，我们也不能动。但是，他年纪大了，我建议，冯乃超同志回来当副校长。冯乃超是创造社的，把鲁迅骂得一塌糊涂。冯是很老的党员，年轻时犯过“左”倾错误，早就改了。当时冯乃超在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当秘书长或副秘书长。我说，冯乃超是广东人，是理想的人选，党内的干部，只有他。他出名二十几年了，也是大名人。他来当副校长兼党委书记。中山大学不是张三李四能去的，只有冯乃超，几个条件都合适。

陆定一说，你这个想法不错。但陆定一回北京后，没有见动静。到了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叶帅调到北京去了，方方调到中央当侨委副主任了，陶铸以第四书记的身份全权主持华南一切工作。我有建议要找他单独谈。一天晚上，陶铸叫我去。他实在忙，吃晚饭的时候，抽时间叫我去。我说，我们现在要办正规教育，而不应该用全力去办什么“革大”（革命大学）了。办“革大”有什么用？过去办“革大”，到处发动群众参加军队，是为了打仗。现在是建设，再办这样的学校没有意思了。改造思想，三个月，几个报告就能改变思想吗？改不过来。我说，办“革大”是临时性的措施，这就是抗大、陕公呀，能一直办下去吗？我说，“革大”停办，改成师范大学，“革大”副院长陈维实，实际去负责。陈维实也是广东人，老延安，很有名。另外找一个当地有名的学者当校长。我说，我们连最著名的中学大学都摸不到边，还不敢去碰哩。我建议，今后我们要抓正规教育，从广州市来讲，先抓大学，再抓中学。因此，教育部门的干部都不能像从前那样安排，要当成很重要的干部来安排。

陶铸这个人爽快得很，能干得很。一听，说，对，就照你讲的办，你就去当教育厅长。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教育厅长不是杜老（杜国庠）吗？他说，杜老年纪大了，叫他一天到晚到处跑，不行。杜老我另外安排。省里有文教委员会，还有华南科学院，总之比现在教育厅长名誉地位要高得多，这是肯定的，这个你不要担心。他说，既然你提出了

这个问题，具体抓，就要你去，不变了。

很快，他就作了决定。“革大”停办。华南“革大”是全国办得最晚、停得最早的，成立了华南师院。当时房子不够，“革大”都是临时的干打垒房子。陈维实改任师范学院副院长，找了个著名的教授当院长。冯乃超也真的调到广州，当了几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调回北京。我当教育厅长，还正式走马上任。但是两三个月后，我就走不动，关节炎大发了。

教育厅长做了个把月，就是暑假，遇到了问题。中学生要考高中，但是根本没有那么多高中来接收，高中毕业的，更不能都进大学。没有几天，就示威。我没有办法，只好草拟个谈话，自己担起这个责任，要不，就是省政府，就是华南分局承担。谈话经过审查，公开发表。我说，全世界这样的情况都会有的，不是说所有的高中生毕业都能升大学，不是所有的初中生毕业都能升高中，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如果所有的初中生都能升高中，那要办多少高中才够呀，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公开表了态，登了报。不公开表态，怎么办呢？我来顶着，我想，无非示威更大一些，要接见的话，我就出来接见，无非还是讲这一套。当时虽然请愿了好几次，但讲了这些道理，事态没有太扩大。其实我这套办法是把问题推开，是打太极拳，即打官腔。

一九五三年三四月间，开全国第一次教育厅长工作会议，我代表广东教育厅参加。后来“反右”派时，人民出版社人事科长贴大字报，说曾彦修填的表，说他当过教育厅长，完全捏造。我也不去辩，运动一来，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说，你们去翻翻报纸，我正式发表过谈话，我参加过全国教育厅长会议，不但参加会议，钱俊瑞当时是教育部的副部长，还提到过我。算好，这些事，我不怕。我发现运动一来，除了不好说你是外国人外，其他全可胡说。

第十四章 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1954年4月—1956年12月）

70 调人民出版社工作，没有任何人跟我谈过话，我也没有问

一九五三年快到四月，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派了一个干部来辽宁鞍山市汤岗子疗养院。这个干部说，上面已经决定调你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了。我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对来的人也不认识。我说我现在属于广州，是请病假来的，病好一点，回广州是自然的。过了一个多星期，这个干部又来了，说，上面决定，你不能回广东了，直接到北京。我问，什么道理呢？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没有问题，胡乔木同志与陶铸同志已经达成协议，陶铸同意你到北京，不回广东了。既然这样，我就没有话说了。乔木同志是多年直接领导我的，我不敢违背。四月间，真的就是从汤岗子温泉疗养院直接到了北京。我的行李是人民出版社后来派人到广东取的。那时有什么行李可言呢，贱价买来的十几方普通端砚是没有了。很重，倒不是因为别的原因。旧书有一两个小书架。其他的，就是一个床垫，一个被子。

一九五四年四月，以中央的名义批转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的报告，其中第三项，是关于出书范围的。第三项说："为了推动科学研究工作，培养学术著作力量，对于学术著作应采取积极鼓励的方针。凡属经过认真研究，在某一方面说来有些价值的著作即应使其有适当出版的机会。……应当估计到中国目前的理论、学术研究的现有水平，不要要求过苛，特别是对待涉及当前政策的学术著作，标准可以放宽。"

从这点可以看出，上面已经感觉到人民出版社过去专门出版中央文件、出版苏联的东西有问题，要改变了。解放已经六年了，但整个出版工作停顿了六年，当时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停了，一个都没有。因此，按照这个批示的这条，要出版一些社会科学的著作了。后两年，党中央出了"双百"方针，如按照这一出版批示来看，这个意见两年前就有了，就是专对我们的决定。

我去干什么？就是执行这个批示，但没有人给我讲，我只看见这个文件。叫我到人民出版社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跟我谈过话，很怪的。我只记得是单位来催我去就职的。我住在西单一胡同内中宣部的小招待所。当时国家出版总署还在，大概一九五五年后就没有了，只存在了三四年。

我去做副社长兼副总编。原来有一个副社长兼副总编王子野。我这一去，上面大概觉得这些人是老延安人，去就去了，谁也没有介绍，也没有说明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我们就这样维持了几年。好在我们都是老延安，大家都是十二三年的根据地，互相都非常注意关系问题。如果两个人因为这件事闹矛盾，那就笑话了。在延安时，我住靠北的山沟，叫杨家岭，是党中央机关，王住靠南的那个山沟，叫王家坪，是中央军委机关。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在根据地那么多年，也不会闹权力问题的笑话。

但是形式上，我在前边。中宣部开会，出版署开会，是叫我去的，有什么事是通知我办。客观上，形成了我是第一。今年前几个月，一个老同志还说，明显是你在前边。我问他，会上讲过吗？支部内部传达过吗？谁讲过吗？他说是没有讲过，就是客观上大家这样认为。

总之，我们两个非常自爱，就怕出“关系”问题。我们能友好多年，不容易。后来，有趣得很，一九七九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王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偶然谈起过去的事。我说，人民出版社有没有社长，有没有总编辑呀，几十年都没有吗？他说，有呀。我问是谁，他说是胡绳。我问，什么时候是胡绳？他说，你在的时候就是胡绳。我说，没有人跟我讲过呀，你也没有跟我讲过。

我们这方面的组织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两人之间，既然上面没有谈，两个人也不谈，处得很好。

71 把一些浅薄低级的纯苏式教条的东西，想法用各种方式停止出版了

一九五四年，解放后就关了的商务书馆、中华书局此时还没有恢复。实际上，当时在北京，甚至在中国，只有三家出版社，一个是人民

出版社，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有个附属少儿出版社。当时每个省已经有个人民出版社，但它们一方面是印刷中央文件，一方面是出通俗读物，真正的出版工作基本上没有展开。

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个牌子出书。适合于哪个牌子，就用哪个牌子出。人民社本身就出文件，真正有点工作可做的，是用三联、世知的牌子出书。我几年间工作出的书，全部是用三联、世知的名义。

这三个出版机构合而为一，可以说星光灿烂，人才云集。人民出版社是解放区出来的干部多；三联书店，是由三家党领导的大出版社合在一起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人才似乎更多。这一来，人民出版社把社会科学的书全包了。

我去之前，人民出版社出的书范围很小，以出版马、恩、列、斯的著作，出版中苏的文件和中国领导人著作为主。还有个别人的东西可以进人民出版社：郭沫若、陈伯达、范文澜、胡绳、于光远。其他人不行。

我是讲过这样的话，这也是后来斗我右派的一个材料。我说，如果只出版中央文件的话，只设一个校对科就行了（按：解放前，校对工作附属于印刷厂），还要编辑部干什么？

人民出版社出了几年《苏联大百科全书》条目选译，即把苏联大百科全书某一条译过来，成一本小册子。我觉得这样出下去不大好。我刚去，说话不能随便。便找沈昌文。沈昌文当时是总编室的秘书，二十多岁，从上海进京的，懂一点俄文，跟我们一个办公室。当时什么副社长、副总编、秘书，都在一间房子里，五六个人，兼会议室。一天下午，没有人的时候，我说，小沈呀，大百科选译一次一条，算一本书，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出了好久了。我说，这不太好吧。如果自然科学方面的某一条，我们写不出来，出出可以，但是苏联的大百科全书多少万条，这样出下去，不太好看，你能不能去暗示一下，一般的，就不要了。就这样，这套书后来就没有再出了。

还有一次，一本俄文翻译的书《论契卡洛夫的经济观点》，二十几万字，清样已经出来，要我签字付印。我问沈昌文，小沈，你懂俄文，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契卡洛夫是苏联十九或十八世纪的二流哲学家，这本书就是论他的经济观点的。我问，这不是他们“副博士”的论文吗？他说，就是。我说，他们的大学毕业生可能找一个冷门，写出一篇一二十万字的论文出来，就得了个副博士。苏联当年的副博士，相当于我们的硕士。我说，既然是他们历史上的二三流哲学家，我们三五十年也不会有人去研究。何况这本书也还是这位哲学家的经济观点，这种书印出来，谁看？我们的教授不会看，大学生也不会看，谁也不会看。我的意思是不印了。当时作为一个副社长，要下点决心。但是，我不便在会议上谈。我通过沈昌文，向编辑传达这样的意思：全国无读者，不印了吧。其实正合大家之意。

我去以后，设法把这些离开学术的、片面引进苏联的书，利用各种非正式的方式停印了。这确实不太容易，你不能公开作报告，也不好在领导的会上讲。沈昌文在其中，对我这一套起了很大的作用。没有他在中间转圜，没有他懂得俄文，这些事都办不了。他可能没有估计到新来的这个人如此狗胆包天。

72 大请京派学者们吃饭，同时积极翻印一些有影响的旧书

我去后不久，开门请客，请学者们吃饭。在什么地方？一个是西四同和居，一个是宣武门的丰泽园，都是有名的教授们知道的地方。一次请两桌。请什么人呢？原则上就是请北大、师大的一些教授。当时大学已经合并了，清华变成了理科。人民大学当时也还有很多老教授，我们也请了。冯友兰、白寿彝、翁独健、罗尔纲、张政烺等人物都请了。当然侯外庐、翦伯赞他们更要请。我们就是把左派的，还有纯学术的人合在一起请。主人参加陪同的不多，我跟王子野两个，还加上一个熟悉这些教授的编辑。

有两个人想请，不敢请。一个沈从文，一个朱光潜。这两个人名气不是更大吗？沈从文，请不得，请了会得罪很多人，党内名流通不过。朱光潜也害怕，第一，说他观点反动，第二，我知道他好像还被聘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的名誉干事之类。其实这个是空名，社会上好多名人都

被排上了，纯粹是挂名的。我们知道他有学问，但他素来被左派骂得很厉害，抗日战争前就被大骂了，那个时候是请不得的。

我们请吃饭，就是两个目的。一方面确实就是对他们的尊敬、尊重。解放以后，他们就是受打击的。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全国大学教师思想改造，天天检讨，过不了关。当时社会上，还有上面的领导，还没有出现过要尊重学者的苗头，我们在全国是第一家，冒着比较大的风险，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胡适派的学者。另外一方面，他们出来一次，客观上总是有影响的。他们自己不会讲，也有可能慢慢就传开：人民出版社尊敬他们，敬请他们赴宴。

吃饭的时候，自然就请他们写书，请他们帮助扩大一些影响。我们这个行动就等于发宣言：我们不光是出马克思主义的书。

同时，为了立刻体现中央的批示，我们扩大出版了一些书。在方针问题方面，是提前执行了双百方针。

像出罗尔纲的书，把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出了一大堆，五六本。谁都知道罗尔纲是真正的胡适的嫡系学者，他在胡适家里住过几年，当过胡适秘书，私人关系好得很。但我的解释就是，罗尔纲这样的学者，全力研究太平天国，而且同情太平天国，在旧史学界中是带点叛逆性的。能像他这样，了不起。那时，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坚持这一点。当时我当然也是“农民战争”革命派。现在我的看法根本改变了，我绝不同意中国历史是农民战争推动前进的。这个观点真可谓错到极点。

当年我们搞审读，审读什么？就是政治审查。那些旧学者的东西，你说他句句都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呀，句句都符合阶级斗争呀，根本办不到，一个都没有。

当年，新的著作比较难找到。我们出了中山大学岑仲勉教授的存稿：《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当时是很有名的教授。还出了中大教授刘节的旧稿《古史考存》。还有北大有名的教授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篇重要论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一直到今天，我们说的长安规模大，如何系统、完整，万国来朝，

大体都是根据他的考证。还出了王锺翰的《清史杂考》。特别是陈寅恪的几本书，影响较大。出版这些书，当然带有千金市马骨之意。这些学者和这些书，在老左派及老党员，大约只有齐燕铭、范文澜、胡乔木几个人知道，他们不说话，就等于通过了。

还出版了陶菊隐的《北洋军阀时期史话》。陶菊隐是湖南人，新闻记者，看的东西很多。他自己投来的稿，很厚。我翻过后，觉得这个稿件是老先生搞的，认认真真的，字也写得工整。中宣部出版处的处长黎澍也是湖南人。我请求他，你们湖南老乡来了个这个稿，很厚的，可靠吗？他说，我认识陶菊隐，他在上海写了很多文章。他对北洋军阀确实研究过。黎澍说，你觉得有内容的话，可以出。后来，我们出了薄薄的八本。前不久，我看见此书又在湖南出版了，把“时期”两个字去掉，改成《北洋军阀史话》，这样符合习惯。

这样一来，等于做广告。这些书，都是用三联的牌子出的。

除了这些新书外，又重印了一些书。像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一段一段的考评，研究文物的。这本书好像敌伪时在北平出过。因为与抗日无关，敌人也没有干涉。听人家说，这个书很有内容，很有学问的人才能考证出来。我个人以为这就是燕昭王筑黄金台，以广招徕。

美国著名记者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是旧译本了，抗战前我看过，是列宁写的序。这本书在世界都很有名，是讲十月革命那一二十天的事。此书没有提到斯大林，所以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就禁了这本书。斯大林当政时，谁藏这书是要杀头的。里德后来恐怕算美共了。

还有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写的近三十万字的《列宁回忆录》。我知道这本书，也知道列宁夫人在列宁去世后受到斯大林的压制，她也反对斯大林，但斯大林不便杀她。

这类书，我要请示。请示谁？只有请示胡乔木。我知道，请示别人没有用，别人不一定知道，胡乔木三十年代一直在上海，对上海出书的情况了如指掌。有些书，像《震撼世界的十天》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斯大林都去世了，但又怕出问题。如果出问题，出在哪一关？就出在胡乔木这一关，别人不太熟悉这些事情。康生不熟悉，干别的事去了，陆定

一很早就进了中央苏区。那几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直到抗日战争上海的出版情况，他不一定很清楚。我请示胡乔木用什么办法？写一封简单的信，如果他同意，请他的秘书打个电话就行了。

当时，以三联书店名义出了《非洲内幕》，这是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写的。在抗战胜利到解放战争这三年期间，上海出了他的《亚洲内幕》《欧洲内幕》《拉丁美洲内幕》等。这个作者，过去看不起他，说他专门写内幕书，其实是我们翻译成“内幕”。中国人一看见“内幕”，价值就降低了。《非洲内幕》在我去人民社前就列入了选题。这本书现在也十分值得看。看了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非洲到现在还会这么乱，这么互杀不止了。

看了《非洲内幕》我才想起他的其他的书，反过来说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计划把他的一套“内幕”书全部翻译校订出版。正准备要印他的书时，“反右”运动一来，什么都完了。

73 权力能达到的地方，想办法开开窗户，透点新鲜空气

我去人民社不久，发动了一次调查，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国家重要社会科学书籍出版情况，列了五千本，书名，哪个出版社出的，哪一年出的，等等，最后做成备查的目录，印出了几千本。但是这个书，竟然没有起作用。当时很奇怪，没有什么人注意这些问题，都忙学习“文件”了。所以，中国自我封闭这么多年，要想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实在不那么多。我自己写了篇杂文，叫《论睁眼看世界》，发表在当时的《文艺报》上。“睁眼看世界”这几个字，来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对林则徐的评价。我说，我们现在就是对世界的情况太不了解，我们现在就需要林则徐的这种精神。其实现在更需要这种精神，中国人现在了解的世界，仍均是我们自己重新画出的世界。

所以，我去了人民社后，强调要了解世界的情况。你既然让我来做没有总编辑的副总编辑，天天只要我签字付印上面的决议，这不是纯粹成了一种无意义的工作了吗？商务书馆的王云五，你说他是资产阶级，但他做了多少工作，出了多少书呀。他不但翻译出版外国的书，还当后台大量整理出版了中国古籍。

一九五五年，中宣部叫我们编一本怪书：《国际右翼社会党》。一九五五年，英国工党的副领袖比万作为英国工党中的左派要来访问中国，一下子，抓瞎了。英国工党是怎么一回事呀，过去学苏联，骂别人是什么帝国主义走狗，骂了几十年，比法西斯还坏，对方是怎么回事，啥也不知道。这时，黎澍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里人才多，现在中央要这方面的书，你们在个把月内，交出一本三十万字的各国社会党介绍的书，特别是英国的。

我说，国际社会党，你要问外交部嘛，还有中联部嘛，中联部是负责联络各国党派的。黎澍说，他们写得出来，还会找到你们呀。我的天！这两个部竟然写不出来。过去骂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光是骂。我说，好吧，我们这里人才是多，商量商量，办得到就办，办不到就回话。

我找到另一副总编陈原商量。我说，既然讲明了，外交部、中联部写不出来，别的地方大概也写不出来，我们这里有哪几个人，临时凑凑，到各个图书馆去看看。于是就搞了一个小组，陈原抓，戴文葆负责，下面三四个人。他们真的在一个月内，印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名字就叫《国际右翼社会党》。“国际”，就是讲全世界。“右翼”是我们加的，必须加“右翼”，这是我们的规矩，就是“右派”的意思。

比万还是当时英国卫生部部长。后来我问，既然是第二把手了，怎么仅是个卫生部长呀。别人说，在英国，卫生部长很重要，有点像内政部长，什么都要管。

我谈这些为了什么呢，我在人民社的工作，主要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在我权力能达到的地方，想办法开开窗户，透一点新鲜空气，多依靠专家，不要整天只印我们的文件、决议，再加上苏联的文件。这样子，不像一个大国，不像一个独立的大国。根据地关闭了十几年，进城反而关得更紧，全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只是整天骂人，骂了半天，骂得又不像样子。所以，我的观点就是睁眼看世界。根据这个精神，首先是打开局面，比较放手，出版方面，不管对内对外，主要是开门。这个开门，不是大开门，小开门而已。不要把眼睛闭起来，睁开一点点也好。但在那时的中国，睁开一点都不行，睁开一点，就是右派。

第十五章 人民出版社的批胡适、批胡风

74 批胡适，经历了一段瞎忙。出的书，我一个字未看过

批胡适，批胡风，“内部肃反”，我是人民社五人小组组长。五人小组是做什么的？是审干的，“肃反”的。

批胡适是一九五四年的事。我到人民社不久，遇到批胡适。批胡适，我们完全是奉命行事。我们又不办报，不需要我们发表文章。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批胡适的文章，管你有理无理，赶快汇集印书。胡适这个人，我过去读过他的一些东西。我对他本人，是比较佩服的，他什么事情都要你拿出证据，这个没有错误。后来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说他主张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这句话，不是说历史应该这样说，他是讽刺一些搞历史研究的人，自己想怎么样写就怎么样写。但我们很多人，把他的意思完全反过来批，这是不对的，这不是他的本意。胡适的文章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到现在，有几个人比得上？所以，一批胡适，我就知道，全国的文科教授全完了。全国的文科教授，有哪一个与胡适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一部分很拥护，一部分拥护得少一点，但是没有敌对关系。胡适这个人，有些地方是有些浅薄，他曾经提出或赞成过“五鬼闹中华”之说，这个说法比较幼稚。“五鬼闹中华”是说中国落后是由“贫、病、愚、弱、私”这五个“鬼”闹的。这是中国落后这个病的表现，而不是病根。他把它作为一个原因，恐怕就不对了。

当时知道胡适这个人，从原则来讲是拥护蒋介石的，他的态度跟《大公报》一样，批评蒋介石批评得很厉害，但绝不主张推翻蒋介石。他们最关键的东西是“国家中心”。他们认为，中国要强大，要统一，只好依靠蒋介石。相对于其他军阀来讲，他们认为蒋介石算是最佳人选了，是矮子中挑高子的意思。

我们对批胡适这个事，消极应付。要我们出书，有电话通知。我们出了《胡适批判选集》，由一个生活书店的老编辑史枚负责选编。所谓选，就是选代表性人物的，从报纸上剪去付印，抄都来不及，等于出杂志，出周刊，一两个月，出了八本。我问过史枚，你看过没有？“哪能

呢。”他说。这八本书，恐怕不到全国批判胡适文章的百分之一，加起来，八百本都有，大家都是执行紧急命令。许多年后，有一次我写了一篇短文，说这八大本可能没有人看过，我一个字都没有看过。编辑这本书的人也没有看过。李慎之后来打电话说他看过。我说，你看过，你都看过吗？他说，看过三本。哪个人在那个时期有时间看？我想看过的人，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就是胡适本人。胡适说，凡是批判他的文字，他都要收集起来看。大陆的报刊，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他都看过。胡适为什么要如此，不得而知。

为什么要批胡适，要这样大干？大概认为国内所有的文史社会科学的老教授，都属于胡适派，只要把胡适打倒，才能树倒猢狲散了。大概是这样，不然，没有什么意义。批胡适经历了一段大闹，有一年左右。

75 反胡风，我们单位算是没有胡风分子

批胡风，大概一九五五年初夏就开始了。这个运动是暴风骤雨式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三批材料。我所知道的，这个运动从头至尾，是毛主席自己抓的。在批判胡适后，中宣部一两个星期要召开一次会，下面某些业务单位的负责人都要去。大学是清华、北大、人大、师大这四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去，不是校长；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这两个大单位的党委书记要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是我，人民文学出版社是王任叔（巴人），这个会有二三十个人。这个会没有名字，用现在的话叫“吹风会”。主要由周扬、陆定一讲一些情况。在这个会上，知道批胡风的问题，陆定一、周扬多次挨毛的批评。因为陆定一、周扬每次讲，都是讲毛对他们的批评。

三批材料，我以为只是一个催化剂。胡风，没有这个东西，也是要批判的。为什么是必然的？关键问题是胡风不赞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是关键，所以总要做他的文章。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不是有几把刀子之说吗？胡风挖苦毛的文艺讲话是“图腾”。这是要挑战毛的文艺理论。所以胡风必须彻底打倒。市面上有那么多书，似乎往往未抓住核心要点。

批胡风时，究竟是一点都不知道，还是知道了要这样做呢？比如绿

原与阿垅的问题，这两个人都被定为特务，但阿垅是把国民党的情报送来给中共的。至于绿原更妙。绿原解放后在中宣部工作，应该是非常信任的，怎么突然一下就变成中美战略情报所的特务了？一九八〇年开会，正好我们一个小组，我问过他。我说，绿原同志，怎么一回事，你怎么一下就变成特务了？他原原本本跟我讲了。他说，一九四四年，蒋经国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建立一个青年军，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青年军不是招收一般的青年，而是招收各个大学、各个高中的毕业生，而且很多是要求会讲英语的。当时美国援华的空军很多，要招大量的翻译——后来变成征用了。当时青年军，现在知道倒不是拉夫，而是各个大学的学生出于一片爱国心自愿去的，包括西南联大的学生。绿原当时在复旦，可能经过考试，被分配到中美战略情报合作所。这个单位，跟渣滓洞集中营没有关系。中美战略情报合作所在山沟的这边，渣滓洞在山沟的那边，两个单位，在一个山的两边。而中美战略情报合作所，已经是国民党跟外国合作的第三个了。之前是中苏所、中英所，都叫战略情报合作研究所，就是了解日本人，了解敌占区的情况，并不是对付共产党的。绿原被征用或考试录取后，给胡风写了一封信，说了他的情况。胡风毕竟是上层，知道一些政治情况，说，那地方去不得，是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去了就出不来，叫他跑。所以，绿原立刻跑到川北一个地方去教书了。这明明是胡风做的一件非常好的事，出主意让绿原快逃，但是后来说绿原成为中美战略情报所的特务，是胡风送去的，刚好百分之分地颠倒了，荒谬到了这种程度。胡风及他的追从者，一般都是非常有才能、非常聪明的人，但又都是有一些异常观点的人。

反胡风时，我对这些情况全不知道，我对胡风的印象倒是有些不太好。一是他的文章看不懂，太怪了。中国有三个“看不懂”，一个冯雪峰，一个侯外庐，一个胡风。这三个人，可以说是左翼里边名声大、地位高，但文章叫人看不懂的人。另外，胡风及他的追从者，在抗战期间对跟他们不在一起的左派的人，往往不看时间、不看当时的情况，批评左翼内部太尖锐。

看了三批材料，哪个不恨胡风？都是出自内心的。胡风原来你表面上是左派，实际是国民党特务。因此批判胡风，我是积极的。

这时，每个单位已经成立五人小组了。五人小组，又管批胡风，又管肃清胡风分子。我们单位，倒没有什么胡风分子问题。

我把胡风派的东西——有半尺高，除了小说，其他的都看了，苦得很，难读得很。我在单位作了一个动员大报告，这样的报告都要作的。后来我的报告两三万字整理出来，在《文艺报》很显著的地方分两期全文发表了。《文艺报》当时还是大的方形刊物。当时我用的笔名是“魏璧佳”。我还有一个笔名叫“肖时聪”，偶尔用，两个笔名的意思是“小时聪明”，“大未必佳”。这篇文章叫《关于胡风反革命理论活动的前前后后》。今天我不讲，没有人知道。死后被人揭发，就是污点了。

在陕北时，我对大后方的情况一直都是注意的。我没有离开中央的宣传系统，看报纸、杂志没有断过。对胡风的事，不详细，但了解一点。因此，在《关于胡风反革命理论活动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我把胡风及其朋友们在那个时候写的文章跟当时国共斗争的形势对照起来，提高说这些文章在客观上都是配合国民党进攻共产党的。胡风跟他的信徒，确实没有从正面写过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的文章，他们都是批评。我的文章联系形势，说胡风的理论配合国民党，进攻共产党。把胡风的理论当成政治活动，这就纯粹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结论了。

现在来看，我这篇文章在客观上找到点材料，是无限上纲。这样上纲，把胡风及其友人的理论活动变成反革命活动，不是什么左派内部的批评。对这个东西，我现在原则上全部收回。几十年，我再没有看过。

胡风和他的朋友在抗战期间的活动，是不是有些问题？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他确实对当时的客观形势照顾不够。而我认为，对同一阵线的朋友应该宽松一点。胡风和他的追随者，还是有点枪口似乎过于对内了。他和他的弟子，批评左翼的话非常尖刻。对内用的语言，太尖刻，太挖苦。他确实是比较孤立的。在三批材料发表之前，他就是孤立的，追随他的大多是一批抗日战争中期十几二十岁的青年。胡风和他的信仰者狭隘得很，不合他们的也被骂得一文不值，也是唯我独尊。

胡风在有的问题上，意见是对的，而延安却一直反对。比如在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上，他认为，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是两个概念。民间形式有些是非常封建落后的，灌输的是奴隶主义思想、忠君思想，讲因果

报应。这一点完全是对的。中国的民间形式没有宣传革命，对人民觉悟的提高，谈不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已经在批胡风这个东西了。当时青年人不可能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感觉胡风这个意见是对的。民族形式与民间形式，不能混为一谈。在这点上，胡风跟延安的矛盾很深。

第十六章 人民出版社的“内部肃反”

76 正式消除了对不少人的怀疑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内部肃反”，是延续反胡风运动下来的。上面可能感觉内部问题很严重，觉得共产党里确有许多国民党特务。这次运动的名字不太清楚，也没有大讲运动，有的叫“内部肃反”，有的叫“清理中内层”。中内层是哪些人呢，党内外的干部。我所遇到的，基本叫“内部肃反”，重点是整文艺界、学术界以及民主人士。

“内部肃反”，跟揭露胡风分子紧密连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一个十人小组，而不是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为什么陆是组长，罗反而是副组长呢？这是沿着反胡风下来的。反胡风就是陆定一出面领导的。

我还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组长，这是反胡风时候指定的，也没有副组长。我打电话请示了几次，说这样不太好，应该有个副组长，但上面始终不接受。

五人小组干什么？就是把人事科档案里边或者头脑里边被认为有问题的人全部过（清理）一遍。这个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我曾打电话问上级，五人小组为什么没有范用？我说，范用在出版界资格又老，影响又大，没有他不行呀。但上面说，你不要问了，这些事情，上级决定的。后来我才猜想到，他是地下党，属于要审查的范围，他也要受审查。“内部肃反”审查地下党，没有公开宣传过、号召过，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但实际上是这样做的。但像范用这样的老同志，政治上没有问题，所以也根本没有去怀疑他。

另外一点，是针对党外人士的。大学里有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的大学教师思想改造。这个改造把大学教师的祖宗三代都摸透了。但在机关里，对党外的进步人士，没有正式审查过，当时基本上认为是值得相信的，很受尊敬的。但是胡风运动一来，就提出了问题：党外人士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另外，旧社会留下的工作人员，当时称“留用人员”，解放后在政治上也没有经过普遍的审查。所以这一次，主要是针对

这些方面的人。这一次，上面没有号召大张旗鼓，也不发动群众乱斗。但“内部肃反”也是有比例的，大约也是百分之五左右。我要老实说一句话，人民出版社在此之前，在叶籁士、王子野二位领导下，本来就不“左”。而我任五人小组组长时，人事科汇报大小怀疑对象，大概至多十几个人。我觉得其中五个人关系重大。这些人最容易当成目标，因为一抓出来就是条大鱼，所以我自己审。“内部肃反”一直搞到一九五七年前的“反右”。

77 把上面抓得最紧的对戴文葆的怀疑彻底取消了

“肃反”时，我在单位听人事科汇报哪些人要审查，再分工哪个负责管哪几个人。我知道人事科知情不多，对人事科我不放权。

我们单位我本人抓此事，决不乱来。首先表现在对戴文葆同志的事情上。现在，戴文葆等于国家第一编辑了。过去江泽民在北戴河每年都要招待一些专家去休养两个星期，出版界就是戴文葆去。近两年，中央领导人春节看望各界人士，出版界就是戴文葆。当时我知道戴文葆能力特强，也特别尊重他。但“肃反”一来，几个方面指着我们说，你们那里有个国民党特务，你们怎么不抓呢？

有一次开政协会，陆定一把王子野叫起来说，你们那里有个国民党特务，你们怎么不管？王子野说，有这个传说，现在我们非常认真地在查这个人的材料，还没有查出来，没有什么根据。不久，我碰到一次，而且一模一样。在宣传部开会，陆定一把我叫起来，我又只好解释说，现在对戴文葆的传说很多，但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他有特务嫌疑，我们正在研究调查。如果确实是，要处理他。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反胡风的高潮过去了，进入“内部肃反”高潮。出版署的副署长跑到我们单位，对我和王子野讲，一个现成的活老虎你们都不捉（抓起来），是什么意思？我当然还是说，只是传说，没有材料，在重点审查。当时署长是胡愈之挂名。

为什么上面肯定戴文葆是个特务，批评我跟王子野两个人不管呢？戴文葆解放前在上海《大公报》工作，他自己讲历史上有段时间在国民党县政府工作。上海《大公报》的地下党分两派，一派说他是特务，另

一派说他不是。解放后，说他是特务那的一位调到中宣部，陆定一大概听到了，当然就传到出版署。我们人民社内部就没有这个传说。

后来，“肃反”第一个是戴文葆。五人小组分工，我说这个人我必须自己来。

其实戴文葆的事情一点也不复杂。他是苏北阜宁人。抗战初期苏北阜宁日本人还没有去，是国民党统治。当时的江南，日本已经占领了，阜宁在苏北，属于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新四军还没有去。戴文葆中学毕业后没有出路，考了个什么训练班。训练班完后，他被分配到阜宁县政府工作。阜宁县政府前挂了一个类似情报机构的牌子。干的全是敲诈老百姓的事。他吓坏了，感觉到这个机关不好，半夜雇了一条船逃到了南通，再从南通到上海。他是独自逃离阜宁的，没有凭据。但是天下的事妙就妙在后来我们拿到真凭实据了，真是无巧不成书。

戴文葆从上海走到重庆，没有钱，只有到国民党作为中国政府党在它统治地区为沦陷区青年逃离敌占区设立的招待所去住一晚，吃两餐。当时国民党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争取沦陷区的青年到自由区去（当时沦陷区人民把原国民政府管理的区域秘密地叫“自由区”）。相隔几十里的县，大路上都设有这样一个招待所。国民政府在抗战时做的这些工作，是件大好事，就像在全国设立十多个国立中学一样。招待所是由县三青团、县教育科联合组办的，所谓招待所，有几张空床，晚上有点黄米饭吃，第二天早上，有点黄米稀饭，吃了以后，你就走，下一站，也可以不花一分钱，甚至还可发一点路费，用现在的钱算，十块二十块，万一中午没地方吃饭，可以买点东西吃。这近于难民工作，有什么不对呢？

戴文葆到重庆后读复旦大学。解放后，在上海《大公报》工作。戴文葆非常老实，把这一段都写在自传里了。解放初，他在上海《大公报》，因讲了这段经历，就被一些人怀疑是特务。但另外有人认为，中学生小孩子找职业还不懂。国民党县政府为了摩登，搞了个情报机构的招牌，表示他是抗日，好看，那不是对付共产党的。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到苏北去。

我研究戴文葆的材料后，认为关键问题是他在阜宁县这几个月究竟做什么。我们派人事科副科长李西克去。之前因为公安部隔离我们的干

部张惠卿，我不知道，对他发过火，李小心一点了。李西克后来立了大功。第一次，没有调查到什么情况。十几岁的孩子，人家不知道。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呀。我说你还得去。公安局才掌握这些情况。你去仔细请教公安局。第二次，他去县公安局。公安局说，我们这里是有一封信，但信是怎么来的不知道，就是你们说的这个人写给他胞兄（？）的一封长信。信里讲县政府不好好抗日，他觉得不对，住下去危险，必须要偷偷离开。县公安局同意李西克把原信带回北京。我们打开一看，就是戴文葆的字。戴文葆的字工工整整的，几千字都是楷书。这封信，正是他十七八岁的字，还带点孩子气。我问，这个信要不要找司法鉴定？大家都说不要了，没有一个人认为有必要找司法鉴定。这个笔迹不可能是伪造的，错了我们负责。这下就清楚了。戴文葆连哥哥都不敢找，是半夜坐小船逃出来的，非常难能可贵。戴文葆的结论是我写的。一般人喜欢写这是历史问题，我说这个问题连历史问题都不要写，历史问题写上去，就没有完，任何运动来，都要清查。五人小组同意我的观点，就是一段个人经历。拖了这么多年，特别是陆定一把我和王子野都叫起来将了军，我们这次索性就担保到底，戴文葆没有任何问题。

这样，戴文葆的问题审查清楚了，什么问题都没有。所以李西克拿这个材料回来，我们都大吃一惊，天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如果李西克没有拿这个回来，多少还有点麻烦，可能会留个历史问题“尾巴”。

78 秘密监管张惠卿，我这个五人小组组长竟然全不知道

张惠卿是在日本占领上海时的地下党，是久经酷刑生死考验的，在我之后，接任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

一九五六年春夏之间，“肃反”运动已经进行了两三个月。有天“肃反”五人小组开会，我突然感觉张惠卿好像好久没见了。我说，怎么好久没看见张惠卿了？人事科长列席参加五人小组会，说，张惠卿已经被“隔离审查”了（当时没有这个词，此处是借用），关在单位一个小房间里。我一听，发火了，说，怎么我不知道？我是五人小组的组长，现在是专管这个事的，我都不知道。他说，李西克知道。李西克是人事科副科长，管保卫工作，跟公安部直接联系。我把李西克叫来问是怎么回事。李说，是公安部决定的。我再一次问，什么？他说，是公安部决定的，

要把他单独审查。我说，你为什么不报告我。他说，他们规定就是这样。我一下发火了，说，不像话！这不是“肃反”机关站在全党之上吗？当时苏联赫鲁晓夫已经暴露了斯大林时代“内务部”在全党之上。我说，中国也是这样吗？我这个五人小组的组长不是我自己当的，是上面指定的，怎么可以这样干？在一个机关，把人关起来，连负责领导“肃反”的人都不知道。哪一天把我抓起来，大家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五人小组，内部指定的，公安部直接来抓人你也不知道。

接下来怎么办？我叫李西克直接跟有关部门交涉，立刻解除隔离审查。

79 他是戴笠手下的特务吗

李××自己填表，重庆时期在某国际问题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工作过。于是，说他可能是戴笠军统。因为国民党军统局下面确有个国际问题研究所。

我说，我找他谈，他骗不了我的。戴笠下面那个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叫王芃生，是个大学者，国民党头号日本问题专家，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他是国民党驻日大使馆的参赞，但实际上大使馆他在负责，他才是管事情的。

一般的情报机关都有一些研究机构，情报机关出钱、出地方，聘请一些专家来研究，大体上都是从公开的报纸、杂志研究对方。这种研究机构的专家跟特务机关的特务是两回事，这些雇员、专家不是特务。周总理在延安给我们作过报告讲过。

我找了个很随便的时间，像聊天一样，对李××说，重庆时期你靠什么生活啊？李××是老前辈，据说参加过一九二八年的平江起义，留苏回来的，懂俄文。我说，听说你在重庆时期生活不太宽裕，你干什么啊？我说得好像不当回事，他也不当回事，说，我在国际问题研究所呀。我一听，就知道他不觉得他那个地方有问题。我说，你在什么国际问题研究所呀，所长不是王芃生吗？他说，哪里是呀，是王宠惠的呀。原来他去的地方是王宠惠为安置部属、部属的部属等而设立的机构。（或者不是王宠惠，是另一个老资格的什么大人物设立的什么机构。）

王宠惠在北洋军阀时期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法专家，当过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理。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前，是国民党外交部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就把郭泰祺调回来当外交部长，这个时期主要是对美的关系了。郭泰祺，现在对他的评价很高，说是老一辈职业爱国外交家。王宠惠下来后做什么呢？国民党是这样的，对这些地位很高的老前辈下来以后，都要安个位置，因人设机构，才能在财政部领钱。王宠惠被安排到国防最高委员会。国民党到了重庆后，南京政府那套机构都得去，去的人都得维持，其他地方撤退去的也一样，都得设很多机关发钱。像王宠惠，就叫他当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搞了一两百人，也不开会，但是有这个机构，就能向财政部要钱。王宠惠的朋友、学生一大堆，他的这一批人怎么办？他早就设立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一类的机构。蒋在南京时期，尤其是在重庆时期要为很多老前辈设立很多类似的委员会、研究所之类的机构，用以安置大量的、无业的各方面的人员。

我继续跟李××聊天。我问，那你们干什么呢？他说，重庆的官僚机构都一样：抽抽烟，看看报，躲躲警报，都是这三件事。

我跟他闲谈后弄清楚了，他根本不在军统王芃生的研究所。以后又调查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名字大体是一样，单位不同，不能张冠李戴。一般人只听说过军统下面有个国际问题研究所，但是，叫国际研究所的，除了它，还有其他的。李××所在的研究所，就是王宠惠养活他的一些门客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当然，王芃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里面的一些报刊研究者，也有雇员性的。战时，我们一些党员与进步人士进入英美情报研究机构不为稀奇。

这样，问题解决了。所以审查干部的事，我最愿意做，我天生负责，负责到底。

80 “虽然我因你而受到更厉害的批斗，但我从内心感激你”

钟远藩不是我负责审查的，是五人小组另外一个同志负责，但我最后给钟远藩留了麻烦。钟远藩是在一外文单位党籍被开除后调到人民社的。五人小组谭吐跟我商量怎么办，这开除对吗？我便一起负责审查。

钟远藩是广东人，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后在广东中山大学搞

救亡运动，是广东救亡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是从外文出版机构调到《人民民主与持久和平》这个刊物的。这个刊物当时是苏联控制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个刊物，中国每期要翻译出版。后来，这个刊物全部搬到人民社来了，我们代管。把这种机构放在我们单位，他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都归我们管，但我们管不了他们的业务。他们也不需要我们去管，他们唯一的任务是翻译。

钟远藩在外文出版机构是被开除党籍的。什么原因呢？当时，那个机构的主管某某是苏联回来的。在什么运动时，钟远藩对他提了点意见。在中国，下面的人对上面的领导人一般地提提意见，一般不会被开除党籍、说你是反党，但某某是苏联回来，就不行了。对我提意见，就是反党，开除党籍。

负责审查的同志问我，你看怎么办。我一看，这个处分没有边（根据）嘛，下级对上级提点意见，就要被开除党籍？五人小组一讨论，认为要改正才好。但这个问题比较麻烦，钟远藩跟我们不是一个系统，那个机构是国务院另外一个系统，要经过国务院国家党委转来转去。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怕麻烦，建议恢复党籍。但是，恢复钟远藩党籍的草稿写出来，还没有发出去，就“反右”了。这个草稿可能是我起草的，我签的名，就摆在他的档案里一辈子。他的问题没有解决。

“文革”后，钟远藩到美国去了——现在还在美国。前几年他回京，硬要来看我，他比我大几岁。我说，你来看我做什么，你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来看你。可他非来不可。他说，我可是来感激你的。我说，你感激什么呀，你的事情没有解决。他说，因为你，我在广东暨南大学被斗得特别厉害。我说，你被斗得特别厉害，还要感谢我呀。他说，斗我斗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们把档案袋里的东西拿出来公布，当众说，你们看，大右派曾彦修想给你恢复党籍。你不是老反革命是什么？这一斗，我才知道你是起草好了报告，还没有来得及向上级反映就被打成右派了。他非得来感谢不可。我说，我那是照正常工作做。他说，虽然我因此而受到更厉害的批斗，但从内心来说，我感激你。

81 “肃反”涉及的另外几个人

黄季芳，清华毕业，参加“民先”（是否已入党记不清了）。他在抗战中期，作为应聘或应该考的译员，赴印度英军司令部下设的宣传机构做翻译（大概是英译中）。而英美军中的这类公开宣传部门，它们的名字在中国人听来都很可怕。例如“战略情报局”之类，其实基本就是翻译或编他们对日及对盟国的宣传资料。美国的这类机构更大。不少地下党员、进步分子都被党或自己想法进去工作了。这与替美英当特务根本上是两回事。黄季芳早就讲过，这次无非是再讲一遍。我之所以一定要把他纳入我直接抓的名下，就是怕不懂的人对他不礼貌，乱问一气。我找他谈，当然也要问及历史，但也是带着向前辈学习、致敬的神态发问的。如问他这几年与清华同学于光远、黄秋耘是不是还有来往之类的。在有的地方，跟黄季芳情况一模一样的，却一直遭审查。解放初三年，在广州我就老听说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党员、漫画家（名字我记不得了，似乎是黄新波）就这样。

应××是东北军张学良的重要政治顾问，在西安事变中功劳很大，是周总理到西安时当晚参加欢迎周总理宴会的几个人之一。西安事变后，他潜住北京。日本投降前三个月，日本人在北京小胡同中把他抓起来了。他说鲍文樾可保他。鲍是张作霖的同伙之一，当时当了大汉奸，任伪河南省长。鲍出面保他。日本人的条件很简单，出来当官，放你；不当官，就杀你。结果要他当了三个月的河南省伪财政厅长。他这个人聪明得很，知道日本一投降，日本人就会杀他，他立即逃到冀中解放区。他不愿留下来，经过延安指令多给费用，他自愿到北平去。解放后，他到人民出版社是周总理办公室安排来的，别人没有这个权力，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肃反”一来，这些问题都要翻出来呀！有人主张追究。我说，恐怕不行，追不追究要问总理，所以事情便了了。真把事情弄去问总理，就是给周总理出难题。

还有一个我们管不了。周静同志，是个男同志，今年九十一二岁了，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他是潘汉年系统的，本身就打进了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他当过一个上海伪报纸的编辑，还在伪江苏省教育厅长家里工作过，这个厅长还派他到日本留学一年。公安部通知我们，这个人的事不要管，他们管。到现在我都弄不明白，潘汉年系统的人处理得那么严格，他却始终没有成为“肃反”对象。对这件事，公安部门处理是公平

的。

几十年后，我问过他，潘汉年都被抓起来了，你怎么没有事？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自己审的五个人。戴文葆、黄季芳、李××，另外两个好像没有这么突出，都没有事。不属于我负责的，我也管了，我举几个。

我们的总务科长是根据地来的，文化不高，但人非常好，工作踏实，负责得不得了。他写自传说，抗战初他杀过人。他是贫农家庭出身，家乡是邯郸附近平汉铁路西面靠近山地的一个地方，抗战初期十四五岁。

这么老实一个人，怎么会杀人？抗战初，日军南侵，全国一片大混乱。他在三不管的地方，地痞流氓厉害。每个村庄纷纷成立自卫队，二十四小时站岗，外村人进来，一般要杀。他们村也组织了自卫队，他也参加了。一次，一个人到他们村来偷东西，被抓住杀了。他在根据地时，就讲过这件事。

我找他谈，问清了当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当时自卫队之类极普遍，他也不是杀人犯。他这类问题，根据地时就很多，反复调查了几次，也没有任何证据，他的表现又这么好。所以，五人小组讨论，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就相信他本人的说法，在特殊的情况下，农村的小孩子没有饭吃，参加自卫队。不再作深究了，问题就这样解决。

另外一个是女同志。我一九五四年到人民社去，她先我半年到，当时二十几岁，能力很强，字也写得漂亮，我也很倚重她。当时人事科说她有问题。她填的表说自己参加过读书会。人事科说，据说这个读书会是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我说，这个同志爱面子超过其他人，样样都争强，现在向她提出问题，可能要出人命，我主张现在决不去谈此事，结果大家同意不谈。不说三青团的外围组织，三青团又怎么样？三青团，中央有政策规定，只要自己说明就行了。审查他人历史，要沉着冷静，千万不要风未来，雨就来了。明明没事，也会搞成暴风骤雨。

我强调，在运动高潮时去调查这么一个爱面子的好强的人，事情又

很轻微，没有必要，如果要调查，也要等这个运动过后。再说死了人，谁负责？

我这一生不学无术，无什么长处可言，但我一生对人负责，决不乱搞。我在当五人小组组长时，在审这些“叛徒”“特务”时，没有发现一个叛徒、特务，也没有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相反，是把一些人的问题、疑点，统统解决，即作了结论，不存在了。

但是大概半年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单位仍被抓了一个电工。这个电工很能干。我怎么发现的？因为他经常要来检查电路，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着他。我问，我们的电工哪里去了？说抓起来了。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说他是国民党交通警察总队的，是国民党保护铁路交通的特别警察。这种警察是训练得很严格。当时把它作为特务武装，现在不知如何看了。

第十七章 “反右派运动”兴起，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号《人民日报》社论之前吧

82 吹风会上听到陆定一、周扬传达毛主席不断批左的意见

“反右”是政治大运动，在我们国家是一个大转折，从“反右”，一直到把“四人帮”抓起来，二十年，中国人走的什么路？天天暴风骤雨，天天烈火雷鸣，世界无二。敌人几十百种：“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旧人员”，“右派分子”……人人几乎都可分入某个“分子”，几乎人人都可以划到某种“敌人”中去。“反右”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

反右派运动，正式兴起应该在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八号《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前，而不是在之后。“反右”前，中国当时处于什么形势，可以简单说一下。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二十大就把斯大林内部大规模滥杀无辜的事情暴露了一点，但绝对没有全部暴露。赫鲁晓夫讲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一点儿东西，他们连根本的几个重要人物提都不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布哈林是什么时候平反的？一九八九年。布哈林是最冤枉的。尽管如此，苏共二十大胆敢把斯大林本身不可侵犯的面具多少拉开了一点。哦，原来斯大林并不是那么神圣啊，他是乱杀人啊。尽管当时对乱杀人仍讳莫如深，但就是那么样，大家都很吃惊。为什么把跟列宁一起革命的领袖全杀掉了？五个元帅，斯大林杀掉了三个，中央政治局委员，除了自己，全杀了。这个情况和苏联整个国家的形势，我们极少数人知道了一点点。个别的人看到美国的《纽约时报》，传开一点。苏共二十大后，朱老总带回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在内部极少数人中传阅。我也正式得了一本，是小本子，办公厅直接发的。过了一两个月，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口头传达，这样慢慢传开了。虽然并没有在全党，或者老百姓中传达，但实际上全知道了——当然一般工人及农村老百姓还是不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部情况一时似乎有点缓和。这时，宣传部有一个会议，用现在的话叫“吹风会”，把北京一些文教系统党内的负责人一两个礼拜召去开一次会，这个会没有名字，就通知你去。四个大学：北大、清华、师大、

人民大学；还有文化部、教育部、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新闻方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出版界有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共有二十多个人。这个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大约是反胡风之前就开始的。情况紧呀，不断地传达毛的指示。

苏共二十大后，宣传部开吹风会，一般是陆定一和周扬讲话。一些事我们就知道一点了。比方说，毛主席在党内高层讲过，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不会发生，在英国、法国不会发生。这个话确实讲得很对。反过来说，只有在个人绝对独裁的国家才能发生。这可是“要害”啊！这就是说，个人独裁无法无天，没有制度管得住啊！

陆定一他们还传达过，毛主席不断讲，要扩大民主。比方说，我们的人大，是不是也可以开几个月？美国国会一开就是一年，英国国会天天开，几个人也开，没有人听，一个人照样讲，我们也开几个月行不行？不说一年十二个月都开会，我们开它几个月，开它半年，你国务院做你的事，让他批评，让他讲。

陆定一、周扬还传达，毛还提出来，大学的党委是不是可以考虑撤销？可以成立一个教授委员会，可以搞一个教授治校嘛。我绝对没有说假。现在，有许多问题死无对证。因为人多不在了，偏偏我没有死。像我这样年龄听见过这些的人，也快要辞世了。

陆定一自己当时对苏联的迷信，一下子降了下来。他对参加吹风会的人说，当时，苏联一九五几年的农产总量，还比不上沙俄时代的一九一四年。过去不是讲苏联集体农庄是天堂吗，但还不如最落后的沙皇时代。现在，据专家研究苏联的粮食产量，快垮台时，即一九九一年，还不如沙皇时代。是陆定一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们的，他可能早就知道，这时才漏了一点。当时，陆定一还说，中央决定，以后党史不由官方来写，由各方面的学者来写。这个话，更开放了。

所以，苏共二十大斯大林这个盖子揭开以后，中国自然而然就松一点。但中国情况特别，一方面松一点，另一方面知道松不得，反而是更紧多了。首先是一九五六年出了社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过了几个月，觉得不对，又出了一个《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一篇文章是谁写的？可能是陈伯达。这篇文章，对斯大林的

批评多少有一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胡乔木写的，收到他的书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就变调了，各方面强调专政的必要性，实质上，就是“批修”的开始，根本是维护斯大林的。毛主席也讲了，看斯大林要三七开。杀了那么多人，也三七开吗？十个人，杀对七个，杀错三个，也是三七开？历史证明，全是错的。

斯大林的“肃反”不是“扩大化”三个字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很多人还是这个态度，只准说斯大林“肃反”扩大化，再说下去，你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目前有发言权的，就是这么一个态度。人家都说全是假案，中国人还要坚持毛的说法：三七开。即使如此，也是骇人听闻，绝不许可的呀，错杀一人即是国家之耻、民族之耻、历史之耻，杀人一个都错不得，可以来个“三七开”吗？“三七开”就可一风吹了吗？

83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讲了些什么

关于反右派问题，已经有某些文章，还有专书。这个问题至今还是敏感的。所以我也不敢去谈，没有必要自找麻烦。我只是感到一点，讲这个问题的，大体上是从一九五七年四月发布整顿“三风”决定、发动“大鸣大放”说起。但据已公布的最权威的资料，最带有根本重要性的文章，似乎并未被怎么重视到。最高方面共有三次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及二十七日长篇工作布置性质的讲话，题目叫《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共三十三页，载《毛选》第五卷第330—362页，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4月第一版。我手边没有这本书，是临时借来的）。谁都知道，这种会议才是真正布置行动的会议。这些讲话是要在决定之后行动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最高方面在中共八大二中会上的讲话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的头上来了。”（《毛选》第五卷第323页）又说：“（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要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同上书，第326页）这十分明显地宣布了为什么

要整风：不是整自己，而是要整人呀！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第一句就是“要足够地估计成绩”；已经提名批了农业部长廖鲁言、河北省委副书记薛迅；已经把孔子与蒋介石同列为“反动派”，已经公开批评了舒芜的小文章《说“难免”》等（按：舒芜划右派就是因为此文）。下面，我只把汇集的若干段抄在这里，这些文章报告清清楚楚，错误是批评不得的。

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毛选》第五卷第331页）

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同上书，第331页）

我们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同上书，第331页）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曾按：《武训传》是在解放前开拍的）（同上书，第333页）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同上书，第334页）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同上书，第335页）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同上书，第336—337页）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

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同上书，第338页）

田里长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同上书，第339页）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同上书，第346页）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同上书，第349页）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按：舒芜作），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同上书，第34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上书，第357页）

这些都是整风前六个月之内，在内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复讲了的。现在有些研究“反右派”的著作竟未涉及，就把“反右派”跟着说成是什么“反击”了。

84 会上发了《草木篇》，立即又收回

在正式“反右”前，一九五七年春天还有一个怪事，至今无法理解。大概在三月，开了一次超大型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出席的人有一两千，是党内党外的人一起开的。这个会前，原来宣传部决定要开一个全国宣传会，一般是地委宣传部长以上的人来参加。陆定一他们向毛报告时，又被骂了一通。毛说，你们就是关门主义，你们的门就是打不开，我要调来千军万马，把你们那个门冲开。这个话是非常明确的，你陆定一、周扬这些人，都是搞关门主义的。我要搞民主，我要搞大民主。这件事，我绝对不敢乱说半句假话，是陆定一在中宣部给我们传达的。他们当时也是摸头不知脑，挨骂之后照办而已。所以，一下子开了另外一个会，全国党内外的，一千几百人，电影方面的著名演员都参加了，这个会我也参加了。

从毛主席批评陆定一、周扬的话看，毛似乎要讲一点民主了，但实际上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到现在说不清楚。我记不得一个报告、发言，就是热闹一阵。但这个会有个特点，开幕那天，每个人进场时发一篇《草木篇》。这是流沙河的一篇散文诗。这个《草木篇》是很怪，文章字面有点阴暗，让人难猜。当时，每个人拿到后，以为这是一篇“反革命”的典型文章了，可能要在会上大批特批，要不，为什么要单独发它呢？但是过了两三天，这篇文章又被收回去了。

为什么要收回呢？现在来看，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如果立刻展

开批判，妨碍开会；另一种是，如果立刻批判，以后的“毒草”就不会出来了。这个文章一批可能什么“毒草”都不放了。如果用当时毒草的标准来看，《草木篇》确实是一棵大“毒草”，当时什么都算毒草，何况你这个《草木篇》，文笔阴沉。这个我不怕得罪流沙河，流沙河这个人很好，十分博学，现在还在。前若干年，在成都我见着他，我跟他说到这次会，我说觉得是要把你打死，后来又收回去了。发出又立刻收回，我闹不清楚是什么意思。

85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大大夸奖姚文元，大家都反感极了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大概开了十来天。其间，毛主席还分批接见了各界人士，有电影界、作家界、新闻出版界等等，一个上午接见一批。

我是新闻出版界被接见的二十个人之一。接见的目的是什么？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我们二十个人在会议室，毛主席来了，陪着的有两三个人。毛始终跟几个人谈话，一个人是《文汇报》的负责人、大右派徐铸成，《新民晚报》的赵超构，还有上海中华书局党外的负责人舒新城。毛跟过去认识的人闲谈，没有谈什么正经事。接见了两个小时左右，东拉西扯的。唯一记得一点，在这个会上，毛特别介绍了姚文元。所以，姚文元并不是在一九六五年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才出来的。毛突然说，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他都看。他问大家，你们看过他的文章吗？毛还推荐说，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文章。可是上海来的几个人无一唱和。在座的人，没有人能回答，只有上海来的两个人知道姚文元。那天接见的，有京沪报纸、出版社的负责人，地方的，有一个《山西日报》负责人吴象。这个同志现在还健在，我们两个可以作证，其他人均作古了。

毛夸奖姚文元，大家听了都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中国之大出现了一个新的鲁迅，都没有听说过，没有人读过他的文章呢？散会后，走出门，我们出版界几个人走一路。黄洛峰（当时担任文化部出版局负责人，一九二七年的党员，出版界最老的党员）、金灿然（出版局）、王任叔（人文社社长），还有我，我们三个人议论起来。毛主席说的这个人是谁呀？这时，王任叔一下子很生气地说：姚蓬子的儿子！王任叔说这话时，又生气，又轻蔑。姚蓬子的资格很老，也是个党员，后来自首

了。王任叔还知道姚文元的其他情况。他说，这是根棍子，在上海专门打人的。王任叔的口气是厌烦透了，气得发抖。这一下子，大家太吃惊了。毛主席，以全国思想领袖、国家领袖，以从来没有过的伟大身份，在党内外新闻出版界经过挑选的单位领导的接见会上来推荐姚文元，到现在，我也想不通，觉得太莫名其妙了。这些人不会因此就捧姚文元的呀，不可能呀，办得到吗？金棍子，银棍子，专门打人的棍子，怎么能叫人人一下就会对他拜倒呢？

这件事表明一个问题：这个会是真正主张双百方针、主张开门，还是学习姚文元？是学习姚文元就是极“左”，就是打人。这件事，当时就让人觉得受到极大的污辱。说是开双百方针的会议，怎么最高领导出来郑重其事地推荐姚文元？还说，你们不知道吧，他的文章在《解放日报》，我建议你们多翻翻《解放日报》。也就是说我们要永久拜姚文元为师。当场我就极不高兴，王任叔也极不高兴，没有一个人的脸色好看。我估计恐怕没有人会接受这个劝告。在座的人，不会因为你老人家推荐姚文元，大家就去捧姚文元。这叫怎么回事呢？这不叫人晦气吗？

这次上千人的会，是动员大放，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究竟是钓鱼的会，还是真正让大家开口的会，现在很难说。但从这两个象征，一是发了《草木篇》，立刻收回；二是郑重推崇姚文元，是不是可以看出一点什么？不过，我觉得老人家郑重向这么一批人推荐姚文元，未免太主观和滑稽了。这一批人不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呀！

下面我先按公式讲：党中央发表决定以后，“反动派”就趁势进攻。

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好像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四月底，是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大家对党提意见，从下到上，从普通党员到毛主席，都可以。

这个文件发布后，全国就真正热闹起来了，每个单位几乎都动起来了，中学、大学，还有科研机构，各大机关，立刻大字报就铺满了。解放后，大字报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后就不可收拾。

第十八章 我这个“反右”五人小组组长，绝没有整别人一点点，首先把自己报成右派（1957年1月—1960年6月）

86 人民出版社的“×、×事件”

我们单位的大字报也铺满了，大房子，小房子，走廊上。天天号召，不贴不行。贴什么事情呢，没有一篇是批评我跟王子野的。王子野是个好人，品德上挑不出毛病。当时首先整的，几乎全是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作风问题。既然你们两个头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怎么大字报贴得地方都没有了，连办公室里边都贴出来了？当时叫“×、×事件”。×呢，是出版部主任，是比较老的党员，在国民党地区干出版十几年，成绩优异。在人民社，工作非常负责，就是方式比较简单，对人讲话不太和蔼。×呢，叫×××，原来的人事科长，贴大字报的时候已经因为自己多次修改自己的历史档案，被调到什么科做科长了。人民出版社闹来闹去，始终就是这两个人，就闹他们，后来变成了我。不过，对我是空洞的，说我要推翻党之类的。

反对他们，跟我有何关系？整风开始时，我为了表示反对宗派，成立了一个整风学习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除我们五人小组之外，加了几个人，其中就有上述这两位，另外还有两个党外人士。这一宣布，就像炸开锅了一样，集中力量反对这两个人当学习委员。所谓学习委员本是表面文章，就是挂个名，开开会什么的，但广大群众就是以这个为题目，正好抓住这件事反对这两个人，要求撤掉他们学习委员的职务。为什么要求撤呢？全是借题发挥。×主任的问题要简单一点，主要是工作方式问题，得罪了不少人。但是，校对科一个女青年突然起来揭露一件事情，说她有一次到×的办公室，×忽然对她说，“侬面孔把我香香吧。”×是上海人，意思是让我亲亲可以吧。这个话当然不对，照现在来说是语言性侵犯。这个女同志起来揭发后，单位内很紧张，比核爆炸还厉害。五人小组研究很多次，认为一般女同志，不大会说这样的话，又没有深仇大恨，何必去造这样的谣呢。我们半信半疑，支部开了几次会，×说没有。我想，解决不了，我自己跟×谈吧。我说，两个月了，

越闹越凶，即使有，道个歉，就完了。我说，这个事情，根据我所了解的，党内不会有什么处罚的。谈了两次，×都坚持否认，说没有。这件事情不大，但容易引起义愤，像海啸一样。

×××的事就复杂多了。“内部肃反”大约一九五七年年初就结束了。一九五六年冬天，按照当时的规定，五人小组每个人都要作一次鉴定，很严格。×××不是五人小组成员，他是固定的参加者，因为他曾是人事科长，很多材料要他提供。五人小组成员作鉴定时，我发现一个问题。×××的表格入党时间填的是一九四〇年。当时根据地是没有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满十八岁才入党。十七岁、十六岁，甚至十五岁都可以。但十四岁，还是儿童团，提前到这个程度，令人生疑。我找到我们的秘书长周保昌。我们单位没有资格设秘书长，秘书长制度是上级在人民出版社为周保昌特设的。他一九三六年就参加革命，一九三八年入党，把他算副社长，上面又不愿意给他这个名义，办公室主任，好像又小一点，所以，给我们单位设一个秘书长。我说，保昌同志，你在延安时听没听说过根据地有十四岁入党的？我知道年龄的规定不是死的，但是，早到这个程度不太可能。我说，你是不是把他的表格找来看一看。奇怪的是，×××的档案就在他自己那里，很快就拿出来。而人事档案的管理有规定，人事科长的档案自己不能保存。

我、王子野、周保昌我们三个一看，眉头立刻皱起来了。很多张不同时期填的表，入党时期最后一个字都改了，由一九四五年，改成一九四〇年，提前了五年。那么一堆表格，统统都是这个字写错了，统统都是这个字看不清楚改了？很清楚，统统都看得出来，“五”改成“〇”。所以没有疑问，清楚得很，是一九四五年入党的，他自己改成了一九四〇年。于是找×××来谈，让他解释一下，他解释不了。我们说，你修改了自己的党龄，提前了五年。他没有一句话，承认了。这个事，我们在党内根本没有公开，上级批准更换人事科长。我们让他管点总务，原来管行政总务的来当人事科长，只是换一下。

这件事，就发生在整风前几个月。这么一调工作，群众就知道这回事了，就传出去了，×××自己修改档案被发现。群众要求罢免他，我就难处理。我这个五人小组组长，接受群众意见，把他们两个撤换下去，这对他们两人的威信打击太大。我们还要请示上级，上级肯定不赞

成。

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我没有想到闹下这么大的麻烦。后来各组开会，特别是行政部门，非拉我去不可，我不去，就不开。我去，有的拍桌子——不是拍我的桌子，是拍他们两个的桌子——骂他们。闹了两个月，整天闹，发展到签名罢免运动。有些团员也签名，后来连累团支书吴道弘也被划成右派，说他带领一团人“叛变”。吴道弘非常温和，工作老老实实的，是啥子右派？！

这样一来，规模就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有人在单位里放言，要到天安门去示威。到天安门示什么威嘛，示人民出版社前人事科长的威？那天安门就挤不下了。不是滑稽吗？还放出信息，要抢人事科的档案。这不能怪群众，群众会想，你人事科长改了自己的档案，我的档案，给我塞些什么东西，我哪里知道。太危险了，动了众怒。

当时出版署没有了，我们属文化部管。我给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汇报。陈克寒原来是出版署的副署长。他也很忙，但我还是说，我就谈几分钟。他说你来吧。我把情况给他讲了，他说，有什么奇怪，戏剧学院、美术学院，还有别的地方比你严重多了。他叫我硬顶住，怕什么嘛。他比我大几岁，入党比我早几年。我说，他们要去天安门。他说，他们去，你跟着去，一起去就是了嘛。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这个话是什么用意。如果人民社的人真的去了，我跟着去了，那我脑袋早没有了，会仅是一个右派问题？一九七八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想去看看陈，遇到老文化部人事司的司长。他说，你不要去。我说，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三次呵。他说，你不要去，你以为你去是安慰他，说不定他还会骂你是右派。后来，接到他追悼会的通知，我还是去了。

我们单位在中央整风文件出来后，轰轰烈烈闹了三四个月，不得了，其实就这两个人的鸡毛小事。

87 内部通知片片来

就在我们单位闹“×、×事件”期间，一九五七年六月八号，《人民

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个文章出来后，在人民出版社并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并不涉及这些问题。

但是，逐渐地，内部的风声比较紧了，我也觉得不对了。好像六、七、八这几个月，不断地收到毛主席写的内部意见，这些意见都是作为特别文件送给我一份的。现在，毛主席写的文件很多都公开了，但其中一个文件，我始终没有见到。毛选五卷也没有这件东西，不知是不是由于技术性的原因，把它漏收了。因为其他几个相当尖锐的指示是收了的。

在这些内部意见中，我也看见了划右派有比例，有百分之二三，有些单位，可多到百分之十。我们人民社一共有多少右派？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右派是我自己第一个报的。接下来的事，我就全不知道了。

88 我的右派“根据”：黑板报上的“谈话”，《人民日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这时，我们单位的黑板报记者张樑木来访问我，他的目的是要说服我，何必在“×、×”问题上坚持呢，要我接受群众意见。他的用心不坏。这是个星期天，他在我家里跟我谈的。我不好随便回答，这两个人的问题我实在解决不了，撤销他们学习委员的资格，出尔反尔，对这两个人的打击也太重。如果两个人吃不消，出了事情，也不行，我怕出人命案啊。要改变这个决定，要请示上级。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一犯错误，也是个大错误，说你在群众面前投降，是投降主义，不也一样吗？我为了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故意找一些大而化之的问题来应付他，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以为我这个话是聪明的，因为我谈的事，是普遍真理，人人都可以谈，没什么稀奇的。我以为是王顾左右的言他。我谈了什么呢？我说，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就这么回事。

我说，整风是很重要、很必要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以国民党而论，国民党一九二七年没有上台的时候，开始威信比较高，把多数的军阀打倒了。老百姓不知道它会变成一个新的独裁者。我还把经过讲了一下，说蒋介石坚持内战剿共，特别是“九一八”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他在内部也不准宣传抗日，到一九三五年签订《何梅协定》，连国

民党的一切力量也得撤出华北了。这个时候，由于打内战，坚持不抵抗，老百姓就很反对蒋介石了，就要打倒他了。我还糊里糊涂地引用了两句杜甫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我说，这两句诗很有教育意义，我们共产党，在山时的泉水是清的，出山后的泉水也是清的。但是，好像没有在山时那么清了，所以要注意一些问题。我讲这些时，是大而化之的，我想这个是一般公理吧，有什么要紧呢？

这一谈，谈了一两千字。稿子整理出来给我看了，没有歪曲我的意思，我修改过，在单位黑板报发表了。这一发表，在单位里变成了原子弹，所有的人都挤去看，群众高兴得不得了，说老曾敢讲。外单位的人也拥来了。文化部也来了，宣传部也来了，上级那么多单位来看，天天围着，几百人，像闹市。尽管如此，我也没当一回事。但这在北京成了爆炸性新闻，认为曾某人大逆不道，竟敢讲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其实我讲的是公理，过去的历史书都讲过，哪本旧历史书不讲呢？哪个朝代上台来不讲前朝的得失，不讲自己要小心呢？所以我认为我讲的不过是普通的话，应酬话，甚至是应付话。

我的这则谈话，现在还在，因为宣传部全文印出来了。宣传部有个内部刊物叫《宣教动态》，不定期的，大字，四页。《宣教动态》就是专门登后来都被划成右派的人的言论。但也有例外，有很尖锐的，像北大教授傅鹰的，登了几次，后来他没有划右派，毛特别提了的。

我现在也说，我的这则谈话，没有一个字是错的，精神上没有错，文字上也没有错。但是，事情就爆发了。就是说，你共产党员根本没有资格讲党中央，只有资格讲自己怎么不行。

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还是五人小组组长，我们单位反右派的动员报告还是由我反复做的。

除了黑板报的事，后来还有一件出问题的事。这件事情早就出了，只是这个时候才被上面提起。

在到处“大鸣大放”期间，《人民日报》召开的某次座谈会把我叫去了。座谈会的目的当时我也不清楚，其实就是钓鱼会，希望你讲几句，

然后给你夸大，登在报上。因为预备的右派分子越多越好。我发言批评文化部的陈克寒个人。我说文化部个别领导太不讲理，像陈克寒同志，谁吃得消？他动不动就要人写书面检讨。我去人民社工作不到半年，要我两次写书面检讨，我当然没有写。

要我两次写检讨是怎么回事呢？我去人民社不久，一九五六出版了《苏共二十大文献集》。在我去之前，一九五二年苏联开十九大，第二年一九五三年，十九大文献集中文本出版了。苏共二十大后，我照章办事。但是这次是批斯大林。陈克寒认为，批斯大林的东西不能出，就要你写检查。我依样画葫芦有什么错？还有一次令我写书面检查更乱来。我们党的老前辈恽逸群，是潘汉年的同事，在日本投降后撤退到根据地。那时不能不撤退，因为他是打进敌伪机关的，不撤退，国民党说你是汉奸，会抓走的。他在苏北的时候，写了本书，叫《蒋党真相》，印成小册子，内容非常实在，很丰富，而且把一些根本没有人弄懂的事，讲清楚了。有人提议出，我们就以三联的名义重印了此书。陈克寒说，重印这个书，又是个政治错误，要我写书面检讨。为什么要印《蒋党真相》呢？举其中一个例子就清楚了。蒋介石跟江浙财阀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都讲蒋介石是依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发家的，蒋介石是保护江浙财阀利益的，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相互利用的，谁也没有说清楚过。江浙系银行财阀跟蒋介石是怎么个关系呢？比如蒋介石要向江浙银行借八百万的现金，给的债券却是一千万。江浙银行的债券一出去，立刻就赚了二百万。公债每年都要还利息，由政府担保，用税收来还。蒋介石刚上台时，是靠江浙财团借给他钱，而江浙财团越吃越饱，越吃越富，在公债上，既吃回扣，又吃高利息，因此，蒋介石跟江浙财阀的利益分不开了。这个东西，我们过去都讲，但却不懂得道理，而《蒋党真相》解释得清清楚楚，连中学生都看得懂。

陈克寒要我为《苏共二十大文献集》和《蒋党真相》写书面检讨，我当然不理他。陈克寒下面的一个司长金灿然，陈克寒也要他写书面检讨，他也没有写。

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我讲了陈克寒的事。我说，陈克寒动不动就要人写书面检查，而且没有理由，还不准申辩，他好像要把文化部变成“武化部”似的。这个挖苦得厉害，但只是挖苦陈克寒一个人。后来

《人民日报》登出此事，加小题目说，“曾彦修说，文化部是武化部”。《人民日报》这个标题，当时是一种标准做法。当时，一是要遵命夸大，制造毒气；二是必须有意歪曲。因为在反右派，需要敌人，必须制造“毒草”。说“曾彦修说，文化部是武化部”，这当然从根本上曲解了我的意思。

这时《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已经变了。原来的主持人是邓拓，他就因为不积极搞这一套，领导不满意，把他骂了一通，说他不是书生办报，是死人办报，大概在五月间就把他这个死人总编辑撤了，变成了吴冷西。一九三九年，在延安马列学院，我同吴冷西曾住过一个窑洞，原来似乎也是很沉稳的。若干年前，吴冷西写过《十年论战》，坚持中国“反修”始终伟大。他聪明得不得了。为什么会那么被看重？不清楚。很多会，只有三几个人参加的毛的小会，他也参加。这不是我造谣，是他多次的自述。这一点，让他终生感激，始终不变。

因此，这种“曾彦修说，文化部是武化部”的标题，总编辑肯定是要看的，这个标题把我的意思改变了。那个时候，全国报纸均如此，我不当一回事。

我现在怎么看我的这发言？对文化部，我没有这个意思，对文化部的领导，特别是钱俊瑞，我非常佩服，我只是不佩服陈克寒一个人。但是在那样的会上，讲这样尖锐挖苦的话，是完全错误的。虽然我指明的是陈克寒，但是话本身伤的不是一个陈克寒，伤的是文化部，是文化部的部长们。所以，我对文化部的钱俊瑞同志，对文化部的其他同志，现在还是要道歉。钱俊瑞是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沈雁冰是部长，挂名的。我对钱俊瑞，绝对不会说这个话，我很尊敬他。那篇黑板报上的讲话出来后，我已经在右派的边缘，是没有正式定下右派的右派，他还让我去参加五人小组长会，这不是所有的上级都办得到的。钱能够办到，钱的胆子大，也有见识。

相当一个时候，我的五人小组组长没有被撤，文化部开五人小组长会，布置这样，布置那样，我照样出席。有一次，开会传达什么，钱俊瑞还是没有把我当右派看，还是叫我去。这次会就是传达“文化部，武化部”问题的。上面发话了，文化部受到了批评：右倾。（恕我不能谈了，

只能以此二字示意。）

领导说，人家在骂你们是武化部了，我看你们一点也不武化。意思是说，还不动武。这个传达我在场，这个我造不了假。这个东西应该有记录稿，可能档案里还有。

89 田家英确曾暗示过我，少说点

这里，要提到田家英。田家英对我不是明白警告过，只是较明显地暗示过，但我当时没有很好地体会这个暗示。李锐同志多次在公开场合下说过，田家英曾多次谈起过，他叫曾彦修少说点，但他还是要说，闯了祸。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反右派劲头很大的时候，田家英为了出版毛泽东的什么著作到人民社来催。他来时，我对他讲，做一个单位的小头头，柴米油盐一大堆，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得管，这种日子不好过，吃不消，我干不了。我说，我到你那个单位去好不好？那个时候，田家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小单位，他是副主任之一，陈伯达是主任。我说，我到你那里挂个名，当个研究员吧。他说，到处都一样。他问，你住在哪里？我说拐个弯就是。他跟我到我家里，没有吃午饭。当时他主要谈《人民日报》的问题，提到“救报运动”。他说，毛主席对《人民日报》批评得非常严厉，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就是“大鸣大放”不放手，并说现在少说话为好。这句话只能说是意到而言未到。

谈到我的调动问题，田家英说，现在人员调动已经停止了，而且你要离开人民出版社，首先要得到×××的同意才行，新闻出版一直是×××在管。我没有办法把你弄到我们单位来。

当时，田家英在一定程度上暗示过我，很紧张，邓拓挨整了，意思要我少说话，这个事是有。但是跟着要来一个反右派，要大整，他可能当时也并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这些。只是暗示我，少说点。

田家英提醒我这事，李锐同志讲过多少次。每次见面，李锐都说，田家英给我讲过多次，他警告过你，不要说，你偏要说。我说，我也没有说什么呀。

当时我确实没有理解田家英讲这些话的意思。即使理解，我也难办到。我讲的话，不是普通老话吗？一个新政权要注意前朝灭亡的原因，这无非是说二加二等于四嘛，历史上不知已被人说过千万次了。

90 中央级的新闻、出版社的负责人，似乎没有一个跑掉的，一锅端

这次，事实上在劫难逃。中央级的新闻、出版社的负责人，似乎没有一个跑掉的，一锅端。

北京中央一级的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大公报》，全国性的大概就这三个。说《人民日报》的邓拓是死人办报，立刻撤职。还好，邓拓的右派没有挂上。写《邓拓传》的夫妇前几年来过，说他们非常感谢邓拓，如果邓拓按《光明日报》《文汇报》那样做，也是这么大干，邓拓少不了戴右派帽子。邓拓一戴右派帽子，《人民日报》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戴帽子。很多人很感谢邓拓，虽然上面压得很紧，他始终怀着戒心顶住不乱来。但是，邓拓是何许人呀，他是个老前辈，经验多，善观风色，稳当不动，我怎么能同他比呢？《人民日报》有两个副总编辑自杀，一个是×××，还有一个女同志××。邓拓总编辑算好，暂时高挂，不管版面了。《光明日报》就不得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都是大右派。储安平后来失踪，到现在也没有弄清他是怎么失踪的。《大公报》，党内的负责人，实际上第一号人物被划成右派，名字我忘记了。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因为有人巧妙地说了话，没有划成右派。张黎群跟我熟悉，延安一个窑洞。当时中央划右派是花了几个星期讨论的，民主党派也好，新闻出版界也好，样板人物，哪些要划，哪些不划，都讨论过。当然，我也是经过讨论的。具体的情况后来知道了。张黎群告诉我，要划他右派时，有人起来保了他，说，张黎群这个人，没有什么头脑，人家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然后很快把张黎群派到陕北米脂当县委副书记。

出版社这边，人民出版社，是我。人民出版社不是简单的人民出版社，当时用人民、三联、世界知识出版社三个招牌出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冯雪峰，虽然冯雪峰是刚刚解除了社长不久，但是，他的声望、地位在那里，划了他，没有划王任叔。当时新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的通俗出

版社，出版比较通俗的读物，面对农村，面对基层，社长杨赓，副社长兰钰，都是右派。杨赓还是名人，大作家、大记者，杨赓自杀了。杨赓为什么经不住？我有点不大理解。他受的锻炼比我多呀！通俗出版社才成立半年多，反右派后就合并到人民社了。当时只有这几个出版社。

当时，北京主要的新闻、出版机构没有一家跑掉的。一号人物走了，二号人物顶。一般是划第一号人物，或者两个一起划，在劫难逃。只有一个单位例外——新华总社。新华总社正副领导好像没有一个划右派的。道理在哪里？新华总社都是×××直接领导的，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他改过的。其他的报纸、出版社，都是间接的，新华社是直接的。如果新华社的正副领导都是右派的话，×××天天抓，面子放在哪里呢？

这就是当时的形势。这是个彻底的歼灭战。现在全国的人不太知道了。似乎一个人，只要有点知识，有点文化，都不可靠，有点意见，更不可靠。

91 报右派名单，我把自己报上去。我自高自大想，我一个是不是可以顶两个呢

紧张局面已经出现了，在社会上也已经听见一些风声了。当时划右派的范围扩大得很，有些人不挨边，都是右派。我们单位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是估计要出大事。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闯祸了，闯下滔天大祸了，说不定要被抓起来。

我建议开个党支部大会，这个会大概是在七八月间开的。当时我们全社只是支部，不像现在，动不动就是党委。开会的时候，我就检讨了。我说，黑板报那篇东西是完全错误的，不管我主观怎么想，客观上引起的反应，就是现在这种情况，许多部门、许多地方都派人来看，客观效果非常不好。而且客观上是有利于右派进攻的。我说，我认识到我是临阵投降，我是五人小组组长，应该带领单位去跟“反党”的人斗争，而我的那篇东西，得到所有“反党”的人的极大欢迎。我知道情况的严重，我在党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了，我请求按照党章最严重的处分，留党察看两年。先不要开除党籍。我这个发言是真心还是假意？按照习

惯，按照思维定式，它当然是真心；不过，它是纯粹按照客观形势不得不讲的，又可以说是一种被迫的政治表态。

我们这些人，自己出了事，自己要扛着，知道越辩问题越重。

那年七月，几十天不下雨，那几十天热死人。我讲了后，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事情来得太突然，不知道怎么办，没有人发言。人人知道，曾某某不是反党，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引起了一个高潮，但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应该算什么，严重到什么程度，应该受什么处分。全社虽然闹得稀烂，进攻的矛头始终只有一个科长、一个处长，根本无一字涉及高层。我以一个“老运动员”的身份知道，我那个谈话一出来，一被抓住，说不定丢脑袋都可能。说在右派进攻时，你带头，你鼓励，而且话还说得很重，跟蒋介石政权的兴亡来对比。

这个会沉寂了很久。这样沉寂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我心里特别着急。算好，我们里边有一个老同志周静出来解了围。我跟他的关系始终非常好，他今年九十二三岁。他是潘汉年系统的，是我们单位唯一一个一九三六年抗战前入党的老同志。他平时很稳重，什么事都不怎么发言。他大概看到情况不妙，站起来了。他是苏州人，软绵绵地说讲了几句：曾彦修犯了严重错误，错误得不得了。他不是临阵投降，他是临阵倒戈。我听了后，心里放下来一点。为什么呢，这种会，上级要派人参加的，还要去汇报的，如果始终没有人发言，或者发言的人说得太软了，那后果就不得了。周静是动了头脑的，把话说得厉害一点，说明这个支部水平很高，这个支部不包庇曾某人。我非常感谢周静。不要看到他表面把我讲得很厉害，实际上是帮了我。这个会议，没有他的意见，怎么向上级反映？说不定就解散这个支部了，说你们都是曾某人的尾巴，不但不批判，还同情他。

这样一来，这个场面算是应付过去了，不然就收不了场。后来，周静在以后一个关键时候又解了一次围，此是后话。

这时，还是没有撤掉我五人小组的职务，我还是五人小组组长。我们单位的“反右”，还是在我的领导下干，上面催报人民出版社右派名单时，会议还是由我召集。五人小组开会议论了两三次怎么办。我就提出来把我的名字报上去。我说，光报别人不报我不行。当时，我还有个想

法，可谓绝对主观主义。我想，把自己报上去，我一个是不是可以顶两三个，是不是可以少报两三个呢？实际上恰好相反，既然头头是右派，下面的右派必然更多。

我提出两三次，没人表态。后来，谭吐说，那只有照老曾这个说法报上去吧。再说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

人民出版社第一批右派名单的报告，是我起草的，我的名字也是我自己写进去的。当时没有第一批、第二批的说法，以为就是一次过。当时提了几个人，我已记不得了，不会超过四个。今天的人会奇怪，为什么要自己报自己。我以为没有什么奇怪的。你如果处在我当时那个地位大概也会如此。因为觉得自己把事情闹大了，得想办法收拾，谈不到什么可贵之处。

我起草报告大概在七八月。六月八号，《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反右”已经轰轰烈烈闹了很久了。上面没有明确表态，是在做准备工作。名单报上去后，也没有跟我谈话，没有什么进展。突然有一天，也是在八月，我从人民出版社后门一进去，单位所有平房，一个空的大操场，里里外外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一些标语的标题字大概有一平方米那么大：打倒右派分子曾彦修。大字报可能有几千张。看来，没有个把月的准备是办不到的。我向来不看，一张不看。我倒不紧张，我知道这件事总是要爆发的，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大的规模。过去没有挨过多少整的人，看见这个规模，可能要吓得自杀。我不怕，“特务”都做过，有啥稀奇的，无非是再来一次就完了。我当时非常镇静，不当一回事。后来才听说，当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广播了，第一条，广播得很长，曾彦修是个大右派。

当天，即我看到大字报的当天，《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第二条，用占五六行字的黑体字登了一条消息，标题叫《曾彦修腐化变质》，副标题我就不知是什么了。标题是当时最大字号的标题，字是临时用木头刻的。这条消息我只看了题目，内容没有看一个字，到现在也没有看一个字，确确实实的。称我“腐化变质”，何必要看。一直到去年，我们单位一位同志找到这个报纸，复印给我看。我说，我不看，我一生也不看，就是现在重新处罚也不看。我知道里边可能会讲些什么内容，我看它做

什么呢？

我是在共产党里见报的第一人。不知道从哪个方面考虑的。后来有人开玩笑说，你是党内的右派状元。这个状元可不好当，作为典型示范，批斗的时候长，有半年。为什么是第一个呢，我现在确实说不出道理来。论地位吧，中央监察部副部长王翰划了右派，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划了右派了，冯雪峰、丁玲、艾青，这些名人也划了右派。无论从哪方面数，比起他们来，我算什么呢，小萝卜头而已，但宣传规模却很大。一九五七年九月后，我的"标准像"作为新闻照片，全国到处贴。这个照片我没有看见过。过了六七年，一九六四年我回四川万县我哥哥家看母亲和哥哥，走在街上，有些人认出了我。

我这个"自报"对不对呢？我认为很对。如不自报，我就要成为"反右"小司令。如果要我把史枚、戴文葆、王以铸、彭世桢、吴道弘……这些人打成右派，我恐怕会自杀。因为我的右派是前奏曲，以后我就一事不知了。

92 今天可以明确地说，对我的批判完全是我不得不设法拖延时间的

从此后，我就自然作为一个批判对象了。在单位批，在文化部大厅里也开过一次会批，各单位的人，加上领导一百多人。这是表态的，没有火力，前辈无人发言。我们单位的批判，要几个月，老油条了，我估计得到。在批判当中，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没有人会问我：有什么人支持你呀？有什么组织呀？只要没有这些问题，我是应付得了的。了不起，我统统承认。

批我，上面知道弄不出什么大政治阴谋问题来，也没有什么人来管这些事，由我们单位管。五人小组谁来管我的事？陈原。让陈原来分管我的事，我就知道没有什么大事了。陈原是一个学者，一个新党员，好像是一九五三或五四年入党的。他来抓我这个事，就表明没有把我当成了不起的政治黑帮来抓，无非是批判会总是要开的，开三次五次是交不了账的，总要开好几个月才说得过去。

对我的批判，我配合得非常好。今天明确地说，这个批判在相当程

度上是被我牵着鼻子走的。我必须这样做。我知道批判会不是几次的问题，起码要开半年。半年没有东西，怎么开会？要我写交代，就是写检讨。好在我知道一些理论条条，知道马克思主义有史以来的一些“修正主义”理论，我就有计划地写了厚厚十几页，两个礼拜交一次检讨。列宁批评的那些东西，我都有。马克思批评的，我都有。不找这些东西穿在身上，大家都难开会。我用这个办法，单位的批判会就真的照这个办。我把检讨一交，他们就组织一批人来看，然后开会来批。就这么样，一次一次地，全是书本战，空对空，最后这个会就没有什么劲头了。那个时候，也不是真正要开什么批判会，但过场必须走，每次前后不过两个小时。因为在露天开会，集合人也需要二三十分钟。两点钟开会，两点半能到就了不起了。一上来，口号叫半天，比“文革”差一点。口号不能不叫，要不然这时间怎么过？一阵口号后，一个人做主要发言。其实这个主要发言，也就是在我的指定范围内，找材料来批，如反马列主义、修正主义等等，其他组织上的阴谋找不出来。这个人发言完后，又一阵口号。这样的批判，搞到一九五八年的一月春节前就开不大下去了。

这时，我们单位还有一个重要的人要批。这个人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原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打进去的，老党员，功劳很大，可能现在还健在。他的讲话跟我不一样。他在外国住了那么久，他的话说出来，不是我们这一套。比方老是问他，问得他厌烦了，他就说，我在美国，中央情报局都没有这样审问过，客客气气的。这下不得了，把党组织比作美国特务机关。他一直生活在美国，不习惯中国这一套。叫他发言，他就发，他一开口就走火，就讲一些不对的名词、不对的话，动不动就说，我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审问时没有强迫我承认什么。所以，开批斗会的兴趣就转移到他的身上去了。

93 要我性命的控告来了，形势超级严峻，似乎是准备当场逮捕

我的事情，内部这样的批斗批斗是走走过场，是做给上级看的，不得不做，双方合作任务算完成了。但是，问题是忽然来了一个真的高潮，要我的命。“要我命”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

人民出版社的后门有一个操场，再最后边是出版署很大的一个大礼堂。大概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在批了我七八次后，大家突然看见有几辆

载重卡车停在操场上，还有几辆吉普车，还有发电机、探照灯，指头粗的一大堆电线，从操场一直拉到礼堂，两个星期，无人知道在干什么。实际上就是布置斗争我的会场。礼堂内四面八方有探照灯，主席台也有探照灯。那么多探照灯，做什么？拍新闻纪录片。我当然完全不知道。一天下午突然说去开会，几个人押着我往后边操场走。押我的人是我们单位的，是一般性的，不厉害。一进去，看见边上有大标语口号，才明白是斗争我的大会。看见这样的架势，我估计当天就把我带走。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无所谓。既然已经这样了，对不起，看你说什么，我今天就无路可退了，把问题说说清楚。

下午两点钟，出版署礼堂开会，一千多人，塞得满满的。不仅是我们单位的，还有好多个其他单位的。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当时要干什么，谁也不知道。新闻纪录片恐怕已经开始拍了。灯光对着我，我也不管。主席台上有十几个人，陈原在主席台上。有陈原这些人，我想关系不大。陈原这些人不是抓人的人。另外还有几个我认识的人。

一宣布，最高××××署某司长代表副总长×××揭发我。这个副总长×××就是在广东一天忽然要杀一百多人的那个大人物，半夜被我报告给叶帅，让他补证据。这下好了，看到《人民日报》批我的东西，于是开了这个大会。这是公审大会呀，样子是要带人走，我这世恐怕就此结束了呀。开这个会至少要经过几个相关的部，经过几个星期的筹备吧。

主持人称“控诉”与“检举”。控诉什么呢，控诉曾彦修在广州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的镇反，一贯反党。我一听，心一下就放下了，行若无事。我想，丑事情自己收起来就算了嘛，何必现在还要来自己翻腾呢？我想，当时不可能不布置一批人观察我的气色的，他一说，我就奚落地笑一笑，主席台上是看得到的。这同测谎仪一样，你如何反应，是躲不过的。老实说，我要是真有问题，这么公审大会似的猛然一来，恐怕是难于抵挡的。

我坐在前排，群众的反应是什么我看不见，但我相信群众对我的印象，并不因为我成了右派就根本有了改变。有时候，我偷偷转一下脑袋，看看后排的群众。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并无敌忾同仇之气，都替我

担忧，今天他就要被抓走了。我故意看看，表示没事，我在下面爱听不听的。我跟我们单位的人关系好，大概谁都怕我被捕。××司长大约“控诉”了一个多钟头，我早就写了一张字条，递给主席团。大概意思是：主席团，这位××司长所讲的情况完全不是事实。真实的情况我全部记得，但是，如果我在今天这个大会上全部讲出来，会涉及党的机密。如果你们一定要我现在讲，我现在就讲，使我没有编造的时间，不过，我的回答至少要一个小时。要么你们在散会后，立刻找我谈，不要给我编造的时间。

主席团的人商量一阵，当众宣布了：某某人，他说对这个发言他立刻可以回答。他说需要多少时间，现在就要他讲。我大概在台下讲了一个小时。鸦雀无声，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

这是一场标准的公审大会。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不怕。我讲后原告无一句反驳，是非明白可见。

回家后，我把一九五一年广东发生的那件事写成文字。我说，能做证明的人，叶帅、方方、古大存地位那么高，不便找，李凡夫可以找，杨奇可以找，成幼殊可以找。后两个人都是在监狱里去重新整理材料的。还有《广州日报》的曾艾荻，当时任《南方日报》采访部主任。以后，我天天主动问此事。陈原被我问烦了，说，不要问了，有事会找你。

94 党内的右派状元，但对我的处理很轻

右派在一九五八年几乎都下乡了，我是留下来了。留在城市的，像我这样的并不是很多，很多人都到北大荒、到西北劳动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前辈聂绀弩都弄去了，丁玲、艾青都弄去了，为什么你这个晚辈的晚辈曾某人跑脱了？原因很简单，两个人扶着我去劳动，可以。那个时候，关节炎很严重，根本不大走得动路，走几步都坐三轮车。这个是根本原因。此外，我们单位的几个右派，能力强的，也都没有去劳改。后来，把我们这批右派当中被认为是有本事的，放在一间大房子里，成立一个小组，要我们编词典。从此，反右派的事，就没有再提。我们的组长柏宏文，老同志，久经生死考验，又懂政策，一点也不歧视

我们。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除，但党籍问题还没有处理。到一九五八年夏天，人民社已由东总布胡同十号搬到朝阳门内一百六十六号，即现在的地方了，有一天开党支部大会，叫我参加，正式通过开除党籍。

天气很闷热，大家都知道这个会就一件事，宣布对我的决定。但并不是几十个人争着叫口号，喊开除。开会后，没有人发言。这种会，事先不布置发言，是不大可能的。总之，过了很久，很久，没有人发言。我心里说，请快一点，快一点，这不过是个手续问题而已。但是，谁都不发言。最后，又是周静起来解围。他有政治经验，他看这个样子不像话，上级有人参加，会去反映的。所以越不发言，我越怕，说是对曾某人有温情主义。周静站起来，用苏州软绵绵的话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右派一律都开除党籍，曾彦修是一样的，我建议开除党籍。就这几句话，大家都举手了。一举完手，我就出去，算解放了。我内心十分佩服周静。没有周静，这两次支部大会怎么收场呀，没有周静，怎么向上级汇报呀，要出事的，我也会更麻烦。

按照我的情况，党内第一个，报上的右派状元，但实际上对我的处理应该说是偏轻的。我属于第三类右派。右派有五类，还有个极右，还有个内控的中右，中右在内部还是算右派，实际是七种。右派开会，自报公议，我报三类，顺利通过。

“反右”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中央在国庆那一天要在全国给一批右派摘帽。这个里边又有我。说通过改造、接受教训等等，总之要说两句好话才有楼梯好下。给什么人摘帽呢？每个民主党派各两个，工商界两个，文化界两个，教育界两个。共产党也是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木刻家彦涵。彦涵是延安鲁艺的学生，他在延安的木刻，在重庆登出后，徐悲鸿写文章大赞。解放后，在中央美院任教授、系主任等。我始终没有见过他，但知道他名声特大，在延安称赞他的木刻的人就很多。当时摘帽的消息登在全国各报上，叫作“摘掉右派帽子”，于是我便成了“摘帽右派”。

两年后第一批摘帽，给你摘了帽，登了报纸，应该说很客气了。原因可能跟我初反右时，首先自报有关吧。

一九八五年，我已经退休了两三年，新闻出版署人事司一个女同志打了几次电话，叫我到新闻出版署取回自己的“材料”。那时我住在前门，坐公交车三四站就到灯市口新闻出版署了。催了我一年多两年，我没有去拿。最后一次我说，留着吧，将来说不定还会有用处，有什么运动再来，就可以写简单一点。将来能肯定没有这种运动吗？

我敢不去取的最根本一点是，我这些东西里边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没有我今天递一个情报，明天递一个情况，更没有检举张三李四王五的一个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我被打成大右派后，我是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状”，检举过别人？没有，半个字也没有。我只是骂自己，没有检举过任何一个人。我没有整过别人，所以，我的一生的一切运动材料，我都不怕。我没有做亏心事，就让它留下吧。一个人连这点个性都没有？

我这一辈子，当然是个“大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写检查交代。从延安到“文革”结束，恐怕在百万字以上。我到现在敢说，那里边没有一字是损害到任何人的，这是我敢于相信自己的地方。我收回“材料”做什么，哪有工夫去销毁它？

95 可能因为我的原因，人民社划右派的比例很高

我们单位究竟有多少右派？有人说三十来个。有人确实是莫名其妙被划了右派。今年春节，我们单位的负责人去看望王以铸，问他，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呀？他说，大概是因为曾彦修划右派的关系吧，他尊重我们这批人，在“反右”时，要过关就难了。（这件事是单位司机告诉我的。）王以铸很有学问，懂七八种外语，古今中外，无所不通。

我们社原来的秘书长，老生活书店的，前几年去世了。一九六三年他到上海来，住在很漂亮的招待所，打电话把我叫去。那时我已经调到上海。他很客气，问了身体情况后说，老曾，你可得注意，你看看，你特别重视的人，不管老的、年轻的，统统是右派呀。他举了一个人，刘某某。据我所知，刘现在在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这个人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的，很聪明，很能干，外文也好，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人们对国民党不了解，把中央政治大学看成跟中共党校一样。这个

学校跟其他的学校是有所不同，但不是国民党的党校，只是毕业出来的人在政府里找工作方便些。读书时不一定是国民党员。我知道这个学校历来招收普通高中生。我反举了另一个人，我说，有一个我比较重视的女同志，“肃反”时说她是三青团外围组织的，我主张不要调查，这个女同志没有划右派呀。他说，这个也是事实。不过，你这个人太爱才，不重视政治。我说，“爱才”两个字不敢当，我自己就没有才，谈得上什么爱才，对有才的人很佩服倒是真的。现已彻底查明，史枚、戴文葆、王以铸等名人，简直不知是如何划为右派的。王以铸在戴文葆的追思会上说，一天，人事科长找戴、王二人谈话，不知谈些什么，出门时，王问：这是不是说我们是右派呢？回说：有这么点意思吧。所以，他们完全是因我而扩大划为右派的，我万死也偿不了我的罪行。

因为我的关系，我们单位划的右派增加了。我们单位如果划三个，就是百分之一，划九个，就是百分之三，如果划到二十个、三十个，是百分之八九到十几了。我们二百多人，知识分子、编辑部的人占不了三分之一，绝大多数还是行政方面的人。所以，人民出版社后来划右派的比例很大。

我看见萧扬写张闻天的一篇文章，说整个外交部的右派在千分之二以内。恐怕只有张闻天才能挡住。乔冠华这些人，都是他顶住的，要不然，统统是右派。张闻天是什么身份？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当然可以挡一下，人家不好查得那么紧。但是，人民出版社，我变成右派后，必然牵连其他人，不多也难交卷。而且划右派，划得没有底，没有完。到一九五八年年底，又补划了一个留美回来的杨静远。杨静远是极著名的经济学家杨端六的女儿。杨静远怎么划成右派的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高潮过后，所有人统统下乡劳动，杨静远到了遵化县。因为一切都归公，收割庄稼马马虎虎，掉得遍地都是。老百姓去拾，公社命令不准，说烂在地里是社会主义，拾回家是资本主义。那个时候还不叫“斗私批修”，是叫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农民不知什么东西，就简称“自发式”。杨静远在内部开会提出意见，认为庄稼收成不好，与其烂在地里浪费，不如让农民拾回家充饥。就这一点，当时就大大批判她。冬天回到北京后，又开编辑部大会批判，我们几个右派也去受教育。结果她被补划成右派。这真是荒诞已极，让老百姓拾庄稼，有什么罪？看到老百姓

饿死不管，才算正确？是非颠倒，已经叫人欲哭无泪。

这个时候把杨静远补划成右派，我相信是上级的意见。人民出版社自己不会把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划成右派。

一九六〇年夏天，我调到上海去了。以后几年中，人民社五人小组中的人凡是到上海，没有一个人不来看我。陈原晚上九点找到当时我住的半郊区，我实在不好意思。陈原是我的专案组的组长，我知道他没有办法，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意见。他也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

人民出版社另外一个副总编辑谭吐，也是五人小组的。他到上海，不但要来看我，还要陪着我这里吃一家、那里吃一家，他知道我钱少了，全是他付钱。张惠卿，后来人民社的副总编辑，他到上海也要专门来看我。范用，也要来看，站着谈了很久，令我感动。总之，当时的领导，或者五人小组的来上海，统统要来看我，所以我很感谢。

“文革”中，人民社也有过两派，两派虽然斗，两派都到上海的辞海编辑所来找我，说要“外调”。他们打听我的家，星期天分头到我家里来。根本不是向我调查什么的，而是向我问好的。他们知道，说来“外调”，辞海的人在旁边，要拍桌子瞪眼睛的。我想既然他们是两派，肯定希望我讲点对方的坏话，结果根本没有谈对方，只是来看看我。他们还担心我在上海怎么样，这就是人性。所以这个人性，是消灭不了的。一个人真正消灭了人性，就不像话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没有对人种下仇恨，在我有权整人的时候，我绝不整人，我没权时的反应就很清楚了。后来我回到北京，回到人民社才知道：好在我在上海，在北京就危险了。本社的不打你，不抓你，但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来，一家伙抓去，一斗，当场把你打死都很可能。

第十九章 “大跃进”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

96 右派没有资格参加大炼钢铁，专代抄大字报

“反右”后，接着是“大跃进”。北京王府井大街两边人行道铺的砖，比一般的砖好，据说是耐火砖，全部被挖掉了，去砌炼钢炉。我走了多少次，没有砖了，全是烂泥。这是眼见，不是听说。

人民社在什么地方炼钢呢？就在现在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停车的空地上。什么都拿去烧，通天亮烧。我们这些右派根本没有资格参加，那是“革命群众”的光荣任务。我的天老爷，阿弥陀佛，我们在上面看见炎炎夏天，天天熊熊大火，有什么炼的，有大火就行了。真是滑稽得很。

我们干什么呢？没有资格参加“大跃进”，就代抄大字报。“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每个人要不断地贴出大字报来歌颂三面红旗，一边要大炼钢铁，一边要交大字报。那时，已经没有白纸了，天下的白纸已经用完了，用报纸抄。抄报纸前，要反复看，有没有毛主席像之类，这个问题很郑重，涂了毛主席像，便是反革命。开始一张《人民日报》算一张，一人一天抄十张，到后来，一天要抄一百张大字报。王以铸聪明得很，说这样抄，抄不完，把《人民日报》对开，一张《人民日报》变成两张，但还是完不成任务，我们每个人至少抄一百张以上，后来又对开，一张《人民日报》变成了四张。

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突然要打麻雀。一九五八年打麻雀是什么原因，现在我也不便谈。报上说刘少奇、叶剑英也出来打麻雀了，这也是世界史上没有过的一种笑话。我打了多久？打了十来天。当时号召是三天，人民社反右派的重点已转到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一个老同志身上，一打麻雀，就叫我去。我有关节炎，还要爬梯子到房上去打麻雀。但打麻雀比在单位里挨斗，或看别人挨斗舒服得多，暂时离开痛苦，像出家当了和尚一样，如登仙界。我很感兴趣，整天拿着长杆子，捆片破布，在房顶上哗——哗——地打。打麻雀规定是三天，三天过后，没有叫我停，我就打下去。有一天，他们发现我好久不见了，不知我是自杀，还

是跑了。后来找到我问，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打麻雀，没有事，没有事。没有人叫我下来呀。此事极端荒谬，全国人民都在打，连国家领导人也出来打。在地上吼闹一整天，麻雀无法着地，渴饿掉地而死了。这种虐杀，对一切生命都不应当吧？还总结经验，在报上宣传，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夸耀，岂不滑稽？

划右派不久，我们吃饭就很不方便了。我们的食堂就在楼下，但我们几个人坐在那里，人家就不便来坐了。别人一来，怕被说成是不跟右派划清界限。群众也希望我们不要去，食堂不大，如果几个右派集中在一起吃饭，特别是最引起注意的这几个人在一起，更不行，说你们又在搞什么“集团”了。分开坐，更没有地方。所以，我们中午吃饭自觉不去食堂，跑到东四十字路东北口的小饭馆去吃。我本身走路就很艰难，拄个棍子。当时东四十字路口还是一大片草棚棚，几十个小饭馆，一般是两毛四分钱炒个白菜肉丝，我们一般两毛四分钱就够了。隆福寺胡同里边，也是小饭馆，贵一些。

“大跃进”闹了半年后，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之交出去吃，已经吃不到什么东西了，饭馆没有东西卖了。以前的朝内菜市场很大，无所不有，但到了一九五九年，连个菜皮都没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中午逛来逛去的，相互都认识。斜对门是文化部，再斜对门，是科学出版社，这些人都见过，都想到那里去买点东西，但都是空的，完全彻底没有了。奇怪的是，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一个把月，开始布置了，菜场里出现上千的瓶瓶罐罐，红的，绿的，什么都有，还有彩带，琳琅满目，像儿童世界一样。原来是拍国庆电影，想说明中国丰盛得不得了。我们知道里边全是空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一个馒头都没有，一片菜叶也没有，完全是零，这件事是我亲眼长期看见的，谁要杀我脑袋，还是我看见的。这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做假，是百分之百做假。当时如果反对这样做，就有可能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反右派后，“大跃进”后，政治风气就是这个样子，上面说这叫“生动活泼”，“最新最美丽的图画”，谁敢说不是呢？

到小饭馆去吃午饭，一个好办法，带几首鼓吹“大跃进”的“诗”去，当场贴上。例如：“旧社会无衣无食，新社会粮食满仓。”“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恩情大。”一九五八年夏时还好，几十家芦苇棚、饭馆还维持了几

个月，全民写诗，棚里贴满“大跃进”诗，但菜只有一种：大白菜炒肉丝。

97 “三年自然灾害”

“全国性的自然灾害”，这个说法是官书的说法，这全不正确。当时有些地方就饿死人。为什么呢，全部公社化，粮食全部归公，人民拿不到。中国幅员这么大，自古以来几千年，没有说从东到西，从北到南，一起闹自然灾害的，除非地球毁灭。中国这么大，有时候自然灾害的范围大一点，有时候小一点，像今年的地震、雪灾，范围就大得可怕，但是那三年，至少一九五八年，全国好。从全国几个地区来讲，我知道的，特别是三个地区，一般是常年没有水灾，没有旱灾。一个是苏无沪地区，就是苏州、无锡、杭州、上海，包括嘉兴，这是最大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水网发达，水多，就排出去，久不下雨，就有水车供应水。江南的龙骨水车比四川的漂亮得多，简直就是艺术品。“大跃进”时统统当柴去炼钢了，残余的我见过，看了让人流眼泪。这个地区，如果范围再大一些，宁沪杭，包括南京，都可以算进去，是太湖区域。但是那几年，这些地方照样饿死很多人。无锡是天堂，也照样饿死人。

一个是成都平原十多个县，这是都江堰水网区，也是旱时可以灌溉，涝时可以排水出去。过去成都市内有许多河，现在都填了，一大破坏，太可惜了。我一九三二年在成都读书时，从我住的地方半边街走到少城公园后门的半边桥，就是沿着河走，一边是河，一边是人行道，河对面是人家，中间还是桥。现在河都没有了，欲哭无泪。成都市本身就在水网上。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成都平原照样饿死人。

再有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也是旱涝保收，珠江水量大，大小河多得很。这个地方以水灾为主。

在这三个地区，那几年照样发生人为的灾难。时间不是三年，现在说三年，说到一九六一年就止了。我的天老爷，一九六一年还没有到顶点咧，实际上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五年。一九五九年不是批彭德怀吗，以后更“左”。一九六三年，我在上海每天除了几两饭吃，什么都买不到。什么时候开始好转的呢？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开始好一点。

所谓好一点，就是危机状态有所改变，不会拿着二两粮票，跑遍上海买不到东西。那个时候，除了想吃东西，不想第二个。我下了班，就拿着提包到处转。那个时候，全国每个人都有一个包，准备有什么东西就买，只要不是草就买。当时我跟保姆一起跑一二十里，跑到上海郊区农民种田的地方，买长到一尺多高的“鸡毛菜”，偷偷买，一买要买几十斤，吃几天，当饭吃。当时没有吃的东西，救命的东西，根本不怕鸡毛菜烂，总比没有东西吃好。买吃的东西很贵，买鸡毛菜都要二三十块钱，而买线装书，四毛线可以买一大堆。一九六三年下半年，上海才开始有桃酥，半两粮票，五毛钱一个。我去买过两三次，给我的小孩子吃，我自己没有吃。当时五毛钱，相当于现在一二十元了吧。所以这个时间不是三年。在上海，有两三年我是下了班就在马路上跑，总想买到点什么东西，结果越饿越跑，越跑越饿。

人民公社好到什么程度呢？我有孩子，腿不太好，准许我有个保姆。保姆是江苏宜兴人，她的儿子叫朱大生，又高又大。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差不多每年，都要到上海来两三次。他当生产队队长，他不是党员。我问他什么道理，他说党员不愿意干。他告诉我他们那里是如何“大跃进”的。

粮食出来，全部交公，一粒不留，根据工分来领粮。当时最强劳动力一天十工分。朱大生又高又大，一天十工分。任何一家人，根据工分分配的粮食都不够吃，只有向公家借。我说，粮食全是你们种的嘛。他说，都是我们种的，但生产队年年全交公了。我们家家都欠公家的粮。全部是人家种出来的，全部交给你，结果还欠你多少。这个就是人民公社，先进在什么地方呢？

说到大炼钢铁，现在有人绝不会信。朱大生说，他们水乡也要炼。宜兴南部是水田，既没有树，也没有煤，更没有铁矿。他们平时烧饭，就是烧稻草。但要炼，非炼不可，上边还组织人夜夜检查，每个村抽干部参加检查队，由上面的县、区干部带着。他们怎么炼呢？把湿泥巴堆成炉子的样子，搞个铁架，把各种各样的枝条、柴草拿去烧，上面冒火，冒烟。烧什么东西呢，烧烂泥巴块。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烧一阵，烟把烂泥巴熏黑了，然后扒出来堆一大堆，全是“钢”。晚上有人检查。我问怎么检查，他说，我们有放哨，只要有检查，我们就烧，平时

不烧。来检查的人看到这些烧黑的烂泥块，说这个“钢”不错，就验收了。我说，你们真妙，成本不高，还把土烧得漆黑，烧得像钢。朱大生说，我也要奉命去检查人家呀。

朱大生到上海来干什么？来卖出口大米。不知出口到哪个国家，总之不是苏联。他们的水泥船不在上海，要到离开上海几十里的一个港口去卖大米。朱大生就住在我们家。他没有地方住，人老实得很。

所以说那几年并不是还苏联的债的问题，刚好相反，反对赫鲁晓夫后，什么都不给他们了，一颗米都不给了。他们也很困难，但我们不帮你的忙了。上海八十岁的人都知道，是要给苏联的不给了。我就在那几年吃了好些好罐头。有一种哈尔滨的酸黄瓜，当时偶尔能买到，一罐五毛钱。为什么从哈尔滨运到上海来呢，上海、北京这两个特别的城市没有东西卖，更不好看。还有橘子酱，一公斤重，一块钱，我都买了一些，因为我很喜欢吃这些东西。一般市民，没有买罐头的习惯。我看见没有什么人买，就去买。

浙江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一九六四年，余明出差路过上海，打听到我在辞海编辑所，电话告诉我他住在外滩。我去了两个晚上，从我们单位到外滩有有轨电车。余明比我大好几岁，是高中同学，当时在浙江省轻工业厅当副厅长。他是老资格，一九三九年到延安了，因为他被捕过，在延安坐了两年牢，一直审查他的这段历史，不相信他，所以从延安到东北，从东北到浙江，当个轻工业厅的副厅长。按他的资格，当个省委书记都可以，是二十年代末或三十年代初的党员。

他谈到一些问题，伤心地为公事哭。我说，你们那里的丝绸好，现在恢复一点了吧？一说，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说，你以为还有啊，桑树条都砍来大炼钢铁了，老百姓都不种了，你以为还有什么桑条，还有那么多蚕。其他地方是桑树，杭嘉湖是桑条，有指头粗，四尺来高，一拉就连根拔得起来。我问，茶呢？他说，茶树也烧了炼钢了。

没有办法，没有东西烧，要交卷，总要拿东西来烧，整个国家几乎都要烧掉了。现在我们的一些专家仍在为“大跃进”辩护，仍在为人民公社辩护，怎么好，怎么伟大。那没有办法，随便你怎么辩护，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这些事情，笑话到任何笑话集都编不出来。现在敢讲的

不多，但我必须要讲。任何有良心的气象学家，应该公布那几年中国的气象情况，公布自然灾害的情况。

实际上中国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不是三年，而是五年。局部地区的真自然灾害年年有，但没有哪一年有今年二〇〇八年这样重吧，当然国家增加了困难，但并没有人人饿饭。

第四编

第二十章 在上海辞海编辑所（1960年6月—1964年9月）

98 调七八十个右派，结果只调去了两三个

我一九六〇年六月调到上海去。上海当时设立了辞海编辑所。这个辞海编辑所缘起毛主席说要重编《辞海》。抗战开始时，上海中华书局用二十年编出了一部《辞海》，上下两卷。抗战时这个书后方就断了，毛主席有一套，常查，觉得这个书有用处。一九五七年在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最高潮中，毛视察到上海，接见老朋友舒新城等文化名人。毛提出要舒修订辞书，甚为重视此事。舒提出调一百个干部，一百万元的计划。后来这些事情由上海市委全盘负责。

这是毛主席的命令，柯庆施当然执行了。这些条件，在当时来说是特好的。找了一所很好的花园很大的花园洋房。关于调人，有个传说。不知是不是舒新城建议调专家，毛主席开玩笑说，那么多右派，现在没有事，你们调去就是了。就是说，那么多教授，那么多大学校长，还有报纸的总编辑等，你们要调就调吧。七十到八十个人，有大学校长、大学教授，还有编辑，其中有我。

我没有去劳改的原因，一是不能行动，二是要留下我编一个东西。一九五八年，我下来后王子野负全责。他找我说，你不能去劳动了，就留在这里，要编蒋介石全集，是毛主席的意思，你也知道，可能就要动手。他说，材料多是公开的，关键是注释，注释比较麻烦，你就在这里做此事。你主要是抓注释。注释牵涉近现代的历史、人物等，政治性很强。上海要调我去辞海，王子野都找各种理由没让我走。我也不想去，在北京臭了，何必还要臭到上海去？拖到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辞海一个副总编辑来北京出差，随便到我们单位来。他一看，我并不是病得那么厉害，结果还是要我去。要我去的原因是编一个大东西光有学者不行，还要有一批做编辑的人。

我一九六〇年六月去上海，到辞海编辑所去报到，一切均很客气。第二天，上海市文教书记石西民派车来接我，接到上海锦江饭店的楼下。这个饭店很有名，楼下有个小会议室，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开。石西民那天在那里开会，他出来接见我，就几分钟，因为他认识我。进北京城前，在新华总社里就是邻座，很熟悉的。这个接见，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打招呼”，跟党内外的人说，这个人，你们不要太整他了。我完全明白他是这个意思。

要调的七八十个人，基本上全部落空，像费孝通，中央民族大学不放，说他现在不当校长，不公开讲课，但可以给教授讲课。山东大学的副校长陆侃如、夫人冯沅君本来也要一块调的，也没有调来。山东大学也这样讲，现在不让他上课，也不做校长了，但可以让他给教研组讲课，结果统统没有落实。最后调成的只有两三个，其中一个叫李毓珍（二十年代的党员，后来失掉了组织关系），笔名叫于振，北大俄文系副主任，翻译了很多俄文诗；一个是我。上海师大去一个姓徐的教授，但没去多久，又回师大了。所以，这个调右派的事全部落空。这件事反过来证明，你打的那些右派，人家单位不放。我们单位也一样，拖了两年。我对自己被调到上海去，至今心里也感到很不安，像聂绀弩、艾青、丁玲这些前辈革命家都去东北劳改了，我怎么能不有愧于他们呢？

99 提意见只能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提真正重要的

我这个身份不好安排。把我放在综合组，就是编务组，无所不管的事务性小组，十来个人，但是编务组的工作，我一点也都没有做过。我的工作，主要是由辞海编辑所长、上海市调来的原教育局副局长杭苇负责。从头到尾，完全由他分配。他从老新四军、老根据地出来，在上海待过很多年，所以知道运动这些情况。按照规矩，我是不能放在重要地方的。但是调你来，又不是专来抄抄写写的。杭苇这个人工作十分积极负责，人直爽，对我相当客气。他要我看稿，提意见。

稿件分四个人看，自然科学一个人、社会科学一个人、文学艺术一个人、历史地理一个人。我复看史地类稿，看后即提意见，处理后发稿。平日我做一些什么呢？我举一两个例子。比如人物评价。稿件里古今中外各种人物评价总体要平衡一下，看有没有太滑边的。中国人跟外

国人比，是不是有评价太高或者太低的。这个活，不是我能做的，但杭苇要我做，只好服从。

另外看长条样。我是看长条样的四个人之一。长条样，就是没有正式印刷前按照笔画排的还没有分页码的清样，没有拼版前叫长条样，长条样还不是正式的清样。看长条样就是提提意见。所有意见，都别在一张纸上，最后交到杭苇、罗竹风那里去。我提了些什么呢？举一条例子。“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条，在一九六几年“左”得要命，被骂得狗血喷头，我提了意见。杭苇看到后，找我到他的办公室，把秘书支开。他说，老曾，你怎么不知道呀。我说，什么事，我真不知道。他说，彭老总为这一条在延安不是被批过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他说，彭老总在一九三九年写过一篇文章，可能是秀才给他写的，对自由平等博爱歌颂了一下，延安知道了，批了他，批他资产阶级思想，说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还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此事。他说，你在延安，怎么不知道？我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远在天边，有各种文件，我们在延安，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以后注意一点。这一来，我就知道了，所有的极“左”的，乱打棍子的，提意见时，只提一些表面文字上的，不能从根本上提什么意见。杭苇在这个问题上怕我出乱子，暗中帮助我，不然，再给你戴一个右派帽子。

我在上海并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我对上海有关同志对我的关照爱护非常感激。我发现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一个人对我采取轻视态度。

100 石西民总结了《辞海》的根本大法

我一到上海，发现工作基本上是停顿的。有一间房，堆满了稿子，一条一条的，没有人管。我进去拿了几条一看，天老爷，这不是中学生写的吗，绝对不能用。在我去之前在北京已经处理过一本“大跃进”时大学新生编的辞典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开始，世界知识出版社从人民社分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出版社，归外交部管。大概一九五九年的秋天，上面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到世界知识出版社去看他们编的《世界知识辞典》的全部草稿，几千条。我每天去，中午给我送饭。我就奇怪，《世界知识辞典》是他们出版社组织的，我是人民出版社的右派，他们那么多专家，哪一个不比我强，为什么叫我去看呢？我当时不多想，现

在很明白了。这个辞典草稿不成话，百分之百否定，但他们谁出来干这个事呢，一否定不是又要当右派吗？

这个《世界知识辞典》草稿简直不像话，没有任何常识。比如英国的工党，印度的国大党，法国的社会党，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这些党每年都要开一次代表大会之类，要选举出一个大体上叫主席什么的人。但这个主席一年选一个，做当年的事务性的联络工作，跟党的领袖完全是两回事。典型的是印度的国大党，领袖是尼赫鲁，以后是他的后裔。我们人民社出版的《世界知识年鉴》是陈原主编的，照规矩讲，一九五四年的主席是谁，就是谁，没有讲是“领袖”。因为领袖比较难讲，有时候是一生的，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要我看的《世界知识辞典》草稿，随便拿着我们社编的年鉴抄，拿着哪年是哪年，全是笑话。不是哪点不对，而是笑话大集中。一个初中、高中毕业生，去搞全球问题，或者刚刚考入大学就编书，全国都是这样。大学把原来的教授打倒，就由刚考进中文系的人编《中国文学史》。这就是“大跃进”闹的笑话。我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看了三个星期，全部看完。但我这个报告没办法写，写出来就是全盘否定。正在为难时，一天回家，在南小街的人行道上碰到陈原。我说，陈原同志，怎么把我调去看这个东西。我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他们是根据他主编的《世界知识年鉴》来编的，拿到哪本抄哪本，全成笑话了。我说，我这个报告不好写，全不能用呀。他说，你不要说了，我懂了。这事我来对付。这个事，了不起，他来对付了。陈原显然也在保护我。

我到上海又看到这样的东西。一房子的稿子，全是一九五九年第四季度“大跃进”刚考进大学的学生写的。我找到副总编辑陈落，他比我大十来岁，是清华大学西语系毕业的，三十年代的地下党员，曾经失掉关系，他当然什么都懂。我说，那稿子我看了一些，我在北京刚好受命处理过世界知识出版社的辞典草稿，跟这一模一样。我报告陈原，陈原已经否定了。陈落说，我知道，你千万不要再讲了。估计编辑所已经发现了问题，大概领导也知道了，包括石西民。上海这些东西是根据什么来编的呢？政治性第一，就是大批判，在政治性下还有什么科学性？通俗性就是“大跃进”。同人人写诗是同一性质。

石西民也在抓《辞海》指导原则问题。一九六一年春天开了一个两

三百人的大会，石西民作了一个报告，提出编写《辞海》的方针：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这就很正确了。这个方针任何辞书都适用，而且永远适用。知识性，辞典首先是告诉人们知识；正面性，讲清楚就行了，二加二等于四，不要扯别的；稳定性，这点很重要，辞书，要供人家翻多少年，这个知识必须是稳定的，不要过三天就不可靠了。这个意见是不是石西民提出来的？也不一定，我想也可能是许多专家提出来的。这个提得非常好。任何辞书、教科书，都离不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辞海》的一个大创造，具有永久价值。而且提出每条的释文要“四至”分明，不宜有半句出界的话。这也可谓是一条经典原则。这些如果是石西民首提的，那石西民的功劳就大了。

但是以后的几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直到一九六四春天《辞海》发排，都是“反修”高潮，一切都是以革命性为准，一切都又全否定了，跟这个方针是根本相对的。要执行这个方针，根本做不到了。政治批判，乱戴帽子，谁也没有办法，编写的人明知道自己是胡说八道，也要这样写。编辑部的编辑看到，知道不对，也不敢说。饿着肚子天天一起“反修”，不要科学，不要知识，就这样胡来。虽然石西民提出了这么正确的原则，但无法贯彻。任何人，只要你一贯彻，就变成反革命修正主义了。所以，《辞海》试行本两巨册就是在这个环境下产生的。一九六四年编出来，很厚的两本，叫试行本，纸张很好，是专门制造的，叫圣经纸，又薄，韧性又强，但内容是“反修”高潮中的产物。此编未发行。当然，作为经验教训，此前的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接着，毛主席的指示又来了，说全国的文联作协都变成裴多菲俱乐部了。跟着以后全部是运动，一年多就是“文革”大爆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

我在上海这些年，业务上可以说丝毫作用没有起。我算好，得到了领导关怀，怕我再出乱子，提意见时，招呼我，反“左”的不能提，这个是善意的警告。在上海十八年，领导、同志们对我很好，处处保护我，我内心感到惭愧，对他们很感谢。

第二十一章 我在“四清”中为三十个工人彻底平了反，至今负责（1964年10月—1966年5月）

101 车间审查部分工人政治历史，不得不全部由我负责，全部无事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经济开始有点恢复了，毛主席又发动要搞“四清”运动。清什么呢？农村的资本主义又发生了，要复辟了，所以要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首先在农村，所有人统统要清查一遍，搞了一两年。城市也搞，所有的单位机关，每个人都要搞。这个事，中央正式作了决定。刘少奇说，“四清”运动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意思是说，农村的人，城市机关的人，“四清”还没有搞清楚的，把这四个方面查清楚；这个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个话跟没有讲差不多。毛主席说不是这个问题，“四清”运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又变成阶级斗争的大运动，而且发表的决定公开批判说，有人说“四清”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是毛第一次公开批刘，在一九六四年就出现了。毛跟刘的矛盾这时已经公开化，书面化了。以后的事情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中央上层当时就知道了。他们听了刘少奇的讲话，以及毛对刘的批评。

简单地说，“四清”是全民的阶级斗争的大运动。每个人都要查。不是被斗，就是斗人，一个也不能跑。在“四清”运动决议中，提出有些“四不清”的人也可参加“四清”运动，作为工作队的队员参加，提高其觉悟，把自己“四不清”的问题讲清楚。我就是作为“四不清”（右派当然是“四不清”了）的人参加的。从一九六四年十月起，到“文革”，近两年。

上海市出版局负责各个出版社、各个印刷厂的“四清”运动。其中有个重点的“四清”对象，也是试点工厂，叫群众印刷厂，由上海市出版局的局长马飞海亲自担任队长。马飞海是老地下党，跟我年龄差不多，人非常好。上海市出版局从各个出版社、工厂等调了三四十个人作为队员，其中我也参加这个“四清”工作队。总之，又把你作为典型，希望你在运动中表现好一点。上海的同志，不管是出版局的局长、副局长，还

是下面的，对我都很好，叫我参加“四清”运动，就是马飞海、丁景唐等同志对我的公开保护。

群众印刷厂有八百多人，是上海印刷厂大型中的小型，中型中的大型。这个印刷厂又印书，又装订，从排印一直到把书印出去。这个厂的装订车间有两百人左右。装订车间是技术性比较薄弱的车间，大概由三十家以上的小装订作合起来的。装订作，就是装订小作坊，但当时就叫装订作。过去私营时两三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装订作，印厂把需要装订的大张印张运出去装订。大一点的装订作有七八个人。解放后，社会主义改造全部改了，合成大装订车间。名义上是一个车间，其实占了许多大房子。这个车间有这样的特点：一是由小装订作合起来的，二是工人的文化程度相差很大，有的过去是小老板，有的过去是还不识字的家庭妇女。

由于这样的情况，这个车间就必然比较复杂。这个复杂，并不是从消极意义上说的，不等于那里的反动派就多，特务就多，不是政治情况复杂，这是两回事。这里边，小业主，也就是小老板有一批，有二十多个人，有的是有机器的，可以称为小资本家。因此，公认这个车间情况非常复杂，“问题”很多，推动工作很难。所谓难，是客观的。文化相差大，年龄相差大，有二十来岁的新工人，有六十多岁的老工人，那时还没有退休制度。还有一些小老板，统统得养着。

“清思想”。在这种工厂里清什么呢？这种工厂是以轻体力劳动为主，又不是科研单位，没有什么脑力劳动者。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反修、反赫鲁晓夫，他们不懂，也无兴趣，那时生活还难得很呢。

“清经济”。装订车间在印刷厂里人数是第一，技术算低级，清什么经济，谁能贪污？拿几张纸出去，或者拿两本书出去？什么地方都要去清思想、清经济，现在我才敢说，那时不敢说，这都是吃了饭没有事干。要人为地制造出一大堆阶级斗争，实际证明也是这样。

“清政治”跟“清组织”是一回事。这个地方有什么组织呢，一个是工会，有一些人给人家戴了反革命、资本家的帽子，其他的，都是工会会员，清什么呢？二个是党，几个党员跟广大工人并没有大关系。共产党内部要清就清，何必弄得天下攘攘？还有几个团员，无非是学习学习。

我就被派到这个装订车间。我们这个“四清”小组有八个人，副组长是个老工人，文化低，人很好，另外有两个大学生，还有两个三十来岁的工人，还有一个是我。正组长挂名而不来上班。清经济，清什么呢，每个月领工资，不多领一文也不少一文钱，闹来闹去就是买卖粮票。那个时候，一两粮票，比现在一百块钱还贵重。没有粮票，饿死也没办法。有一两粮票，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当时江浙天堂地区也有一二十斤或二三十斤粮票换一个媳妇的现象。

装订车间买卖粮票是怎么回事呢？我现在没有粮了，支撑不下去了，我向你买两斤粮票，这就是救命。除了直接买卖，还有转卖，这个是必然的。我有几百块钱，我从你那里买了粮票后，我用不完，又倒一下。相互间买卖粮票，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参加了。你说，这是贪污？就算吧，整一个，法不责众，而且没有凭据，只是大家的印象，某某人，倒卖粮票。这样的事，反复发动，反复讲，效果不大。交代清楚就完了。如果反映很多的，找他谈谈话，让他认认错就算了。这怎么就成了全国性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呢？其他的，啥也没有。要说投机倒把，他没有东西投什么机倒什么把呀。

清经济，我举一个笑话。有一个女工经常把劳动棉纱线手套拆了后织棉线衣、棉线背心。她哪里来的？大概是偷的。她有问题，有经济问题，有贪污。大家反映得厉害，我们就去了解情况。原来她的丈夫是另外一个钢铁厂的搬运工，手套是一个星期发两双。因此，这个女工就有许多，她吃过饭就织。闹了半天，就是这么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反映清经济的事情中，这件事是最大的。真是闹剧！

所以，在普通老百姓里清经济、清思想，都清不了什么。清组织、清政治，他们什么组织都没有，挂名的工会会员，人人都是。结果后来自然就变成了集中清政治历史。我们“四清”工作队一去，印刷厂人事科就把这个车间“问题”多的人的档案交给我们了。别看这个普通装订车间，有些人的档案两大本。各种各样的运动交代、各种表、外调材料，多得不得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上下，人事科认为问题严重。

当时我是摘帽右派，不能参加审查。但后来没有办法，我不但审查普通的，连党员也要我去审查。这三十个人的结论都是我写的，统统弄

得清清楚楚，什么事都没有。工作队的工人同志，年轻的三十岁，年龄大一点的四十来岁，他们的文化不高，对旧社会的情况不太了解，什么叫国民党、三青团，不懂，连青红帮，杜月笙、黄金荣都弄不清，政治上基本上是一张白纸。这些人解放后成为积极分子，确实很单纯，很卖力，表现好，也入党了，成为“四清”工作队的组长或者队员。

我们共用一张差不多有半个乒乓球桌子那么大的办公桌。开始，他们一人分几个人，没有分给我，因为我不是党员，是大右派，形式上必须另眼看待。但他们都相信我，讨论时，没叫我离开。他们也离不开我，讨论这个，讨论那个，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本身比审查对象还小一二十岁，要讨论别人二三十年前的事情，连边都摸不着。开始，我看他们苦得很，没有办法，不得不参加，发发言。慢慢地，可能他们去汇报了吧，我就正式参加对工人的审查了。党员的档案，开始我还是不能看，非党员，我都能看。到了最后，审查对象有两个党员，包括一个支部书记，他们不知道怎么办，还是交给我。这些同志相信我，知道我不会包庇特务。最后，审查历史这个事，就由我一个人包揽了。我提出一些问题，请他们去调查，最后讨论作结论。

由我起草的三十来个人的结论，只有一个人没有作正式推翻怀疑的结论。但也没有增加新的怀疑，因为现有的资料无法增加对他的怀疑，也无法根本推翻过去对他的一点怀疑。这个人，本身问题不严重。国民党垮台时，他在浙江温州不挂牌的据说是非正式特务机关给别人做饭，兼管清洁。这是他自己写的，这就说明他不懂什么。我们还到温州反复调查，问当地解放前的情况。又问街道，街道邻居说，那个没有牌子的房子是有几个人进进出出，但究竟是干什么的，弄不清楚。所以，就是根据他本人写的，他就是做饭和做清洁的，其他的没有，构不成什么特务嫌疑。但对他的怀疑，不能全解除，所以没有作结论，但把性质冲淡了。

另外三十个左右，我可以举四五个人。这些人的事，比小说里写的还有趣。

102 被怀疑是特务的小资本家，其实是解放前救过地下党员的同情分子

李某某，六十来岁的老先生。他原来是有十几个人的装订作的小老板，够得上小资本家了。公私合营后，他也就进工厂了。他本人在老弱残废组，做点零碎的小事。他的妻子五十多了，在折页组。他们说，这个人的问题严重。一是说他解放前曾经寄钱给国民党浦东游击队，二是说他常常去看过去属他的一丈多长的折页机，想复辟，想国民党打回来，收回他的机器。所以，李某某，除资本家外，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

我说，审查别人的问题，最怕始终不见面，背对背，始终乱猜，根据无数的怀疑作了无任何证据的结论，人家都不知道。我说，这次要一个个问清楚，要审查就这样做，背对背的审查，我不参加，要我参加，就要直接谈话。他们同意了。我找这个老先生谈话。我说，听你说你身体不好，饭也不大吃得下去，没有什么事情的。还不清楚的，讲清楚就是了，身体要紧。他什么都不敢说，吓得不得了，尽管我对他非常客气，绝对不是怀疑他的，而是关心的，问他什么地方的人、多少岁、身体什么样，等等，但他还是吓坏了。

正在这时，有人向我反映说，他的妻子这两三天没有吃午饭，恐怕要出事。因为中午在厂里食堂吃一顿饭。中午吃饭带休息有四十五分钟。我就去找这位女工谈，好好安慰她。我说，听说你两天都没有吃午饭，千万不要这样，身体吃不消。总之东拉西扯，只强调要她先吃饭，天垮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对方一听，觉得你不是来整我的。她无意间提到解放前他们家是帮助过地下党的，她家楼上曾经藏过共产党，有三个人，住了两三个星期。我立刻就懂了。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大逮捕，抓住共产党立刻杀头，当时整个地下党到处隐蔽。我问，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姓什么？她说不知道，是她的老伴认识的。这下我就很注意了，一边问，一边听，看她说的像不像。她就有点诉苦了，说很难呀，很危险。我问怎么危险，怎么难。她说，三个人在楼上，我每天去买菜，都是偷偷地不让人家看见。我问为什么，她说，平时就我们夫妇，突然加三个人，每天买菜增加很多。她这个话，不像编出来的，因为她是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能力编。我很注意，但我不表现出来。我就用各种方法再启发她讲具体的事，看她讲的是不是真的。她又提到倒马桶。上海天天倒马桶。她说，倒马桶也难，要没有人的时候倒。我问

为什么呢，她说，一下子来了三个人，增加很多，如果被旁边的人家看见，就会奇怪。我听她这样讲，觉得这些不大可能编造出来，是她无意中讲出来的，真实性非常强。一个人没有实际的经历，你就是一个侦探小说家，也制造不出这样的故事来。我反复安慰她，一定会调查清楚，劝她先吃饭，不会有什么事情的。然后，我又去问她的丈夫，把三个躲藏者的名字弄清了。我回小组，把这些事一谈，就请费全法做下一步的事。我们小组的费全法是中华书局的印刷工人，三十岁，能干，灵活得很。我说，如果地下党真有三个人在他们楼上避过难，去问市总工会，一定问得出来。这三个人，不会是普通的人，职位不会低，一定是中层干部了。如果市总工会没有，就到市委组织部去调查。这种调查的方法，他们不懂。费全法去问市总工会，一问，三个人立刻调查出来了。一个在浦东哪个厂当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一个在哪个区当工会副主席之类的，还有一个也查到了，都是上海市工会的中层干部。后来，费全法又到浦东去见了那个党委书记还是副书记，那个人说有这一回事，他们是在那里躲过。问为什么要到他家去。他说，平时跟这个小资本家就有关系，觉得他思想并不反动，跟他建立来往。一个完全证实，其他两个，就不去见也行。

因为根本问题弄清楚了，说寄钱帮助过国民党浦东游击队的事，就直接问他了。我知道国民党没有浦东游击队，我们倒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说，你浦东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熟人，听说你解放前给浦东那边寄过钱，是不是有这回事？他说，有啊，他恐怕寄了相当于“四清”时的一两百块。我问为什么要寄钱。他说，那个人说他没有办法生存了，要做个小生意，过去认识的，他就寄了。

所以，问题弄清楚了。这个人不但不是反动资本家，相反是在危机时帮助地下党、隐藏了三个党员的进步的资本家。把这些问题弄清楚并不难。不要神秘化，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又不去调查。

103 说人家是汉奸反革命，其实是抗战时我们派出的“两面村长”

朱某某，快六十岁了，是清洁工人，工作表现非常好，但头上戴顶“汉奸反革命”的帽子。人事科就是这样介绍的。但是群众反映好，工

作上找不出毛病，卖命得很。这个帽子是公开戴的，所以更怕。我们又看档案，又派人去调查。他是江阴县对河那边靖江县江边的一个农民。那个地方是敌伪统治，建立了伪政权，但是我们也进进出出的。他是“两面村长”，是我们叫他去当伪村长的，总要有一个人应付差事嘛。他说，我白天应付伪政府，晚上，走几里路就到根据地汇报情况，接受任务。我一听他说“接受任务”，心里就想，一般人说不出来。我问他有些什么指示。他说，敌人要粮食，你说不给，就要杀老百姓的头。他特别讲到献铜献铁。他说，明知道这是敌人拿去做武器的，我就请示，结果是，不交不行，不交就暴露了，所以就收起来，把最差的交给敌人，好的运到根据地去。我一听，这不大像一个文化低的人能制造出来的。如果完全是敌人那边的村长，不会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他即使要编造，也会漏洞百出。你讲的是真的、假的，我一听就知道了。

我们到他家乡也调查过，得出结果，这个人是共产党指派的应付敌人的村长，实际上为解放区工作。因为他的“汉奸反革命”帽子是上海××区公安局戴的，有名单的，他要定期去汇报，我们就向××区公安局报告。××区公安局也派了人来，说是弄错了，就是你们说的情况。我说，为什么不早点解决呢？那个人说，我们的工作也不容易。你们来了这么大个工作队，什么局长呀一大堆，你们调查出来，比我们容易说话，如果我们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右倾、投降。

当时还没有“平反”一说，共产党还有搞错的呀。当时说因为表现好、劳动好等等，说些好话，大家都赞成，摘了帽子。说人家是汉奸反革命，结果呢，不但不是汉奸，而是抗战时立了功的，是共产党派他去当“两面村长”的。想想看，这样的情况有多少？

104 一个真新四军，长年被怀疑是特务分子

胡某某，是真的新四军，被怀疑是特务分子，说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根据是他平日的胡吹。弄清楚这个人的问题，很费力。

胡某某是切边工，行话叫“大刀架子上做的”，很有劲，工作不错，但喜欢胡吹（吹牛）。还买卖粮票，车间里你卖给我，我卖给你。他还有赌钱恶习。当时那点工资真的用不完，能买的东西就那么多，钱没有

用处。当然是小赌，打牌、掷骰子，麻将当时还少。他老讲他是新四军，是从南京对面的江北撤退到黄河以北山东渤海区，又打回来的，功劳很大。过去他是党员，后来没有党籍了，等等。

他的档案厚厚一大本。工作组反复讨论，我也参加。非常奇怪，他的档案里竟有一张党证，是有光纸，比巴掌小一点，油印的，某某人是某某团的党员。我觉得奇怪。共产党从来没有党证制度，这是怎么回事？问“四清”队的几个领导，新四军在苏北有没有党证制度，他们说没有听说过。但是，特务哪有那么笨的，制造一个假党证，这么简陋，不是闹笑话吗？如果是假的，就应该制造得像样一点，制造成这个样子，骗人也难呀。我仔细看，里边的章，跟写的字不一样，写的是某某团，章却是另外一个团的。这样看，我觉得反而更不像假的了。作假的人，公开做出这个矛盾给你看吗？天下任何特务机关不会这么傻的。华北似乎没有盖章之说，但新四军地区有指头大小的章。我们的队伍番号一天到晚变来变去，今天叫什么团，明天又叫什么团，后天又变成地方队伍叫什么团。这个团变来变去，但党的章是老章，永远不变的。这有可能。所以这个党证，我不能肯定是真的，但更不能肯定是假的。我们工作队的副队长，辞海的副总编辑陈落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知道的事情多。我向他建议说，胡某某的经历有北上，有南下，我们两个找他谈一次话，和和平平的，听他讲，提出问题。他如果是假的，上下几千里，怎么来的，怎么去的，他的文化程度低，要骗我们，不可能。

一天下午约胡某某谈，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原原本本讲了。他就是上海人，是外滩修鞋的。大概在日本快投降前两年，一九四四年被抓壮丁，变成伪军。不久打了败仗，新四军把他们解放了，他就变成新四军了。当时我们兵源不够，训练训练，讲讲话，诉诉苦，就变成新四军。大体上他说得对。

他说，我打仗表现不错，发展为党员。我问怎么不错，他说，如果我打得不好，还准我当党员吗？他说，又调我去当某个师长的警卫员，师长是解放后才叫的，那时可能叫某个军分区司令之类。我一听，解放区团以上干部有警卫员，不是党员不能做。

他讲一九四六年民国党大进攻，他们朝北撤退时经过了什么地方。我觉得他说得大体对，他的文化程度不高，编不出来。有时，我插一句话说，你说的地名不大对，音是对的，字记错了。这个是为了解除他的恐慌，让他知道我不是来找他的碴子的；这也是对他的威慑，你乱说过不了关。当他讲到一些地方，我又提出问题，看他讲的是不是实话。比如他讲到山东渤海区，我问他到过哪些地方，他说到了阳信。我说我也到过阳信，阳信出什么？他说，出枣，出梨。全对。他讲到南下时说，北撤也难，南下也难，打了多少仗，牺牲了多少人。这也跟实际的情况差不多。

我问起他党证的事。我说，共产党没有党证制哟，你这是怎么来的？他说，这是临时的。我们北撤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收容队，为了准备受伤掉队时让老百姓收留，发了这个党证，这张党证不但说明我是新四军，还说明我是党员。我这一听，完全不像假的。什么高明的特务都制造不出这些细节来。陈落听了也觉得是合理的。

我问，你又怎么离队了呢？他说，我一到了江阴要塞，就请假回上海，我就不想回队了，所以我就没有回去。我问，还记得师长的名字吗？他说记得，叫某某某。

这次谈话后，我跟陈落已大致肯定，他讲的全是真的，编是编不出来的。有个别的地方他记不清楚，是自然的事情。最后就是调查他说的师长了。十好几年了，怎么找到这个师长？大家都觉得难。我说，当时的师长，现在中央军委、国防部都有名字。我们工作队没有办法调查，我们写一个情况，通过市委组织部，请市委办公厅转国防部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转有关单位。总之，往国防部办公厅一交就行了，或请中央组织部转也一样。这个信发出后，不到两个星期，海南岛来信了，过去那个师长现在是海南岛某舰队司令。这个司令立刻回信，关心得不得了，介绍这个人怎样怎样，本人所说均属实。说他还派人回上海找过两次，没有找到。这个材料一来，情况完全清楚了。

这种很复杂的历史，叫一般的人事科去调查，怎么弄得清楚？一般工作队，也弄不清楚。所以，我们把一切复杂情况都交给人事科，很危险。

105 被认为是“滥权”病退了女工的女支书，差点被开除党籍

诸××是党支部书记，权力比车间主任大。这个女同志能力强，脾气大，工作方式不好，得罪人，对她的反映很多。一、说她父亲是大汉奸，二、说她是洋奴，历史不清，三、说她在“四清”开始前一两年，对女职工进行过搜身。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一次有人丢东西，她把几个女职工叫到她的办公室去，没有搜出结果来。四、最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去后才爆炸性地说她在一九六二年越权把女工汪某某病退了。最后一事闹得天翻地覆。

一九六一到一九六二年，全国饿饭的人很多，全国单位要减员，中央紧急政策。诸××把一个姓汪的女工病退了，是××区核防所出的医生签字证明了的。当时上面规定，估计这人一年或者两年之内不可能上班，就要病退。退回地方，由民政局救济。这是压缩开支，减少各单位支出。

我们“四清”工作队一进厂，汪某某就来了。很多人支持她，说诸××让汪某某病退，没有根据。这个问题最尖锐，用的时间很长。诸××是车间支部书记，我是大右派，按规定，我是不能做党员的“四清”工作的。但是，这个问题复杂，还是交给我。我接手前，已经开过两次批判会。“四清”工作队的队长马飞海来看了，说不要这样搞，这是斗争会，诸××的脾气那个样子，万一出事怎么办？

我没有权力阻止开批判会，但让我接手调查，我愿意。首先她父亲的名字我听说过，印象中是个诗人，在民国初期当过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之类，汪伪政府前南京有个汉奸“维新政府”，主席叫梁鸿志，她父亲又是梁鸿志的秘书。我就请教他人后找到古籍出版社的富寿荪同志问诸××父亲的情况。这位同志说，诸的父亲是清朝末年同光诗体的代表。他还帮我找来书，证明诸××之父是诗人、名流。

诸××父亲的情况弄清楚了，确实是大官僚，是汉奸。但我们关键是查女工汪某某被病退的问题。如果不是核防所的意见，那就是严重违纪了。医生签字的地方，写的是医生的名字，但多人核对，是诸××的笔迹。这下，我们就紧张了。我们让一个女大学生去查核防所的档案，

还让她把医生的签字带去给医生看。医生看了，说不是他写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轻易做结论。我知道一点，住院的病人，医院有另外一套讨论病历。这个大学生跑了几次，觉得太啰唆。我们只好商量请另外一个女工，工作队员张美珍去。我说，据我所知，任何医院内部还有一个讨论病状的档案，是内部讨论的记录，一般不给人看，只有特殊情况，如上级卫生部门来调查才给看。我说，对诸的处理意见，只有看了这个档案才能决定。我对张美珍说，你要详详细细地说明，去哀求他们，说明这个特殊档案与我们处理一个人的关系，请他们给你看，有没有他们讨论的档案。张美珍跑了两三次，真的有内部档案，档案的诊断结果是汪某某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内不能工作。医院只作了这个结论，退不退，中央有文件，因为签字就要得罪人了。有这些材料，基本上就把诸××的主要矛盾弄清楚了。

领导派我找诸××谈话，她不知道我是右派，如果知道，肯定会大骂我。当时规定，工作队所有人的身份都不公开。我把她找出来在食堂里谈。她的性子急得很，见面就说，你们把我开除好了，你们把我开除好了。我说，诸××同志，慢慢来，你看这个样子是不是要把你开除的样子嘛。我只好说，组织上了解你，不然不会找你反复谈。你的父亲，调查过了，是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你呢，具体的情况你不知道，但你的情况跟你父亲完全不同。她一听，就流泪了，说，我父亲有七个小老婆，我是第七个小老婆生的。我三四岁时，父亲就去世，我们被赶出来，就跟乞丐一样。我父亲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我是依靠母亲做工带大的。她这一说，她的出身大汉奸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不是说她是洋奴吗？这个问题也要问清楚。我就说，听说你还会跳舞、会唱歌、会吹洋奏乐器。她说，我是被送到天主堂去学的。天主堂经济也困难，我们就去婚礼和丧礼上演奏，大商店开业，我们也去。原来她是干这个事，并不是洋奴。我说这个事我知道，大城市都有，解放后一段时间还有，我在广州看见过。

这些事情问清楚后，就剩最后的医生签字了。我又问她，我们调查了，好像医生的字迹是你的，怎么回事？她一下子又爆发了，又大哭，说，你们把我开除好了，你们把我开除好了。我说情况我们基本都了解了，你慢慢讲，慢慢讲。她看我不是整她的，说，是我代医生签名的。

我说，你怎么去干这种事呢？意思是你怎么干这样的傻事。她说有什么办法，病退是得罪人的事，有指标，有任务，医生不签字，我也不知道高下，就代医生签了。她承认了。我说，一切都清楚了，现在你的任务是好好吃饭，注意健康，大事我们替你保险。上面只叫她做点自我批评了结。她工作积极，好面子，好胜，方式有点简单。这类同志是解放后第一批积极分子，非常可靠。

106 “劝退”党的会上，临时暗中紧急改变“劝退”决定

失掉共产党党籍当时有两种，一种是开除，一种是劝退。朱××，三十多岁参加过新四军。他是怎么到上海当工人的，没有多问。他们夫妇都不会理家，当时有高价粮卖，他常买高价粮，钱不够用，到处借，欠工厂的钱也比较多。大家对他的意见较多。就在“四清”期间，一九六五年夏秋，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报说父亲去世。他向厂部借了二百元。其实朱××父亲这时并没有死，他弟弟打电报时，父亲病重，以为活不成了。当时我们不知道，朱××也不知道这些真实情况。朱××寄钱回家乡如皋或东台，本人没有回去。这件事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就在他寄钱不久，工作组因事外调，被调的人刚好从如皋回来，说见到了朱××的父亲，还到朱××的父亲家坐过。我们就觉得奇怪了，朱××说他父亲死了，寄了钱回去，但他父亲并没有死，他公然说父亲死了来骗两百块钱。

小组请费全法到朱××家乡去调查，真的看见朱父还在。费全法回到上海，汇报了情况，说是弟弟估计父亲会死才打的电报。我说，这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证明朱××是否欺骗，还必须证明他寄了安葬费后，是否还给父亲写了信，如寄了信，就证明他知道父亲没有死。厂里的人都知道，朱××对他父亲好，常寄钱，寄信也很多。我对费全法说，恐怕得再去一次，用非公开的办法，看有没有朱××再给他父亲写的信，如果有，问题就大了。我对费全法说，你的方法必须转弯抹角。他拿了一个空信封回来，是一九六五年几月的。这个信封的日期，说明信是向公家借钱以后写的。上面研究后，觉得朱××不可挽救了，觉悟低，决定劝他退党。

为了扩大影响，劝朱××退党的会，邀请了十多个老工人参加。我

跟费全法在旁边听。

就在开会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信封有点旧。我对费全法说，那信封好像旧了一点，能不能确定邮戳是哪天的？费全法是搞印刷质检的，说，我借放大镜来看。我马上递了个条子给主席说，请你现在设法拖时间，信封可能有问题，现在不能做组织处理。费全法拿放大镜来一看，“1963”“1965”，“3”与“5”两个字，就看清是“3”而不是“5”，也就是说这是前两年的邮戳。这下查清楚了，是旧信封。所以，我又立刻给主席递条子说，这个问题千万不能谈了，是旧信封，就是批评一下。

这件事如果不是小心，就会冤枉一个好人。

“四清”从一九六四年的四月搞到“文革”前，一年多。经过调查，证明这个印刷厂的装订车间的三十多个人没有问题。后来“文革”一来，过了半年多，说“四清”工作队是镇压群众，要交代。我说，我去吧。我可以当着群众的面，把一个个人是怎么审查的，一个个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统统说出来。陈落说，算了，你不要去，去了没有用。“文革”了，是非全翻了，越有理越有罪，现在要全是坏人才行。

作为一个摘帽右派，在这个印刷厂“四清”，我总觉得这是我这一生干的一件好事。三十多个人的结论，全是我写的，像部福尔摩斯侦探案。我全像办案似的，同一般所谓搞政治运动全不同，一个疑点，一个反证都不放过。

我这个人可谓“不学无术”。这个成语一般是骂人最厉害的话。如果我们把“无术”理解成为没有什么大的办事本领的话，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办事本领，那就是我愿、也敢对“人事”问题负责。很多人怕挨此事之边，我却十分喜欢钻进去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我一生毫无所长，凡遇到人的“历史”难题，涉及“整人”的，只要允许我过问时，我一定主动过问。孔子在《语论》中说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个“四毋”主义其实就是一个主义：不要主观主义，也就是胡适强调的四个字“拿证据来”！凡对人的政治怀疑，全没有证据的，在我的力量能及之处，我一定给予推翻。我现在已经进入九十岁了，还能活几天？吹牛会被人揭发得更惨。近来，我写了一首自寿诗《微觉此生未整人》：“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

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第二十二章 半饥半饱，强作风流

107 我的关节炎竟然治好了百分之七八十

在北京人民社时，我的关节炎严重，走不动，我住的地方与我办公的地方，只有一站地，但都走不动。走不动怎么办呢，便找了一个三轮车工人，用破三轮车拉我上下班。然后他就做清洁、烧开水等杂工。他也很高兴，他有正式编制，后来当收发。我当了右派后，当然不能坐三轮车了，我就靠拄棍子。

到了上海后，一九六三年，我到医院去看一般的感冒之类的病，医生姓李，四十多岁，他问我还有没有别的病，我说还有关节炎。我把我的情况讲了，说走不动，还把拐杖给他看。这个李医生好得不得了。他说，治疗试试看。我说我治疗过，没有效果。他说，再试试。他去联系骨科，骨科一个专家的回答也很科学，说你这个类风湿关节炎，目前全世界都没有治疗的办法。这个病古时候就有，所以，治可以治，一般不大见效。很客气。这个话，我在北京就听专家讲过。可是这个内科李医生说，试试吧。他给我吃“可的松”，激素类药，当时还没有“强的松”。我照着他给的药吃。两三个月后，在商店柜台买东西，买完走出来，棍子都忘记了，又回去拿。李医生太好了，但过不了多久，这个李医生不见了。我问护士，说调走了。我问调到哪里，说不知道。李医生走后，我还找其他的医生，其他医生说，既然有效，就可以治下去。我吃“可的松”，三个月后是一天一片，然后是一天半片，最后服到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一九七〇到干校劳动时，也带着照样服。

“文革”开始时，我的关节炎实际上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了。从走不了几步，到后来在干校劳动样样都离不开我，真是没有想到。现在老了，九十岁走不了路，不是痛得不得了，只是隐隐痛。

108 “文革”前，我在上海是怎么度过业余时光的

逛旧书店，买两种书——

那个时候物质生活很困难，不用说了。政治生活就是“反修”，一年比一年紧。但是还有星期天，还有多数晚上的时间。当时又没有电视，我在上海的业余消遣主要有下面一些。

逛旧书店。上海旧书店在福州路。星期天，就坐四十九路公共汽车到福州路口下，在那里待两三个钟头，中午坐车回家。旧书买什么呢？我买两种书。一种是线装书，买来做什么？做大便纸。那个时候没有大便纸卖，上海也没有，单位每个月发很小张的三十张。买了些什么呢，现在讲，实在对不起，有《二程全书》《朱子语类》《王阳明全集》等，这些书解放后根本就卖不出去，很多，《二程全书》有几十本，纸还比较好。有中华书局的，也有商务印书馆的，你花几毛钱，一块钱，提两大捆回去。同时我不喜欢理学，我对理学厌烦得很。中国搞成这个样子，理学家要负很大的责任。

另一种是我喜欢的书，因为钱不多，买些零零碎碎的。比如《世说新语》，几种版本我都买，有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本，有商务印书馆的四库丛刊本。当时一堆一堆地摆在那里，没有人要，三四毛钱一本。文字漂亮得不得了。还有董解元的《西厢记》——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贾岛的《长江集》。《长江集》，很薄，万有文库本，有光纸的，五分钱或一毛钱，字一点点大。我看了后，倒数的第三首诗吧，好像是“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记不清了，每一个字我都画了红圈。其他有几首也画满了。还有三曹诗集里的一些诗，我也是圈上加圈。

批邓拓的时候，因邓拓引用过贾岛的诗，说邓拓要拿刀杀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就知道不对了，我也画了圈，不是说我也想刺杀元首吗？要赶快消灭书。那时，什么书都有问题。这一类道林纸的，反光的，很重，水又化不了。怎么办？第一，不敢烧，要冒烟，抓到不得了，就是反革命。第二，又不敢拿到废纸店去卖，怕废纸店有人监视。当时就是这么荒唐。因此，我放在水盆里泡，发涨后，撕碎用手捏成蚕豆大，放进马桶一边冲一边倒，再查，你查不出来。那时，逼得不得不想这样的办法。因为查出来，说不清。尽管是非常薄的唐代诗人的一本旧书，你在上面画了红圈圈，就可能是反革命。

在这个问题上，田家英就吃了亏。一九七八年以后，我见过他夫人董边。

这些故事现在为什么讲？因为没有人想得到人们会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而今天还有人要歌颂这个怎么伟大，我觉得真是不可理解。

除了逛旧书店外，还逛文具店。文具店有纸笔墨店。福州路过去拐弯有个河南路，河南路有家很大的墨庄，叫曹素功墨店，各种各样的墨多得很，观赏观赏，买点零碎的，两毛、三毛的，十几二十块的买不起，但经常去看，太好看了，想不到墨的形状竟是数十百种的。

逛旧货店、古董店——

上海广东路有一家很大的古董店，延安中路等处也有。上海古董店、旧货店不少，那时还开着，只是没有人去买。我没有什么知识，只是看看。当时卖的东西多是几块，而不是几十、几百、几千。比方说，紫檀木的笔架，两三块，现在一万块钱都买不着。各种小玩意，镇纸的东西，有象牙的，有竹的，有玉的。象牙的，大概不到十块钱，但买不起呀。字画一大堆，都三块五块。木器店也有。有个圆桌子很漂亮，是花梨木的，现在叫黄花梨，要十五块钱。价钱不便宜，但买回去，放在那里。一个右派，不知道自己犯的罪还消遣，不是自己找罪受。我只是去看看，看了后，心情好一些，时间也过得快一点，一个上午就过去了。

跑旧货店有一个目的，我要卖一点旧货。当时旧货店的东西还是很贵。国内什么都不能生产，什么都不准进口了，偏偏我有一些东西可以卖。我有几个照相机。一九三六年，我在重庆北碚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当练习生会照相。解放初，我买了几只旧照相机，德国的蔡司依康、罗勒福来、徕卡都有。蔡司依康相机有两种，一种照小的，两寸，一卷照十六张；一种照八张，这两种我都买了，因为已成废品了，两种加起来，不超过五十块。还有观剧镜，外国进口的，镀金的，很漂亮，我也买过一个，好玩，也便宜，那个时候三五块钱，也是旧的。还有金笔，解放后，在广州地摊上，五一笔、派克笔，根本不值线。五一金笔，一支旧的可能相当于一九五四年币改后的两三块钱。我大概一样买了一

支。还有一种瓦特曼金笔，中国人只知道瓦特曼是墨水，也有金笔，我也买了。

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派上用场了。我的东西都卖了。上海有钱的很多，会买东西的人更多。觉得钱没有用，买的人，不一定是投什么机，可能是绝望的心情，买点旧货看看算了。好东西，一两天就卖出去了。

上海旧货店的人都是有眼光的，他收这些东西都是高价。因为上海有一批人，手里有钱，又懂这些东西，知道以后再也没有这些东西了，不准进来了，就要买回去，贵也要买。旧货店帮你卖，非常合理。一般是七折到八折。比如他卖了一百块，他通知你，他收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佣金，给你七十块或者八十块。卖解放初买的东西，也只在上海才卖得出去。

听音乐——

上海音乐厅当时在延安东路，离外滩一站路，现在整体搬家了。我办公的地方在陕西北路，有轨电车可到。一九六三年夏天后，饥饿的情况稍有缓解，音乐厅才有演出。每次演出要登广告。只要有演出，不吃午饭，我就去买票，两毛到三毛一张。买好票，立刻用粮票买点东西回来上班。回来的时间不够，要迟到一点。迟到一二十分钟。我跟一个副总编辑在一个小办公室，这个副总编辑不管这些事，普通的办公室不行，迟到是不行的。五点过下班，就不着急了，七点才开幕。

其实我哪里懂这些东西，就是散散心。但是，到现在还记得哪些人演的什么。不是有意记的，什么原因，说不出来，但是这一辈子就记住了。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卫仲乐，六十几岁，白头发，弹《十面埋伏》，想不到琵琶弹得那么精彩。还有一个陆春龄，是个三轮车工人，报上介绍过，吹笛子《江南春早》等，好得不得了。温可铮，个子不高，男低音。男低音是很难唱的，世界上不多。中国二十世纪以来，我所知道的，他是一个。好不好，我无法评论，我不懂。还有一个，叫杜矢甲，跟萧军的作风差不多，在延安对谁都不理不睬的。在延安，我听杜演唱过两三次。他不大出台。他唱《伏尔加船夫曲》。二十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出名的男低音只有苏联的夏里阿平，高尔基的朋友。我在

台下还见过拉二胡的闵惠芬，她拉《二泉映月》《江河水》。我看她比赛时，年纪很小，坐在椅子上，脚似乎还不着地。

为什么六七十年前听过一两次的，连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作品现在还记得，想也不用想？因为我自己没有才，我尊敬有才的人，我佩服有学问、有专长的人，我尊重他们，我觉得他们了不起，所以把他们记住了。另外，我不会悲观的原因，是我还有这些可笑的闲情野趣。

坐公共汽车逛郊区——

当时在上海一张月票可以到处跑，但是郊区要另外买票。所谓郊区，就是离开上海市区十几二十里以外的地方。上海郊区什么样子，我也去看看。老看南京路、淮海路，有啥意思？

上海周围附近的市镇，什么七宝、宝山、朱家角、高桥，我都去过。我坐着车，看一看，又坐车回来。七宝、朱家角是比较大的市镇。现在鼎鼎大名的宝山县，当时就是一条小街，什么都没有，连我们四川的小乡镇都比不上。到高桥看到了杜月笙的杜家祠堂，大门外墙上好像有用金箔贴成的一篇杜氏族谱序，似乎是章太炎写的，说杜月笙的祖先是杜甫，妙不可言。

去转郊区是为什么目的呢，什么都不为。不买东西，也不卖东西，反正花钱的话，就是三毛、一毛五的票钱，不花钱的话，就是月票。我总不能说在上海待了这么多年，只知道南京路、淮海路、外滩嘛。这也是开阔眼界的办法。

第二十三章 “文革”早期：牛棚虐事（1966年6月—1969年9月）

109 什么人进“牛棚”

“文革”开始时，上海辞海编辑所相当庞大了，七八十上百人了。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单位里不断出现各种各样的造反派。“搏苍龙”“抓刘邓”“革到底”“学林江”，这类战斗队和革命司令部多得很。前半年，一九六六年六月到同年的十一月十二月，我是单位的第一个焦点，你是右派，大右派，文章做起来很方便。做就是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大打人，就是骂。大字报如山似海。天天有高潮，骂我根本不能到上海前线来，上海是国防前线，怎么能让这种反革命分子来呢？说我是周扬派来的定时炸弹，不过瘾，又说是刘邓黑司令部派到上海来的特别情报员。我举这些，是好笑，怎么会闹成这样？一点不稀奇，当时全国都是这样的，没有说你是日本派来的特务，已经够客气了。再下去，就可以说你是日本派的特务了。这样以我为中心，闹了半年。到十一二月，我发现有张大字报是几个党员写的。他们本身是“老保”，是靠边的。他们说，我们单位“文革”的大方向偏了，大方向应该是揪“阎王殿”。这张大字报出来后，情况才有改变。这些党员都到北京去串联了。单位里十几个真造反派真干起来了，很厉害，楼梯、房子，里里外外贴满了反对“老保”的大字报，把矛头一下全对着“老保”，即多数群众了。

第二年，一九六七年年初就开始设牛棚了。我呢，是第一个进牛棚的。这个牛棚里只关我一条牛，是旧式花园的花房改的公共食堂，不准我到办公室，白天劳动。

我们那个单位，与季羡林《牛棚杂忆》写的相比起来，没有那么凶，没有那么残暴，但折磨人的花样可能比他们多。我这里尽量不重复，全国讲得不少了。

当时上海的牛棚关十种人：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资本家、走资派、反动权威。又可简称“地、富、反、坏、右，叛、特、

资、走、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其他，扯不上边的，就给你戴上更多帽子后关起来斗，当然大单位关的范围比这个宽多了。

当时什么叫“反动权威”？现在的青年人可以说想死都想不到。凡是你有一技之长的，就是反动权威。理发理得比别人好，工资比别人高，是反动权威；炒菜炒得好的，也是反动权威。更奇怪的是编竹篮子的、编竹筐的师傅，也叫反动权威，都是要挨斗的。“文革”开始，上海的理发店挂毛主席像，两边还摆上些什么，跟供菩萨一模一样。理发的人去，首先问，你是什么货色？当时谁都怕，是什么就说什么，如我是地主、我是右派、我是资本家等等。问完，叫你向毛主席请罪，在毛主席像前哇哇请半天罪。请了罪，叫了口号，才给你理发。我去试过一回，这个理发比坐监狱还难受，宁肯上杀场，我也不去理这个发了。没有办法，我就在小弄堂里理。当时很多家中无收入，妇女都出来理发了，也不管会不会理，拿着小推子，一块布，一个凳子，也不要镜子。当时牛鬼蛇神太多，我们单位七八十个人，揪出来二十三个人，这些人怎么办呢，工资扣了，去理发也要先请罪，于是，就在弄堂边，一毛钱理了，也不洗。有一天，我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理发员理得很好，还有一个镜子，就去找他理发了。我一边理一边跟他聊。我说，你不是一毛钱的家庭妇女来理发的，你的手艺高明得很呀！他说，我是某某大理发厅的理发师。我说，怎么到这里来了呢？他说，你不知道，理发店理得好的都要挨斗的。我问，斗什么呢？他说，斗反动权威。他让我向近处上海美琪电影院斜对面的一间旧平房看，那是个编竹器的合作社。他说，那里才开斗争会。我问斗什么。他说，斗师傅，反动权威。到这个竹器社来编竹器的都是附近的贫民，来求生的，竟然成了反动权威。这个理发师说，我们的理发店已经有人挨斗了，我再不跑出来，就斗到我的头上了。我不好意思，给他四毛钱。其他大理发店是八毛一块多。他不好意思收，说来说去，收了两毛钱。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绝不是只有哪一个人感到恐怖的问题，人人都感到生活在惶惶难以终日的世界里边。编个竹筐，技术好一点，都要被斗。一切只许坏，不能好，不许你做出成绩，任何人要做出成绩，那你就是牛鬼蛇神。当时小学教师、小学校长，大部分都被打成牛鬼蛇神了，提着破痰盂敲几下，叫喊我是什么什么牛鬼蛇神之类。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我住的房屋后面，我亲眼看见了。有些小孩子，拿着木棍赶老师。当时的气氛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全地

球都必然会照这么办，先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然后“五洲震荡风雷激”，“环球同此凉热”了。

一九六六年，陈伯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一个号召全国大斗特斗、大乱特乱、天天刮十二级以上台风的总动员令，从此全国就人无宁日，地无宁日，国无宁日，以致有那么多坟墓也无宁日，延安的“四八”烈士墓也被毁了。而所谓“牛鬼蛇神”又是无任何明确定义的，今天你算权高气大，但一声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坚决的保皇派”等等，你就一切都完了。在很长一个时期，“文革”中的前三四年吧，“人”与“牛鬼蛇神”之间是没有明确区分的，今天你斗别人是“牛鬼蛇神”，说不定明天你就是“牛鬼蛇神”了。一九六六年秋冬或一九七七年春，一次在上海辞海编辑所大斗“牛鬼蛇神”时，我被插着大“标子”（旧时押赴刑场砍头时插在罪犯后颈高过头的大标牌），上书“大右派曾彦修”，字少醒目，倒也简明。始终押着我赶上“斗牛”场并被斗的，是一位原国民党政府浙江南部温岭县的“推事”，据说是县法院的审判官。（此人最后似也未进牛棚，不知有何法术。）我心里想：这倒好，蒋介石何必“反攻大陆”呢？这不是已经实现“国民党大审共产党”了吗？上海事实上已经把革命与反革命翻了个天了，大概是一九六九年八九月间，表面上以所谓“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名义，组织多少万人去消灭江南造船厂的另一个造反派，结果竟把“江南”船厂的地下党员视为反动组织，公开在文化广场设办公处，要江南厂的地下党员去登记自首（这一登记是不是明白叫“自首登记”我不甚清楚）。解放后，我们并不要每个国民党员都来登记，而是只要它的区党部委员以上的党官来登记。我当然不是说一切“文革”中的全国乱打乱斗，都是来自陈伯达的这一号召，但它们同这个号召是绝对分不开的，则是事实。

110 打扫厕所的学问，我可以写一本很不错的小册子

我一九六七年春进牛棚，到一九六九年，将近三年。干了什么呢，我择要地讲讲。打扫厕所还要“择要”讲，学问确实不少。

一清晨赶到单位打扫清洁。开始是我一个，后来就多了。进了“牛棚”的，都来打扫。我们单位是大资本家的花园洋房，有个很大的花园。

房屋不让我们进，我们打扫公共的地方，特别是厕所，楼上楼下好几个，而我是打扫厕所的真正的专家。平生唯此堪称杰，打扫厕所可称王。关于打扫厕所，我可以写一本书。“文革”后，邓小平曾经夸奖童第周，说童第周真是个科学家，打扫厕所，也打扫得非常干净。我看了后，心里有点不平。我不是科学家，但我也打扫得很好，坐便器内部，工具弄不到的地方，我都是用手去弄干净的。外边花园里的小便池，可能几十年没有打扫过，我全是用手。还有厕所的地板，多少年没有去垢，我是坐在地板上，拿着钝刀，一边刮，一边擦，一寸一寸弄的。又要刮干净，又不要伤地板，好容易！所以，打扫厕所这门学问，我可以写一本小册子。除了童第周外，全国打扫厕所打扫得好的，一定千千万万。既然打扫厕所了，就把它打扫干净。打扫女厕所，我尤其卖力。没人时，进去反锁，打扫半小时出来，让人进去。如此反复，便完成任务了。我故意夸大地两手拿满清洁器物，大张旗鼓地进进出出，让人明眼看见，以免发生诬告。

打扫厕所的工作，对我来讲是长期的强项。划了右派到上海去，就没有断过。这个单位对我很好，很客气，甚至优待，重体力的劳动没有让我做。但是扫厕所，我一去，就要打扫。可能是上面规定的，你没有到东北、西北去劳改，必须在本单位劳改，而且还必定是打扫厕所之类的。其实，打扫卫生本身没有什么下贱，是规定的人头脑有欠清洁。我对接受打扫厕所的工作特别高兴。因为就没有人认真打扫干净过。我认认真真的，每个平方寸都要打扫干净，至今足以自傲。

他们七点半上班前，我们就要打扫好，他们上班，我们就滚开，到牛棚去。

我们单位调去的右派，有四个。李毓珍，老前辈了，我们没有要他多劳动，我跟另外两个右派，一年要四次到中华书局图书馆去做一次清洁。这时中华书局的资方在大陆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图书室由辞海编辑所代管，也可以使用，很大的，几层楼，几十万册书。图书馆平时关起来，每一季要彻底打扫一次，透透气。一次要三天。我心想，这些书商盖这么大的图书馆楼，藏这么多书做什么呢？

111 天天早晚请罪中之千奇百怪

早晚两次，在毛主席的大像前请罪。伟大叫了半天之后，叫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还要叫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完了后，鞠躬请罪，一鞠躬，两鞠躬，三鞠躬。一天必须做两次，一直做到进了干校后，右派们还是得集中做，最后做到林彪事件后，这个事才自然放松了，没有人抓了。

我们单位有个人更特别，叫钟吉宇，解放前是中华书局的中级职员。中华书局解放前是私营的，商务是第一号大，它是第二号大。钟吉宇是个居士，编过佛教的刊物。这个老先生说话很耿直。造反派天天来牛棚批斗，每个人都要自报身份。我报右派还不行，一定要报“大右派”。他呢，他报不出来。他说，我是中华书局的职员。造反派敲他的脑袋，敲来敲去，老斗他，说他是骗子，是伪居士，说他信佛教是骗人的，还说他是资本家，非要他承认是资本家不可。哎呀，钟老先生呢，要辩。说，我怎么是资本家嘛，中华书局解放以后公私合营，党组织要开三方代表会谈，中华书局资方在上海一个人也没有，因为规定要三方开会后作出决定执行，组织便指定我当资方代表。我跟资方没有关系，我是个小职员。他坚决不承认，不断地辩论。造反派便不断地敲他的脑袋，恨透了他。最后把他弄出来，单独请罪。为了他，造反派在单位花园里几根仿古希腊柱子的背后，设了一个毛主席像，跟神龛一模一样，让他每天老早来，跪在这个像前面请罪，八点后才能到牛棚去。下午六点钟放我们回去。他呢，五点半后又让叫去跪着请罪。很长的时间，有一年把。这是个倔强的老人，人格高尚。这些事都是从上海某大学请来支援我单位的几个学生干的——整个民族被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112 牛鬼蛇神有的不准坐公交车，后来全不准坐

我们单位造反派规定，少数几个牛鬼蛇神，上下班不准坐公交车。其他的，可以坐，但是，不许坐，有座位也不许坐，只能站着，如果别人要你坐，你要说，我是牛鬼蛇神。世界变成这样，想得到吗？阮友秋是老前辈，据说是个很老的党员，留学日本的，他翻译的书我也看过。当时阮友秋大概六十好几了，也没有退休，平时来辞海上班，坐在资料室一张桌子边，资料也不管，属于安置性质，维持生活而已，没有什么任务。解放后一二十年，大一点的单位，都有这种现象，也就是让一些老人的生活能维持下去。阮友秋老了，身体也不好。他住在虹口那边，

到辞海编辑所来，很远很远。他坐的那路公交车上有个女造反派很凶，发现他坐了，叫他站起来。造反派还要斗他，并规定牛鬼蛇神绝不准坐。阮老说，我站不动了，我老了。不管，照样斗，照样骂。现在有些人，写“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绩怎么伟大，想把这些事统统抹掉。

不仅平时不能坐，我们到郊外很远的地方劳动，也不能坐。造反派把单位所有牛鬼蛇神，包括年纪大的，弄到郊外钢筋水泥构件厂去劳动。这个厂的劳动很重，这种苦地方造反派不派人跟去，我们自己去。带队的人，他能劳动，另外还有两三个身体强的，他们去顶，我算中等。我干什么呢，我推车，推石子，准备拌混凝土。

我们中有老先生四五个怎么办呢？我一面推石子，一面还受领队之命负责招呼他们，担心他们出死亡事故。我给他们安排一点像是在劳动样子的劳动，这里擦擦，那里摸摸。这个厂比较好，造反派不管我们。我们的老人中有傅东华。

这个工厂在郊区，出厂门走好久才是有轨电车的终点站，回家上车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为什么这样晚呢？水泥厂劳动后一身全是水泥，下班后，必须冲干净，吃晚饭才走，所以离开工厂时，已经坐末班车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摇摇摆摆，我们也不能坐，我们不得不设法把傅东华围起来，让他坐坐。

113 不准在食堂吃饭

辞海编辑所的食堂有六七张桌子，食堂的清洁全归我们管，但是吃饭的时候，所有的牛鬼蛇神不准跟其他人一起吃。群众并不赞成，但没有办法。我们的造反派是跟王洪文的工总司联系在一起的，厉害得很，那是皇家造反派，谁也不敢惹。我们二十七八个牛鬼蛇神，吃饭时在食堂外边等，下雨就淋雨，大太阳就晒太阳，等他们吃完后，我们再进去。我们急急忙忙吃完后再洗碗，收拾食堂。洗碗少不了我，那么多碗筷，没有几个手脚快的不行。我们牛鬼蛇神里当队长的，手脚快，我们三个右派，手脚也快。其他人运输、摆放碗。下午或者开斗争会，或者在花园里劳动。这个食堂一天到晚都是我们负责清洁，但是，就不准进去吃饭。

114 天天读：他们干出来的恶事，不应该是人类想得出来的

天天上午，有时候加下午，天天读，天天批，天天斗，天天思想汇报。天天读，读毛主席的语录、文章；天天批，自己汇报，自己批评，汇报思想，除了口头的，还有书面的；天天斗，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有时候斗得很长，一个人斗两三个星期。

毛主席的书，读什么呢，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我们这些人就是国民党的人，敦促我们投降。其中一个牛鬼蛇神姜兆良就是山东根据地十几岁参加过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打过杜聿明的，结果他变成杜聿明了，要他“投降”。

事情更坏到在什么程度呢？当时造反派嫌他们的力量不够，只有十八个人，嫌其他的都是老保，从上海师大引进来了三个学生。这三个学生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他们干出来的事，不是人类想得出来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些文章在三个学生没有来之前，已是反复背过的。三个学生来了后，叫我们背《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怎么背？叫我背一段，叫另一个人背第二段，后来发展到背到一段中途，停下来，让下一个人接下句去背。一背不出来，就打你的头。这种做法，确实是把我们国家的青年毁掉了，从心里边毁掉了，从良心上毁掉了，从道德上毁掉了，把国家、民族毁掉了。

当时我们的一位老干部，据说抗战前曾当过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的，着急得很。我跟他关系好。我说，你看，我们当了牛鬼蛇神不要紧，青年变成这个样子怎么办，民族的前途怎么办？他话不多，含着泪说，我们死不足惜，本来就没有想到能活到今天的，可是……他说不下去了。

我们单位还有个傅东华，傅老，他可不是普通人。抗战前，他在上海是什么地位呢，当时鸳鸯蝴蝶派是不被算为作家的，包括张恨水也不大算，当时上海，左翼作家和中间派作家都能通得过的文人，约有三个，一个是傅东华，一个是叶圣陶，一个是夏丏尊。这三个人地位高，名声好。如果做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这三个人都可以当，可望通过。傅东华是无锡有名的国学专修馆毕业的，毕业后却到北京师大附中高中

部教英文。我问过他老人家是怎么回事，他说他自己一直在学英文，他把他的英文成绩一报，就被录用了。这种人少见，可以说是一个天才吧。这个老先生也在牛棚里，人老了，话也说不清楚了，我们经常保护他。那时，“样板戏”已统治几年了。有一天考我们样板戏，这可要命，像傅东华这样的人，他怎么会管你什么样板戏不样板戏呢？一天思想汇报，他说，昨天我看了样板戏。造反派问，哪个样板戏？他说，八个样板戏。他听说过样板戏有八个。造反派说，你讲是哪八个。忙中他一个也讲不出来。又斗得他不死不活的。

天天汇报思想，还有个大笑话。可能在一九六九年或者一九七〇年，造反派经常出题考试，有天出的题是毛主席的生日是哪年哪月哪日。二三十个人里，少数人说对了，多数人回答不上来，其中有我，年月日一个都不知道。单位的两个负责人也是很老的党员，都没有答出来。造反派骂，这样伟大的事你们都不知道，还算不算中国人？骂的时候说，特别是你们三个，都是老党员……这个话一出来，他觉得失言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还说我是老党员。他马上改口说，你曾某人不在内，一下子更正了。造反派又骂，毛主席的生日，你们三个全说不出来，你们吃不吃寿面？我们说，吃。真的，毛主席的生日，上海家家户户吃寿面，年年都吃，居委会还不断提醒，不要忘记，要你去买面条，吃寿面。

115 除了搬大餐桌，我还要在广告牌上贴批判我的大字报，既有生命危险，又污辱人

制钢板标语，贴标语——

这个工作很重，最不简单。墙有多大，标语就搞多大，字呢，一个直径也有三四尺。贴什么，无非是“四个伟大”、永远健康之类。江青还没有贴标语，只是开大会的时候就要叫“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贴的时候，要一个大车，几桶糨糊。人家贴的还没有干，我们的就贴上去，我们的还没有干，人家的又贴上来。真是：标语家家贴，一盖几十层。黄昏不到，拾废品的一下子就揭得干干净净。第二天再贴。如此反复了几年，形成了一种贴标语、揭标语、废品收购站的奇异三角关系，一种空前的今古奇观。

还要制钢板标语。我们单位大量地买钢板、三角铁。我们牛鬼蛇神里边偏偏有一个大学化工系毕业的，知道一点钢板怎么焊接、怎么锯三角铁等。锯三角铁是用一种专门的锯子，一边锯，一边加油，锯子不行了，要赶快换锯条，锯条都买了几包，一包一百片。锯好后，还要焊，还要除锈，最后还要打黄漆底，用红漆书写。那个标语有三个人高，要竖起来，下面要挖深坑。这些全套的工作，大概做了两三个月。制好标语后，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不在毛主席像前，而在这个标语前请罪了。

更妙的是要我在南京西路的广告牌上贴大字报。那时的广告牌，统统都变成了贴标语贴大字报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有一天发现这块地方没有贴，造反派赶快搞了一个基本上是关于我的专辑，大右派某某怎么样怎么样。弄好后，要牛鬼蛇神去贴。贴的时候，才知道是贴我。这个广告牌很高，运了两张乒乓桌重叠放，又借了很长的两个竹梯捆在一起架在上面。这时造反派说，规定这个大字报要曾彦修自己去贴。如果没有造反派在场，其他同志可能不会让我去。他们知道我的关节不好，怕出事。但那时没有办法，我只有横下心了。我先爬上两层乒乓桌，又爬上两个接起来的竹梯。平时，看见广告牌上的字并不大，但是一旦上去，才看到字很大，一个最小的字至少三四寸见方。

要你去贴写你的大字报，还爬到这么高的地方，这也是造反派想出来的折磨人的办法。他能够给哪个人以最大的痛苦，就选择哪个人做。一个人的心肠能够坏到那个程度，真是想不到。我想起这样的事情，就要哭。不是因为我贴自己的大字报要哭，是想到民族的灾难就要哭。为什么要把一个民族害成这个样呀！这些青年平常并不敢这么做的。所以我到现在还会有些悲观，甚至很悲观。如果有人号召干坏事，还是有人会跟着走的。能够坏到什么程度，就坏到什么程度。又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何必把坏事干到了这样的程度呢？

搬橡木大餐桌——

单位里的斗争大会都在二楼开，一个大房间，连着中间空着的一片。斗我们牛鬼蛇神中的人，有若干次。要斗一个人的时候，造反派就叫我们做一件很怪的工作。我们单位的花园洋房，原来是何某人的，他儿子是民国党的一个中将。解放前夕，全家都去香港了。楼下有个西式

大餐桌，丈把长，中间可以拉长，可以缩短。这个桌子是进口的，橡木，很厚，非常好，但是重，估计有七八百斤。造反派要我们干什么呢，每次开批斗会，要把这个桌子搬到二楼上去，会后又搬下楼。

二十几个人，楼梯挤不下，上面一些人，下面一些人，一阶一阶抬，这个当中，有五六个人，包括傅东华这样七十以上岁的老人，他们也要帮助抬。我赶快给我们牛鬼组长说，这些事情不能让他们做，如果在下面，万一顶不住，压死了怎么办。得令后，我叫他们到上边去，做个样子，叫一叫。不管是上下楼梯，还是在楼梯拐弯处，都非常紧张，因为整个楼梯都是铺了大理石的，很漂亮，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大理石弄坏了。

把这么重的桌子搬上二楼做什么呢？就放在旁边，从来不用。这样的搬动，五六次以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先打两百杀威棒，想尽一切办法折磨人，怎么样能使你感到最大痛苦，就怎么样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人心道德被弄成这个样子……

花园里的其他劳动——

在花园里种菜、修枝、剪草。两只手用大剪刀剪万年青，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力气。其他的，我都能做。种菜需要肥料，办公室旁都有蓄粪池，我们就舀起来，加水冲淡，做肥料。这套东西，原来就会一些，这时又学会了一些。锯树我最感兴趣，我爬到树上去锯，还要下来反复看，把树锯得很漂亮。有一棵大白玉兰树，一根枝长歪了，从观赏角度来讲，从树的安全看，必须锯掉。当时七十多岁的老花匠还在，我们问他，现在锯可以吧，如果造反派问，你就说，是你叫我们锯的。他说，可以。造反派真来问他了。他说，是他叫我们锯的，他一个人没有力气。

这些劳动，除搬桌子，贴自己的标语，其他的没有大的危险，就是污辱人。

第二十四章 “文革”中期：三年干校劳动（1969年10月—1972年3月）

116 在奉贤县海边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相当紧张

到干校前，我们在农村已经住了几个月。这件事是全国都统一的。我们单位开到奉贤县农村，占三分之二多一点的人都去了，上海还留了二十多个，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有些是身体不行的，有些是管钱的，有些是造反派，造反派的女的似乎未去。

一家伙到农村去，好几十个人（工宣队、军宣队就十几个人），天天要吃饭、喝水。不能吃农民的，就借用农民的厨房。大师傅去了一个，做菜的，其他的任务就在三个人身上了，我和严庆龙两个右派，外加一个钟吉宇。可能上面有规定，一切重劳动都交给右派。我们三个二十四小时负责整个厨房。

做些什么呢，天不亮，四点多钟起来用大锅烧水做稀饭，然后是挑水。我们借厨房那家人旁边就是小河，上海周围多是这样的，岸上离水面只有两三尺。挑多少呢，有半个人高的缸四个，我跟严庆龙两个人一早上要挑五六十挑，还要挑够洗脸水、洗碗水。钟吉宇管烧火，他精神不够正常，不敢放心让他挑。早上大家起床做运动，然后洗脸，开早饭。饭吃完后，洗碗，洗锅，全是我们的事。四缸水用得差不多了，又要挑水，把四个缸装满，接着打扫厨房。

忙完早饭打扫后，随着师傅去柘林镇上买菜。这个师傅并不很坏，但他知道这个时候对我们决不能好。我们去挑菜先回来，他在茶馆里坐一阵，九点多钟回来。我们理菜、洗菜、切菜，中午淘米做饭，他只管炒菜、分菜。中午饭后，洗锅，清扫，又挑水，把几缸子灌满。这时大概快到三点，大体可以休息半个小时。接着做晚饭。晚饭后，又是收拾，黄昏起，又要挑水，供晚上洗脸等使用。

我们三个人，就睡在厨房旁边农民的一张床上。我高瘦，严庆龙又高又大，钟吉宇个子较小，这样怎么睡觉呢？我们再三央求，钟吉宇老先生做完事后，可以回到大家住的地方。

当时有规定，在农村里不能说哪个是右派，怕出事。因为农村也闹，知道你是右派，把你打死都有可能。因为有这一条，我们没有被打死。这是军宣队的规定，不然也难说。

一九六九年十月到十二月在奉贤县农村里三个月的劳动，算是把整个工作顶过来了。解决好几十个人的洗脸、洗脚、吃饭，没有别人，实际上主要是我和严庆龙两个。根本上是严庆龙。钟吉宇也少不了。这三个月是负担最大的，相当紧张，心里很怕，缸子摆在外边，如果放毒，不把我们捉（抓）去枪毙才怪！还好，那个时候这些事还少。

117 平常看见我是一把骨头，一劳动，样样会干

一九七〇年一月或者二月，我们正式到了奉贤县的五七干校。干校离海边不远，在闵行镇东面十来里的海塘里面，东面是东海。那一带都是五七干校，我们旁边是电影五七干校。干校正在修的时候，我们均不知道，建筑材料铁丝、木料是从上海运去的，花了不少钱，可能搭草棚的草是当地买的。叫我们去，房子、路、水沟已经基本修好了，可见早已定案。因为要划界，要整地，要有一大堆“基本建设”，这一大段区域不知准备了多久了。

我们叫新闻出版五七干校，共有十多个单位，每个单位是军事编制一个连，我们是九连。《解放日报》是一个连，《文汇报》是一个连。七八十个人是一个连，五六十个也是一个连。房子全是新草棚，我们有一个大草棚，男同志住，有一个小一点的，住女同志。还有两个更小的，一个住工宣队，一个住军宣队。男同志、女同志住的都是旧的双层木床，全是从上海各校运去的。学校停办了。

我们去住了一个晚上，漏雨，又补草。这次没有让我上去，上房危险。按照规定应该是我上去的。

在这里劳动的两三年，对我来讲，是一种解放，因为我会劳动。我在根据地十几年，什么没有干过？从小在家里边，也看过，也干过。不像上海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劳动过，确实不懂。我们那个连里会劳动的好像只有一两个，或两三个。

我们九连工宣队前前后后的几个队长都非常好，都是工厂里的老模范，他们是被造反派排斥的。我们的军宣队长是空四军一个地勤排长。空四军后来因为林彪事件搞得很厉害，说要暗杀毛主席。这个排长才是真正的工农兵。他在安徽农村是放牛娃，也打过铁，然后当兵。他不过是个地勤排长，但他很有水平。名义上全部权掌握在工宣队手里，实际是掌握在军宣队手上。

平常看见我不行，一劳动，就不一样了。

生产组拿着新买的锯子锯木头，锯不动。我说没有开口呀。他们问什么是开口，我解释了半天，一个齿向这边，一个齿向那边。我说我可以开口，需要钳子。又去上海买钳子。我们那里天天有大卡车回上海。我小时候看见过锯条开口，虽然是第一次做，但道理懂，就没有问题。他们又去锯竹子，锯不动。我说锯竹子跟锯木头的锯是两种。锯竹子的，锯子比较薄，齿也比较小。又去重买。

这大体上会给他们一个印象：原来解放区来的这些老东西，什么苦活都会呀！

118 我跟郑炳中（耿庸）做管水员

主要的劳动是种稻。给我们连四块田，每块田的中间原来是堆盐的地方，四块田共十六亩。稻田事先已经做了很多基本建设工作，都挖好了，盐没有了，也冲过一些了，水也淹好了。何时做的，做来干什么的，不太清楚。

种水稻要一个管水员，一天到晚要看着。插秧以后干什么呢，田干了，要灌水，下大雨了，不管多大，都要披个雨衣去看。水多了，秧苗会漂起来，要放水。任何时候离不开人，半夜都要管。南方种水稻我知道个大略，我就自报了做管水员。做管水员是辛苦，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找个借口，这样就等于脱离了我们本部了，什么大批判，什么唱样板戏，我就堂而皇之地逃过了。我自愿地以劳动惩罚来代替精神惩罚，多好呀！管水员，浪漫点说，我就真成了大地的儿子。

不久，我把郑炳中也设法弄来做了管水员。我当水利部长，他是“现

行”，只能当水利部副部长。

郑炳中，笔名耿庸，是“胡风派”中的一个作家，刚出狱几个月，即遇“文革”，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到干校后，我觉得他一个人苦得很，把他一个人放在小工具间。工具间就是放粪桶的地方。这些受胡风影响者有些不可理解，一天到晚拿个马恩全集在那里看，苍蝇呀，蚊子呀，嗡嗡嗡的，不管。像他那样，我觉得比坐监狱还难受。我向工宣队、军宣队建议——这个建议不能像正常的建议，还得装出个样子。我说，郑炳中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叫他在那里舒服，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这么大四块田，我一个人也管不了，我建议把他调出来，同我一起管水。他们同意了。

耕地、耙田，全是我和耿庸两个人做的，公家向老百姓借的牛。犁田开始，我让他在前面牵牛，我在后边，结果我根本不行，犁不动。他到后边去，哎呀，居然就犁动了。犁一阵，我们上田休息休息，抽劳动牌烟，八分钱一盒。

搞（干）了一个星期，我就问耿庸，你劳动真厉害，劳动了十年，什么都会。他说，我一天都没有劳动过呀。我很吃惊，说，你不是胡风分子，被关了十年吗？他说，我真的一天都没有劳动过。他们坐的是特殊监狱，在上海建国西路，房子很高很大，当时关有几千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是个秘密的监狱，他们进出都是晚上。到现在为止，我问别人，说老百姓只知道那里是个军事秘密单位，其他都不知道。

耿庸说，一间房子那么小，关几个人，还能劳动什么呢？根本没有劳动。我说，你们这批人太厉害了，坐在粪桶旁读马列，下了田，又马上能做从来没有做过的，还能犁田。

犁了田，又要耙田。我说，我也要学一学。耙田，前边牛拉，后边有一个专门耙田的农具，人站在农具上，牛往前拉，就把田耙平了。但我站上去就滚下来，站上去就滚下来。他站上去，就没有问题，把田耙平了。在体力劳动上，他成了天才，我不理解。这个劳动，难度很大，第一次就学会了，除了佩服外，我只说能跟着胡风跑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奇人。这些人，干一个事，专一个事，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不过思想确实有点钻牛角尖。

田耙平了，放水，水只能高出秧苗根一点。插秧的时候，我就成为要人了，这里叫老曾，那里叫老曾。我升为“老曾”了。说这里没有水，这里水太深。插了秧后，长到三四寸，稗子出来了，我看到那么多人去拔，把田搞得一塌糊涂。我跟耿庸说，我们两个包下来，整天拔，他们会答应的。上面当然答应了。只要天一亮我们就去，晚上才回来。搞（干）了不久，发现了问题，稗子弄了一大堆在田坎（埂）上。田坎窄，又只有抱到大路上，运输量很大，太耽误时间。不久，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看见后笑我们，他说不要这样，稗子拔起来，根朝上，用脚跟踏进土里，它就长不起来了。孔子说他“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我们说，“吾不如小农”“吾不如小圃”。我和耿庸，把稗子和稻子分得清清楚楚，一看就不会错。稗子的梗子和叶子更宽一点，颜色更绿，根部更白一些。以后就整天做这个事。上午，下午，至多休息十多分钟，抽点烟。稗子问题解决了，有希望收一点。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没收成。

撒化肥，我们说大家来，把稻子弄坏了，还是我们两个。喷药，也是我们两个。冲水，因为是盐碱地，上面浮着一层盐碱，也是我们两个。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一天全部的时间不够。虫也出来了，团部生产处装了光管灭虫，通根电线，常出毛病，所以，晚上要去看光管。

119 捞水藻、捞水浮莲、拉大车、倒石子

到深潭里去捞水藻，做肥料。黑色的水藻很细，比头发粗一点，有点像长头发菜。水有大半人深，有些地方比人深。许多人不敢下水，我不怕，会游一点。我不是在家乡学会的，我是在延安延河里学会的。

我们连队会一点水的，我一个，还有一个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一军宣队员。我们三个，背心一脱下去。他们说，老曾这个人似乎风都吹得倒，现在能下水，公然游来游去。我们把水藻推到岸边，岸边的人用钩子钩上去，运走。

捞水浮莲，绞碎喂猪。水浮莲很重，大多数人不敢下去，捞水浮莲又少不了我，又是我们下水去推。因此，在干校的两三年，他们不怎么斗我。

拉大车是个技术活，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硬去拉，拉不动，掌握好重心，用力就不大。在上海牛棚时，老派我跟另外一个人去拉东西。这个人老实，胆子也小，说他是国民党的中校，其实他什么都不是。空车的时候，他都拉不动。我说，你坐上去。他不敢，怕被人看见。我说，你没有发现拉空车时要放砖，你坐上去，你的重量刚好落在车轮着地的中轴点上，拉起来就轻。马路上有许多妇女拉车的。我说，你看，她们都手臂约三十度向上，就像车在推她们。车子启动以后有个惯性，你就利用它。他不敢坐，我说我来试验一下。我去坐，他很高兴，他拉动了。

所以，在干校拉大车，拉酒糟，又少不了我。这一来，不少人认为根据地的人真是劳动过的，没有做过的，一下子也就学会了。

挑石子，挑沙子，挑烂泥巴，这些工作，只要你会挑，就不太重，扁担在肩上都是一闪一闪的。关键是倒出的时候需要技术。倒时，一只脚跨前半步，两只手拉着绳子往两边一翻，倒得干干净净。他们看，看不会，非要把挑的东西放下来，再来倒，多费力呀。最难的是挑烂泥，始终没有一个学会，我不懂是什么道理。很容易的，老百姓谁都会做，腰一弯，一脚跨前半步，两只手往外一翻，烂泥就倒出去了。结果，竟始终成了我一个人的表演，无人想学。

干校要不断地搞基本建设，要修路，不断有石头、细沙子运来。都是船装的，离开干校有十几里路。一船石子，一船沙，派给哪个连，哪个连就去装到卡车上。

从船上装进竹筐，很重，几个壮丁戴着很厚的手套干，因为离卡车还有二三十米一段路。装车时，下面四个人推，我跟耿庸两个人在卡车上接，然后倒（因为这最重，也易伤）。但倒了第一筐，我就发现不对。前一筐倒下，把后边的堵住了。我立刻跟耿庸说这样不行。后来，装满一筐石子放在卡车尾下，送石子的人提着的一筐快放到这个筐上时，我们立刻乘势提起来一下往空中一翻，倒出石子。倒的时候，尽量往最前边倒。我很快就发明了这个办法。这个发明很重要，不然会累死我们两人，我们在车上是不是很累呢？是很累，但用猛力，几秒钟的事，但是，非如此不可，不如此，解决不了问题。

我看见其他的连队，像古籍出版社，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累半天，弄不了。我们建议他们像我们这样，他们学不会，有一次，我跟耿庸两个就帮他们倒，我们是邻居，不然他们就完不成任务。装完车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回干校。我这个人，是天生的体力劳动者，我还能想点办法。体力劳动，只要想办法，就不大一样。

120 挑水，淘猪圈，冲盐碱

还有一件事是带有污辱性的，要右派做。干校每个连队都有四个大缸，上面有盖子，我跟严庆龙、程光裕三个右派必须每天挑水。前面已经讲过了。

淘猪圈。这个事够受。猪圈长期没有淘，垫猪圈的草压在下面，要把它挖出来，装车，运到田里做肥料。重得要命，用全身的力量挖，都挖不起来，只能挖几根。这个工作，我们单位还有一个女同志参加。是处罚呀，她是人事科长庄献之。叫一个中年女同志来做这种事情，道德的底线何在？但是造反派的骨干，一下也没有下乡。

冲盐碱。田里当中的一块原来是堆盐的，盐分很重，影响水稻收成。我跟耿庸两个人去改良。我们用比手掌宽的一点的铁铲把土翻起来，用水冲，这样反复翻，反复冲。我们估计要三四年后才能改善一点点。这个工作本来可以不做，没有人叫我们做，但我们认为在干校是一辈子，就想，把这个田改善一点，使亩产高一点。我真的是这样想的，看样子，一辈子就这样子了，与其天天唱着“样板戏”过日子，不如避开“样板戏”天天老老实实去种田。不但如此，我们还准备在一九七二年提出全面的改革种植计划，即中间堆盐部分不种，把力量集中在旁边，劳动力可能减少一半，收成可能要好一些。因为观察了两年，费这么大的力量，肥料、种子等，用在堆过盐的田里，一切投入多白费。大概一九七〇年以后，团部作总结，说我们种出来的水稻，按照我们当时已降的工资来算，平均四百多块一斤。但是一九七二年还没有春耕，突然北京开个什么会，周总理关心《辞海》的事，说《辞海》是毛主席提出的任务，你们放弃了几年，不对，要我们回上海。其实周总理是用尽苦心，用各种名义把文教单位的人弄回去干事情。所以我们辞海编辑所的人在一九七二年四五月间就全回上海了，其他单位的还继续干。我个人

一九七四年又回干校去干了四个月。所以加起来，我干了三年。

121 表面上对我要大整，重要的问题反而要请教我

三年当中，由于劳动的关系，看我不像个反革命，人虽然瘦，但什么都拿得起，什么都会，所以军宣队的队长，表面上对我要训训，机密的问题反而要找我商量。

我们单位的陈落（陈国栋）在清华大学当过党支部书记。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清华大学毕业，长期做地下工作。抗战后的一两年失掉关系，解放后经过审查，重新入党。

肯定是陈落自己的自传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他领导的一个学生党员回山西时在太原被捕叛变了。这个学生供出了一些人，包括陈落。这样一直怀疑陈落，“文革”斗，下到干校也斗，说他是叛徒。理由是，叛徒讲了你的名字，你读的学校，你为什么没有被捕？你一定是被捕了，当了叛徒。陈落这个人不大说话，他的解释一直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出事嘛，听说那人被捕，我就回到乡下躲起来了。

一天晚上，快九点了，军宣队的队长、工宣队的队长突然来找我。工宣队长参加过抗美援朝，人极好。他们把我找去，说：老曾，陈落这个事斗了这么久，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看到他们很诚恳，就跟他们谈了可能两个多钟头。我从“九一八”以后的形势谈起，谈国民党跟地方军阀的关系。我说，国民党跟各个地方势力的关系，不是共产党中央跟黑龙江省委、广东省委的关系，根本上是两回事。国民党下面的地方势力，特别像阎锡山这些军阀，他们希望自己控制的地方秩序稳定，不出事情。至于你蒋介石直接统治的地方，则巴不得（希望）你越乱越好，越控制不住，他们越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稳坐钓鱼台，你想吃掉我，办不到。所以，如果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在自己的地方发现了蒋介石南京有个共产党，不会立刻用密码电报通知南京，更不会派专人去通知。他们跟蒋介石的关系，是希望蒋介石垮台。所以这种事，不会报告。我们共产党不一样，西藏、黑龙江如果发现了什么问题，马上一个电报到中央、公安部，当天就抓起来了。如果国民党全国都像我们，我们现在恐怕还没有取得政权，还在地下呢。所以像陈落这种事，只能是这样，相反倒

是不能解释了。如果阎锡山立刻高兴得不得了，赶快给南京一个电报，告诉南京哪里有个共产党，赶快捉（抓）起来，国民党就团结成一个人一样，它会垮台吗？国民党不是这样，我们共产党才是这样。因此陈落讲这种情况，不但不稀奇，而是正常，甚至是必然。最后我说，我讲的这些，供你们参考吧。

这就是启蒙，不怪他们。他们看出来了，你不像个坏人，所以就把这种事来问你。一方面劳动的事，表面上要你做最脏最累的，但不是出自他们的本性，他们是被迫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等等，当时着重是搞右派。其他的学术权威，也无非叫他扫扫地。

122 用各种劳动去代替各种强迫思想“改造”

“文革”时期的劳动，五七干校的劳动，不少人的回忆都痛苦、悲观，包括叶圣陶的儿子写的回忆录。我确实没有谈这些方面，我完全没有谈内心的悲观。其实悲观得很，悲观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前途。我当时认为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认为中国完蛋了，特别是林彪事件后，更是如此，看到权力落到江青手中后，更不抱任何希望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是一个什么知识分子了，而是一个国定的五种主要反革命分子“地、富、反、坏、右”中最后的一个等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绝望了。鲁迅似乎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正是鲁迅还看不出中国有什么希望的时候讲的，很沉重，很痛苦。我这时候就是这种心情。

那些大叫其苦的东西，我看到过。原因在于他们那时还没有麻木，还没有绝望。而我相反，我实行的是“阿Q主义”：人生大概会遇到这些东西，都是正常的吧！我用这来麻木自己。当然这终究也是自己骗自己的。但是，如果不骗，不是更苦么。所以我愿意劳动，花全部时间劳动。我当了管水员后，许多事都逃掉了。比如天天唱样板戏，我就不唱；学习姚文元批评吴晗的文章，我就不学。到现在为止，姚的这篇文章我也没有读过一字。如果又要学，我找种种借口，找最难的、最累的、最脏的活儿干。我说，今天我干这个，就躲过了。他们再怎么整我，觉得水稻没有我不行。

我还躲过了“拉练”。拉练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半夜走，走几十里，再回来。我们干校拉练了许多次，我都有借口，一次都没有参加过。我说，一来一去，四五天，这里管水的事一天到晚都离不开人。他们同意了。陈落当时五十几岁了，头发全白了。我看他几十里路走下来，实在是累得不行，我跟耿庸商量，陈落也苦，这次你跟陈落对调一下行不行，这次把陈落留下，你跑一趟？耿庸去了，陈落少去跑了一次。四五个钟头跑几十里，要他的命。我因是管水员，免了这样的事，而且非常自然。

所以，我犁田时，犁田至上；我插秧时，插秧至上。这样，把人的痛苦减低了不少。天天学习唱样板戏，天天读圣书，天天喊口号，天天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人到了这种程度，变成什么了？心里边不愿意，但又不得不这样做。我呢，用各种劳动代替各种歌颂“四人帮”的痛苦。比较起来，一天到晚受那种罪，受那种精神的罪，比下地狱还痛苦。你江青是什么？你张春桥是什么？你姚文元是什么？我要把我的人格全放下，捧你们，全天歌颂你们，那个痛苦，不是人受的。所以，体力上受的苦就变成很能接受的了。天不亮就起来到田里，晚上九点才回来。你去拉练，来回四五天，我一个人在乡下劳动，没有人来干涉，得其所哉，心里不那么痛苦。

在干校当然苦，但在那个情况下你不接受这个任务，你不干，别人更苦。比如装卡车，我跟耿庸不做，累死也运不回去。捞水藻，我会一点水，你不下去，别人不会水的下去，行吗？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不干，别人干起来，痛苦多我一百倍。他没有这个技术，他不会。你强迫我下去，还不如我自己下去。

别人谈到五七干校之类的经历时，都很痛苦，我为什么反而眉飞色舞十分高兴的样子呢？我可以问一句：你是喜欢天天在四十度高温下生活，还是比较喜欢天天在三十六七度下生活呢？“地、富、反、坏、右”，天天过的什么“生活”？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最下，腐刑，极矣！”“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劳动时，我不比年轻力壮的人差，这时我的人格是独立的，自由的，没有时间去自羞自愧与自我污辱了，因此，当时就会“自我感觉良好”，阿Q一番。人活个脸，树活个皮，再大的权力也不要以逼人自辱为乐啊，“士可杀，不可辱”，圣

人又何必非先辱后杀不可呢？那是失败，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汉武帝权大极矣，不时以屠杀大臣为乐，他给了司马迁“宫刑”，到底是谁犯了罪呢？

123 在宽宽的田埂上，吸着“劳动”牌香烟，作作打油诗消遣

进入干校时，各人的处境不一样，心态自然会不同。对有些人像是判了无期徒刑一样，悲痛十分是自然的。但是，它我对则是一个大解脱，天天在大自然中，与自然相处，对话，再怎么苦，再怎么累，自然不会侮辱人，不会让你做我前边讲的那些侮辱自己的事。你如果不是生成的奴才，当然选择去做重体力劳动。

我这时学会了猛抽香烟。当时上海烟厂为适应大家的购买力水平，新出了一种八分钱一盒的“劳动”牌香烟。大概与相声里那个“宇宙”牌差不多。二十支，有时会自动熄掉，有时会猛然发出爆炸声。但不会弄死人，照吸不误。

我在一九六九、一九七〇、一九七一这几年，一个人在田间坐看蓝天白云时，每每顺口吟出一些打油诗，即咏即成，多是五绝、七绝，间有七律，恐怕有几十首。不过我作的不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样的闲适诗。我举几首。我曾与一老人共同抬沙石水泥等一个时期，我有诗记其事：“勤勤建猎舍，抬沙万把斤。竹杠两边客，自始未通名。”为什么不通名呢？为了减少麻烦。后据说，另一抬扛者名金姓尧，是一大文史家。我又与“胡风分子”耿庸是管水员，前边已经讲过我们的事。我也有诗：“夜半起犁田，耿庸刚出监。我争先上耙，一鞭滚下来。”

此外，偶然也有一些时事性的感言诗。例如，一九七一年好像在五七干校看过一次钢琴伴唱《黄河大合唱》。我的印象还好，是艺术家们合作的。于是，我在脑子中又形成了一首《哭冼星海》：“七载巴黎究乐音，一曲黄河海内惊。国人引领聆新曲，却送神京学圣经。”因为这位勤奋的天才一去就不复返了。

一九七一年在五七干校时，好像又有一次批瞿秋白的高潮，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便顺口念成四句诗《悼瞿秋白》：“慷慨赴死易，从容就

义难。秋深月更白，诸夏永怀霜。”这里要解释两句。“诸夏”句是指一九三六年鲁迅为瞿秋白出版瞿秋白译文集两厚册特装豪华本时，把出版者取名为“诸夏怀霜社”，而瞿即名“霜”，“诸夏”则泛指中国。

我们五七干校所在的地方在上海市，属奉贤县柘林镇，南面靠海一面修建了几个世纪著名的“海塘”，即一项延绵数百里的保护农田、防治海潮的特大水利工程。海塘之外，南面即杭州湾，再往东就直连太平洋了。柘林镇在五个世纪前曾被倭寇长期占领，倭寇据此作为抢掠焚烧我东南诸省的重要据点。我几乎天天都要走上海塘，面对杭州湾，不知不觉就形成了《柘林东望》这首诗：“柘林东望海汪汪，五百年前宰杀场。世事于今唯内创，仰视云天泪几行。”

第二十五章 “文革”后期：心如死灰（1972年4月—1977年6月）

124 闲散人员，一当就是六年

从干校回上海之前，要派几个人打扫个把月才行。好几年没有人住，很漂亮的两层楼的西式的大楼，还有附属房子、卫生间及大花园，留守的人只是天天画个到，不管卫生的。又是派我们三个右派：我，严庆龙，陈光裕。我们单位一共四个右派，李毓珍老了，恐怕六十多岁了，发头白了。这个工程浩大呀。但是，工宣队、军宣队没有派一个人监督，所以，他们内心其实是矛盾的，派上海的大学生回去，解决不了问题，他们知道劳动还是你右派最可靠。他们心里知道，你们不是坏人。我跟严庆龙两个都是老党员，陈光裕老实得不得了，可能是右派人数不够，把他凑数的。为什么工宣队、军宣队一个人不上来？一方面对我们比较放心，你们不敢闹什么事；另一方面，这几个星期的劳动够苦的。吃饭要跑到旁边买两个上海煎包。我连吃饭的精神都没有，请他们帮我带几个回来。

这个工程又是很有趣的，包括锯树，树长得乱七八糟，必须全部修剪。我五十几岁学上树。为什么我要锯树呢？我手脚长，方便得多。陈光裕，小矮子；严庆龙，太胖。我手脚确实要比他们灵活一点，人瘦，手长，脚长，锯起来像个老猴子，钻来钻去。

我们搞了两三个礼拜，单位搬回来了。以后，我就没有派任何业务工作。我们有一批人七八个人，右派有几个，单独在过去仆人住的最边上的一间木房子里，从旁边的楼梯进去，我们叫西伯利亚。著名人物不少，包括《文汇报》的两个社长，徐铸成、陈虞孙，《新民晚报》的副总编辑张林岚，还有一些新闻出版的头头，都调到辞海来“养着”了，但不是工作。是天天学，还是学语录之类，要学两个小时，学完后就闷在那里，不多说话。我一九七八年八月离开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分配工作。

“文革”后期没有事情给我做，还是劳动，这个工厂那个工厂劳动，

在花园里劳动，但是形势已经跟“文革”前半期有区别了，不是完全以正式的牛鬼蛇神的身份去劳动。闲散人员，一当又是六年。

125 那个时候就是绝望，不是等死，是等被捕

在漫长的六年多的时间里，我只能说，心如死灰。这时，不像过去还能到音乐厅去听二胡、听笛子，没有了，只有样板戏。所以，人不存在任何希望了。看样子，国家也不准备分配工作。说得清楚一点，那个时候就是绝望，不是等死，是等被捕。

为什么说等被捕呢？右派，你除了等被捕还等什么？我举的下面几件事，就能说明了。

第一件，确立八个样板戏。

林彪事件是一九七一年在干校时听说的，没有给我们传达。他们听传达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发抖。我是陈落同志偷偷告诉我的。林彪事件后，一切就明白了，上面连能牵制江青的人都没有了。大家都拥护周总理，但大家也知道，周也朝不保夕。江青这伙人，做的不可思议的事越来越多。林彪垮台后，正式确定八个样板戏，《人民日报》正式发社论，《普及样板戏》。把八个样板戏变成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中的最高文化。这下，“大破大立”这四个字全都明白了。“大破”，就是要把中国几千年的一切知识文化，一切道德标准，全部扫荡；外国的，也统统不要，全部都反动。要的就是江青的八个样板戏。这八个样板戏，能征服中华民族吗？能够使一个知识分子崇拜吗？所以，大破什么，大立什么，清清楚楚了。到处天天唱样板戏。当时农村一些青年组织起来唱，民间演员当然不可能演得跟江青认可的样板戏一模一样，这就说你是反动了。

样板戏怎么能够变成中外加起来的最高文化呢，这不是笑话吗？当然，样板戏个别的场次，如《沙家浜》中的“智斗”，我估计还要传下去。但是这场戏，你要是知道一些外国的文学史，特别是戏剧史，就知道它的写作方法、写作思想是学习外国的东西。中国戏剧再怎么复杂，自己有一套思想体系，要灌输“忠孝节义”，比如《赵氏孤儿》，又长又复杂的戏，外国都很重视。《白蛇传》也是比较长的一个戏。把这两个

戏跟“智斗”一比，风格完全不一样，没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当时不敢讲，但是我看出来了，就是这一场，吸收融合了古代希腊的喜剧，以及后来法国、意大利喜剧的东西。因此，这场戏跟整个戏的前前后后大不一样。“十八个人就是十八棵青松”，第一号主人公，一个人那么吃力地在那里歌唱自己一半天，这才是江青要求的。后来才知道，“智斗”这场戏是汪曾祺编的，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了多少外国书，没有这个修养编不出来。说句实话，这场喜剧极高明，但它是标准西方式的，是引进。

第二件事，一九七三年公开树立了一个交白卷的大骂科学知识的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自己答不出题，还要大骂出的题都是反动落后的。把他树立成新的英雄，说明什么？是不是全国都不识字最好？都不知道二加二等于四最好？事情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一点都没有办法了。把这样的人树立成民族英雄，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古今中外是空前绝后的。任何民族不会出现这样不可想象的怪事。全国树立不要科学、不要文化的典范，实际上在树立地痞流氓。这种做法，把好坏根本颠倒过来了。当然，张铁生本人也是中了毒，但是他公然在考卷上骂，是投机了。他知道上面就是要他这种东西，就是要他这种“伟大革命精神”，所以，他一下子成了全国的革命英雄。如果这样搞下去，那还有什么神七、神八上天？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地位？中华还存在吗？因此，“文革”后期，明显地可以看到毁灭文化、打倒科学的运动不但没有减速，反而还在向深度发展。人们希望林彪死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更厉害了。所以看到这些，我是非常悲观的。

第三件事，“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批投降派。

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基辛格、尼克松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出来。但是一般的人，特别是我，还是懂得要基辛格、尼克松来，是为了对付苏联，是联美对苏，国内没有放松，越来越紧，不是反对“五一六”吗，吓死人。内部就更怪了。公开讲：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说的是理工科大学。根据这句话，中西方的文史全不要了。这个话，谁都知道是错误的。这样的局面，不得不令人悲观。

一九七三年后“批林批孔”，“批周公”，批《水浒》，批投降派，混

战一场哦。“批周公”，明明就是批周恩来。这种批，比“文革”初期还要复杂得多，把“批林”跟“批孔”连在一起。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如果把祖先的文化传统丢掉，包括孔子在内——孔子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消极、错误的东西，但好的东西占多数——国内的各个民族、海外的华人华侨、全世界的中国人就没有一个团结的思想中心了，中华共性就不存在了。马英九几次公开讲，强调一个中华民族，这个东西就厉害。几千年创造的以儒家孔孟思想为主导的文化，可以改善，但不能推倒、烧掉。中国是不可能把中国人（华人）团结在秦始皇身边的，绝无可能，团结在孔子身边倒有可能，包括我们几十年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有可能。我可以说，孔子有很多伟大的思想，了不起。但是，要叫我团结到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这些人的身边，团结到太平天国的身边，不可能，永远不可能。黄巢有两句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从这句诗就看出来，中国的历史不可能以农民战争的领袖为轴心来写。现在世界有那么多“孔子学院”，你说不行，要一律改为“秦始皇学院”，你看哪个国家会接受。

我们中国精神上合理的东西，在孔孟，还有如李白、杜甫等身上，而不是在秦始皇身上、黄巢身上、李自成身上。

最后一件事就是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他的死，对全国人民来说是天崩地裂，知道从此以后没有任何——至少在表面上能够牵制江青的势力了。只要周在一天，他们还不大方便把周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把周一打，人民的内心就变了。周死的时候，全国悲痛。每个人都感到不知道明天的命运如何，好像变成了没有娘的孤儿，被扔在沙漠里，感到生命连蚊子苍蝇都不如。是哭周，更主要还是哭自己，全成了没娘的孤儿了。在中国历史上，我估计这是第一次。我完全是内心无主，不知道这个国家何时会变焦土。我看不见这个国家有一点点好转的迹象。

上海的“四人帮”的部下们下令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更不准开追悼会。但是实际情况是布店把所有的黑绸等全部拿出来卖。当时，军宣队撤走了。工宣队给我们传达说，叶帅因病请假。我知道江青他们利用这个机会，把军权从老帅们手里夺走。

但是在辞海编辑所，就是那些老工人带头设灵堂，戴黑纱。所有地

方都是这样。这证明中国这个国家既不愿望亡于外患，也不愿意亡于内乱。但那个时候，除了悲观，没有别的办法。这没有什么好吹的，我没有看见什么前途。当时我写了一首悼总理的诗：

大地凝寒举国悲，鞠躬尽瘁巨星垂。行矣不回周总理，忍睹江山竟付谁。

很清楚，是说国家成了江青的了。诗不能给别人看见，只记在心里，说明内心沉重。江青这些人上台，把老一点的统统杀掉。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等待被捕。现在有些人不谈这些，其实跟我一样。

126 这几天不对头，杀气腾腾，他们动手了，我准备牺牲了

抓“四人帮”是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六号，以后这两三天，新华社的消息、评论，多得不得了，杀气腾腾，话还是“文革”那一套，但是更凶了，镇压味更浓了。

我住在上海三楼房子，跟我同一层的姜兆良（已经去世）是党员，他的两个哥哥死在淮海战役，他也是参加过淮海战役支前的，却把他打成牛鬼蛇神。这个时候，像我们这些人，互相都比较放心了。经过“文化大革命”，什么人什么心肠还不清楚？我去问他，说，这几天不大对呀，杀气腾腾，他们动手了，我现在就准备牺牲了，恐怕就在这几天了。我主要是说那几天的消息、评论等杀气腾腾，我不知道那几天的新闻、评论等是针对“四人帮”的，不知道华国锋是用这种方法对付“四人帮”的余党的。这不能怪华国锋。他要表现出比他们更左，更坚持毛泽东路线，更拥护毛泽东才行。

姜兆良说，老曾，事情还不清楚。告诉你，我也很紧张。但我一个山东一起南下的同乡在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工作，我去见过他。他告诉我，本来要在上海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现在内部通知，这个会不开了。大家都在议论，不是说延期，而是说不开了。张春桥是全军政治部主任呀。老曾，事情可能不是那么坏的。

我松了一口气，希望情况并不是我分析的那样。张春桥的会不是改期，是不开了。

过两天，情况就知道了。大概是十月九号早晨，我们照样上班，马路两边贴满了大标语：油炸江青，活剥张春桥。跟平常的“打倒”之类不一样。这些标语说明老百姓恨江青他们，比恨日本人还要恨。日本人侵略要杀中国人，但你中国人也这样干，所以特别恨。

听说是上海交大、上海飞机厂、复旦大学从北京听到消息后，通宵赶出了标语。

127 本单位宣布“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会上，负责人却专骂右派

上海各单位正式传达大概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号。我们单位十三号晚上统一传达，照念市委的通知。这个通知很简单，说中央对这几个人“隔离审查”。当然知道是逮捕了。传达通知的人是当时辞海编辑所新来的负责人。我们一九七二年回上海后，辞海编辑所的负责人变了几次。这个负责人传达完后，大骂牛鬼蛇神，骂了半天，特别是骂右派，骂得非常尖锐，非常厉害。其实是指着我的鼻子骂。另外两个是小右派，我是大右派。他用上海话说，你们右“帕”分子，要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当时我就想，什么道理，还在糊里糊涂拥护“四人帮”，“四人帮”被抓起来了，你照本宣科就是了，这样大骂为什么呢？你也是个三八式地下党员，为了保存自己，竟然这样胡闹。经过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反右”“文革”，有些同志，包括有些三八式的党员，入党快四十年了，怎么在这个时候还大骂右派，有什么必要？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呀，所谓隔离审查就是逮捕，这点应该知道的呀。所以，几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得一些人，包括三八式的，也真正异化了，被毁掉了。为什么我谈张春桥、姚文元，不生气，他们本来就是人民的公敌，气他们干什么。但你这样的人，在宣布打倒“四人帮”时，反把我大骂一顿，只能说你已被彻底改造了，不明是非了。任何时候，总之，整死你右派我就没错。

为什么对此我会义愤，声音会提高，对他这样的人生气？因为你应该首先是个人。我没有把江青看成人，张春桥他们是毒蛇猛兽，你呢，你四十年的党员了，你这个三八式，我对你是抱有希望的，而你在这个场合，大部分的时间骂右派。我觉得是政治投机，他说这些话，意思是

谁胜谁负还不知道，如果江青这一派翻过来，他不是又表现好了吗？此外还能做什么解释呢？

128 一辈子有三件最快乐的事情，我都看见了，幸何如哉

我现在九十岁了，一辈子有三件最快乐的事情，我都看见了。一个人，一生可以看见这三件事，满足了，可以死了。

一是日本投降。中国人的高兴程度，一般人想象不到，外国人更想象不到。日本投降前的中国，虽然还是你打我，我打你，特别是蒙古族、满族，从山海关外取得中央政权，但是，他们还是接受了中国的共同文化，而且明、清两个朝代，对中国的贡献很大。现在公开承认，西藏是元代进入中国领土的。我们今天这个版图就是清代确定的。有东北，有内蒙古，有新疆，有西藏。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抗日战争，只有日本侵略的时候，整个中国才面临亡国，中国人全变成了被统治的、被杀害的对象，这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第二是解放南京。现在的青年不怎么理解，为什么解放南京我们会那么高兴。他们不知道，包括现在六七十岁的人不大理解为什么现在九十岁的人那么恨蒋介石。一些教授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书，说蒋介石没有投降日本，内心是始终要抗日的，这点已经被证实。但是，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杀的革命青年太多。我们看见他天天杀青年，引起很多知识分子，至少是高中学生对他极深的仇恨。左倾的，到延安去的青年，都恨他得很。

第三件事情是活捉江青。这件事有点意外，当时没有估计到。正在愁中国可能要完蛋，正在愁自己哪天要被杀的时候，这个全民公敌被捉起来了。如果政权一旦落入江青之手，就是全国流血。中国的黑暗不知要延长多少时候。如果她上台来统治，要杀的人，不会少于几千万。她上台来要封官，自然有很多人要跟着她走。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跟着走？因为会得到高官厚禄。希特勒得到政权后，也不懂军队，只把原来的校官将官都利用，只要封官就行了。

这三件事，是旋转乾坤不可比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个人吃饭一辈子，难道就为了天天吃饭？看见这些惊天动地的事的人，也有，但现在

不是太多了。所以我精神有个寄托。怎么样呢，你日本没有把我们中国亡掉，你投降了。你蒋介石杀人这么厉害，你完蛋了。你江青这么厉害，也完蛋了，而且更惨，公审判死刑，虽然不执行，但是判了就不得了，给以后的历史看，什么样的东西是中国的敌人，就是江青这些人。她最反动，是真正的人民的公敌。

第五编

第二十六章 调回北京到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1977年7月—1979年7月）

129 交给于光远关于六十一个人和张闻天的证明材料

打倒“四人帮”后，我没有给北京写什么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于光远到上海来。于当时还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个领导之一，胡乔木是主要的。研究室有几十个人。

于光远到上海跟我打电话，叫我去看他，在一个很讲究的内部招待所，可能在三四月，不太冷。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四人帮”是怎么被抓的，等等。他来上海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他们单位曾经准备创办一个刊物《思想战线》，上海“四人帮”那些头头说是邓小平复辟的东西，用各种方法破坏。他就来调查这件事情。这件事调查不调查都是那么一回事。我的情况没有什么好说的，没有分配工作。我问他的情况，他说纪登奎要他们全部到大庆油田去调查研究。当时纪登奎是很当权的，华国锋第一，汪东兴第二，他似乎第三。我说，这还骗得了人呀。很简单，怕你们这些人留在北京哇啦哇啦，不好办，再继续像“四人帮”那样整你们，不行了，但实际上是驱逐你们。我说，你到大庆去，能总结出什么经验来？还不是干打垒，“两论”起家。当时就是这样总结的。我说你们去，还不是“两论起家”。整个东北的石油，就是“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你再调查，也不准你违反这个理论。你就拖吧。

我交给他两份材料，我早就抄好了。怪得很，老右派，我偏偏要写两份材料。

一份是康生讲六十一个党员是“叛徒”的事。我对于光远说，康生讲的这件事，你跟我一样，全部听过。康生“文革”出来抓叛徒，其实没有哪个人比他更清楚这六十一个人不是叛徒。他亲口对我们讲了这六十一个人案件的详细情况，讲了一两个钟头。我写一两千字，向中央讲清六

十一个人的事情。当然不可能保证是原话。批准六十一个人出来，不是你康生批准的，你康生还没有回国咧，是张闻天代表中央回答当时在北平的刘少奇。因此这个问题，既不是他们六十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刘少奇的问题，是中央在特殊情况下要他们用登报的方式出来的。

我把材料交给于光远，于光远拿回北京，感到气候还不对，没有上交，不知放在哪里了。一九七八年夏天，或者是秋天，于光远偶尔遇见胡耀邦，胡耀邦急于要给六十一个人平反。这个案件牵涉的人太多，几个中央局书记，很多都是省委书记，至少都是部长。于光远说，我们写过材料，忘记交了，我们清清楚楚。胡耀邦要他赶快回去找，他没有找到。第二天，他派司机把我拉到他家去。一九七八年夏，我已经调回北京。他家还有别的几个人在谈工作，他让我赶快写。我就在他那里写，不过一千多字，很快就写出来。我说，还要几个人签字，他们都还在。于说，不行，胡耀邦等着要。我说，不给别人看？于光远说，有两个人就行了。我自己说不出口，你是老干部，我是右派。他叫秘书去打印，打了就发，说胡耀邦分秒必争。这些事，别人不知道。虽然这些是小事，说明胡在这些事上，确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后来，给六十一人平反的正式文件上，附有于、曾的证明信。我见过的。

另外一份材料是关于张闻天的。我说，庐山会议后，特别是“文革”后，说张闻天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代表人物，据我所知，张闻天不是这样，张闻天是拥护毛主席的。我说，我这个材料，只有几个人知道。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张闻天召集我们农村调查团，还有本地的一些干部在晋西北谈话。张从头到底，全部歌颂毛泽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这个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听见的，在北京的还有六七个人，我还举了名字，说这些人都还在。因此说张闻天一贯反毛，不是事实。现在来看，张闻天的这个报告，对毛泽东当然歌颂得过分了。

张闻天那天晚上给我们作报告，完全是他自动的，临时组织起来的，讲了两三个钟头。无非是讲毛泽东如何伟大，如何神圣。想不到他最后一段讲，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来，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涌现出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真是奇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打了那么多仗，死了那么多人，说唯一的成就是这个，这就是极端的个人崇拜理论。他本人可能不是真的相信这个理论，他古今中外的书都读过一些。他那天的讲

话，实际上是个人表态。这个表态，我们几个跟随他下乡的团员不会去报告的，但当地的一百多个人，会不会有人传话到延安去呢？当时“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已经出现了，张闻天那天晚上没有用，但已经把毛神化了。所以，当个人权力集中的时候，就像张闻天这种人格高尚的人，这个时候也要神化他了；像张闻天这样有眼光、有学问，还有人格的人，也完全俯服了。

关于张闻天，我做了一个最错误的事。大概在一九八〇年为张闻天平反，为他开单独的追悼会，陈云致悼词。这个悼词初稿是由三个人起草的，其中有何方和我。不用说，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单独跟他有过直接关系。我和何方当时都还靠边。我又起草了一篇文章，讲了张闻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谈话的精神，然后交给七个人去签名。我们工作团还健在的七个人有马洪、雍文涛等，七个人都签了名。其中一段，被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参加过这个农村调查的当地的某某坚决反对，删去了，说那是被批评张的走资政策，张还是错的。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一段，张主张市场开放，很接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各项政策。但是张七一晚上讲话神化毛的这一段，由我写进文章里去了，现在还在《人民日报》上。根据姓氏笔画，我不在前边，但那篇文章是我写的，一个字都没有改过。我当时的水平就是这个样，是跟风。风是什么？谁拥护毛主席，就正确。公开文章还必须如此。

130 调回北京的经过

于光远回北京后不久，我接到他的一封信说，中央要编中国大百科全书，要调一些人到北京，可能有我。这件事实际有权主持的还是胡乔木。

我回了信，说回北京我是赞成的，因为“文革”之后两年还是靠边，连非正式的工作也没有。但是我本人不赞成在中国编大百科全书。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编一个像样的大百科全书，一定是这个国家经过某种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变化以后，反映国家重大的新东西，可是中国没有。现在中国百废待举，这时要编这种书，无非是按传统解释一切，把别人的大百科全书移植过来介绍一点知识，这跟中国大国的形象不太

相符。

这封信发出不久，从非正式的渠道听说要调一批人，其中有我。到了一九七七年六月，我给单位请了一个星期假，到北京来看看。因为当时我没有事，又换了新的负责人束纫秋，他非常好，后来任《新民晚报》的副社长。他说，你去很好，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你带去，你如果能见到胡乔木同志，我们有关于党史方面的问题要问问他。《辞海》还在继续编写，“文革”结束了，知道老调子不行了，但不知道怎么改。

我到北京，住在出版局的空房子里。出版局几间空房子住满了，都是被赶出北京一二十年的人。我找到当时出版局的局长陈翰伯，陈翰伯说是有这件事情，胡乔木他们在筹备，是要编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要调一批人。一方面要调一批科学专家，一方面也要调一批做文字宣传工作很久的人，还准备调一批老同志回北京。我又讲，我就不赞成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我说，我不赞成，把我调来干什么呢？他说，你不赞成归不赞成，调你回来你还是要回来。

实际的筹备小组由姜椿芳做。他是老前辈，外文很好，“文革”期间坐了十年监狱。他出监狱后，就抓紧干这件事，因此把胡乔木说动了，让他来负责。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叫什么领导小组，有什么长，那时什么都没有，就是筹备小组。当时已经找到四个人参加筹备小组。有姜椿芳、朱语今和我。还有一个没有来，他就在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他不愿意干，他有事情做。

我问陈翰伯，胡乔木同志能不能见我一下，我有任务。一共才三四天。他说他已经给胡乔木说了我来了，胡乔木准备见我。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去见胡乔木，车子把我送到现在社科院。走上楼梯，一下碰到周扬。周扬当时是社科院副院长。我看见他，高兴得不知怎么说，我以为他早就死了，一般人都以为他死了。“文革”初期把他当一号人物整，闹得那么凶，活得成呀！不管周扬过去怎么“左”，但看见他红光满面，后边还跟着一个秘书，是很惊喜，感到意外，我等于看见一个“死灵魂”一样。他也看见了我，他说，你去吧，他们几个等着你。很短的互问。

我跟周扬没有直接关系，但他认识我。从反胡风开始，我要到宣传

部去开吹风会，见他很多次。他是上级、老前辈，我是小青年，就点点头恭恭敬敬地招呼一下。我变成右派后，他大概知道。“文革”一开始，我们辞海编辑所造反的对象主要是我，就是斗我。为什么呢？周扬大概在一九六三年到上海去过，他通过下面的人问起几个人，表示关心，讲几句话，无非是官话。他问了傅东华，还有些人，也问了我。当然是前辈勉励后辈的话，比如好好改造，将来还是有前途的，等等，只能讲这些，是经过别人传达的。我当然是左耳进，右耳出，这有啥稀奇呢？但“文革”初期斗我，主要的大字报就集中在我身上，说我是周扬派到上海的坐探。

我走进一个小会议室，有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我跟他们三个都很熟悉。他们三个招呼了我后继续谈，谈他们院里的事，甚至牵扯人事安排。我继续听不好，退出来也不好，进退维谷，硬着头皮坐在远处。你是被开除了党籍的人，不考虑你自己的身份呀。但他们三人还是把你当成老党员看，毫无忌讳……

他们的事情谈完，我一般性地问好后，直接提出问题。我说，辞海编辑所正在加紧修改有关党史的人物，有一批人，负责人叫我带来问问乔木同志，有瞿秋白、彭德怀、林伯渠、刘志丹等。彭德怀写得很坏；林伯渠，不懂这么重要的一个老前辈，为什么写得那么一般，肯定是有问题，但上海不知道。

胡乔木说，现在一个个说不清楚，党史人物全部要改，全部要重来。你回去说，停止写了，不要改了，改也改不好。胡乔木谈林伯渠的事，谈了二十分钟。几十年不见，他谈那么机密的事，弄得我莫名其妙。关于林伯渠的一些事，后来知道一些。林伯渠的夫人在林伯渠死后，写过化名信给中央，后来查出来，她自杀了。但是胡乔木给我谈的，不是这件事，是上面对林伯渠本人的误会，他说，这是完全不对的。

他偶然谈起说，把你们这批人调回北京来，主要是为了解决你们的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当地解决不了。还是要问北京，这就不如把你们调回北京好。他说的这批人是指哪些人，我不知道。但他的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你们这批人，要准备重新入党。

131 重新入党申请书确实难写

我回上海几天，很快收拾后就到北京来了，大概在一九七七年的七月。到秋天，国庆放假前后，天已经不热了，新华社的李慎之跑到我们大百科筹备小组来。我们十几个人，有两间破平房，在东城的边上，走几步就是农田。李慎之在东单下公共汽车，走两三站才到。

李慎之主要来问我一个问题。我过去没有见过他。他说，估计你也有这个事。我们那里，上边先暗示，后来正式讲，要我写入党申请书。后来又催我几次，现在已经告诉我，入党申请书的手续是必要的，会上不会繁难。

写入党申请书就是重新入党的意思。他感到不好写，来问我。我说，我的情况跟你一样，我也拖到现在。他问，你为什么不写？我说，难写。怎么写？重新入党，不写你是右派？但不写不行，这就下不了笔。你说我现在才拥护共产党，我们十几岁就拥护共产党了；你说我现在才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们十几岁就相信了，干这个东西干了几十年。现在这么写，全是说假话。

我告诉他我的情况。我们这里的负责人姜椿芳同志，先是找我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两次，暗示我。看我几个星期没有动静，有天下午把我带到他家吃晚饭。他有车子。在吃晚饭前，他又很客气地问这个问题。在这个超级慈祥的老人面前，实在感到不好办。姜椿芳是个好得不得了的人，一个和善的老人，老党员。但面对他，这个申请书还是难写。我跟你一样，要恢复，就恢复，不恢复，这个问题就只好放下。

在姜椿芳家，我很难表态。面对很和善的老前辈，比你大十几岁，比你入党早十来年，个人品格又非常好，我只能非常客气地说话，无非说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再仔细考虑，等等。

我和李慎之两个商定不过这一关。这一关太难过。

要这些人重新入党，可能到处有难处，很多人不表态，才调整了。大概过了几个月，开支部大会，通知一声，某某人恢复了党籍，组织问题就算解决了。

132 在大百科全书待了大半年，感觉能力实在太不够了

我在大百科全书大概待了大半年，感到科学研究与国外相距太久了，很难接上头。但国内的一些科学家积极性很高，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也有积极性，但表现不一样，有点怕，不知道怎么写，认为老一套不行了，新一套，又不知道上面的尺度。

大事情不会做，某些小事，要让我抓一下还可以。我给姜老建议，赶快抓紧时间，把大百科的一些条目请现在还健在的科学家写。我说，他们可以请助手写，写完后他要看，要修改，或者委托什么人修改。这个稿子存下来，因为离出版还要好几年，将来书出来，有的老人可能不在世了，条目仍用他的名义，也可以连助手都署名。我举了一些例子，比方说请郭老写“甲骨文”的条目，如果这一条是由郭老写的，大百科的声望地位就不一样了。又比如请裴文中或贾兰坡写“周口店人”。周口店人的研究，他们是始终参与的，其他人写，就不一样。又如请梁思成写“故宫”，请冯乃超写“创造社”。当时他们都在，积极性很高。我说，如果这样写，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们可能有三四千条以上，那大百科的影响就更大。我说，我可以来专任此事，别的我不行，只要找一个伙伴。我推荐了戴文葆。我说戴文葆同志是我所知道的人民出版社第一个学问广泛的编辑。我跟戴文葆两个，只要在全国有大学、研究所的城市跑上一年，大概能拿出两三千条。不说从学术上，就是从商业角度上来讲，这也是个好办法。我还请戴文葆来开了两次会，他愿意，他认为我这个设想很对，而且他干这些事比我能干得多。他的知识、学识比我好得多。后来没有做此事，戴文葆回文物出版社了。（之后，我又动员他回人民出版社。）

这个事情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无何作用，我没有这个学问。我急于要离开，我知道我做不出事情来。

第二十七章 回人民出版社：“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风波（1979年8月—1984年12月）

133 到人民出版社的任职与辞职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人告诉我，人民出版社这几年没有总编辑，社长有，是延安出来的，我还认识。经过“文革”后，有些人变聪明了，社长可以做，总编辑决不干。总编辑要管稿件，要签字付印，可能出问题。社长兼总编辑，就是不兼，不管稿件。这个也奇怪，上级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办事，只有行政工作的负责人，没有编辑工作的总负责人，几年了，可谓奇之又奇。

他们问我，你愿意回来吗？我说，我愿意，大家都熟悉，特别是有资格有学问的老编辑都熟悉，关系也很好。他们先去活动，到人民社任总编辑，后来上面批准了。

我正式回人民出版社上班是一九七九年八月底九月初，在大百科，一年多就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做。

我当时愿意回去是感觉到可以做一点事情，你现在没有人抓全部的出版规划，我正好去。责任，我不怕，我就去负责任。当时人民出版社还是一个单位两个招牌，可以用三联的名义出书，人民出版社也另设个三联编辑室，其他编辑室的也可以用这个名义出书。所以我去，主要是为了三联这个招牌去的。人民出版社这个招牌，书难出，那时仍主要是出文件。

回人民社后的日常的工作，简单地说，不难，这么多年不好好出书，就放手多出一些书吧。但我回人民社工作才一两年，一场大风暴吹来了：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风暴吹到我头上是很厉害的，我是被这场风吹垮的。

我在人民出版社的工作年限到一九八三年年底，一九八四年一月一号，我就正式离职了。为什么恢复工作才两年（此处专指在人民出版社时间，在大百科一段，我什么事也没有干），就决然辞职了？

我之所以急急离开，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我建议翻译出版的那套“外国政治学术丛书”。中国人不准谈政治，“政治”两个字是我硬要加的。我建议后，很快就干起来了。我回人民出版社基本上只干了这一件事，而这一件事，就闯下了大祸。一场暴风雨就来了。但是全面发动，是在我离职一个多月后，还专门把我找到中宣部去开会。

当时“反精神污染”等，闹得天翻地覆，我感觉时光在回转。“文革”刚结束，怎么又要搞相似的运动了？就是在全国闹得非常响的时候，我因公在上海。我听说我们社有些搞人事的、搞行政的人，已在叫女同志的头发要剪短一点，裤子长了短了的，又搞成这样子。我说不像话，是瞎胡闹。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我是不可能在全国“反精神污染”的口号下来也跟反对民主、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的。后来接着“反自由化”，因为“反精神污染”不好听，大家不喜欢这个名词。我看这一来，工作很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坚决辞职了。

我是一九八三年秋天写的辞职信，批准我工作算到一九八三年年底。没有人逼我，就是因为“反精神污染”，加上丁玲、欧阳山等人的拥护谈话，我感觉到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不能接受。

134 为什么要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

十年“文革”，任何比较正常的图书出版都停止了，只有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只有张春桥、姚文元写的小册子，八个样板戏，还有江青对老帅们的训话等。现在人们已经无人知道了，“文革”一开始，江青就对老帅、老将们有一篇训话，号召老帅们要“为人民立新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此讲话即成小册，人手一册。一家人，有几套毛选，不算稀奇，有一堆小红书，不算稀奇，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一件怪事。这种现象，“四人帮”垮台后，在思想专制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花多大的力量去揭发、批判。十多年只出了两本书：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章士钊的《柳文指要》。

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为了大百科，我到过西安等几个地方，到过乡下。“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一些人家，毛选一大堆还摆在那里，

毛主席的塑像也摆得好好的，都跟过去一模一样。所以十几年，从“文革”算起，到八十年代初，老百姓谁不希望能看到一些新书？而且中国对外国的情况，特别是对“二战”后的外国情况，实际上从来就是一无所知。不是所知甚少，我认为是一无所知。自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没有翻译介绍外国情况的书，要有，都是那几本俄文书。名义上有《参考消息》，大学生都可以看，但《参考消息》并不是真的各种消息都有，这个《参考消息》是根据一定的要求来选的，参考性很少。

解放后若干年我们宣传的什么？宣传全世界所有苦难的人民都等待中国人民去解救他们。“文革”前后，我多次下乡劳动，农村天天出工都要叫口号：“身在家门口，远望天安门，心想全世界，为世界革命种田。”闹完了，再下田去，已经十点过了。在“文革”期间，更是厉害，到处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虫，全无敌”。给老百姓灌输的是：全世界等待着我们去解放。

我这里还有个例子。一九五七年划右派前不久，我的一个亲戚的孩子从师大毕业来看我，谈起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俘虏争取回国，他不理解。对我说，他们生活穷得很，他们回去，不是要杀头、要在街上要饭吗？我问，谁告诉你的？他说，从小学到大学都是这样教的。当时我哭笑不得。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外国的人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杀光。自我愚昧，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因此，一九七九年八月下旬我回到人民社工作后，我的老毛病又犯了，就是要睁开眼睛，看看全世界。中国对外国，几十年来到了一无所知的程度。所以，非要有一些讲真实情况的书不可。不说点具体情况，是非常糟糕的。这时，我主张赶快把“二战”后外国的情况，多翻译介绍一些进来。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情况要介绍。我利用我这个职务，想大规模地搞一些介绍外国的书。但是这个工作有些不太好做。介绍外国与投降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是两回事呀，但你介绍外国，就是投降外国。要革命，就还是要说，全世界人民等着我们去解放他们！

135 发起出版“外国政治学术丛书”的简单经过

人民出版社有不少同志感觉跟我一样，觉得当时我们太封闭，而且解放后一直如此。他们也认为，应该组织大批的外国书，翻译过来，因为要组织编写新的稿件，基本上很困难。大部分教授惊魂未定，他们先追求安全自保，有饭吃，不挨斗，工资照发就行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愿意把一辈子研究的东西，在临死前拿出来，并不是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对历史怎么解释。所谓的中国历史就是靠李自成、黄巢，靠农民战争，历史学家不信，稍有常识的，不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外语修养不错的学者还多，如果组织他们翻译，他们的责任小，正好符合他们的心意。同时，一些政府部门，如外交部、中联部、国际研究机关，这些单位的兴趣更是大得不得了，他们跟出版社的编辑也认识，大家兴趣很高，听说人民社有这个意图，这些部门很快自己串联，热闹起来了。

人民出版社五十年代编介绍国外书的人还在，他们本来外文很好，很快地，人民社新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室，调了几个外语强的人去。我的意思就是公开地打出“政治”招牌，我们应该了解国外的经济、政治。

然后由我出面，由宣传部、编译局、出版局来发起。我们出版社是小单位，不够资格。这个事情的发起，我在《申诉书》里说得非常清楚（《申诉书》指我在一九八四年夏上交×××同志的一件抗辩书，后面将谈此事）：

惟觉此事由人民出版社出面邀请不够资格，遂立即于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于光远（社科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以上三个国家出版局）等五同志，建议由他们出面邀请有关单位开一次筹备座谈会，成立书目选译小组，然后再开一次有外地三五家出版社组织参加的具体分工的会议。五天后，陈翰伯同志在原信上批：“送曾彦修同志。惠德、光远同志早有此意，可惜多年来未能开展此项工作。建议把此件送陈原同志一阅。我希望在七月间开会（指具体分配出版任务的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半个月后，即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由王惠德、于光远、陈翰伯三人联名代表中央编译局、社科院马列所、国家出版局发出邀请信，人民出版社是被邀请的出版社之一，于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六日在国家出版局召开第一次座谈会。

陈翰伯、王惠德、于光远以及国家出版局的几位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由陈翰伯同志主持，不约而同地都觉得这不过是把荒废了十五年的工作重新拣起来做罢了（不过，此次选译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参考），所以那次会议主要是互相回忆了六十年代出版“灰皮书”“黄皮书”的情况，并原则决定先成立一个选题小组，由六十年代初始终参与此事的中宣部工作人员冯修蕙任临时小组召集人，选目小组由中联部七局、中联部苏联东欧研究所、外交部苏欧司、马恩编译局、北京图书馆、中国图书进口公司、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单位代表组成。并原则决定一俟书目初步弄好后，即由国家出版局召集全国部分出版社会议，分工承担任务。×××同志批评说，人民出版社唯一的“创新”就是出了这套书。但是，这个功劳主要不能归我们，我们确是起了一点作用。

这样一来，非常顺利，这套书经过修订，目录出来，有九十七本。国家出版局大概在一九八〇年春天开了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是落实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布置，即加强中级读物的出版。中级读物，就是解放初出的像社会发展史一类书。

但译书目录一出来，大家的注意都在这上面了，争得很厉害。我对本单位的人说，人家不要的，我们来。这样，经过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两年，由全国若干个出版社出版，绝大多数书都出来了。

当时，出版界多少形成了一些新鲜空气。中国上十亿人口，出版这几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还发现，不少人长期养成了一种惰性，对这些书并没有什么兴趣，一是看不懂，二三十年跟外部完全断绝了，不知道如何选书。二是确实被运动整怕了，只求一个安全，对译此套书有兴趣的并不多，多数出版社对此无兴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很快地，一九八二年开始了“反对精神污染”。在学术上，在文艺上，更紧张。《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副总编辑王若水两个人下来了。胡绩伟为了什么？为了不同意×××、×××说党性高于人民性。这个话本身非常抽象，讲道理讲不出来。胡绩伟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胡绩伟认为，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其他的利益，人民性是最高的，人民性就是人民利益，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这个说法恐怕没有错。党性高于人民性，那党的利益高于人民利益，这个确实不那么易

懂。胡绩伟也是二十来岁从地下工作撤退到延安的，做报纸一直做到《人民日报》的总编辑，感觉到这种空洞的口号非常错误，所以要在“文革”后完全转变过来。但是×××、×××就不同意，坚持这个东西，斗，斗了多少年。是不是真的在斗这两个名词呢？照我看，不是这个。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没有矛盾，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高、人道主义低的问题。同时，王若水又是周扬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篇讲话文章的三个作者之一。一九八三年，周扬作了长篇讲演，把过去极“左”的观点改变了，就强调了一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周扬当时身体不好，要他写这么长的文章，实际上是困难的。王若水是这个报告争论最大的这段的起草人。另外两个人是王元化与顾骧。

先是批周扬，周扬一气得病。胡绩伟跟王若水，在《人民日报》大会、小会上被批判，职都撤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倒一点敏感性都没有，没有感到他们的后边会连着其他单位。我们算个什么？一颗小绿豆。但是事实上并不像我所想的那么简单。我一九八三年夏辞职，是感到工作无法做了，动辄得咎。但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到三月，把人民社的组长以上的同志叫到宣传部去，批评了两次。第一次我不在家，要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各处副处级以上的人到宣传部去听转述×××的批评，约两小时。三月六号，又叫人民社三个负责人去，指令曾彦修必到。其时我已经离职三个月，是退休人员了。×××一人对我们批评了三个钟头。我一字未发。

但是这一次我也一点没有屈服。我立刻写了一本厚厚的《申诉书》——我不好叫“抗议书”，交给×××，也交给一些政治局委员或书记。我也上交到中纪委，因为根据批评我的那些说法，我的问题应该由中纪委处理——我的问题已经不是思想问题，而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了。

从反右派、“文革”这些运动过来，经验多了，屈服、检讨没有用，下一个运动你会更惨。与其那样，不如我现在就顶住，随便你，我不但不检讨，我要你检讨；我不但不向你道歉，我反复要你向全体人民出版社及我本人道歉。这不是捣乱，而是教训使然。

136 胡耀邦立即批示，赞成“外国政治学术丛书”计划

选题小组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制订出翻译近现代外国学术重要书籍九十七种，号称一百种的计划。人民出版社负责事务上的工作，打印出来，寄出去征求意见。

哪晓得（知道）过了个把星期，突然收到一本两厘米多厚的油印的东西，就是我们寄出去的计划征求意见稿，是胡耀邦总书记办公室退回来的，还有胡的亲笔批示。这个事，我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负责把计划草案分发给专家，至多是某个研究所。但是，人民出版社的政治编辑室寄了一些给社会上的著名人物，竟寄了胡耀邦一份。这个做法是很不妥当的。按照规定，我们这个计划修改定了后最后要报中宣部，看中宣部要不要请示书记处。“文革”期间，无政府主义已经普及全民了。我当时是总编辑，是要负全责的。我只好写一封信，给胡的办公室说对不起，我们无政府的状态还多得很，这个东西是最早的草稿，成型后会呈送中宣部，对寄给胡耀邦一事，我只好表示歉意。因为任何一个小单位都把自己的计划寄给总书记去征求意见，实在太不应该。

胡的回信是这样的：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该指定一二十人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 7·21

这是一九八〇年的事。这封信应该还保存着，是他的亲笔信。

胡耀邦之所以讲太多了，还要精选，是对我们一家出版社讲的。一家出版社一下要翻译一百本确实难。胡耀邦的这个回信，我们并没有对外宣传过，但筹备、翻译这批书的二三十个人都知道了。

到了一九八三年，清理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一九八四年，

×××专门为了这套书，又叫我们三个去。我在《申诉书》里说了这件事：

今年（按，指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同志找我们（曾彦修、张惠卿、陈茂仪）谈话时，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当面向×××同志念了耀邦同志的批示，但×××同志听了后，随便说了两句："耀邦同志是一般说说，不是对你们人民出版社说的。"但是，我以为耀邦同志的批示绝不是随便说说，这个批示在党的理论研究上将会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他认为必须熟悉国外的理论情况，"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把问题提得很高，正确而又必要。第二，这个批示是直接回答人民出版社的，批示中还用了"你们"的话，怎么能解释成为不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呢？第三，正因为只是对人民出版社说的，所以，才会觉得一下子搞这么多书，计划太大。如果对全国说的，能够说只翻译百把本就把这项重要工作停止了么，显然不可能作这种理解。

第二十八章 “台风”的经过与我的三万言《申诉书》

137 事情是这样起来的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某部突然召集人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及行政副处长以上的人去听传达——×××对人民社的批评。那时，我刚好不在北京。

我在《申诉书》里写到这次批评：

×××同志于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和三月六日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工作作了“批评”。我这里把批评打上引号，请看了这两次“批评”的原话摘要就会完全明白了。（见附件一、二）“批评”的总精神是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是对的，但是自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就完全错了，是被×××同志认为不受党的领导的理论界牵着鼻子跑了，还公开替托派宣传，真正陷入了“三信危机”，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了自由主义的出版社”，等等。其他严厉指摘尚多，主要内容略见附件一、二。

×××同×××同志都多次说过，个人责任就不追究了。四月初他们二位向××同志汇报思想工作九条时，第一条就谈了这个问题，又说不追究个人责任了。……

×××严厉的指责还很多。这件事，不仅仅是这样批我们，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初，×××和×××两位向××汇报思想工作，实际上就是汇报“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的情况，一共九条，第一条就是谈人民出版社。在他们的汇报当中还讲，个人责任就不追究了，意思就是组织处理从宽，本来是应该追究的。

怎么知道这个汇报的呢？要知道“文革”以后情况不同了，打倒“四人帮”后，上面的事通过小道传下来。我在给×××的《申诉书》中也写上了这件事。

我的《申诉书》将近三万字，章节清楚，但太长了，不可能在这个

谈话中多讲，只把要点介绍一下。介绍之后，我是对，还是错，只有付之公论。

138 ×××与我的总分歧：坚持马列与坚持“双百”方针是不是不能并存

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多年来一直没有出过这个问题。共产党不是因为提出“双百”方针，就放弃马克思主义，这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可以并存的。《申诉书》中说：

我本人则完全承认我历来就主张要充分了解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其他社会科学、文艺思想等方面的情况的。……

一九五五年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作《论“睁眼看世界”》，至今不少人还印象很深。……

一切应该迎头赶上。对当代的外情不了解是最危险的。……我感觉，更迫切的恐怕首先要了解二次大战后，尤其是眼前的情况。但是，×××同志在原则上认为不应该出这类书的，他在三月六日第二次对我等三人的谈话中说：“用什么名义，用三联，用商务，不是个实质性问题，实质性问题是出了这些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而没有消除它的东西，去和它斗争。你们没有以灭害为己任，缺乏这方面的积极性，这才是个问题。”

×××的这段话很厉害，除了马列和党的文献，“二战”以后的外国书都是害，你们不但不灭害，还介绍进来。这段话，我认为说得太滑边。人类的文化，“二战”后的，就都是坏的？作为那么高级的领导人，把出版“二战”后的书说成是“没有以灭害为己任”，这个太滑边了。人类的文化，难道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出来后就断了不成？难道除了马克思外，都是害吗？这些思想长期在中国流行，不稀奇。

这样的话出自高级领导，或者一个宣传家口里，当时我实在非常吃惊。这种话，老实说，跟他以前的讲话不一样，以前他绝不会讲这种话的。

中国封建文化的顽固学者认为，孔夫子后再也没有真理，孔子已经把一切人间的道理讲完了。×××的说法是另外一种。马克思、列宁，加上斯大林，已经把人间的真理讲完了，再不能去读外国书了。

这次突如其来的对我们的毁灭性批评，我在《申诉书》里说得很清楚：

×××同志一九八四年三月六日谈话，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的新原则，他说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订的出书方针（那时我还未到人民出版社），“这个方针讲了些漂亮话，不求实际”。“里边还有一个矛盾，或者叫界限不清，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是宣传马列主义，怎么能并驾齐驱？不太明了。”这段话确实很难使人明了。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并没有说过它同宣传马列、坚持马列不能并存。如果×××同志讲的是对的，那么近三十年来恐怕一切宣传、理论、报刊、出版方针都全错了。因为不管哪里都是要坚持马列，也要坚持“双百”，从未有人批评过两者并存是错误的。……我觉得×××同志现在发表的是纲领性意见，在中央未发表意见之前，本人很难同意此种说法。

×××具体集中指责我们四大问题。最尖锐的是指责我们人民社宣传托派。中国也好，苏联也好，几十年来，把托派看成是人间罪恶的代名词，其实对人家啥也不知道。

我在《申诉书》里说：

×××同志具体指摘我们的一个个的严重问题很多。以下就他指摘最多最尖锐的三类问题作点说明，其余就不谈了。这就是：一、宣传并公开为托派、布哈林翻案的问题；二、“反苏”问题；三、散布其他一些共产党的理论、纲领问题。

×××同志指摘最多、最严厉的是我们出版了第四国际托派理论家曼德尔《关于过渡社会的理论》一书（六万三千字，一九八一年九月出版）。他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日第一次谈话说：“国家政治出版社出托派的书，出反对苏联的书，出不破哲三的书。……托派在中国是反革命组织，只要有活动，我们就法办。现在公开出托派的书，这是跟我们党的方针直接违反的。”“我想象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开出版托派的书，走

得太远了！”三月六日第二次谈话时又说：“人民出版社居然出国际托派曼德尔的书，还说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国际的观点，明知他是托派还公开出版他的书！”

我觉得批评我们的人才高八斗的，这回却真是走得太远了，还认为布哈林等是应该杀的，这不符合他的知识修养。

139 比利时的曼德尔，跟中国的大权威开了一个大玩笑

这回×××的严厉是异乎寻常，说得我们跟现行反革命差不多了，该法办了。但是，我早深知这本书的出版经过。我们是有意出版这本书的。因为我们知道×××同志曾经特别赞美过这本书，用不同的方式介绍过这本书，说这本书怎么特别好，因为他不知道作者是个托派倾向者。我们不得不公开出版，加一个说明。

我的《申诉书》里，对这个问题不得不讲得特别清楚：

“文革”前几年比共（马列）总书记格鲁巴访华时带来了曼德尔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部大书，交与中联部，说明曼德尔是托派理论家，但比共（马列）批判不了这部书，希望中国同志把它翻译出来，加以批判。后来译出来了，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了上册，“文革”开始后下册未能印出。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商务印书馆作为一般学术著作出版了此书的下册。×××同志看了此书后，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八日在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赞美此书说：“我看到一本比利时的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坚持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接受”（见附件六。这个附件是原大字原件复印，很重要，盼能看一看）。这些评价当然是很高的，这就是说曼德尔是一个创造性的、没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志特别重视下册中的十五章——十七章，即研究苏联及过渡时期经济的三章。据我们所知，×××同志还曾要一个党中央的机关把曼德尔的这三章书印成

了大字本，分发中央负责同志及很多同志参考。中央党校也在同年十月将这三章书印成大字本，封面印有“中共中央党校翻印”字样，发与全体学员作为正面学习材料，根本未向学员说明是托派资料。人民出版社的一个副总编辑张惠卿当时正在那里轮训，他也得到一本，至今还在手中。正因为这个国际托派理论家，被×××同志如此作为正面人物在党中央机关内广为宣传，我们才觉得必须说明曼德尔是当代国际托派的著名理论家，以免谬种流传，不可收拾。……我们在这本小书中之所以特别要指明作者的托派身份，不过是想默默地做一点补救工作……不想我们竟因此而遭受如此强烈的谴责！

《申诉书》是一九八四年秋交的。我所说的观点，完全还是老的正统的教条主义的观点，即凡托派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当然有其高明的地方，在他还不知道曼德尔是托派时，看出他著作的合理性，高度地赞美，但是，一旦他知道曼德尔的托派身份后，连我们指明曼德尔的身份，出版曼德尔的小册子，也都成了犯罪了。如此处理事情，天下是非还有个客观标准吗？

他提倡的、歌颂的、向领导推荐的，向科学工作者、向党校推荐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怎么一到我们手里就成了犯罪呢？“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这几句强硬的回答，实在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他讲的话，离开事实太远了，太滑边了，好像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似的。所以，我在《申诉书》中说：

说托派是德日意法西斯的间谍，则二次大战结束已整整四十年了，迄今全世界未发现任何一件公私材料能证明这一点。而要把这个事情整个隐秘至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是不理解×××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还要说一套三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话。

140 现在还能坚持布哈林是个反革命分子吗？太怪了

我们受到特别尖锐指责的是×××批评我们出版了一本为布哈林平反的书，×××仍然坚持布哈林是个反革命分子。其实，苏联方面已经多次非正式为其彻底平反多年了。他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外国间谍。但

×××却还要坚持斯大林对布哈林的判决，责备我们不应该出早已在全世界通行了的书：《布哈林案件》。我在《申诉书》里说：

《布哈林案件》一书则是几万字的一本小册子，是英国罗素和平基金会组织人撰写的。本书首先转录了维辛斯基公诉的全文，另外引用了苏联的报刊材料，是说明与布哈林同案的一些重要人物均已平反（苏联没有一个人公开平反的，都是非正式的方式），用以反证布哈林罪名不能成立。此外，书中还引用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一段话："我们无限期地搁置了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平反，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的决定是一个错误。"书中还引用了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著名的女革命家斯塔索娃等于一九六二年苏共二十二大后联名致苏共政治局要求为布哈林平反的信件。另外，全世界都知道，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院院长、《斯大林传略》的领衔作者波斯伯洛夫在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二十一日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在公开回答提问"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是不是外国间谍"时说："我可以声明，只要仔细研究苏共二十二大文件，就足以说明，无论布哈林还是李可夫，当然都不是间谍和恐怖分子。"（这段话是我们怕万一原书不可靠，一九八四年又找出苏联报刊重译的。我们知道凡苏联的屠杀问题，中国定为"三七开"，比人家更清楚、更权威。叫重查《真理报》也是我之意。）这本《布哈林案件》一书之不属于捕风捉影的一类东西是很明白的。它的材料并不多，所引资料也都是全世界久已熟知的。上述波斯伯洛夫的谈话更从未受过苏联官方的任何谴责和否认。时至今日如还认为布哈林是法西斯间谍，以至一九一八年即勾结各帝国主义合谋刺杀列宁等，那么，全世界恐怕除了阿尔巴尼亚霍查之流，不管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包括苏联本身，已经绝没有人这么说了。

中国不熟悉这些问题，以致不少同志至今还拿大审判及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作根据。这电影是不能再放了。可是有个什么运动一来，就要连续放这个电影。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文化古国能如此滑稽？只要一放这个电影，人们就晓得一定要搞什么对敌斗争的大运动了。

怎么可以落后到这个程度呢？×××真不了解情况吗？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坚持布哈林是间谍。可以说在中国，电影《列宁在一九一

八》已经在全国、全党，造成了几乎是改不过来的错误，现在很多人还是电影中的观点。一九五六年“反右”前，文化部开党组扩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学术性的，一些著名的党外人物都参加了，茅盾、郑振铎、欧阳予倩，把我也扩大起进去了，我不是名人，当时属于文化部管。办公厅的副主任×××，跟我激烈争论起来。我还是比较平静，我说《列宁在一九一八》不能再放了，因为知道说布哈林的罪名是假的。但那位同志只看过《列宁在一九一八》，只相信电影，不相信其他。实际上，当时我已经知道列宁夫人的《列宁回忆录》，当时已经翻译出来，还没有出版。列宁夫人回忆列宁遇事的那天，布哈林是唯一一个劝告列宁不要去演讲的人。当时列宁想到哪去就到哪去，比较随意。那天，布哈林说不安全，列宁表面说不去，还是去了。但这个电影却相反，说布哈林组织暗杀列宁，是外国间谍。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他水平高，懂的事多，他说，不要这么激烈，这是讨论问题，讨论这个报告就是要纠正从前不对的地方。这样就维护了我的发言权。讲这件事是想说明，到今天一些人也说布哈林是反革命，是间谍。他没有另外的来源嘛，就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以苏联的一个电影定是非，现在没有了吗？还有。

×××责备我们为布哈林翻案，就难理解了，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他的知识比我们多几十倍、几百倍，他的情报来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却连半个字的情报来源也没有。

141 人民出版社还有个“反苏”问题（指契尔年科时期）

×××说人民出版社“反苏”，是指的什么呢？我在《申诉书》里说：

×××同志着重提了《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苏联出版物材料汇编》一书，说我们“反苏”。此书编辑者是美国人，原书一九七四年出版。此书名字很怕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广告手段，我们以改名为妥。但是这本书的内容却毫无惊人之处，它不过是苏联报刊书籍材料的摘录而已。这位编者不过是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用苏联自己的公开材料来证明苏联历次大审判是冤案而已。我们有此一书便可起个备忘录的作用，以免出现苏联都已实际平反了的人物，我们还

是几十年日日夜夜坚持他们是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侦探间谍之类的笑话。

这本书也不叫平反，就叙述一个个人干了什么，有什么功劳，也没有说他被杀的事，实际上就变成了事实平反了。书名我也不以为然，但我去人民社时，书已经出了，那几年没有总编辑，各自为政。

把托洛茨基说成帝国主义的侦探间谍，到现在为止，中外根本拿不出任何一件小事来证明。我看见的材料，没有说世界上有哪个托洛茨基分子是希特勒的间谍、侦探的。中国那几个信仰托洛茨基的人，待在北平的、上海的、广州的，住亭子间，饭也吃不饱，一天到晚想要世界革命。这些都是些怪人，有他们的理论，有他们的理想，但找不出一个是日本人的间谍，也找不出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务。

在中国，是有两个托派最早的中央委员投降了国民党。但那是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托派组织刚成立不久。这样的人，已经跟托洛茨基者没有关系了，中国的托洛茨基派骂这两个叛徒，比我们骂得还厉害。不仅如此，中国的托洛茨基认为抗战时，国共合作，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所以，他们的思想之"左"，思想之奇怪，现在都令人不理解。但都谈不上把世界的、中国的托派说成是德、日间谍。而×××这样一个大人物，在一九八四年还坚持这样的说法，我觉得确实令人不解。而且这个话，不是对一个中学生讲，而是对一批人讲，这些人，至少还是三八式吧，信仰马克思已经几十年了，加入共产党也已经几十年了，他们一点头脑都没有？因此，我在《申诉书》里反驳说：

选译本书，无论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没有什么错误，"反苏"之说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苏联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偏向和错误问题，如他们突然的强迫的全盘集体化及其教训；农轻重工长期比例失调；"肃反"的大规模镇压行动，战争前后的某些失着；思想文教科技工作中的大国主义、闭关自守与拒绝承认一切新鲜事物的做法（一切俄罗斯第一，反对爱因斯坦学说，反对控制论，反对电子计算机的设想和人工智能的设想，反对遗传基因与遗传工程的研究，宣传生物自然发生，等等）都是我们亟应了解和研究的教训。翻译这类问题的书，又是由内部出版，这同反苏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这类书今后还应该认真出。据知，这套书中的一本有谈及苏联集体化失败之处，政府负责人×××曾要求赶

快把内容提要弄出来给他看。

142 是否应该了解外国党（外国共产党）

×××在找我们谈话的时候，特别指责我们翻译了三几个外国共产党理论主张的书。原因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全力反苏以来，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被列为“苏修”的走狗了，中国跟他们完全断绝了关系。“文革”前后，有一些外国共产党里边又分出了几个人，成立了共产党的马列派，或者毛派。这些共产党的力量本来就很小，这一分裂，力量就更小。我们介绍了两个欧洲的小党，目的是让中国人知道，那些小组织是成不了事情的。他们各方面水平都很低，他们讲的东西，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可能依靠他们去解放全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介绍一个比较正规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性的文件，但是这件事，受到×××的严厉批评。关键一点就是，日共把无产阶级专政叫无产阶级执政，就是这么一点，其他也没有提出来什么批评。我的天，对这个批评，我就根本无法理解。因此，我在《申诉书》中说：

日共就在东邻，我们不能预存永远不能改善关系、世世代代要敌对下去的决心。……万一有朝一日可能重新建立关系时，为避免对他们一无所知，就必须把他们的理论、主张介绍过来。而不破哲三是他们的总书记，最主要的理论家，其在党内的实际地位早已在老迈的宫本显治等之上。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正续编，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日共的理论和观点，既有一般性的理论看法，也有如何处理日本现在及将来的问题的阐述，这样的书是很难找到的，不译过来，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日共呢？×××同志所说不应该翻译的理由，一是日共反华，二是他们认为应把无产阶级专政译作无产阶级执政。反华，我们也长期地全面反对过日共，不能因为此就不研究他们……其实，专政、执政，他们更强调的是译名不妥。（我们正式叫法不也重新采用人民民主专政么？）日共究竟是怎么回事，总要译出来看看才知道。……不去了解人家，只能使我们自己闭塞。例如，理论界过去一般认为日共的理论基本上是欧洲共产主义的简单移植，但是不破哲三的书却批评欧洲共产主义，表明他们同欧洲共产主义又有不同。究竟是否相同也是要研究才能知道。

143 我在《申诉书》里反复要求×××道歉

一九八三、八四年的气氛是相当不平常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清污、“反自由化”的形势很猛，有的单位里有的人大大地活跃起来了，我们社人事科的人又去警告女同志，自己直接就去警告，头发要短一点，裤脚要大一点之类，表示他们有权。对一九八二、一九八三、一九八四这两三年这样批判，有几种立场可以采取，其中一是不回答，接受批判并检讨，以当时全国形势之紧张难逃此运；二是不接受，并作一些反批评。我采取的是第二种。

接受批判、检讨，这个历史上的教训多了。接受批判检讨后就没个完，永远过不了关，终生都背着这个包袱，终生都放不下，一有事，就要批斗，就要检讨。所以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我如果再做检讨的话，人的自尊心到哪里去了呢？人生在世，一生就为了污辱自己，辱骂自己而存在吗？这样活下去，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先？中国老百姓有句老话，人活个脸，树活个皮。一生做检讨，一生要人侮辱自己，算个什么事呢？中国有个古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这个时候，我就是不畏死了。几十年还不够，我天天缩着，不敢说一句人话？二十多年了，现在刚刚出来做点小事，三年不到，又犯“罪”了，谁受得了呢？当时我对×××的这个反批判，也是什么都准备了的。下一步，就到秦城监狱去。当时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你把一切不合理的做到家了，我就无所谓了。

同时我也考虑过，我个人的行为，就是我个人的行为，没有什么影响。我不是周扬，周扬的处境难了，那么高的地位，那么大的影响，说他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等，他只好闷声，苦在心头，一下就病倒了。在批判周扬前，《人民日报》的胡绩伟、王若水，已经被批判了。我们这个小小的单位，就被选为典型了。当时出乎我的意料，但一遇上后，我反而一点也不吃惊了，我反而什么事情都没有了。无非是要来的终于来了。无非是要我屈服，如果我不屈服呢？人要活个尊严，把人的尊严无止境地摧残下去，“文革”后再这么干，不是把人们的一点希望又要扑灭下去吗？

人民出版社这样具体的事，一般人不知道。实际上批评者只在独揽

人间真理，只要一个头脑，重复历史往事。并不是什么科学问题，政治问题，无非是权在你手里，这样的一种规矩怎么可能使国家兴旺、强大？我非常奇怪，一个人对历史怎么不是引为借鉴，而是想去重复？我以为这实在是中国的一件大怪事，为什么对那么明显的大错误，也要去重复呢？我在《申诉书》中几次提到要批判我的人向我们、向我本人道歉。我说：

××× 同志是我多年十分尊敬的老上级和业务上的老师，但是，“吾爱吾师，吾尤其爱真理”。三中全会过了六七年后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批评”，我是不能不辩正的。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只掌握在某一个人的手里，掌握在一个人手里的东西就成不了“主义”……我以一个学生的身份深盼 ××× 同志能够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 同志几次要我们在整党中重新明确方向，彻底讨论一下。那么，在整党中作为一个党员我有权利也有义务说明我的看法和全部事实真相。最好，××× 同志能正式对人民出版社表示道歉。因为 ××× 同志的这些批评，全国都传开了。

同时，我准备好事情可能复杂化，这个复杂化就又难免会牵扯到“肃反”这类问题中去的。因此我在《申诉书》中申明：

因为这件事情已涉及严重的党纪问题，我不得不把这件材料同时呈送中央纪检会。

这件事，我绝不是小题大做。我觉得这种批判、这种扫荡如果太顺利了，就不行。一刀砍下来，本以为像切豆腐似的，结果偏砍不动，这样就会想下一步整人时注意一点。

我的《申诉书》是在我们单位秘密打印的，因为牵扯到中央 ×× 局委员，属于机密，所以打印一张，销毁一张，印了三十份。司机去寄送到中央办公厅，包括送了一批政治局委员，一批书记处的，同时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我考虑过，与其等你整我，不如我先备案。这大概叫恶人先告状吧。这次，我也就只能主动当一次

恶人了。

《申诉书》我花的力量很大，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量去写？并不是为了我个人。不过，个人当时不表态也不行。认错，我不可能，因为事情是你搞错了。难道我也跟着说，布哈林等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都应该杀，杀得很对？我能讲这种话吗？不可能。我是被逼上了梁山，除此别无他法。反驳要的是根据、是事实，如果没有材料，没有理由，我也无法反驳。中纪委收到，有没有看的？我估计可能有人看，看了笑笑，你们那些扯皮，我们管，一天不干事了？

第六编

在我一生中，可以说是纯偶然又偶然的原因，我跟张闻天、康生、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这五个人都有过直接的接触。和他们中的三四位有直接接触的人，可能有一些，但同时跟这五个人都有直接接触的，我估计很少。我是个什么呢，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水平低得很，确实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我在他们几个领导下工作过。这个领导，不是他在上面作报告，我在下面听，基本上是有一点个人的面对面的关系。这个历史确实是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为什么要反复说呢？不然就会说这是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要这样说，我当然也没有办法。我只是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这几个大人物的印象，而人们对这几个人都是很感兴趣的，我谈的印象是比较平常的，不是在光环下、神坛上，或者地狱里的，就是在相对平常状态下获得的印象。

第二十九章 张闻天：有才有识，大公无私，朴素谦逊，但是比较软弱

144 在遵义会议中的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突然出现一个问题，说张闻天的职务不是“总书记”，是“总负责”，根据是陈云写的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事，若干年来争论很多，若有其事，大论特论。其实总书记这个说法，是从西欧一些政党那里来的。西欧的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工党，其他政党也有这种情况。“书记”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秘书之类的。“书记”，在中国古代另有含义，就是秘书，管行政上的文案事。我们译的西欧那些政党的总书记，就是相当于执行秘书，而且他们的总书记是事务性的，多半一年换一个。现在西欧各国的党，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还是社会民主党，还是工党之类的，有的叫主席，有的叫总秘书、总书记，随便你怎么翻译，总之总书记根本不是最高领导人的意思，大体上是当年的联络秘书的意思。列宁要斯大林出任总书记的时候，即办公室主任、秘书处主任、联络主任这一类的意思，所以，一直到最后，斯大林并不称自己是“总书记”，而只自称作“书记”。但后来在中国，总书记变成最高的、权力无限的、自然也就威望无限的神化人物了。很多人就不愿意讲张闻天当过总书记，只说他是“总负责”。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总负责才是真正重要得多，总书记本身并无负责一切的意思，而“总负责”则字面上已十分明白了。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时，张闻天并不是红军，也不是土地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但他是个缓冲人物。博古他们跟毛泽东说不来，张跟毛没有什么矛盾，而且他这个人和蔼，水平比较高。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总报告。站起来全盘反对博古的，确实是他。而他的长篇发言，这些年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毛主席告诉他讲些什么，他就讲些什么，专讲别人的话。这可能吗？他的发言现在还在呀！那个发言很长，他不是个战争的指挥者，但是，他是学习了一些东西，有自己的体会的。所以，他的反报告，既有毛泽东的关于战争的想法，恐怕还要看到他在根据地观察了两年多，有他自己的体会。自己没有体会，别人告诉他，他可以发

言，讲几分钟，十分钟后，还能讲什么呢？他那个发言，在军事匆忙当中，还能你看我看，大家改吗？他的稿子不能用，还能变成决议吗？所以根据一般的常识来讲，他的发言，不可能是毛泽东一字一句告诉他的。《张闻天与遵义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一篇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共十九页，应为一万四千字左右。这个决议也就是会议上的报告。决议注：“这文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所以，现在来讲，报告与决议就是一回事了。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作用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么多年专家的研究，他在长征中的作用在慢慢增长。他名义上是总负责，他能召集大家来开会，他能够让毛把各方面军事正确意见讲出来。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十频道王树增讲他的纪实文学《长征》，材料较简单，有一点很特别，他明确讲一方面军是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领导到达陕北的。过去似乎从没有人这样讲过，从没有人把张的地位放得这么高，说他是“跟着走”。“跟着走”，就是不起作用。我们总是把一方面军当作长征的总代表，这里把他的名字正式摆在第二名，这当然是某个研究者的意见。但是允许这样，并见诸电视，就很不简单了。抗战后没有这样提过，都说是毛领导，我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到延安，从来没有说在长征中张闻天有什么作用。我想不同意王树增这种提法的人肯定很多。他能够这样说出来，光是他一个人也不一定有这个胆量。但是我肯定，有人坚决反对。当然，他这个提法对不对，我也有些怀疑。因为把张放在周恩来之前，是不是对，可以考虑。总理在长征中，在关键时期，即过草地的前后病得很重，是上天为我们把他保存下来了。

145 西安事变，最早主张全面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

西安事变后，十二月十三日，中央在陕北开会，当时没有多少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什么事都是由他们四人决定，博古仍然保持政治局常委地位，什么重要的事，他还是参加决策。

打倒“四人帮”后，我从上海辞海编辑所回到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张闻天文章的选辑小组。后来，这个小组成为中央特设的了。我时常跟这个小组联系，因为张闻天是我的老师。他们写到西安事变这一段，跟传统的说法不一样，他们说，是张闻天在会上发言，明确一开始就主

张和平解决。而传统的说法是，一切都是毛主席定的。我问他们，有没有档案根据？他们说，我们看了西安事变两次会议的简单记录。我说，档案馆的记录。你们说你看到了，他问你，在哪里呢？你就抓瞎（没有办法）了。我问他们这档案有多长，他们说不长，零零落落的。我说，如果要让你们写的观点保存下去，不怕追究，你们必须要把有关的记录全记下来。他们觉得我的意见对。我说书呆子解决不了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将来说你们造谣，你我大家一起吃不消。当时开会是张闻天当主席，是靠后发言，张闻天讲的最根本的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要抗日，局部的统一战线是不行的，必须由局部扩大到全国才有可能，要承认南京政府正统才行（大意）。就是说，中国要抗日，不是依靠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这三家在西安就能成事，一定要全国，首先要包括南京政府，包括蒋介石，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统一的全国力量，抗什么日？张学良几万人，共产党的力量更少。因此张主张和平解决，团结抗日。

博古作了两次发言，第一次发言，似乎要武力解决，第二次，在张闻天讲了后，他改正了自己的看法，同意张闻天的看法。博古这个人，过去的错误就是年轻。有啥稀奇呢，地位高了，犯错误影响大。总理的发言也好，承认南京政府出面领导抗日。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讲，西安事变，最早和最明确与坚持主张和平解决的是张闻天，明确得很。这个历史改不了了。张闻天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因为他主持的时间不算长，不怎么引人注意，但他遇到的都是最大的问题。现在的电影、电视演此事的时候，张闻天在会上若有若无，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46 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首先提出应有继承的因素在内

一九三八年，张闻天在陕北公学作了《论青年的修养》的报告，在抗大作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说。这两个东西，当时全文在延安都登出来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候，他讲的这两个问题跟人家的不大一样。在《论青年的修养》里，强调青年要有修养。他说的青年修养，当然主要是讲革命的意志等。《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讲话就很怪了，全是讲继承中国文化的。他引用了很多诸子百家的东西，从这个讲话可以看出来，他的准备比较急。他是读过这些旧书的，但系统上、思想上

似乎还没有那么清楚，主要引用孔子、孟子等，文章不是很顺畅，有一点硬，显得是急时抱佛足。但他以共产党总负责人的身份，在战争高潮的时候讲个人道德修养，讲继承中国的文化，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讲，实质上，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第一个较系统地提出要接受中国优良文化传统的人。他提出中国文化不能片面地打倒，要吸收其中的精华，因为我们一直是打倒，把孔子、孟子骂得一塌糊涂。这时共产党对外公开了，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威望蒸蒸日上。他对这个问题不能不表态。他直接表示，我们要接受中国文化，要接受中国文化中最优良的东西。对这两个讲演，当时我也不大懂，只觉得抗战这么紧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这只能说明我的程度很低。这两个东西，不仅在青年里边，在延安领导层也不受重视。但历史证明张闻天的眼光很高明。在此关头，中国共产党不能再以反对一切旧文化为己任了。

一九三九年初冬，党中央决定开一个一百多人的文化大会。开会之前，中央内部就讨论过抗战中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开始提出了三个特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后来周总理提出，还要加个“民主的”。这个讨论，毛同意四大特征。我以为，这样的一种提法到现在还是对的，以马克思挂帅，也离不开这几个特征。但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长篇文章——后来题目改了，叫《新民主主义论》——把“民主的”删掉了。毛主席的文章先发表，张闻天的报告后发表。但张闻天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张闻天仍是按照讨论的决议写的，还是提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人说，大众的就代表民主的，这就太牛头不对马嘴了。大众的，就是表现通俗化的，是表现形式问题，它是不能代表民主的。所以，在中国文化民族发展方向上，张闻天应该是有重要贡献的。他所坚持的东西，到今天还是正确的，而且今后还离不开它们。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在重庆发生了一个争论问题，就是通俗的“民间形式”问题。胡风认为通俗的、民间的形式，内容往往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它同“民主的”要求并不是一回事。这点上，胡风并没有错。

147 在延安马列学院院长这段时间，我认为张至少不全是过

在延安办马列学院，他当院长，从一九三八年四月起，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取消，三年多一点。马列学院跟抗大、陕北公学不大一样，马列

学院是小型的，正式学习几门课程。

延安一整风，说马列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个问题怎么讲呢？当时，总的说来都是学习苏联那一套，一些提法，一些做法，确实是苏联那一套，而且是斯大林那一套。但这个事情不是张闻天的事情，他当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中共六中全会的报告里边就讲了，说苏共党史是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你那样讲了，就照那样做。因此延安以后学马列主义就是学《苏共党史》，马列学院自不例外。

我在马列学院从开始到最后结束都在，那里的情况，我是比较清楚的。跟我一样从头到尾待了那么久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三个人：邓力群、李清和我。我跟邓力群后来离开了。停办后的马列学院，李清还留下来，做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改办中央研究院。李清现在还在，他当过几年交通部长。

马列学院的六门课，可以说是有教条主义，是有相当严重地照搬苏联的东西。但有一点，这些课程使在那里读书的人的眼界开阔了一点，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人。这些人不是简单地打土豪，分土地，打倒国民党，不是那么简单了，知识大大增多了。

如果马列学院的院长不由张闻天当，也难，只有推给毛当。毛不愿意当，毛不愿意兼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适合于张。张在延安比较稳定。王明、博古、周恩来，他们经常要到重庆去。张当院长这段时间，是过大于功，还是功大于过，我认为至少不完全是过。但整风后不提了，延安好像没有马列学院这件事。怎么没有这回事呢，李先念我们就同过学，我们同一个小组，一个窑洞住了几个月。像李先念这样的老革命，农民出身，领导武装斗争那么多年，来学习是好事。马列学院由张闻天负责办，我只能说，作用是两方面的，教条主义是一方面，但不是他有权决定搞的，教条主义历来就有，从王明、博古那时就开始，不是办了这个学校才有的，而且一切以苏共党史为准，也不是张闻天定的。另一方面，马列学院也培养了一批干部。六七门课程学下来，希腊罗马也知道一点，拿破仑也知道一点，没有坏处。

148 一九四二年初起的农村调查

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天还没有亮就从杨家岭出发的。我是这个团的一个团员。跟着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调查的情况，前边已经讲过。我的调查给他汇报，他很有兴趣。他的调查报告解放后中央秘书处尚存，即《米脂杨家沟调查报告》，一九五五年，我在人民社把它要来出版了。

149 至少张在表面上也已卷入了个人崇拜的巨潮中

他一九四二年时在晋西北农村调查团的“七一”讲话，看得出来，一方面是被迫的，一方面是自动的，因为没有人逼着他讲。这个讲话太过分了，内容纯粹是个人崇拜。他知道他的处境艰难，因为没有参加整风，延安有人说他是“躲风”，他必须表态。这个对工作团内部的“七一”报告，也是达到个人崇拜的极点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这说明张闻天的软弱一面。他自动地等于宣布我完全放弃我的一切。我当时听了，有点意外。现在看来，一点也不意外，他不能不利用这个机会对毛表态。

150 “文革”期间在六十一个人问题上的崇高表现

这件事情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告诉我的。

“文革”期间张闻天被打倒，但没有进监狱。这时，各种造反派、审查刘少奇专案组跑到张闻天的家去威胁他，要他讲六十一个人办理登报出狱这件事是刘少奇在北平个人决定的，陕北的中央不知道，包括他本人都不知道，主要是证明毛不知道，强迫他承认陕北不知道这件事，他也没有代表中央回过电。专案组威胁利诱的话讲过很多次，甚至讲，你只要澄清了这个问题，将来中央还是有你的位置的，送一个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等。但是，几次张闻天都坚决否定此事，说当时他是党内的负责人，这些问题按例要以他的名义回电的。他坚持说，当时是他批准的，他回电的。他不便说其他人及中央，一人顶住。这样重大的问题，任何人不可能个人决定，张又讲究民主，当然是共同决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有档案？我估计可能没有档案。电报的内容是通知刘少奇他

们可以采取行动出狱，因为再不出狱，日本人一来就完了。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很难原原本本讲出来。张闻天只能忍辱负重，管你多么严重，我一个人顶着，我不把这个责任推给刘少奇。刘少奇他们有这个建议，我是回了电的。他这样就大大分担了刘少奇的责任，同时也消除了陕北诸人的责任：我一个人入狱就是了。张闻天对夫人刘英说，恐怕要被捕了，准备入狱。最后弄到广东去了。

这件事，张闻天个人的崇高的人格很使人佩服。抓就抓，要我的命就要我的命。我不能在这时去害刘少奇，罪归我一人就是。张闻天在共产党里边是有崇高人格的，他的高风亮节，永远是模范。

151 逝世早了三个多月，给世人留下永远的悲哀

我提起这事就说不出话来，就泪流不止。张闻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一号黎明在无锡病逝的，这个事太遗憾了，离开江青被捕还有三个多月，他没有看见这一天。再晚一点，看见“四人帮”被捕不是好一点吗？早去了三四个月。那时国事蜩螗，国家的希望在哪里？他是带着无限的痛苦离开人世的，令人痛心不已。他的一些学生，佩服他的一些人，都感觉很遗憾。对共产党来讲，把“四人帮”抓起来，是把共产党的性命挽回了。我觉得他在七月一日去世，真是个悲剧。他的品质、道德，是很使人追念的。他不像别人，在知识分子里边，他确实没有什么自私心。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第三十章 有才无德的康生

152 知识广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康生、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康生在苏联中共代表团中是近似于王明的一个人，政治局委员，地位很高。一九三八年五六月在马列学院教过我们的课，党的理论这部分是他讲的。他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两个人。一个外号“机关枪”，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此人即后来的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饶漱石。另一个叫“小开”，上海话叫小老板，老板少爷的意思，在上海似乎有三教九流、无不能交的意思，这个人就是潘汉年。陈云讲的党课，也盛赞了这两个人。

康生知识广博，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几乎无所不通。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的戏曲史。书法，篆刻，他全通。他的字就很好，刻的章，很好，画的画，也很好，但他从不拿出来发表。他回到中国，用四川话来说就是很“知趣”，上面就是比较精通中国文化的，你在他的面前表现你有本事，你也懂得这些高级文艺，怎么可以？所以一些领导人写的诗，都不拿到《人民日报》发表。董老、叶帅这些人偶尔写写，只在小报报屁股上发表发表。

康生的知识展露出来，会引起很多麻烦。他精通的东西，有时候到了不能想象的程度。京戏他全懂，不但懂，还会打小鼓。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乐队指挥实际上也兼具表演指挥的某种性能。我亲眼看见康生指挥过。一九三八年七月一号那天，大概延安第一次纪念建党十七周年，党校要开纪念大会，请马列学院的所有学员去参加，同时中午晚上会餐。党校在延安城东十几二十里，马列学院在北门外七八里路。我们天不亮就出发，到那里杀猪宰羊，大吃一顿。下午开会时，还有几个美共青年参加。康生当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戏《打渔杀家》。江青演女儿萧桂英，演得很好。那时江青很漂亮，二十七八岁吧。那个时候就知道，江青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阿甲在《打渔杀家》中演父亲萧恩。后来江青把阿甲整得死去活来。江青当时跟毛还不是一家

人，还是党校的学生。康当时是党校的副校长，动员江青出来演萧桂英这个角色，康生指挥乐队。但这乐队放在戏台左边，用纱幔隔开，看不清楚。这不知是否中国舞台剧乐队不放在正中的开始。一九八〇年我有次到广西开会，遇到那时党校的人，也是马列学院的同学韩世富、李成铁。我问，那天是不是康生打鼓？他们说，确确实实是康生。说大概准备了个把月，他们早就看过了。但是，那晚我本人并未看清楚，因为那晚的乐队反常地放在舞台左面用布挡起来了，所以我还不是真正亲见。

康生一辈子工作紧张，什么时间去学这些东西的呢？他在上海地下党，管“特科”，更紧张。在苏联住了几年，估计关于中国的书看得多一点，可以在莫斯科看中文古籍。但一九三八年能打小鼓，哪里学的？说明他是何等聪明。领导我们土改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讲京戏。他问我们，你们懂不懂什么叫“水袖功夫”？他说，看一个人会不会演戏，戏的水平怎么样，看他出门水袖抖几抖就行了。旧社会，“水袖功夫”这个说法很流行，比如说某某人的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我们青年中没有一个懂。他给我们解释，一个演员出来有没有本事，看他一出场，水袖甩几下就知道了。水袖不容易，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功夫能看出一个演员的修养，特别是青衣，虽然是甩几下，但这个人的各种苦楚，各种悲愁都表现出来了。所以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他对中国这一套的了解，怎么来的？当然是自学的。他在苏联几年，在延安那么多年，他是用功的。这个人聪明得很，记忆力好。他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就在上海大学搞革命，哪有那么多时间来学这些东西，不能不佩服他。

康生的知识技艺如此高明，有些还具有相当难度，一般人甚至费一生之力也不一定能比得上他。在上层，在背后，都知道他不佩服齐白石，他还另外刻一闲章“鲁赤水”与之相对，并盖在自己消遣的画作上。问题是他的这种情趣看似高雅独行，其实仅是表面，想以此博名。而他日夜梦求从公私两方面夺取高级文物的卑鄙劫掠行为，实在是太令人吃惊和可怕了。大约一九八〇年或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得到一张到故宫内

某处秘密参观的票，我去了，地址似乎是故宫东北部一个较小的很旧的院落。整个下午参观的人大概只有二三十个，由一女专家作总介绍。女专家说，今天是看“四人帮”个人盗窃的国家文物。女专家的介绍很详细，说被盗窃的文物，就是直接从故宫调出的，数量质量均以康生第一，陈伯达第二，江青第三，姚文元第四，张春桥没有。这里面没有一件张春桥盗窃的东西，这说明张春桥头脑里只有整人害人的坏脑筋，彻头彻尾的“政治挂帅”，他什么文化也顾不得要了。江青干的有些事最令人激愤和耻笑，她虽欲学“老佛爷”，但又上不得台盘，谁也想不到她会干出如此小家子的恶霸事。她从故宫要了些毛笔，但这是“公平交易”，她是用每支四五元从故宫正式买去的。我记得好像还看见过故宫打给她的收条存根。看到这里，大家都骂：像个什么样子！

康生这部分，我们也不过看看百分之一罢了。这部分是精品：康生是不会闹江青这种笑话的。康生名下陈列出来的书籍是知名的中国戏曲专家傅惜华的藏品，应是全国第一了吧。康生他们把国家的、民间的“帝、封、资”文化积累都烧毁个干净，他却用国家权力把人家的文化精品抢过手来。我现在谈到这件事，自己都说不出口，因为丢了国格呀！你康生、江青是个什么身份啊！

康生抢的东西中，有一块精美瓦砚，据女专家介绍——我的记忆可能不准了——大致说中国此种瓦砚，现存数只，均已外流，在境内就可能只有康生要去的这一只了。还有半只虎符，女专家说，是解放后在京郊发掘出来的，是非铜质的，据说，一般是铜质的，非铜质的至今仍只发现这一个。总之，是国内唯一的半个。这些说明：康生要的是唯一的或罕有的。

康生的博识、广学，懂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恐怕是知道得最广阔的。陈独秀知道古学，但不精通这些东西。瞿秋白懂一点，似乎也不精通那么多东西。

153 他是个害人狂

根本不用说，他是个害人狂。

一九四八年我是在搞土改，是在以康生任团长的土改工作团。春节

之前，我们到了山东境内靠近河北的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县，再到何家湾村，渤海区党委就驻在这里。春节前后，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何家湾。年三十晚，区党委请康生吃饭，组织部长刘格平是回族，不能参加。春节正日，刘设家宴请康生，饭后，不过下午四时许，康生带领全团人散步。散步中，康对大家介绍了刘格平生平，说他就是“六十一人”出狱时他坚持不出狱的。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全部是中央坚决要他们这么做的。六十一个人出狱大概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但“文革”时康生说他们全部是“叛徒”。

我们去山东土改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邓老没有康生那么厉害，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在山东扫荡了渤海区党委。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

整景晓村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感觉到一些。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讲话比较随便。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当地负责人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因为我们习惯用这两个字，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没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我们三人对小毛（毛岸英）说，在这里讲讲就算了，出了这个门，可不要再讲了。

“文革”中，康生整人就更不用说了，他开了一堆名单，党的中央委员会、民主党派的人物，他把这些人害得很惨。不说别的，我举一个例子，他的秘书凌云。他在延安枣园社会部的时候，凌云就是他的秘书，这个秘书不是一般的秘书，是很重要的秘书。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他到山东去，凌云也是整个土改工作团的秘书。他很相信凌云，但他把凌云抓起来了。大概七八年前我见到凌云。我说，你“文革”期间被关了十多年，你怎么会被关呢，康生还不知道你？凌云说，就是康生干的。我奇怪，问，康生要抓你干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确实觉得于公于

私，康生都没有抓我的理由和必要。凌云举了一个例子。解放初，康生和夫人曹轶欧——我们叫曹大姐——两个人在济南不知道什么原因闹得非常紧张，康生去青岛休养，曹在济南精神不正常。凌云把曹轶欧照顾得很好。凌云说，结果我进秦城也是他提出来的。凌云没有详细讲。我说，他把你捉起来干什么呢？你又不是老资格，（按：抗日战争前后那两三年入党的，一直不算做老党员。）关你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迫害人，目的是什么？是从苏联学来的，这是一方面。但在中国，不如此就不行吗？所以，他始终采取这个办法，硬是把自己保护到底了。

154 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绝不糊涂

这个人的头脑是很清楚的，绝不是个糊涂人。在个别的情况下，他能够听人家反映真实情况，而且能够容忍。这件事，凌云现在还在，他可以侧面证明。

一九四七年大概六七月，在晋西北土改，康生是团长，我是团员。七月间康生在晋西北开临县郝家坡会议，我列席。这个会议的情况，前边讲土地改革时我已经讲过。我们当时的情况，跟他在晋西北强调的大不一样，做法也大不一样。但我汇报会时，他听得进去。如果他听不进去，反过来整你，说你右倾，我就完了。这件事说明，他心里边并不是个傻瓜，他心里明白。我讲的时候，他没有反驳，汇报的时间，连他讲话至少一个小时。

这次汇报，是他先给我讲。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讲过。因为讲出来人家不相信，说你宣传康生，但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是凌云白天通知我康生要听我单独汇报。汇报是在一天晚上十一点钟后开始进行的，这时他开始吃晚餐，因为下半夜还要工作。汇报时，他把他那里的工作先向我讲了好久，弄得我诚惶诚恐。没有办法，人家那么高的地位，只有听完了再汇报。

临走前，晋绥分局组织部长、朔县组长张邦英教我说，地难分，你带点沙地去给康老看。张的党内斗争经验多了，给我先出了这个主意，我哪想得到这些？

我知道我的话难说得很，带了旧报纸包的三包土和一包糠窝窝头。第一包是沙，我说这个沙占全村土地面积百分之九十以上，每人可分十几二十亩，他看都不去看。第二包，重沙质，不全部是沙，这占全村百分之六七。这一来，就是百分之九十几了。第三包是半沙质土壤，沙占一半，土壤占一半。这个在全村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要种田，只有种这样的田才有收成，而且还得靠肥料，靠井水。用水井里的水来种田，南方人根本想不到，南方到处都是水。北方水井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我所在的前柳村就有两个水井，一个甜水井，一个苦水井。北方把淡水井，没有涩口味道的叫甜水井。苦水井，有的是盐碱硝味的，有的是苦味的，这个水，只能日用。北方要打出一口甜水井，简直是天老爷赐的恩。好的地方，有井水浇灌，一亩地照样打好几百斤，上千斤都办得到。我汇报时说，我们不但分了地，还访问过得地群众，但基本上没有兴趣，因为中农本来有相对好一点的一点土地，结果拿出一二分地“调剂，调剂”，返回他五亩沙地，实际上是他吃亏了。我又把糠窝窝头（当然是当天又重新发涨了的）给康看。康问，是老百姓吃的？我说，老百姓不全是，有很多是。因此，那地方现在对分土地毫无兴趣（朔县是新解放区）。我这两手很厉害，我知道康生很精明，凡是做保卫工作的，第一条就必须精明。不带些东西，凭我的身份，敢说什么呢？我这个汇报，康生听得很认真，可能认为你这个年轻人，竟知道这样来汇报。如果盲目说，也解决不了问题，因此那天晚上他没有整我。以后对我的看法也可能由这晚定下来的，可能觉得你这个人不是随便说话的。说白了，就是印象不错。其实，没有老前辈张邦英指点，我还恐怕真会出乱子。

那天我汇报情况说，我们那个村没有地主，只有两个“富农”，并且讲了详细情况。他们是富裕，但是不够富农条件，因为他们根本上是自己劳动。他说，你这个书呆子。仅仅封你个“书呆子”，这就不简单了，只是叫你回去对这二户“扫地出门”，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也这样做了，明知其错还是做了——现在追不回来了。这件事，说明他的很多议论，跟他的内心并不是一致的。他知道这些客观情况之后，他还是非要往“左”不可。什么原因，现在怎么说呢？他无非是背后是一套，当众是一套。当众这一套是为了自己过关，自己上升。

155 康生是一个两面派

康生并不因为在晋西北的土改，我给他汇报的情况，我们那里执行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就把我看成是反动派。解放初我要到青岛去治关节炎，经过济南，到山东分局组织部报到。那时，他的夫人曹轶欧大姐是组织部副部长。我去后，康生叫我留几天。他叫我到他的小办公室，看他刻的各种各样的图章。他还给我看济南国民党总司令王耀武的图章，还盖个印给我看，说，还大方。我理解，他觉得你这个人还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比他年轻二十多岁。

他说，我来济南这么久，大明湖还没有去过。明天是星期天，我去，你跟我一路去。第二天，他们夫妇、凌云（当时是济南市的公安局长），我，安排了一条船，就在大明湖那里游来游去。不仅如此，他还带大家上岸看王耀武出走的那个堤防洞。大明湖有些地方有厚厚的堤防拦着。我们的地位，是差得不能比，一个普通党员，一个政治局委员。我这次去，他优礼有加。他原来不认识我的，而我在晋西北汇报的那一套跟他不一样，为什么他当时没有把我当成敌人打击？这说明他的内心世界跟外表表现出来的并不一样，我老早就感觉不一样。

一九六〇年六月间，我去了上海辞海编辑所。通知我是在一九五八年，我们单位的负责人王子野能拖就拖，原因是单位奉命要编《蒋介石全集》，要我参加注释工作。我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后去看王子野。王子野说，你走后，我看见康生。康生问，曾彦修怎么样？我说，到上海辞海去了。他说，怎么不告诉我一声？王子野对我说，他讲这个话，我也不懂，告诉一下中宣部就了不起了，怎么必须告诉你呢？王子野说，算你走好了。他问你，看样子不是要整你。当时他讲了一句，叫他做做资料工作也可以嘛。就是摘录马列讲什么什么，供写作组写反修大批判文章。看样子是指这件事，你戴着“帽子”，不能参加写作组，但写作组需要马列语录，你可以在本单位参加提供。那种写作组又没有任何机密，空对空作战，所以叫你去协助，一点不稀奇，算你走了好，不然就麻烦了。

我提这些，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康生是一个两面派，不要只看见他凶恶的那部分，他内心是清清楚楚的：他只有保持极“左”的、打击一切

的姿态，才能上升。但在背后，他也希望弄清楚一些事。向他如实反映一些东西的人，并不会把你怎么样。他跟张闻天比起来，正好相反。张闻天是带点书呆子味道，是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康生没有书呆子味道，他的中国文化修养，反高于张闻天，但一辈子深藏不露，绝不表现，一辈子不发表一首诗，一幅画。历史上历来如此。一个帝王，认为自己的诗好，书法好，别人敢再表现吗？隋炀帝不是有个故事吗？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因为一首诗的一句“空梁落燕泥”什么的，把隋朝初年出名的大臣薛道衡杀掉了。薛道衡是他的有才华的大臣。以后当大臣的人都知道，如果皇帝诗词歌赋都懂的话，你只能装傻。皇帝喜欢写字，你写字就得歪歪斜斜。皇帝会作诗，你就要显出你的诗不够擦屁股的资格。如果你写出来的比他还高明，那你就不要想活命了。历史上的帝王，可能只有曹操与唐太宗二人开明一点。他们允许臣下表现艺术才能。曹操比唐太宗更开明一些。

康生这个人，多才多艺，几乎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为了政治上的地位，他迫害人，政治道德堕落到了极端。另外，他又是两面派，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些实际情况跟他讲，他心里知道。康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个很特殊的人物。文学艺术方面知道得这么多，但是他知道的，跟他表现的刚好相反，知道文学艺术的人，一般都比较文雅，人格比较高尚，也总会有点表现欲，这是无可厚非的。偏偏他的精神非常恶浊，非常暴虐。康生这个人，头脑清楚得很，一九六几年他曾经是中央理论小组的组长。理论小组，就是意识形态，包括唱戏，决定权在他手里。这时候，他有点像日丹诺夫了，但他的学识比日丹诺夫高明多了，在权力上还是比不上日。康生就是人格太差，为了保持自己地位，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迫害人，一点人格都没有，什么革命人、共产党人，一点都谈不上。任何人都要以他为戒。我还觉得他有点可惜。

第三十一章 陈伯达：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

156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

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这么坏，什么原因？

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常务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一下子跌下来，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变成了反动头子，全国要批他？这经过，我一点不知道。不知谁能说得出来。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至今如此。因为当时我什么传达都听不到。

陈伯达说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大书生，但他读书却不太用功，懒得很，就是文笔好。佩服而又知道他一点的年轻人，无顾忌地说他“懒”，即不用功，不苦读，靠聪明。这不是秘密，知道的人很多。他读的书并不多，靠聪明。陈伯达不是个政客，他并不想当政客，当政客就要活动，要到处跑，要讲话，他不会这些。他正式讲话，五分钟都困难。在延安，我觉得他只想当个政论家，他只希望他的一篇文章出来，全党注意，全国注意，他就十分满意了，弄两个稿费买鸡吃。问题是，不可能允许你这样一个专门写文章的名流存在，不与政治结合起来，你的文章就发不出去。因此，陈伯达在延安必须服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离开了这一条，他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因为他讲的福建话，很难懂，跟人家谈不起来。一九四〇年，南洋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开欢迎大会，陈老先生讲话，陈伯达翻译，从头到尾不知说什么。他们是同乡，别人翻译不够格。我在场，大家唯有鼓掌而已。陈唯一的任务就是奉命撰写当时最重要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时尚论著。他的一生，没有一个字离开这个，而且他一生的文章，没有离开最高的领导，是受命要写的。他写这种时尚著作，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他到《人民日报》，可以当场写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不是陈的风格，甚至

不是他的思想，这样的文章不经过别人看就发表出来，我有点怀疑。他这篇文章应是早有的，或是带了原稿，或者背下来的。想想看，如果错了，他陈伯达有几个脑袋？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无法无天的紧急总动员令，这个口号是颗炸毁全国的原子弹，谁不吃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要把全国打得稀烂。历史证明，这个文章一出来，实际上陈伯达的历史作用也就完了。这个横扫其实包括了他在内。他的作用发挥到了顶点，因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后，就没有可以再扫荡的东西了，打倒完了嘛。就是说，今后就没有委托你陈伯达再写加码的专文去扫荡什么了。以后打倒刘少奇也好，打倒其他人也好，都是等而下之的新人物写的，不需要你陈伯达写了。

他成了中央“文革”的组长不久，江青就代替他当代组长了。用中国话来说，狡兔死，走狗烹。他这篇文章一出来，把已经打倒的、正在打倒的、准备打倒的，都扫光了，话已说到了顶，无可加码了，因此陈伯达的作用也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要专挑小刺，陈伯达可不行，比江青手下的姚文元等差远了。

所以，不是一九七一年庐山会议批评他后，他才不重要了，而是在这篇文章以后实际上就不重要了。不仅如此，这篇文章以后，他的活动，反而变成了他的罪行的材料，说他是在为林彪服务，破坏了毛主席的威信，一大堆罪名加在他的头上。“文革”的事，是江青在那里指挥，陈伯达也根本不大会做这些事，只有江青一人敢对陈左一声老夫子，右一声老夫子。其实是挖苦他，轻视他，说他除写几篇文章外，无用了。你叫他做行政指挥，他做不了，他至多只能指挥他的秘书，替他收集资料，他来写书。陈伯达要是离开了柴沫（行政秘书）、田家英、史敬棠、何均、陈真这五个人，他就什么官也不会当，什么书也写不出来了。

一九七〇年中央在庐山开会，准备打倒林彪，毛主席下山后到处讲，准备打倒林彪。在这个会上，争论的东西叫滑天下之大稽，今天提到还叫人笑。这个会上，林彪、陈伯达反复称毛主席是天才，是伟大，林彪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设主席，毛主席说不要设。这就发生了“问

题”，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个象征性的元首，你中共中央的主席，人家总统来，你怎么办，以什么身份去接待人家元首？所以这个元首，堂堂一个大国，不管有没有实权，总是要有的。毛主席主张不要，而且还写进宪法里。

陈伯达照例讲伟大。

陈伯达为了设国家主席这一条，把在北京的史敬棠叫去了。史敬棠坐专机飞到庐山，干什么呢，代陈草拟在宪法中起草设立国家主席这一条，就几个字，滑不滑稽？

后来反林彪，反陈伯达，出了几本材料，把史敬棠的手迹也弄上去了。史敬棠比我大几岁，一九四一年我同他住一间小窑洞。十几年前我问史，陈伯达为什么要叫你去？那几个字他不会写？他说，你还不知道吗，陈伯达就是这样，懒得很。我说，再懒，就写几个字，这么一条一款都写不出来吗？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硬是要我代他草拟。我说，不可理解。难道陈伯达老早就知道，写这一条要犯罪吗？犯了法，拿你去充罪也不够分量呀。后来史敬棠在林彪、陈伯达事件中，进没有进监狱，我没有问他，但是他被隔离审查了多少年。

从此，陈伯达就被打倒、被批判了，成了林彪集团头目之一，又成了反革命。不过大家不大懂，也没有怎么批陈伯达，因为一批就要走火，说伟大、天才等等都不对，哪个敢说？

陈伯达的为人，在延安是很受青年人尊敬的。但是进城后不久，一下子就成为被一些人讽刺挖苦的对象了。什么原因？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九五一年五月初开全国第一次宣传会议，我的座位在前面，但我跑到最后一排空位去跟宣传部几个我认识的人闲扯。这几个人进进出出的，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一天，陈伯达在上面讲话，这几个人就说开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不会讲普通话，他讲话，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普通话。他有个口头禅：我是一个“小小小学生”。但用他的普通话讲出来就是：我是一个小猢狲。“小猢狲”就是小猴子的意思。后面几个人，有田家英、于光远、黎澍、王宗一、王惠德，这几个人我都特别熟，这几个人还有个特点，说话都比较随便。陈伯达在台上讲了二三十分钟，哪晓得首先就是王宗一发难。王宗一讲话相当尖锐。他说，呵，呵，你看

这家伙，又来了，又来了。其他几个人跟着就挖苦。我觉得奇怪，暗想，哎呀，我才离开北京不到两年，过去陈老夫子的威信那么高，怎么一下子把他作为讪笑的对象了，一下子变成“家伙”了呢？当时我感觉到他的威信一落千丈，不是个别人对他，而是宣传部那么多处长们都把他作为笑话。什么原因呢？我不敢问，现在也不知道。如果没有突出的表现，我想这些人不会这样干的，特别是田家英，跟他关系非常好，长期做他的写作的助手。于光远更是个道德人，绝不会随便笑人的。

我想，陈伯达这个人的虚伪，到了被人家发现的时候，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这些人一下子看不起他，说明他的威信已经完全没有了。当时我就有一个感觉，为什么上面和下面对一个人的看法会完全不同？这个时候，陈伯达的地位是在不断上升中。但是，跟他接触多一点的人，却这样看不起他，这些人里边，据我所知，除了于光远，过去对他都是非常尊敬的。于光远为什么不那么尊敬他呢？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过很长的文章，叫《中国地租概说》，我没有读过。于光远看过后发现陈伯达没有读过《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很多人都没有读过，这不算稀奇，因为一九三八年才算正式翻译过来。但是于光远发现，陈伯达连第一卷都没有读过，因为第一卷早就有中译本。于光远应陈伯达之邀，跑到杨家岭去找他，陈伯达很客气，表示感谢。结果，于光远发现他印书时，一个字不改。

除了于光远，在延安时，其他人对他都是很尊敬的，但到了一九五一年却都挖苦他，我不相信会毫无根据。现在于光远还在，其他人都不在世了。

157 我与陈伯达的关系

我跟陈伯达的关系不多，有一点点直接的个人关系。延安一九四一年夏天，也就是开始整风前，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职务，就是以一个重量级的文化人的身份住在延安。据说他曾经是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如果真是的话，也是挂名，他不大管这些事情的。他一生在什么单位负责，都是个甩手掌柜。那时，他跟一些人长期住在延安马列学院山下面简陋的几间小平房里，他们既不上课，也不学习，也不开会，就是住招待所。有徐海东、谭余保、陈伯达、丁玲、高士奇。估计

他们的生活由马列学院照顾，大概他们的生活比一般的学员高得多。我们看见他们，恭恭敬敬点点头，其他没有什么。当时看不出陈伯达在干什么，可能在写书吧。或者就是《三民主义概论》。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飞机第一次炸延安，我进城买书，当时延安有几个窑洞卖书的，我们一个月领两块钱，买书的话，薄薄的可以买四五本，陈伯达也跟普通人一样进城买书。我没有看见他。人很多，日本飞机第一次狂轰滥炸，我往东跑，跑到城门洞里堵住了，回头看，炸弹炸的火焰一两丈高。陈伯达受了轻伤，马列学院几个同学把他抬回去。抬的人当中，有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余宗彦。我讲这件事是为了什么呢，说明陈伯达一九三八年在延安还是一个比较著名的普通文化人。

陈伯达在一九四一年四五月前，主要是写中国古代诸子百家研究的文章，当时不大具备条件。他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听说好像有些文章的原稿是毛主席看过交给张闻天发表的。这些文章在战争时期没有起什么作用，延安都没有什么人看。我都看过，但等于不看，因为我的基础太差了。我记得他有篇小文章叫《论杨朱哲学》，杨朱的哲学在先秦留下来的材料不多，孟子曾经骂过杨朱：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杨氏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般学马克思主义的人，简单认为杨朱哲学是个人自私哲学。但陈伯达和孟子的提法不一样，孟子认为，为我，而不为他人利益是不对的。陈伯达讲，杨朱哲学在当时有他的进步性，他代表的是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不讲利讲什么呢，发展工商业对社会是好事。所以他讲，杨朱哲学中的“为我”，不要简单地看，要看他的时代，他这种哲学，不是守旧的哲学，而是比较先进的思想。他的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这究竟是他的解释，还是引用别人的解释，我不清楚。因此，当时我们十几岁二十岁的青年对陈伯达的印象很好，认为他对先秦诸子百家也研究过，是一个比较懂得中国古代的人，跟左翼一般文化人很不相同，认为他既是一个高级文化人，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的文化人。对陈伯达有这样看法的，不是我一个人，在延安是较普遍的，不能因为以后判了他十几年徒刑，就不尊重史实。

一九三九年或者一九四〇年，延安组织了很多研究会，是上面发起的，什么资本论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一大堆。我由

马列学院派去参加两个研究会，一个是由陈伯达管的三民主义研究会，一个是由王明管的马列主义研究会。我在三民主义研究会听陈伯达东讲西讲，我们懂什么，就听他讲。他说，我一九二七年在莫斯科留学，他们都在研究斯大林、托洛茨基，斗得个要命，我就研究三民主义。我为什么要研究三民主义？我觉得蒋介石是利用三民主义，而我们对三民主义一点也不懂。我们研究一下吧，你不研究如何批评它，简单的骂不行呀！我们觉得他的思想比别人高得多，就听他讲。他说，三民主义这个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无条件反对，反对哪一个都不对。我们过去不懂，在上海的时候，对三民主义统统骂，实际上我们自己毫无研究。我们小青年一听，又觉得他的见解比别人高明。他问我们，现在的三民主义，哪个重要？有人说，民族主义重要，因为抗战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重要。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强调民权主义。为什么呢，民族主义，现在战争已经打起来了，全民抗战了，也算在做了。民生主义，现在抗战大家都苦得很，强调改善民生办不到。过于强调这个东西，国民党、蒋介石会说你是在挑起阶级斗争。我们现在就要强调民权主义，就要民主，把蒋介石的独裁削弱一些。这样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然，强调民权主义不是他一个人的主张，是中央的决定，当时中央说我们讲三民主义，但强调民权主义。经过陈伯达这样一分析，觉得他的思想比较高，对他是相当崇拜，所以，对他不是一般的尊重，而是非常尊重。

延安时期，一九四一年夏起，他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我就是下面的一个研究人员，我是在经济组。中央政治研究室是怎么来的呢，后来不大讲了。一九四一年五月间，毛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强调反对主观主义，说我们今后的一切工作都要建立在调查研究上。毛一下成立了一个很大的“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他当局长，任弼时当副局长，下设三个机构：中央党务研究室，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敌伪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毛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毛兼主任是听陈说的。陈素不管事。这件事没有开过成立大会，也没有什么文件，具体的内容是陈伯达告诉我们的。政研室的人，现在还在北京的，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七个人，包括邓力群等。陈伯达这个副主任，是挂个名，什么事都不管，埋头写自己的文章。陈伯达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个人讲学”。晚上，吃过晚饭后，我们拿着凳子到他的窑洞里听他漫谈。

陈伯达住一个窑洞，里边有一个小炕，他躺在炕上。我们二十来岁，他已经四十多岁，是老前辈，胖胖矮矮的，很随便。窑洞里边最多能容十多个人，挤不进去，我们就在外边听他闲吹。他什么都吹，天上，地下，无所不吹。有时候，他会讲一些毛泽东跟他谈的事情。在延安，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客有谁？公事以外可以随便谈谈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陈伯达，我不知道还有第二个。周恩来、朱德是谈公事，陈伯达不谈公事，陈伯达去是听毛闲聊。毛也需要消遣，也要找人闲聊。陈伯达这个人看书杂，思想也活泼，有时候叫他去。陈伯达对我们讲，毛主席说，曾国藩家书是好东西，应该读。而过去，共产党把曾国藩骂得狗血喷头，还会读你曾国藩的书？陈伯达也说，曾国藩的家书，文字非常漂亮，内容非常实际，这个书读了没有坏处。一般的马列主义者，不仅是我们这些青年，那些四十来岁的入党一二十年的，一般对中国的文化是一笔抹杀的，骂曾国藩骂得更厉害。陈伯达一次讲，毛主席提出要“自然而然革命化”。他说，毛主席这个意见很好，完全强迫革命不行，有些事要等，要等它自然而然革命化就好办了。对我来讲，能接受，到现在也接受，觉得毛讲得对，应该坚持。“自然而然革命化”，毛大概在延安没有多讲，所以知道的人不是很多。因为，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在王明等人领导下，一天到晚反对“尾巴主义”。陈伯达跟我们讲，我们听是听，但不敢宣传，因为不是直接听来的，如果说毛主席没有讲过，怎么得了！但我对此印象是很深的，因为这跟我们过去学来的、听来的不一样。毛在这些问题上，有过非常正确的思想，但他后来不是这样做。强迫农业高级合作化，强迫建立人民公社，每年跳升，有什么自然而然呢？

总的说来，陈伯达在延安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威信高于所有在延安的文化人，远远高于周扬这些人。当时延安的党内党外文化人加起来恐怕有几百个。

我在政治研究室待了大半年，一九四二年年初叫我参加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这事是怎么来的，我全不知道。

158 陈在延安整风中的特殊重要性

延安整风应该从一九四一年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算起。

大概在一九四二年前后，陈伯达写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在建立毛泽东的绝对崇高威望和地位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这是把党史翻了个过。现在不提它们了，不符史实。实际上，延安时我们是学此二文很多的。一篇叫《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有一篇叫《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此书在解放后出单行本时可能更名为《关于十年内战》）。

《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毛主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半期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中国革命就是要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胜利。陈伯达讲，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党内，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因此，只有毛泽东历来都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的。

《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反革命是说蒋介石怎么统治，革命是说我们这一面。我们这一面，革命的范围还是很大的，罢工、罢课、贴标语、游行示威，都在里边。陈伯达说，唯一正确的就是毛泽东在农村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把蒋介石推翻。而且只有毛主席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领袖。

两篇文章，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上从来就是正确的，是唯一正确的领袖。这两篇文章，对建立这种观点，起了无比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那些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同志全同意陈伯达。有些监狱出来的同志说，我们贴标语、喊口号，被蒋介石捉起来了好几年，蒋介石怕你“示威”？统统抓起来就解决了，还是毛泽东的办法对。所以，陈伯达在延安整风，在拥护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最高的领袖这方面，他是出了大力的。这两篇文章当时大家拥护，事实上对我们这些小青年坚决拥护毛泽东起了极大的作用。

蒋介石在一九四三年发表《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当然是别人替他写的，讲将来要统一，要建国，要强国，一切归国民党领导，中国的命运，一切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掌握在蒋介石手里，离开蒋介石，什么都不行。陈伯达奉命写一篇文章，评蒋介石这本书，名《评〈中国之命运〉》。毛主席也改过很多次。这篇文章很好，延安发表了，占两三版。陈达伯给我们讲过，写文章要学习梁启超。他很喜欢梁启超的文

章。他讲，梁启超说过，写文章笔尖要常带感情，这样的文章才能引起人家的共鸣。他写文章就很注意这个问题。他的《评〈中国之命运〉》就是这样，全文充满了革命的感情。这篇文章不是简单地反蒋，拥护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只看过一遍，现在还记得一点。陈伯达讲到一九二七年“四一二”蒋介石屠杀共产党，讲到蒋介石屠杀的革命者很多，用了三句话，好几十年了，仍然记得。他说：蒋介石杀人流的血“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真是太多了”，连用了三次，一般用两次，他用了三次，让人无比沉痛。我现在说起来还要流泪，这叫言有尽而悲无穷。陈伯达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在共产党成立以来，恐怕也是难得的。用在好的方面，就是《评〈中国之命运〉》，用在极坏的方面，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笔尖也带感情，就是：杀，杀，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像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发动全国乱砍乱杀，极尽暴力煽动之能事。所以他说他的文章带感情，从正面的例子看，是这样，从反面的例子看，也确实发挥到了极点。为了这后一篇文章，“上帝”怎么能赦免他呢！

中共在延安开了七大之后不久，大概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陈伯达来到了中央宣传部，这时我已经调到中央宣传部两三年了。陆定一、陈伯达来任中宣部正副部长，这两个位置好几年都是空的。宣传部就是散兵游勇，加上一些家属住在那里，跟一个招待所差不多。他们两个来，带了个秘书长丁华。这个秘书长也是个老前辈，同他们二人并不熟，同大家关系很好，成了我们的大家长。但是，他们来后宣传部也没有变化，仍没有工作。陈伯达住在顶层的窑洞，只管写他的书。他最著名的书，一本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延安出的，这个书是借袁世凯的名骂蒋介石，主要是说蒋介石是个窃国大盗。这个书后来的作用不大。第二本书叫《中国四大家族》，第三本叫《人民公敌蒋介石》。后两本书是奉命写的。他写书有四个助手，没有这四个助手，他恐怕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中国四大家族》可能是在日本投降前后毛叫他写的，名字也是毛取的，助手是何均、陈真，这两个人替他收集经济方面的资料。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强，编排资料、写说明文字的能力比别人强。所以，他弄一弄，写出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现在来看完全站不住脚，即

所谓“主题先行”。这个书的基本思想，就是把国民党时期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两局”等的财产全算成了蒋、孔、宋、陈的私人财产。除了这“四行两局”外，国民党当时还搞了许多国营企业，都算成了他们的私人财产。所以，“中国四大家族”就来了，说中国的财富就是他们四大家族的。

现在解放六十年了，证明这个论断无法成立。陈立夫在政治上是最彻底反共，“政治挂帅”得很，并不怎么弄钱。国民党退到台湾后，他怕别人在蒋面前要求惩罚他，因为他的极端反共政策失败了，离开了台湾。他后来到了美国，连吃饭都困难。靠办鸡场生活。前不久，电视里说陈立夫的孙子捐了一样三星堆的宝贝给国家。陈立夫的孙子讲，陈立夫嘱咐，再怎么穷，也不能卖，要拿回去捐赠。陈立夫是政治动物，是彻头彻尾搞政治的，是拿官薪吃饭的人，他好像没有多少钱。蒋介石的财力也清楚，他没有什么钱。蒋介石是军事政治动物，并不搞私产，宋美龄长期住在美国，大多是孔家援助的。陈伯达这本书，是先有结论，后找一些材料来拼凑，方法就错误。所以，费了那么大的劲写出来的书，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孔、宋不太清楚，蒋、陈有几个钱呢？

《人民公敌蒋介石》这本书，帮助收集材料的人有两个，一个田家英，一个史敬棠，他们多年替陈伯达收集各种材料，偏于收集政治材料。田家英的文笔好，实际上许多东西是弄好了，交给陈，陈编辑编辑弄出来。《人民公敌蒋介石》，说蒋介石独裁，反动是对的，卖国来讲，现在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了。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也是要抗日的。

这两本书，当时是起了大作用，我们反正相信。但是，《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篇文章，才是奠定陈在党内权力的基础，才是奠定陈在领导人面前的政治地位的基础。而我们在整风中也确实认真地学习了这两本册子。

159 一个很有才情的人，最后成为一个反革命的头子，确实是一场大喜剧

陈伯达还喜欢写毛笔字，他写毛笔字也是个天才。他不多练字，但

写得非常之好，又豪放，又潇洒。他的几本小册子的封面，都是他自己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很佩服。

在他下面的青年，经常看见他的，都说他懒，陈并不刻苦用功，同其他人不大相同，但他确实有天赋。一九六〇年我调到上海辞海编辑所几年后，晚上有些专家闲扯（聊天），我坐在旁边听。他们扯到中国的书法。有人讲日本有人评论，中国现当代的书法家有三个半人，第一个是毛泽东，第二个是康生，第三个是陈伯达，还有半个，是多年鼎鼎大名的书法家沈尹默。他们说，毛泽东、康生、陈伯达的字，都有特点，个人创造性都很强。沈尹默虽是书法大家，但个性特点不够突出，所以只能算半个。这种说法可能是胡扯，可能也不是毫无道理。我是外行，不敢胡说。

陈伯达这个人，留下的教训是很多的。他十分有才情，但他没有去做学问，他完全为了当时的某种政治的需要服务，只要是这个需要，他个人的上升需要，他就用文章用书籍来响应，改造历史事实来发挥他的论点，而不是把自己的历史论点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所以陈伯达的一生，虽然写了那么多东西，今天看来，在学术上有根据，能站得住的，怕很少。

陈伯达的一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值得一切弄理论史学的人引以为鉴。陈伯达之所以会这样，因为人聪明，但没有很切实的真才实学。如果他要像党内的其他学者，像范文澜一样，一辈子研究学问，他的成就可能会比范文澜这些前辈高得多（范有大实学，但后来被简单的“阶级斗争论”教义化了）。陈伯达的这一生，其实也不过像苏联的米丁、尤金、维辛斯基、李森科这一类的所谓学者一样（不过，我认为陈比他们究竟高明得多，因为那些不过是几把刀枪而已），事情一过，东西全部无用，甚至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上没有真正的建树。今天不管陈判没判刑，陈的书的参考价值都还有，但不大。陈是一个喜剧人物，不是悲剧人物。以陈伯达为鉴，可观得失。

不过，在一切判刑的人当中，最令人叹息的还是陈伯达，他不是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东西。他是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国民党屠杀共产党后加入共产党的。这一点，他自己是引以为骄傲的，他常给我们讲，虽然

话说得平淡。可惜，一个人如果不真正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只是为自己的名、自己的位，而不去坚持事实，写多少书都没有用。在当时就有人看穿你这个东西不行，以后更会成为废品。我作为晚辈也算观察了这一类人七十多年，我现在觉得任何东西，凡是不合历史事实的，随便你怎么讲，有些当时就被人耻笑，有些最后要破产。我觉得，陈伯达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一个文化人，一个作家，光赶时髦没有用，最后还要考虑到对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符不符合史实，对不对得起中国人民。

第三十二章 陆定一：才、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160 几乎一生都任宣传部长，但留下的著作并不多

陆定一这个老前辈很特别，几乎一生都任各种宣传部长，但留下的著作并不多。他作为宣传部长，不怎么写东西。他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交大读书，读的电机之类，他的自然科学基础很好，英语很好，看书、讲话、翻译都行，一九二五年就加入共产党。一个读纯工程科学的人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道理很简单，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况，中国民族所处的地位，逼得中国很多最有思想而又愿意做自我牺牲的人都觉得要挽救中国，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的国民党，在苏联及中共各种具体帮助下，刚改组成功了一年多，以后，中国到处都是共产党员以跨国民党籍的身份，出面替国民党组织党部。陆此时是否也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出来做共产党的工作，我不清楚，不过一般是如此的。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国民党似乎还在共产党之后才在各地成立呢？但事实就绝对如此。一个真正有形的、具体的、有组织的、有党员的国民党，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尤其是一九二四、二五、二六、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以前在苏联及中共帮助下组织起来的，现在的中国青年全不知此事了。我们县里的国民党县党部就是共产党替它组织的。这位老同志姓陈，后去苏多年，我在延安拜访过他多次，解放后被派回任宜宾地委书记。我这些话扯远了一点，因为现在不仅青年不知道，即使研究党史的人，也得不到那个时期的那种亲切感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翻天覆地的全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高潮，是谁掀起的？是谁具体组织领导的？确确实实就是共产党，全国如此，绝无例外。一个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国民党，是谁帮它建立的？确确实实的历史是：共产党帮它建立起来的。我的年龄当然也未参与其事，但正遇到此事失败后共产党员在全国无例外地惨遭大屠杀的惨烈时期，所以清楚地知道那时的悲痛故事。下面我再把事情拉回到正题上来。

陆定一在一九二七年就任团中央宣传部长。特别奇怪的是，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开的“八七会议”，一共才有十几个人参加，陆也参加过，太不简单了。这个会是共产党在“四一二”后开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决定

中国共产党以后革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决定中国共产党以后要在农村发动起义，发动武装斗争。这可是天大的变化，因此参加这个会应该是非常光荣的。但参加这个会的人倒并不都是共产党的重要领袖，陆定一就是其中一个。他当时恰好到了武汉，以团中央的宣传部长身份离参加党中央开的紧急会议，应该说还差得很远，但是当时不正常。邓小平也参加了，当时论职务，邓小平也没有资格参加，还有个留法、苏回来的郑超麟，当时只是湖北省青年团的宣传部长，也参加了。我举这几个人说明，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党的重要领导人。陆定一跟党的一些老前辈一样，也成了决定中国革命决策的参与人之一。所以，这个会看起来并不是什么有计划的，是临时的十分紧急会议。当时共产国际派了苏联的一个小青年罗米那兹来参加，基本上是由他主持的。陆定一在苏联待过一段时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从上海撤退到江西土地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这是个名义，当时并没有多少实际的工作。一九三七年抗战后，八路军开赴前线，他又任八路军前方总司令部下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四一年他回到延安不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他又出任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被捕后坐了十二年牢，他一生，说来说去都是宣传部长。但他一生并没有多少著作。他不像王明、博古、张闻天，以及后来的陈伯达，什么原因，我说不出来。这跟个性恐怕有点关系，一点不好表现。

161 教我们的是政治，不大讲技术

我对陆定一的印象比较好，因为他架子不大，也没有那么多神秘性，有时候还能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部下一点点。比方，他同陈伯达在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到中央宣传部任正副部长，当时全党还处于整风后期，实际上宣传业务已经完全停止。陆定一在中宣部组织了一个党史小组。当时大概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说要根据七大精神写一部党史。成员有三个人，张仲实、丁华（帅昌书）和我。他给我们发了一套《两条路线》，我们才知道一些事情。这套书一看，我们确实感觉到一九二七年以后，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在上海的领导是盲动主义，宗派主义，打倒一切，什么都反，自己孤立自己。陆定一召集了几次三人小会，全听他讲。他讲“王明路线”，我心里叫“哟”，没有听说过呀！又讲

一九三一年的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我们又很吃惊，因为以前说这个会是如何伟大，如何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他说，这些东西全部是错误的。我们的“左”倾盲动主义从这个时候就定型了，扩大了。他是在这个小组里讲的，我也不敢告诉别人。当时在延安这些东西还是非常机密的，尽管上面讨论历史问题已经两三年了，我们下面一点也不知道。“王明路线”，当时不敢讲，属于高度机密。“王明路线”这个问题，延安时一般干部并不知道，只看见王明、博古是不当权了，并不知道什么“第三次左倾路线”。

陆定一跟胡乔木在培养干部方面不大一样，田家英和我到胡乔木枣园编语文教材两次住了三个月，那时中央正在忙于开七大，正在忙于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但是我们一点不知道。胡乔木确实做到了滴水不漏。

陆定一和胡乔木两个人的领导作风很不一样，胡乔木守口如瓶可以说是达到极点。陆定一要做什么事，会把基本情况告诉我们。陆定一似乎还对我们讲过，所谓“斗争哲学”是国民党反共派对我们的一种污蔑，马克思主义哪里只讲斗争呢？

我讲这件事，说明陆定一对干部的领导教育跟胡乔木有点不大一样，胡乔木教我们的是要讲究相当完善的技术，陆定一教我们的是政治、思想，他不讲技术。

162 进北京城以前，叫我做过三件小事

陆定一到中宣部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他就忙了，中共中央发声明、发文章特别多了。不久他就参加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开政协会议，他是中共八个代表之一。他从重庆回来后，对我们进行了一些传达。不久他就离开杨家岭中宣部，搬到枣园毛主席那里去了。解放战争时期，陆留在陕北毛的身边，一九四八年约六月，我从山东土改工作团回来，又在西柏坡见到陆定一。他仍然是中宣部长，不过忙于中央的事，部务不管，交与秘书长丁华管事。

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住在西柏坡，陆定一也住在那里，我当时住在二里外的东柏坡。有一天，陆派个人叫我到他那

里，当时没有多少电话。我去，看到党中央在集体办公，一个房子里有杨尚昆、安子文、邓颖超、李维汉等人。我去后，陆定一走出来说，进城后全部教会大学都要接管，教会大学是文化侵略最厉害的，培养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人，这个欺骗上层的知识分子学校，绝对不能让他们办，一进城就接管。你去调查一下全国教会大学的情况，多大规模，哪些负责人等，特别要调查有中国负责人的学校，给我资料。

我到处问，附近没有一个教会学校的大学生。我拿介绍信到南庄中央组织部去问有哪些人是教会大学毕业的。中组部一位同志说，我们也不知道。大家都知道黄华是燕京大学的，但他在哪里，还不太清楚。一句话，不知道教会大学是怎么一回事，连一个真正教会大学毕业的大学生都没有找到。

陆定一交给我的这项工作，没有结果。由于做这件事，我知道对教会学校要立刻接管，没有商量余地。现在看来，当时为了跟国民党斗争，跟西方国家的关系老早就定下来了，不是毛主席进城来写一边倒的文章才定的。

陆定一这天还要我办第三件事。他叫我编中央政策文献小册子，准备进城后大量印刷。虽然我们在中央机关，但对军事上的情况并不知道，而且当时连辽沈战役还未结束。我听他这样说，觉得中央已经在准备这些东西，要进北京的样子了。他说，你编好后，交给乔木同志审查，这里边好多东西都是他写的，我会告诉他。后来我就这么照办的。

一九四九年秋天我南下广东后，见过陆一次。我认真对他提了一个建议，调一个名人来当中山大学副校长，具体建议的是冯乃超，后来实现了。一九五四年我调回北京在人民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工作紧张的时候，中央宣传部常开会，现在叫“吹风会”“通气会”，又常见到陆定一了。这个会上，陆定一给我们讲了很多情况。在胡风的事还没有登报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个“反革命集团”了，中央已经定下来要打翻他们了，而且认为胡风“反党集团”的危险性特别大。他和周扬每次都是带着检讨的口气说话。他和周扬在不断挨毛主席的批评。

163 我弄不清“双百”方针最早是谁提出的

在通气会上，陆定一多次谈到“百花齐放”，给我的感觉这个口号似乎是他在中央的少数人会议上提出来似的，而这个意见是得到了毛的同意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提出，现在所有的书籍文章似乎都讲得有点含糊，没有哪个文章明白说这是毛主席在哪个会上提出来的。

苏联开了二十大后，吹风会上，陆定一告诉了我们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他说苏联现在粮食的产量，远远低于沙皇时期，我们非常吃惊。我们过去得到的信息是苏联富得流油，天下第一，怎么几十年后是这个样子？其实一直如此。陆定一在苏联住过几年，他还透露了一些其他情况。他说，我们二十年代住在苏联就知道，不断有外国共产党人失踪，但不敢问，现在看来，都是被抓起来了。这段时间，陆定一表现出对教条主义很痛恨。当时参加通气会的还有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实际负责人×××。陆定一对人民大学的教学，学苏联那一套，非常不满意，骂他们是教条主义，骂的话非常难听，说他们改不过来。所以我感觉到，陆定一在党的领导人里边，比较起来是一个比较直爽的人，也比较正派。似乎也从未听到他歌颂过苏联。

陆定一从监狱里出来后，就没有担任过任何工作了，分配给他的是挂名政协副主席，他就以医院为家。

在党的几个大秀才中，我最佩服的还是他，他比较注意吸收历史教训。他这个人太可惜了，中年就被自己人捉捕，最悲惨，就不能再起作用，他的才、识，都没有得到发展。

164 他为我题字，我能做到一点点就好了

最后我要提件小事。大概在一九八几年，有个我认识的朋友孙邦铎君跟他家有点往来，这个朋友到广州东山宾馆去看他，请他题字。题完后，这个朋友对陆讲，你有个老部下曾彦修，还记得吗？他说，当然记得。这个朋友说，你不给他题幅字？他说，好。他拿着笔题了那幅字，后来人家裱好了送给我。这个字的内容，是长辈对我的勉励，我愧不敢当：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我本人看见后很吃惊。我说，陆定一怎么写这几句给我，我怎么吃得消呢？我哪里配得上这么四句话，根本不配嘛。但转念一想，他题此送给我，总要考虑一下，如果你这个人跟这四句话是完全相反，他绝对不会题此送给你。所以我只能说，他的用意是勉励我，而且是终生的。我现在已经九十岁了，我终生不敢违背老前辈的良苦用心。所以我把它拍了照片，作为传家之宝。谁得到这个诗，都是会非常高兴的。我当然是以惭愧为主，这是争取方向嘛。

第三十三章 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165 也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大才人

胡乔木在中共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特殊到几乎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人物。如果中国没有长期的个人崇拜的话，当然也就没有他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人物。他的文集保留了他的诗：“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诗言志，终生不出此圈一步。

胡乔木的特殊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说他权大，后来加上位高，言足以制天下，我是指还有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胡是中共历史上很难找的一个大才人。在中共历史上，有的人不是才学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他们根本上是大革命家、大政治家，他们不是、也不必以才名世。后来一批人，如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这些人是老革命家，也是中共知识分子当中很有才的人，尤其是瞿秋白。但是这些人牺牲得早，像恽代英、萧楚女，他们的才学没有得到发挥。瞿秋白，当然是聪明得不得了，但他很早就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一段时期，瞿秋白是政治上的第一人物。再下来，就是张闻天、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这几个，他们跟胡乔木不同。他们在党内都占过重要的领导地位。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才学，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机缘，他们参加革命早。再下来，就是党内很著名，但没有占重要地位的人，这就很多了，不知道有多少，像阳翰笙、李一氓、成仿吾、周扬、夏衍、邓拓这么一批人，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共历史上也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名声都很大，但跟胡乔木也不同，在才学的广度上，大概比不上胡乔木。我感觉到胡乔木的才学，主要是广度，但有些地方也有深度。

胡乔木很爱才，甚至非常爱才。爱才的基础是识才，而不是以能否为我所用来画线。例如，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委任李慎之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这就要点胆识了。因为他非常清楚，李是有很多叛逆观点的。所不同的，李既是官，又是民，是上马草兵书，下马弹民调，老百姓立场是根本不放的。

胡乔木还有个特别的地方，是其他人远远赶不上的，他在品评文字的逻辑、语法、修辞等方面，堪称独步。而且我认为在道理上他都是对的。尽管这样，他本人的文字则并不特别吸引人，远远不及陈伯达，也没有形成一个“胡体”。这是什么道理？他的思想受到了太多的控制，左顾右盼，下笔如有“绳”，文章写得不放手，展不开，写不好。他本人的文章，我并不佩服。

胡乔木在知识面的广度上同康生比，恐怕各有所长，彼此彼此。康生在党内不得了，在戏曲、音乐、绘画、甲骨文、金文、版本学等方面，他不仅仅是有点常识，似乎是花了时间去钻研过的。康生说来这是业余，业余能达到这个标准非常难能可贵。胡乔木在知识的广度方面可能超过康生。但在甲骨文、金文、版本、戏曲等方面，那胡又不如康生。胡的工作比康生忙得多，一到了延安，就没有闲的，而且一直到他离开工作。他工作的紧张程度，是超过常人的。作为职业革命家，他确实是全心全意，呕心沥血，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生命贡献给了共产党，贡献给了革命。我甚至想，他也有可能是延安第一忙人。在党内，熟悉胡乔木的人还较多。解放后，打倒“四人帮”后，跟他发生密切关系的，至少几十个。我是以前知道一些琐事，全是明日黄花了。

胡的知识来源，跟他的学校很有关系。他的中学是扬州中学，扬州中学在旧中国是非常著名的中学。有人讲，当时有三个程度最高的中学，它是其中之一。胡乔木从扬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进的是清华大学，后来又转到浙江大学，因此他读的高中、大学，是全国最著名的名校。所以我们的初中、高中、大学办得好不好，跟一个人的成长关系很大。你不办好，很难培养人。

但从根本上讲，是胡本人聪明，用功，求知欲旺盛，他杂书也读。他参加革命活动很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但他还看一些偏僻的书。所以，在这些地方，你只有佩服。另外，我们在延安他的家里编语文教科书时，他提出来中学第五年级，即高中毕业，也要教点语音学。我们哪里懂呢，他给我们说了一下，说语音学并不难，历史上一两千年，从《诗经》开始，就很合规律，说不清楚，很难。但这个问题，清末以来已经有一批学者整理出个头绪了，民国后，留学生多了，中国音韵学的神秘性早已经完全打破了，因此，教高中毕业生一点音韵学常识，完全

应该。中国诗，音韵学是自然的，你无意中懂了规律，你就可以作诗。为什么有人写出旧体诗不像样？就是不懂音韵。他说音韵根本不难，千万不要把它神秘化。

他当时要我写科学小品，我提到朱洗科学通俗生物学著作。不要看延安好像闭塞，实际上大后方和上海出的书很快就运来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了一套朱洗的生物学丛书，十本，比较厚。当时宣传部没有什么事做，我看过十本书中的《人类的祖先》《蛋生人与人生蛋》等。我说，我觉得朱洗的科学通俗作品写得好，科学性很强，通俗，引人入胜，讲真科学，不是光说废话。哪知道胡乔木也看过。他说对，朱洗是个科学家，又能这样通俗地写，当然很好。不过它是多本书，而你们要写的是一篇短文，内容只说一点，技术要求更高。他这么说，只能让我感到吃惊。他拿什么时间看这些书，他日理万机，我不得不佩服。为了求知，跟他当时业务关系不大的书也要读。这一点，恐怕是一切搞文化工作的人，特别是作家，都要向他学习的。要不，你的知识贫乏，只能讲干巴巴的那一点。

166 在延安时期的作用

胡乔木最晚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年底就长住延安了，之前他在党办的安吴堡安吴青训班当副主任，离延安几百里，主任是冯文彬，实际主持教务的是胡乔木。这个学校实际上是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预备学校。如果没有可靠的介绍信，就必须在这个学校学习一阵，审查后再定你是否能去延安。

这个学校办了一年多吧，就没有办了。胡乔木本人可能在一九三九年回到延安。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延安撤退，他一直在延安。除了主要那几个领导人毛、刘、周、朱外，他实际是延安天空众星当中最亮的了。他地位不高，岁数不大，三十几岁，但是当时很多事情都是他干的。一九四一年毛把他叫去当政治局秘书后，就起了这个作用。在延安，开始他在中央青委当宣传部长，李锐、于光远、许立群，都是他下面的工作人员。这些人是偶然去的，还是他找去的，不清楚。但怎么会这么巧呢，一个个后来都是大名鼎鼎的人，好像人才都集中他那里去了。

可能是一九四一年夏天，胡因为有什么文章被毛发现了，把他叫去当秘书了。一九四二年后，这个秘书的头衔就多了，一会儿是政治局秘书，一九四二年毛整风，成立中央整风委员会，他又是整风委员会的秘书，所以不必弄清他有多少个重要秘书头衔，关键是毛的秘书。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作第一个整风报告（是不是《反对党八股》？），这个报告前，张闻天就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凌晨离开了杨家岭去陕北和晋西北。

张闻天走后，名义上由何凯丰来当宣传部长。这件事太具讽刺性了。何凯丰是什么人呢，是跟王明他们一起留学苏联的，是非常有名的教条顽固派，但他在教条主义集团中只是四五位后的人物，远远在王明、博古、张闻天之后。但他进入了政治局。在遵义会议上，他是唯一一个死不转变，反对毛主席的。连博古都转变了，他还反对毛。他的威信，在党内是谈不到的，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一方面反教条主义，整风，另一方面，把一个教条主义中威信最差的人弄出来当宣传部长，这对整风是一个最大的讽刺。

但何凯丰很快住院休养了。一九四二年夏天，连中宣部的主要科长吴亮平也调到晋西北某个县下去当区长还是区委书记了。胡乔木以什么名义去的中宣部呢，我不清楚，可能是代行职务，当然他还有一些重要的“秘书”名义去领导宣传部的工作。

胡作为毛的秘书和中宣部的实际管理人——是何名义我不清楚，也没有问清楚——住在杨家岭。同时，中央秘书处也在杨家岭，他在这里编什么，调什么资料，方便得很。如果住在枣园，麻烦，相距十多里，来回送。所以，他相当长的时候在杨家岭。

他到杨家岭来的时候，是在毛一九四一年五月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之后，在张闻天一九四二年年初下乡之后，他的任务与毛的任务是分不开的。我们当时闹不清楚毛报告中引用的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是讽刺谁，当时一般青年看了后五体投地，以为是讽刺我们的。我们十八九岁去，在延安待了几年，二十二三岁，确实没有什么本事。但我们这些人有什么资格受他的讽刺呢？他讽刺的是王明、博古、张闻天。

延安相当一个时期，一般人，还不要说我们这些下层，包括上面的，都把胡看成毛的代言人，胡讲什么，大家都要考虑考虑，是他讲的，还是毛讲的。陈伯达风格有所不同，一般把他自己讲的同毛讲的分开。

另外，假设没有胡乔木在延安，就较难很快编出《六大以来》《两条路线》。《六大以来》党史资料汇编一出来，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只好认错服输了，谁也不好再坚持半个字了。这几个人只有王明装病，不表态，不那么公开认输。这个功劳是谁打的基础呢？没有胡乔木收集材料编出这些书来，要在历史上把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后地下党中央在上海的“左”倾错误暴露出来是比较难的。因为这部分领导人强调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指挥的。现在拿出他们真正的东西，他们自己写的“打倒一切”的东西，“左”倾到极点。所以说在这点上，胡乔木的功劳确实大。不提供、整理这些材料，不编好这些材料，这个问题就不好解决。因为毛主席过去不清楚这些东西，毛主席在土地革命区，在根据地，这时一翻，发现错误很多，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而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打倒，中国革命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现在来看就很清楚了。实际上，从这时开始，胡乔木已经代表最高权力在宣传文化上指挥全局了，并且表现出比过去的人都要注重中国实际。他在杨家岭中宣部，实际上是整个宣传、教育工作的转运中枢。在延安，他的上级只有一个，进城来也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他，也没有第二个人想去指挥他。

从一九四三年起，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一个叫中央组织委员会，一个叫中央宣传委员会，当然都是毛主席在领导。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书记是刘少奇，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是毛泽东。很奇怪吧，共产党一直是重组织轻宣传的，怎么这回组织成了刘少奇，宣传成了毛泽东？原因是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一九四四年，都是以整风为主。整风是干什么？是思想教育，广义上属于“宣传”。一九四三年中央政治局作了决定的，毛在中央有最后决定权。最后决定权一来，胡乔木就是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的一个秘书。

但是，胡乔木当时与前辈们，与周围人的人事关系却是比较好的。

他当时的为人是比较谦虚的。所以，尽管他的权力那么大，那么重要，但是他个人的声誉没有受到损失，老前辈谁都喜欢他，觉得他还是个年轻人，三十来岁，人家并不觉得他有什么高傲。当时我们也是非常尊敬他的，觉得他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岁，有那么大的本事，有点崇拜。总之觉得，在延安他是一个奇人，有人说胡乔木像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其实大不一样，陈只是替蒋写应酬文章，写不得不表态的文章，是空话、废话，应付场面。胡乔木替毛起草的东西，是决定性根本性的文章，决定大问题的文章。

所以，胡乔木在延安的作用，地位不高，名义不高，毛主席的秘书，但其实非常重要。这个时期，他处理事情很好，上面、下面对他的印象都不错。像我们，真的佩服，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奇才。我的感觉可能不全对。

167 调我到中宣部去

一九四三年十一、十二月，胡乔木还住在杨家岭中宣部。一九四三年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紧张得不得了，中央需要一批通俗宣传材料，写好后拿到外边去换个题目出版。共产党的宣传资料历来如此。

这时候，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抢救后大家都无业务，胡乔木把我叫去，交我给一批资料。这批资料主要是说国民党怎么反动、怎么抓人、怎么黑暗之类。这些材料是地下党提供的，有些根据，怕也有夸大。这时中宣部的人，下放的下放，其他的人确实全部靠边，才会叫到外单位的我。

我把编写好的东西交去后，胡乔木把我叫去了。这是一天下午，十一月或十二月，很冷，他生病躺在床上，就住在张闻天原来住的那间砖窑洞里。他这个人，要批评人，要表扬人，都很简单，不拖沓。他的原话记不得了，意思说，还可改好。但是，他很明确地指出我文字中的种种毛病。说我白话夹文言，还用了一些不妥当的名词、形容词，用现在的话说，用了一些酸溜溜的词语。还有就是一些地方文句不通。总的意思，我了解为：材料有，文字不行，文风华而不实。

我确实一下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了，心想，水平怎么这么差呀，他说

得完全对呀。好在我这个人在这些地方经受得起批评。只要你说得对，我就五体投地。最后，他要我回去修改。

他这次对我的批评，我终生感念不尽，不管现在我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样的批评，内容上这么尖锐，但语气上却很和缓，对我是极大的帮助，我一生感念他。

我回去彻底修改后交了。他可能觉得孺子可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底把我调到中宣部去了。我去的时候正是苏联红军初打出国境的时候。

胡乔木还是让我编编写写。不到个把月，胡乔木就调回枣园毛主席处去了。

168 同田家英到胡乔木的窑洞里编语文课本

我继续留在中宣部。干什么呢，谁也想不到，胡乔木要搞一套初高中结合起来的语文课本，田家英和我二人就参加这个课本的编写。当时看不出日本什么时候投降，以为我们还要丧失很多地方，基本力量还要转移到山沟里，可能还要在山里待十年二十年。延安当时没有正规的学校，办的学校跟训练班差不多。胡乔木自己要主编一部五年制的初高中语文课本。

他这个人很奇怪。一方面忙于最高层的政治评估、活动，另一方面个人的兴趣，他也要顾及。他就找我跟田家英编。在战争那么忙碌的时候，他忙那么多事，新华社的稿件呀，《解放日报》的社论呀，中央的文件呀，他还要忙这个课本。这是他个人业余爱好，个人兴趣。胡乔木对中学的语文教科书，有他一套完全独立的见解。首先他就认为这是初高中最重要的一套课本。他这套见解，老实说，现在恐怕没有人能完成。他当时要我们编的语文课本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语文，选从古到今的；第二部分是文法；第三部分他要求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作风教育以及科学观点教育等糅进去写成文章。最后这一大部分，他认为没有现成的文章可选，全要自己写。这个设想不错，但要求太高，确实很难办。

我跟田家英的分工是，田负责选课文与写文法讲义，注释，选从

《左传》《史记》到“五四”时的文章。胡乔木对闻一多、俞平伯、朱自清，总之对“五四”运动后产生的大的文学家，有成就的，他都很佩服。他曾做过朱自清的学生，更佩服朱自清。田选文章不困难。不要看田只念到初一，到延安后他更看了许多书。田极聪明，看书过目不忘。旧体诗、词，一般看一遍就能背了。这一点，跟毛主席有相似之处。毛主席问他哪个诗人说了什么，要田查，一查大体全对，最多差一两个字。毛主席的记忆力之好，恐怕是历史上难找的。不仅是唐人的诗，宋人的词，甚至清人的，毛主席看一遍也能记下来。他这样的人，大概真是几千年出一个吧。田家英也有这个本事，当然基础没有毛好。毛有老师，田家英无老师。

但编文法，即中国语法，就把田难住了。当时只有一本《马氏文通》。所以实际上要田家英创造出一套语法来，怎么可能呢？我的天老爷，我们都是中学生呀。胡乔木让他多看参考书。

我处于次要地位，负责把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科学普及知识等糅在一起，写成一篇篇文章。为什么全要自己写呢，因为抗战前的通俗文字，在胡的眼里统统不行。像高士其写的，文字长得不得了，不可能进教科书。有个开明青年丛书，我也看过，有些还是看不懂，比如《趣味的数学》，既然说趣味，还是难懂。这些东西，胡乔木都知道。他说不能像贾祖璋的《碧血丹心》那样，内容少，文字也比较粗糙。他拿出一本《乌拉波拉故事集》，抗战时贵阳出版的，我们还不知道。胡乔木这个人是多读，他连这本译书也看过。他说，你们看看，这书写得很好，但却不能用作语文课本，因为太长，一篇好几千字。我拿来仔细看了，确实写得很好，就是每篇都太长，废话还是不少。

为了编这个教材，他把田和我两个人调到枣园他的窑洞里。他的两个窑洞都不大，是挨着的，一个他们夫妇，加上两个孩子住，另外一个办公，他把办公窑洞让我们住，他在自己住的窑洞的一张小桌上办公。两个窑洞都是老的，人工建的，不是挖的，很一般。

我们去过他那里两次。一九四四年“九一八”那天，容易记，我跟田背着行李到他的办公室。这次住了一个多月。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第二次叫我们去，一直到五月罗斯福死后，形势大变，我们才要求回到杨家

岭。为什么要我们去呢，便于耳提面命。

胡乔木给我出了一些题目：尽善尽美，百折不挠，生物的生殖，等等。这就是说，科学的、政治的、道德的等等东西，要当成文学性的散文来写。为写出这些东西，一文不超二千字，我改了又写，写了又改，反反复复，在文字方面受胡乔木的“夹磨”（训练）。两次住了三个来月。

胡为什么要我们反复写呢？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先搞出个“样板”，再参考这个写。胡要求我写的那几篇，我写了三篇。我记得《生物的生殖》这篇，我自己比较满意。我当时二十四五岁，既未结婚，也未恋爱。写这类文章，要打破神秘性就难办了。我写了一千多字。胡乔木要求一千五百字左右，用散文写。开头的部分我现在还能大致记得大意，文字可能还要漂亮些：

春天来了，到田间去看白蝴蝶在菜花中飞舞采食，这个时候，就是在进行两种生物的生殖活动。一个是植物花粉间结合的“无性生殖”，另一个是白蝴蝶间交配的“有性生殖”。

这个开头比较轻松，人人都看到过这样的现象，它得到了胡的赞美。胡对人的赞美，任何时候都不会公开直说。他只会这样说：我看这样可以了。或者说：这样写比较好。最多是这样。当然，我上面这个例子，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很难说，可能是胡说，当时只是草稿，尚未作科学核实。

我们两次去，加起来将近三个月。他对田选的课文样本（古代的），比较满意。我的任务，肯定完不成，住在那里，就写了这么几篇东西，就是反复磨。

我这个人的头脑有点特别，对重大的国内国际事件比较关心，对这些事一记下来，就是一生。一九四五年，大概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延安《参考消息》登载了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回到美国在华盛顿的谈话，说美国今后将只以蒋介石元帅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为合法的唯一交涉对象。过去当然也是如此，现在特别提出来，强调一下，无非说明今后美国要疏远共产党了。这时候，美军的观察组还在延安。美军观察组一九四四年

就来了，可以单独跟共产党直接交涉。美国从情报需要，十分想知道一点解放区的情况。我们也十分需要他，来看看吧：从山东半岛到陕北，是不是敌伪的占领区。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军将来可能在华北登陆，吃的粮食、喝的水要靠我们。美国人估计要在华北登陆才能打败日本。赫尔利谈话后，我估计形势要大变，美国已经决定不与共产党合作了。国内的形势也要变，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要紧张起来。国民党要加紧反共，包括清剿解放区。

五月间，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日本要投降。胡乔木也没有跟我们谈过。罗斯福去世后的一两天，我们也感觉形势要变了。当时我们这些小青年长期在延安，政治还是敏感的，总在观察点什么。胡乔木也忙得要命。我们说回去吧，他根本没有时间管我们了。他说，好好，回去吧，现在情况变化很大。他并没有多说。大概就是在罗斯福死后的两三天，我们就背着行李回中宣部了。回中宣部还是没有事情做。

这是我一生第二次在文字上受到胡乔木的“夹磨”，第二次在文字上得到了很多教育。胡乔木非常严格，也非常仔细。他讲的道理确实对，但自己做起文章来，好像又不那么生动。

写《胡乔木传》的程中原同志曾告诉我，他费了很大的劲，找到延安时期中学中文教科书。他给我看了编者说明。我说，这个说明不仅是照胡乔木的意思写的，也完全是他的文字。这个书，可能是别人接着编，遵照了他的方针，只是他没有时间管了。他编语文的方针可能是转到陕甘宁教育厅了。最后有没有结果，我根本也不知道。那题目中确实有些极妙的，如“当太阳请假的时候”等，这可不是我能写出的了。

169 审查我编的十本小册子

一九四八年五月前后，我从山东奉命调回东柏坡，从延安失守后，中央这时已经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安定下来了，大概除战争外，一些工作要恢复了。延安撤退后，中央各个机构大体都散了，都到其他地方去了，尤其是东北。我知道西柏坡就住几个人，毛、周、刘、朱、董老，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他们住在那里，其他人都只能住在附近的村庄。当时宣传部在东柏坡算是跟西柏坡最近的，但业务工作没

有开展，只有秘书长丁华在那里维持局面，有几家人要照顾。这时，王惠德、于光远先后调到宣传部来了。于光远是跟我一起从山东回来的。陆定一、陈伯达，仍然不怎么管宣传部的事。这个时候似乎有气氛，好像要进北京了。因为陆定一已经准备进城用的书了，于光远、王惠德就在编写这些，如政治经济学常识读本、社会发展史等。陆定一大概知道我不学无术，没有叫我写，他叫我编。他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拿出百分之几的时间来管管宣传部的事。他知道宣传部还没有组织起来，知道业务人员只有几个（进北京后的中宣部实际全是新组织的）。他叫我编进城后广泛用的宣传品，也就是党的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根据什么来编？手里边空的。好在各个根据地都印各种小册子，党中央的文件，各方面的政策，如工商业政策、土改政策、文艺政策等等，都有小册子，找了几十本。

编是陆定一叫我编的，他说审查交乔木，他比我熟悉这些文件。胡乔木当时没有大名义，是新华社的社长。这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社长也好，不是社长也好，反正归他领导，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人名辞典上查他，进城前，说是毛的秘书，新华社社长，并没有其他名义。

这里就要提到编关于铁托的书了。

苏联在一九四八年整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主权方面稍微有一点维护的意思，苏联立刻就说铁托是杀人犯、匪帮、德国的间谍，天下的恶话都骂到顶了。中国从上到下都没有人相信，因为我们是把南斯拉夫作为模范的。“解放区”“解放军”这名词是从哪里来的？是学南斯拉夫的。抗战时，我们自己的地方叫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占领的地方，我们叫敌占区，国民党叫沦陷区，沦陷区的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区域似没有名字的，就叫“那边”，叫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叫“自由区”，这种情况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七月最热的时候，重庆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到延安，这对国民党是个极大的压力。外国的记者，特别是美国人想了解“共区”。叶剑英在延安以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身份作了一个报告，叫《中国解放区概况》，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才第一次看见这个名字，觉得“解放区”这个名字太好了。但是军队，习惯还叫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统治时候就这两个，其他小的叫抗日游击

队等。南斯拉夫比我们艰苦，牺牲比例比我们大，死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当时朱总司令在一个报告中讲，南斯拉夫是“铁托”，厉害得很，我们要成为“钢托”。“解放区”“解放军”，全是从南斯拉夫学过来的名词。

定一同志告诉我，要编一本关于南斯拉夫的书，说他们（指苏联）注意得很。不然，我怎么会想到呢？这一下，我得到了暗示：斯大林，你要得罪他，他就可以骂你。不过中国太大了，他不一定敢那么闹。对南斯拉夫，他可以骂一个民族英雄是外国间谍。当时还有个复杂情况，八九月间，西柏坡突然唱起一首歌，叫《民主青年进行曲》，曲是贺绿汀写的，词是萧三写的，歌写得好，几天周围都传开了。歌中有这几句：“毛泽东—斯大林，斯大林—毛泽东，像太阳在天空照！红旗在空中飘，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这个歌是说全世界革命要取得胜利了，美国等就要全完了。问题是毛、斯并列，第一句把毛放在斯前边。不几天，秘书长丁华悄悄通知我们，不要唱了。我们知道这个歌闯祸了。苏联老在国际上放出消息说，中国是比铁托大得多的铁托。就是说中国不服从他们的领导，不服从他们的命令，迟早要威胁他们。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不唱了。接着我奉命编这本书，这本书里尽是苏联骂铁托是匪徒的东西，你不把这个东西编进去，苏联就要整你。我编了它，由上级来决定。我到西柏坡去交给胡乔木审查。关于铁托这本书，我起了三个名字：《南斯拉夫问题文件集》，这个一般得很；第二个，《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文件集》；第三个，《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我的汇报很简单，第一个太一般，苏联不满意，南斯拉夫也不满意。南斯拉夫会说，我有什么“问题”，我比你们还苦呢。第二个呢，苏联可能还是不满意。第三个比较空，但是客观上对苏联来讲，他们可以勉强接受，也没有正面骂南斯拉夫。

胡一看，指着第三个书名说，这个好，这个好。胡这个人，批评人怎么样，语气也不重，但是称赞人更稳重。一般说“这样可以了”“我看就这样”，就是很高的赞誉了。因为总的说来，他是保持文雅状态。

苏联不是一天到晚骂铁托是匪徒吗，但我们能把这放在书名上吗？所以想出“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的书名。书里边，把苏联的一些文献放进去，把我们的一些文件放进去，这样，也算批评铁托了，但没有在书名上说你是匪徒，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当年苏联反铁

托，中国的处境不响应不行。所以，这个书名，得到胡的赞许。

审查完这十本书，胡问我，你现在有什么事？我说没有什么特别事，全宣传部现在没有什么特别事，丁华秘书长你认识的，就管日常生活，于光远、王惠德刚调来，好像在编写什么，我不知道。他说，你呢？我说，我就是在编这些东西，即陆定一安排的进城需要的小册子。他说，这样好不好，你到新华社来帮帮忙吧。当时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不像现在这个手续那个手续，转档案什么的，当时背着自己的行李到那个地方去，就是调工作。我说，我没有意见，反正现在宣传部也没有什么事，一切上级决定。他说，还是到新华社这里来帮帮。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起到定一同志那里跟他说说。

那天下午四五点钟左右，我跟他走出门不远，就遇到毛主席跟江青散步，后边跟着警卫员。毛主席问胡乔木，这是不是于光远？胡乔木说，不是于光远，他叫什么什么。

毛这个人，一些事情无比精明，对另一些事情并不精明。他在认人这点上，跟周总理完全不能比。于光远毛见过多少次，延安哲学研究会，毛也去参加，于光远也去参加，讨论、吃饭在一起。不仅仅这样，于光远在延安还到过他的窑洞，因为要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于光远同一个比较老的同志屈伯传，到他的窑洞里去谈过。毛几次见过于光远，他还认错人。于同我一起土改一年多，这些琐碎事是谈过的。毛的思想用在全局上，对小青年，见过多次还不认识。但记得名字，就了不起了。

胡乔木跟毛主席说了几句，分手了。我跟着他继续走，走了几丈远，他突然说，算了吧，我给定一同志打个电话就行了。然后他说，我也想走一走。我往东柏坡回去，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偶然谈起另外的事情，跟苏联有关系，是关于斯大林奖的，他说苏联要把这个奖给中国什么人，而他对这著作是看不中的。

170 “不必回宣传部了，就跟新华社到北京吧”

我是十一月底去小新华社的，三月底动身到北京，共待了四个多月。过了一两个多月，大概在一九四八年的一二月，我发现范长江、石

西民不见了，谁也不问，估计是调走了。我们在西柏坡的行动是很注意的，毛、刘、周、朱都在，我们自觉不乱走。

可是一天，我竟然在西柏坡看见了范长江、石西民二人。我很吃惊，只一般地问，你们还在这里？他们说，我们要调出去。这下我才知道，他们要调工作了。

我在小新华社并没有什么工作，看得出来，胡调这些人去新华社，也没有什么工作。而且当时所谓的评论组主要的两个人已经走了，我在那里干什么？不大好意思。大约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一天下午，我向胡乔木提过一次我的工作调动，三两分钟，他很忙。那时，我的关节痛得厉害，走路相当困难。在小新华社搞了几个月，每天后半夜才睡，当时都是临时建的木材房子，没有炕，冷死人。我的关节炎大大加重了，已经到了拄棍子也较难走的程度。我向他提出要求，我说，我这个情况，恐怕很难适合在北方这个天寒的地方工作，我请求随军南下。就回四川吧，我家乡南部、东部热死人。

我是试探性提出的，但胡以一种商量口气说，现在要进北京了，离解放西南、华南还有一段时间，看战争情况，你先到北京再说。最后他说，你不必回宣传部了，跟新华社到北京。

我当然服从。我听他的口气，我能不能南下，是战局决定的。

尾声 我对两个“和谐”问题的一点看法

我一生自到延安至今，已经超过七十二个年头了。我算个什么人？勉强地说，我是一个不够格的编辑，我如能获得此资格，就十分满意了。编辑，是为他人做嫁衣的，多么光荣。人要自己适当定位，定位不适当，跌下来变得粉碎。

最后，我还有点感想，这真是多余的话了。

一、两个“和谐”从根本上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及“世界革命”之类的提法

前几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在全球建立“和谐世界”的新口号。这样的提法，跟过去六七十年的传统灌输相距太远了，令相当一部分人难以接受。但是我愿意以行将就木之身，出来讲我的一点个人体会。

和谐这个思想，我们过去几十年已真把它批倒批臭了，说之者谓为“反”，闻之者惊，谁还敢沾它点边？一谈和谐，就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之尤，就是赫鲁晓夫代理人。“要武不要文”。赫鲁晓夫一九五六年曾经提出“三和”，之后几十年间，中国就斥之为世界的万恶之源。中国这边看见的天地，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世界革命立刻就要成功了，比喝口凉开水还容易。对赫鲁晓夫则说，“放屁放屁，请君充我荒腹！”实在太“那个”了。其实长时期的世界形势，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中国来说，那么长一个时期，“三年自然灾害”弄得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还拿什么力量去“扫除一切害人虫”——“苏修”和“美帝”呢？

我们批判了几十年的赫鲁晓夫，其实赫鲁晓夫只有两条“大罪”。一条，他多多少少批判了斯大林的胡乱杀人，从而放出了反个人崇拜这个妖魔。其实他根本不敢全面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出来平反的人物仅仅限于一些最坚定的斯大林系的领导人物，此外被公开审判处死的大量要人，他半个也没有平反，包括勃留赫尔（加仑将军）等三大元帅在内。

赫鲁晓夫另外一条“罪”，是说他提出了“三和”。一是“和平共处”，一是“和平竞赛”，一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指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特别是美苏不要打起来。“和平竞赛”，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和平竞赛，不要用打仗来解决。“和平过渡”，指发展中国家不通过暴力革命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这种提法，是不是他的罪呢？这些，在当时和现在，恐怕都根本成不了什么罪的。

其实中国自己哪有力量来反对这个“三和”呢，但我们就是要坚决反对。从此中国闹了几十年。以至于“晚打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常规战争不如原子战争”的说法也出来了。中国内部当时有的中央同志提出对外的援助要适当量力而行，就成“三降一灭”的大错误了。“一灭”就是消灭世界革命。“世界革命”这个东西，不是你掏空腰包就能援助出来的，它本来就是空想，你二十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的一个特大穷国，自己长期陷入全国性的大饥饿，就是全国人民粒米不沾，也造不出一个什么“世界革命”来的呀。中国是替有些人买了一些大单的。而这些人干什么呢？关起门来自己人杀自己人。像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太可怕了。今后任何人如要想继续保持上述那些老条条老做法，就根本不可能再取信于民于万一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维新，真正的维新。

现在中央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建立理想世界的一个主要目标，这很了不起。世界人民今后要获得总的解放，确实是要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的。根据世界各国的现状来看，要想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让各地都推翻旧政府，成立新政府，“解放”全世界，根本上就不是那么回事，全是空想出来的嘛！世界各国、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可谓千差万别，形势已经很清楚了：由某个阶级进行世界暴力革命，已经没有这个可能——本来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更加没有这个可能性了。现在，全世界人民希望能保持温饱，没有内外恐怖的威胁。要达到这个目的，从现在起，天老爷，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中国的领导人从邓小平起，在这方面现在是相当重视实际了，觉得世界现在已经没有可能通过什么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来“解放全人类”了，而只提出实际上有可能争得的建立和谐世界的口号。只要世界能够真正和和平平，有些地区就有可能慢慢得到一点发展，那里的痛苦、牺牲就可能慢慢减少一点。越搞世界革命，流血越多，痛苦越大，给世

界带来的破坏越深。经过“一战”“二战”，到现在八九十年了，对这些问题，如果还不敢表示一点真实态度，还是根据老尺寸，把近一百年的世界历史事实视若无睹，一天到晚仍然坚信和号召取得世界无产阶级武装革命的胜利，这样的独角戏再唱下去，唱的人就第一个不相信，听的人谁相信呢？

二、两个“和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希望建立的社会，绝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绝不是一天到晚你打我，我打你，你告密我，我告密你的社会，绝不是“克格勃”统治一切的社会。现在中国党中央敢于提出这样国内与国际和平或和谐的两个口号，在我看来，这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过去一切只向专政方向发展的东西，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绝不是专制，更绝不是个人的专制。秦始皇加马克思，是绝对不可能的。秦始皇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马克思，马克思也不可能加亿万分之一的秦始皇。秦始皇和马克思的统一是绝对的荒唐。而现在，中国党中央提出这两个和平口号，我感觉到确是在向马克思本来的思想接近了。

这样的大事，最后产生在中国，我为此感到很高兴。我想，这跟我们民族文化中优秀和美的那部分底蕴，恐怕多少有点关系。因为这两个口号同时是我们悠久文化中最优美、最善良部分的继承和发展。虽然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教训也太沉重了，但可能正是由于如此，所以我们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带飞跃性的历史进步。

但是我们有些理论家喜欢这样讲：现在固然正确，过去的那些斗争也是少不了的，必须要经过那么几十年残酷酣畅的斗争，遍地流血才行。一定要这样吗？绝对不是。以柬埔寨为例，杀人成职业，就把自己搞垮了。中国之所以没有被搞垮，是因为老革命家们终于把江青捉起来了。如果江青这帮人真得势，不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柬埔寨才怪咧！他们在处决人时，已经在全国向丧家征讨两角左右的子弹费了，国不成国了！不仅仅小国，大国也会自我灭亡的，苏联不就自我灭亡了吗？

三、两个“和谐”从理论上保证了中国在政治上不会有倒退的前

途

最重要的，我要着重说明一点。我以为，在中国要建立“和谐社会”，这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重大的历史收获，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自取得政权后到今天作出的一个空前的重大的决策，八十八年来，谁敢讲“和谐”这两个字？打倒江青帮反革命以来，又谁敢说“和谐”这两个字？现在，中国找到了一条新路，决定在国内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永远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永远不再强调搞阶级斗争，挖去这条天天内斗的孽根，这块危险的癌细胞，从根本上改为强调和谐发展。在打倒了江青帮以后，邓小平同志以超人的勇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流”这个伟大的口号。我以为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根本精神，它同时也为今天的两个“和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我一见到报上“和谐社会”这个提法，就像成仙成佛一样地大欢喜。因为，每个中国人，至少像我这样的人，心里边还是担心：会不会有人在哪天又要发动什么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呢？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诱人了：只有残酷无情的斗争，才能保持残酷无情的集中权力；也只有残酷无情的集中权力，才永远需要残酷无情的阶级斗争。但是，“和谐社会”口号的提出，就从理论上讲明我们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且是长期的，永久的，而不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和谐社会”就是要弱化、软化，消除可能的或已有的社会矛盾，而绝不是加剧和扩大社会矛盾，非斗得个酣畅淋漓，不可收拾不可。

有些读者很可能讨厌我两次用了“伟大”这个字眼。我估计其中四十岁或三十五岁以下的朋友居多，因为他们不知道“不和平”的日子是个什么样子。“和平”在中国首先是“除弊”的问题，中国要再不保持永远的内部“和平”，再出现已经经历过的某些岁月，那么“江山如此多娇”就要变成“江山如此多焦”了。难道国内的“和平”发展，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吗？

同时，我要特别声明：“和平”在中国根本上是上对下、官对民、权力者对非权力者的问题。下对上，哪个有敢不“和平”的？闹事？谁在闹事？例如，你把人民的那点土地——命根子事实上无条件或半无条件地

拿走了，受害者冒死聚众请愿，这就要武装解决问题吗？这同“和平”解决国内矛盾问题的大方针是一致的吗？人民什么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叫“顺民”，有悖于当代任何先进民族的素养，我们绝不要这个东西，这样的国家强不起来。十三亿顺民，何以在当代及今后的世界上立脚？人民需要的绝不是单方面的、无条件服从的“和平”。如果把“和平”只往这方面解释，那就变得对人民不讲和平了。

我能够在生前看见这两个“和平”或“和谐”的口号，内心里确实感到非常安慰。对我来讲，这是此生所能收到的最好的信息了。光是说经济怎么上去，是好，但这不够，因为随时都可能动摇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党把这两个口号庄重地宣示天下，至少在中国，把内部互相消灭的这种可怕前途，从理论上、根本上把它否定了。我现在死去，就放心得多。如果国家的前途大体上不会大逆转了，这不就可以落下多年来高悬着的那颗心吗？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东西呢？

多年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我问过很多人，同我一样，都回答不出来，说没有听传达或解释过。现在，我以为好了，包括国内和世界在内的这两个“和平”或“和谐”，不就能够相当扼要地得到回答了吗？

当然，国际和平相处，是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力量去争取的，但它不决定于我们单方面的希望。因此，只有加强我们足够的自卫力量，才能希望取得和平的生存环境。当前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国际环境，中国越弱越不利于国际和平。

我明确地、坚定地拥护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为目标的伟大决定，我们应当努力从各方面正确地去逐步实现这个决定。

2008年7月到11月

后记

在朋友的建议下采访曾彦修老师，并做一本访谈录之类的书，无论是朋友还是我，都知道此书是为了保存真实的、有价值的记忆，但希望曾老师接受采访，费了一些周折。好不容易他才同意。

采访是从2008年7月开始的，12月基本结束。几乎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我都背着电脑，带着录音笔去北京南边方庄曾老师的家。客厅有一张长方形的胶合板大桌子，他坐长的一边，我坐宽的一边，一坐就是三个多小时。

开始我曾担心曾老师的记忆，因为他年近九十，但我很快发现，他的记忆可以说是超常的。他手边没有一本书，所有的书都打包装箱准备搬家，而他说到一本书的一篇文章，八九不离十。他审核文稿时，如果我稍稍把他的“记忆”挪动一点，他都会“恢复”原样。用他的话来说，“很多事像刀刻的一样”，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曾老师的讲述极富感染力，讲到一些事件时，他会越讲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声，还辅之以手势。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整理，又经他修订的《曾彦修访谈录》就非常有现场感。我相信，读完这本充满不屈和希望的书，读者肯定会感受到这一点。

2015年3月我与曾老师告别时，又一次感谢他接受我的采访。我想，他的讲述，不但会影响我这一辈人对他经历的历史事件的认识，也会给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留下宝贵的记录。

李晋西

2015年11月

封面照片摄影：马立国

在我一生经过的一些大事中，我的原则是：一切按具体情况处理。明知其错的我绝不干。为此要付出多大代价，我无条件地承担就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常常都会有例外的，唯独有一件事情，我觉得绝不能有例外，那就是：良心。

——曾彦修

曾彦修访谈录



扫扫有惊喜

ISBN 978-7-02-015649-8

9 787020 156498 >

定价：49.00元